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论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幸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前 言

空军元帅威廉·埃利奥特爵士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会长)

德国不仅仅在地理上位于欧洲的中心。几年来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德国的繁荣对其毗邻国家关系至为重大，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对负责编辑《国际事务概览》者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丛书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状况，对于为重建德国，特别是在至为关键的早期所面临的问题，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对这个问题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乃约请迈克尔·鲍尔佛先生撰写该卷中的德国部分。鲍尔佛先生专攻历史，他熟悉和研究德国问题达二十五年之久。1945—1947年间他还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任负责工作。但是他的这种官方背景不应被理解为官方同意他的见解；他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官方正式文件，书中所表达的纯属他个人的见解。

鲍尔佛先生此著大体上包括1945年5月至1946年12月这段时间。这也许是德国整个历史上最艰难最不幸的时期之一。由于纳粹的野心，这个国家在这段时期中，真是问题重重，灾难深重。这一段历史与其前后时期的历史相比，差距非常显著，但是由于查塔姆大厦《国际事务概览》编写体例上的特点，读者仅仅通读本书是不能领略这种差距的。永无止境的历史事件只能分段撰写和出版；阅读本书时度同时参致《希特勒的欧洲》一书以及从1947—1948年度始每年出版的备卷《概览》。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德国历史几乎完全处于黑暗的时刻，只有变，从而为一项有成效的合作计划奠定了基础。

本卷还收有约翰·梅尔先生撰写的关于奥地利在大体上同一时期的情况；查塔姆大厦有幸又找到了一位对自己所写事件掌握着第一手材料的作者。梅尔先生从1945年9月至1948年10月曾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政治部任职。但是他同鲍尔佛先生一样，撰写此稿时也没有机会接触正式的官方文件，他所表达的也纯属个人的见解。

四国在德国进行管制的历史与在奥地利进行管制的历史有互相阐明的作用，把二者合并成一卷，对《概览》的读者不无方便之处。当然，有关作者只能对其所写的部分负责。

1955年10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1945—1946 年

第一编 四国对德国的管制 1945—1946 年迈克尔·鲍尔弗

你骄傲的心啊！你确是这样地冀求过，你冀求幸福，要么享尽无限幸福，
要么忍受无限痛苦，骄傲的心，如今你终于苦难重重。

海涅

作者序

作者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当地报社门前阅读有关 1930 年 9 月 14 日选举结果的报道，获悉纳粹党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是作者头脑中有关德国的最初印象之一。作者对纳粹上台所造成的局势极为关切，因此在 1939 年以前曾五度返回德国，凡是能到手的印刷品都一一阅读，并与德国朋友保持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期间，有机会接触盟国掌握的有关德国平民状况和士气的绝大部分情报。1945 年 6 月回到德国，同年 9 月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一个官员前赴柏林，其间从 1946 年 4 月至 1947 年 9 月任对德新闻管理处主任。其后辞去该职，赴伦敦任职，但后来又曾两度访问德国。

以上所述作者的详细经历可以说明：当 1952 年末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询问作者能否撰写一本阐述占领初期情况的书时，作者真是跃跃欲试。然而这不是一项能轻易接受的任务。要写一本符合要求的书，首先得搜集大量事实材料，这些材料需要到各图书馆去查考，而作者身负的其他任务又不容许就此课题进行持续的研究或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办法帮助扫除了障碍。首先作者的妻子表示愿意承担大部分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其次，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明确表示这本书只需对事实勾画出一个轮廓而不必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详加论述。

尽管如此，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零星时间拼凑而成的，疏漏之处很多。作者愿意在一开始就把最突出的一些缺点讲清楚，这对批评家或许不无裨益。

首先，所选定的历史时期是武断的。因为本卷是《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 年）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会建议本书论述的历史从欧洲胜利日起至 1946 年 12 月 31 日止。从德国问题的观点来看，后一日期委实没有特殊意义，仅仅是双占区财政安排生效的前夕。但是思考再三，选择其他的日期作为终点同样会遭到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解体，货币改革，对柏林的封锁等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中间而不是开始或末尾，如果把这几个历史事件都罗列进来，势必要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在 1947 年内也找不到明显的终点日期。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论述的时期乃从 1945 年 5 月 7 日开始至 1946 年 12 月 31 日止，但是为了阐明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或勾画出一幅较完整的景象，需要越出这两个时间界限时，作者也毫无犹豫之处。这样做，无疑会使体例欠完整，然而对读者还是较为方便的。

第二，有许多题目完全放过了，包括一些重要事情，如：法律改革，公共卫生，德国思想的发展等等。还有一些题目，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只作了粗略的叙述。对比起来，关于新闻宣传机构的论述也许失之于过长，与其地位不相称；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是鉴于过去对这一问题尚无其他充分论述的材料，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又特别熟悉。总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广泛地论述。而不作详尽的描绘。这个题目写上七本书肯定也是值得的，作者没有这样做，也许还是受到一些读者欢迎的。事实上，全书已比原计划的字数几乎超出了一倍。

第三，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原本本，而不是仅仅编纂大事记。同时读者也可能非常希望从这样一本著作中找到有关占领的主要事实和统计资料。为了不让这两项材料妨碍叙述，作者尽量将其集中放在脚注中，这就可能使很多书页下面塞满了脚注。对使用本书的大多数读者说来，

不妨将脚注略去不看。

第四，一个老问题，即对几桩平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叙述。作者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使材料的安排务求有利于突出要说明问题的最主要方面。以第二章为例，关于战时演变是按国家分头叙述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重复并需采用大量的前后参照材料。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料早已出版，而且毫无疑问今后还会有其他类似的著作问世，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重复叙述史实，而是要说明各占领国对德国的不同态度。有关占领的主要史实则放在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中加以叙述，因为这则乎是全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本书叙述的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象到处流浪的米迪安军队那样的倾向，时而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因此希望批评家就整本书而不要就某一部分进行评论。

第五，作者在阐述某些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时，则力求客观，但深信完全排除个人偏见则不可能，同时也不想掩饰自己是站在英国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研究⁵ 阐述这段历史的。在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英美两国演化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人类设计过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唯一的前提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们，首先要能适应这种必需的相当严格的条件，这一政治制度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作者在写作时力求避免以恩人自居的面貌出现，作为一个非德国籍的自由党党员，在探讨德国问题时是很容易造成这种印象的。如果作者能做到不期望猪也会飞翔的话，那么他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好象他之怜悯猪正是由于猪不会飞翔。

初稿写成以后，承蒙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慷慨协助，把油印稿分送给从不同角度关心德国占领问题的友好审阅。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仅使作者避免了许多事实错误，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想法，使作者澄清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不便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谨借此机会对他们不辞劳苦给予协助公开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同时必须申明，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本书于 1954 年秋定稿，因此在这以后出版的书刊材料：只在个别情况下予以引用。

迈克尔·鲍尔弗
1955 年 10 月

德 国

第一章 投降时的德国

1945年3月19日，在盟军沿雷马根桥渡过莱茵河之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要求把敌方进军沿线所有交通道路，铁道车辆、卡车、桥梁以及水坝、工厂和供应品一律予以破坏。^①他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的结局是失败，德国也要毁灭。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连保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任何必要去加以考虑了。“相反，不如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通通破坏为好。”^②施佩尔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是在精心策划，让人民和他自己同归于尽，”^①很久以前，希特勒还对劳施宁说过：“我们可能要遭到毁灭，果真如此，我们就要把全世界都牵着和我们一道毁灭——让全世界化为一片火海。”^②现在这种威胁确实出现了。第三帝国从头到尾摆出了一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的架势，并竭尽全力地把德国推进了一个现代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之中。

事实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只是阵发性地实施过一阵。盟军在德国本土作战，节节向前推进时，的确遭到过不少拚死抵抗。这样一来，在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之外，又加上作战带来的损失。德国当年在格尔尼卡、华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亲自饱尝其恶果了。许多德国城市，如科隆和纽伦堡等地的中心已化为一片废墟，使一些曾经游历过的外国人几乎无法辨认了。科隆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住宅破坏殆尽；在杜塞尔多夫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住宅不能居住；^③法兰克福的十八万套住宅中有八万套被毁。据计算，如在柏林每天开出十列有五十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十六年才能运完。^④在英占区的五百五十万套住宅中有三百五十万套或完全被毁或严重损坏。^①在波茨坦协定所划定的德国领土范围内，原有一千六百万套住宅，其中有二百三十四万套被毁，还有四百多万套至少损坏了百分之二十五。^②盟国一些听过有关房屋破坏情况汇报的人员，刚刚进入德国时，看到还有那么多建筑物仍旧屹立在那里，开始感到很惊奇。其实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大城市的建筑物没有伤痕的寥寥无几；以汉诺威为例，未遭破坏的建筑物不到百分之一。^③受害的不仅仅限于大城市；较小的城镇，如希尔德斯海姆和海尔布隆也损失惨重；即使乡村亦未能幸免。作者于1945年6月曾乘飞机从法兰克福至慕尼黑，沿途所见至为惊人。开头看到好一些村庄在外表上还完好无损，后来就看到另外一些村庄，恰巧是德军进行疯狂的最后抵抗的场所，都变成一片焦土了。一般来说，1939年只住四个人的地方，现在有十个德国人挤在一起住，^①即使这样，还使用了一些不能叫做住宅的地下室和临时房舍。

遭到破坏的不光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物，办公楼，剧院，艺术馆等等也全都毁坏了，在纽伦堡，四十座新教教堂中有三十座被毁。在柏林，所有一百八十七座福音派教堂全部遭到轰炸或炮击，其中六十九座被毁坏无遗，^②在科隆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学校被毁或严重损坏：^③在柏林有一百四十九幢校舍被毁，三十六幢严重损坏，二百二十一幢需要大修，八十一幢移作他用，只余下一百六十二幢完好可用的。^④全国二十三所大学中有十四所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坏。

盟国依靠空军优势使德国运输陷于瘫痪，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然而经验证明，只有广泛而持久地进行空袭，才能有效地破坏交通运输。对德同进行这种轰炸的结果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英占区的一万三千公里铁路只

剩下一千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一千公里还是不相连接的，一万二千辆客车中，有五千辆无法使用，其余的也大多严重损坏。机车中可用者不到一半。

①全德国有二千三百九十五座铁路桥梁不能使用，在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九百五十八座主要的河道桥梁中有七百四十座不能使用，②其中包括跨越莱茵河的所有桥梁。没有一条航道是通航的（只要想到莱茵河社伊斯堡以下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的航运量还要大，就不难理解航运破坏的影响之大）。英占区的运河网上有五百四十座遭到破坏的桥梁需要拆除。③在汉堡有五十艘商船，十九座浮船坞，还有许多较小的船只沉没在港口。④英占区有一千五百个长途电话交换台被破坏，相当于 1939 年该地区所有设备的一半。⑤西方各国的普通公民现在把方便的交通运输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在德国交通遭到破坏似乎暂时中断了文明生活。

有些最严重的战争创伤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易于体察。从 1938 年至 1944 年期间，公共债务由四百亿德国马克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亿德国马克，纸币流通量由一百零四亿德国马克增加到七百三十亿德国马克。①用硬性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抑制物价和工资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只能使纳粹政权消失后的通货膨胀来势更猛。以数量增加了的货币去猎取数量较少的物资，而价格维持不变，结果使占有货币便成为次要的了。人民群众由于普遍期待着某种货币改革和削减债务的措施，因此对货币的信心便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这是促使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失败，幻灭，以及认为努力一直是徒劳无益等意识，很难提高人们的品德标准。在德国，这种情况是在纳粹匪帮持续统治十二年之后出现的，因为纳粹千方百计把德国人经历过 1918 年的灾难和 1922—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仍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破坏殆尽，即使那些并不赞同纳粹分子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毒害，德国主要地是已经失去了道德感。

生命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据统计在战斗中德军死亡人数达三百十万人，平民死亡人数达十万人。另外五十万平民死于空袭；由于战争直接造成死亡率增加而死于非命者估计达四十万人；②此外据信有二十万人死在集中营里。①阻在西德就有二百万人残废。②又据统计，1924 年出生的德国人当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五人死亡或失踪，另外三十一人程度不等地变成严重残废者，③1939 年全人口中男性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到 1946 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战前妇女比男子多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人，这一数字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人。④在二十岁到四十五岁范围内，女性和男性是一千四百八十二与一千之比。⑤结核病患者由 1939 年的四万二千人增加到 1943 年的七万五千人。⑥

死亡率既然激增，活着的人要想吃饱肚子，这就很难说了。农业方面，牲畜头数大大下降；据统计 1937 年英占区共有牲畜一千四百八十万头，即使在 1944 年仍有一千三百九十万头，到 1945 年则已下降到九百十万头了，

主要是缺乏饲料所致。①未来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由于缺乏肥料和人力而受到威胁。德国的农民一向是靠碱性矿渣肥料来提高贫瘠土壤的单位产量的，但矿渣肥料乃是钢铁生产的副产品。过去农业劳动力充沛，有可能实行集约耕作。但在战时此项劳力是由外籍工人提供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迅速回国，而他们所顶替的德国人或者已经阵亡，或者还在部队里没有复员。运输的梗阻更 11 增长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而且给囤积产品提供了借口，那些产

品如果上市出售，很可能只是换回无用的钞票。

德国遭受的损失并不完全是由敌方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纳粹党的划一政策——用单一的政治观点向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进行渗透的主张——把许多最有才干最优秀的公民不是置于死地，就是从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1933 年以前的一代人中幸存下来的都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即使其中有一些后来还很活跃；他们的天然的接班人或者死亡，或者移居国外，或者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有十二年之久，其中一半是战争岁月，德国人接触世界上各种主要思潮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受到阻碍，而当权者则不遗余力地传播一种冒牌货来取而代之。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不戴纳粹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人生，或者有机会得知事实真象并据以进行自由探讨的话，那就算是幸运的了。

上而所说的就是盟军进入德国时所面临的一些情况。战争所造成的破坏颇为引人注目，但其结果在很多方面都被夸大了。在一片瓦砾堆下有好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仍完好无损或者很容易修复。的确，1945 年 5 月鲁尔地区的煤炭上业日产量只二万五千吨，而战前平均日产量则力四十万吨。①钢的生产量甚至更低。1945 年 8 月美占区的钢铁厂中恢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五，而产量只达总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②次年秋天的一项估计证明，即使在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主要目标的鲁尔地区，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厂房和机器给破坏到不堪修复的程度，③就全德国而言，不堪修复的厂房和机器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④交通运输易于破坏，但也易于修复。1945 年 5 月英占区铁路总里程中只有十二分之一行车，到次年 11 月仍未修复通车的则只有十三分之一了。⑤在屡遭空袭的汉姆，候车室至今仍保留其仿造时廉时代的人理石浮雕。德国有些港口几乎未受损伤，即使在汉堡港也还有一些深水停泊地是完好无损的。一位英方军管官员对德国工厂情况作了一次典型调查，发现德 12 国工厂的库存物资和原材料比英国工厂要雄厚得多。①煤产量是下降了，但是地面上还有存煤二百万吨。②

再者，1944 年以前，德国靠掠夺欧洲各国发了横财；其他各国所受损失有甚于德国。因为德国不仅从被占领国家拿走粮食和消费品，而且在许多为别人所根本料想不到的地方没有非同寻常的宝物仓库，储藏价值不等的珍贵物品。③据说一位为此感到困拢的美国民政官员向其上级讲过这样的话：“现在我可以五个管工业的官员，但是首先请给我派一名负责清理掠夺物资的官员。”④有二十万台机床拆迁到德国，德国的机床总数由 1938 年的九十六万六千台增加到 1945 年的一百三十万台。仅法国一国就支付了七千亿法郎的占领费用。⑤结果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大大提高。在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唯有德国 1944 年的工业总产值高于 1938 年。⑥受损失的主要是德国的社会资本；德国工业设备所遭到的长期性损失并不算大，虽然战败后的混乱情况和交通的破坏使它看起来似乎损失比较严重。即使在社会领域里，情况也不是一片凄凉。一位熟悉英、德两国情况的苏联军官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人看上去比英国人更丰满，没有英国人那么疲惫，芽着也比英国人强。这位英国记者在德国各地旅行了四个月以后倾向于同意苏联军官的看法。①

战事闹哄哄地结束了，接着是潮水般的人口流动。首先有七百万德国武装部队向西方盟国军队投降。②美占区在美军进驻前已从德国东部流入一百五十万人，他们在苏军挺进时弃家西逃。③英占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遭到

轰炸的大城市有一千万居民撤退到乡下，④虽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有点令人惊异的是人口的流动方向似乎倒转了过来；例如，从什切青抵达柏林的最后一列火车，据说满载着原来从柏林撤出的人口，他们急于在征服者到达前回家照管他们的财产。4 月间，纳粹分子曾试图把政府各部门一分为二，分别从柏林朝南北两个方向撤退：13 有些在中途搁浅，携带的档案卷宗象雪片一样沿铁路线到处飞扬。在德国各地多种多样的隐蔽场所中都挖掘出文件、档案、博物馆的文物和私人收藏的珍宝。随着纳粹政权的倒台，有六百万外籍工人以及许多盟国的战俘象断梗的飞蓬一样到处流动，他们纷纷挤向公路，急于觅道还乡。在这个日益紧缩的地带内除了拥塞着上述形形色色纷然杂处的人群之外，还有八百多万盟国军队蜂拥而来。①

从东西两方涌进的人流到了易北河畔就煞住了，犹如上涨的浪潮在高水位上停住了一样。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虽然大体上是按照外交方案行事的，但却立即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在随便哪个发达国家所必然要出现的一种情况。例如中部德国的采矿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依赖于鲁尔地区。纺织工业的纺纱业集中于威斯特伐利亚，而织布业则集中在萨克森。②主要在美占区生产的照相机，需要俄占区供应光学玻璃，法占区供应镜头和快门。③俄占区的人口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但造纸工业的生产能力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俄占区生产的钾盐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④美占区工业的全部用煤和俄占区工业的部分用煤要靠英占区的鲁尔来供应。德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百分之六十八集中在美占区，而这些工厂也是修理它们所制造的汽车所需零件的唯一来源。①瓷土、石膏以及烧制细瓷容器所需的特种耐火粘土等邻邦是巴伐利亚州的陶瓷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但只产于俄占区。②要想复兴工业，就得保证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能够继续畅通无阻。而运输体系的解体意味着即使没有政治上的麻烦存在，恢复生产也殊非易事。③

人们得吃饱肚子，才能工作，可是食品供应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俄占区的牛肉、羊肉、牛奶、黄油、奶酪，水果、蔬菜、鱼和蛋等都供应不足。④俄占区只拥有全国乳牛存栏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拥有的羊则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八。易北河以东的大农场过去一直向鲁尔和莱茵兰工业地区输送大量制造面包用的谷物、马铃薯和糖（虽然在 14 这种看来不合逻辑的经济体系失去管制时，有一部分谷物已从西方运到了东方）。举一个虽然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德国种甜菜所需要的种子大部分靠马格德堡附近一小块地方供应；如果在 1945 年夏季该地区还属英军占领时未能将甜菜籽供应各地，那么 1946—1947 年英占区和美占区的食糖配给量就还要少得多了。据克莱将军的记载，⑤西部各占领区在 1935 年至 1938 年间的农业生产，只能配给每一消费者一千一百卡路里热量的食品。

这就是盟国军队进驻德同时的情景，由此可见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但是盟国自身不能把全部甚至是大部分注意力倾注于德国。他们心怀异志，如何取得协调，这个问题姑且不论，几年来他们自身就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坏。在 1945 年 8 月以前，人们都认为盟国的力量须得转入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一旦结束，临时参军的大部分战士迫切要求脱掉军装；他们的亲友也都吵吵嚷嚷地要他们回国。不出几个月，美国军队实质上陷于解体。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占领军部队内部人员的不断流动，这些都有损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目标的持续贯彻。俄国所面临的重建任务比德国还要艰巨。英国如果不能迅速恢复起点几等于零的出口贸易，就要

挨饿，因此必须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国内。法国不得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几个方面重起炉灶。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国都因被德国占领而苦难深重。在从战争转向和平的过程中，到处都充满了难题、紧张和不安，这就使各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在这种转变过程结束之前，甚至在结束后的几年之内，各方面的匮乏部不得不加以考虑。对德国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牺牲不幸的受害者而优待残忍的敌人。

第二章 各占领国的态度

第一节 美国

美国政府最初对战后世界秩序表态的文件是大西洋宪章，但是这个文件并未具体提到德国。然而大西洋宪章第八节对德国的战后待遇明显地有所预示，要求对那 15 些“在本国国境之外进行侵略或可能要进行侵略”的国家解除武装。这个意见未见于丘吉尔起草的初稿中，而是由罗斯福提出来的。^①大西洋宪章所保证的利益不一定适用于德国，这一点到 1944 年才趋于明朗。^②1942 年美国采取了制订对德政策的下一个步骤，由国务院成立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不担任公职的名流。^③他们的一般想法是通情达理，温和适度的，成为国务院制订政策的开端。具体他说，他们反对强行肢解德国的任何尝试，理由是这样做只能激怒德国人起来造反。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为他们的上级所采纳。从一开始罗斯福总统似乎就赞同分割德国，^①一般说来罗斯福是主张强硬路线的。正是罗斯福，他在出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说，他要使会议采纳“无条件投降”的定则。^②他所以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永远不能忘记威尔逊总统的烦恼；他认为威尔逊制订十四点政策作为光荣投降的依据，给战后世界招来不知多少麻烦，因为各国对十四点是否遭到违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③1943 年 2 月 12 日总统在白宫同记者们谈话时说：“我们不想伤害轴心国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他们的罪行，对他们的凶残暴虐的领袖，必须给以应有的惩罚。”^④同年 3 月，艾登告诉罗斯福，说斯大林很可能坚持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①罗斯福对之井无异议，只是表示希望通过鼓励分裂的运动来促其实现。罗斯福的个人助理霍普金斯问他：如果掀不起这样的运动又怎么办？总统说，不论情况如何，必须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②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也赞同分割德国。在 1943 年 10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他的上级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说，这是美国领导人一般都赞同的方针政策，虽然专家们都认为行不通；艾登和莫洛托夫也都说英国和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仿。^③

然而美方代表团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是由专家们负责起草的，事前准备这份文件时就会按照总统指示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过磋商，因此，其中体现了英国人以前的想法。^④这份文件已经包含着全部占领德国并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的主张。但是除了提议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考虑到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传统联系，这个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以外，文件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文件规定要摧毁德国制造军备的能力，要根除纳粹主义，但是要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规定德国要对它造成的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但容许德国人享有“能过得去的生活水准”。规定德国的经济活动要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应制订人权法令，以保证言论、信仰和出版的自由。莫斯科会议同意接受该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会议决定在伦敦设置欧洲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拟订对德政策的细节。

然而就在下一个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英美苏三国首脑对于他们的外交部长刚刚讨论通过的方案竟很少理睬或不予理睬。罗斯福重申分割德国的主张，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由联合国管制。^①此项建议稍作讨论之后，便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在讨论这一建议时，斯大林显得比丘吉尔还要冷淡。^②欧洲咨询委员会于 1944 年 1 月 14 日召开首次会议，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一开始，就出现了障碍，英、美两国对德国西北部应作为谁的占领区的问题争持不下。这一争论

直到 1945 年 9 月魁北克会议时才得到解决。③事情并不止于此。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会议的是驻伦敦大使约翰·G·怀南特，为了使他得到的指示不致自相矛盾，在华盛顿设立了对外称为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任务是协调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方面的意见。陆军部的代表来自民政局，这是最近成立的机构，准备研究处理将要出现的军事管制政府的各项问题；其大部分成员是穿军装的律师，他们倾向于把整个问题视为管辖权问题。起初他们坚持“德国的投降和重建纯属军事问题，须由军事当局作出决定”。①在他们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委员会以后，派出的人却是一位下级军官，无权表态承担义务。既然不急于作出决策，压力可能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就处理德国问题的方案取得协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留待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议，那时战后世界的轮廓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而得到怀南特大使大力支持的国务院则争辩说，恰恰相反，应当乘胜利之日尚属渺茫的时候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在这一阶段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②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确作出努力来划分临时占领区的界线，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 1944 年 1 月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他反对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主张采用盟国共同占领的办法，至少英、美两国不要分家。③然而他的主张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陆军部认为美国在战后不可以同英国绑在一起，必须脱开手，以便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居中斡旋。①

美国国务院按其既定方针行事。它在 1944 年 7 月向欧洲咨询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新的方案，提出更多的论据来反对分割德国，并强调盟国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对德政策。②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对英国以前提出的赔偿建议提出反对理由，而代之以在较短时期内由德国用实物进行有限赔偿的提案。③但这些都只是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主张，既未得到华盛顿其他政府部门的赞同，也未得到总统的同意。总统如曾过目，肯定会认为失之于过分宽大。这种态度可以用来说明他为什么乐于倾听提出新的原则的原委。

美国财政部在政府中的影响通常不如英国财政部那么大，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回在小亨利·摩根索的怂恿下 18 美国财政部对德国问题的干预是无关重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前已经有好几次表现出他很关心主管范围以外的事务，还在德国飞弹轰击英国的高潮时期，他就访问过伦敦。他似乎在情感上强烈反对德国，德国迫害犹太民族的暴行对他触动很深，由于这种情况，又由于他相信英国会赞同过于宽大的和平条件，他起草了一个臭名远扬的方案，问华盛顿后即呈交总统。①

对摩根索方案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都把这个方案视为无知之作，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方案的缺点倒在于聪明过分。他提出这个方案并非单纯出于他对德国的盲目仇恨，而且还出于他对其他方案的吹毛求疵。摩根索行事过于仓促而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象丘吉尔所说的那样，②他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逻辑的结论”。他论证道：如果盟国仍然采用 1918 年以后试图对德国施加的那种控制，不管实施得多么严格，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是堵塞不住的。③毁掉现有军备无济于事，在德国人再度需要武装的时候，原有军备早就过时了。没收德国的商船队也没有用，只能迫使德国人建造质量更好的新船只。转入和平生产的军火工厂随时都能再改回去。管制委员会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要停止其职能而被撤销。用实物而不用货币赔偿则会加强德国的工业实力，从而削弱接受赔偿国的工业实

力。德国掠夺去的财物很难一一识别和收回。取缔纳粹主义只是将其驱入地下。强施民主，将遭失败，因而很快变得不受欢迎。由联合国对德国进行再教育更是一种行不通的理想：“有哪一位教育家敢于断然声称外来的教育可以成功地强加于六千万人民呢？”^①

在摩根索看来，采取裁军和让德国改弦更张等积极措施是徒劳无功，自拆台脚的，除了无情地把德国化为一个在今后许多年代再也不能为非作歹的国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主张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负责在战后缔造和平的人来说都是基本的问题，对 19 之确实没有简易的答案。摩根索主张对德国要残酷无情，这表明他未能理解一个文明国家虐待另一个文明国家有一定的限度，越过限度是行不通的。正如史汀生后来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德国人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而是〕在于在今后许多年内……能否象财政部的方案所设想的那样，把七千万人的生活控制在仅能维持温饱的低水平上。……一个从属的问题是：即使能够这样做，这对世界上的其余部分从经济上或精神上来看是否有好处。^②

我们对摩根索方案的缺乏人道之处可以表示反感。

我们可以谴责这个方案行不通，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准备实施，也不相信别人会贯彻实施。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摩根索方案毕竟对至今还没有人拿出良策的问题提出了首尾一贯的答案。

在这时刻，种种方案都正在草拟，以备万一，因为人们认为盟军将突破德国防线，西线战事将于 1944 年秋结束。那些负责组织军政府的官员不得不在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对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作出明确指示的条件下起草指令。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德国处按照同美国国务院制订的原则相类似的指导思想编写了一本军政府人员工作手册，这本手册确定了对德国居民供应食品的数量以维持每人每日二千卡路里为目标，理由是标准再低，人们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虽然手册也承认占领初期的食物供应量可能只够维持每人每日配给一千二百卡路里至一千四百卡路里之需。手册还规定德国可以保留一些重工业，1944 年 8 月，这本手册的油印本落入摩根索派驻欧洲的私人代表手中，他立即把这本手册送回华盛顿。^③总统审阅以后，一反常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手册的起草者对德国人太手软了。手册被迅速收回，再没有编写出别的手册来代替。罗斯福在 1944 年 8 月 26 日写给科德尔·赫尔的一封信中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回德国是一个战败国。我并不想让他们饿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为了活命，除自己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救济的话，那就让他们每天三次到部队的粥汤食堂领粥汤好了。……必须让全体德国人都痛切地理解整个德国都曾参与了破坏现代文明准则的无法无天的阴谋。^④20 对残忍表示激动愤慨是自由主义者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罗斯福是以兼具高尚的情操和锐利的政治敏感而著称的，系统的思考问题则非其所长。再者，这时盘桓在他头脑里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作战的决策，而这也是三军参谋长们要专心致志去思考的问题。罗斯福的健康情况正开始恶化。^⑤1944 年的前七个月，哈里·霍普金斯一直是在住院休养，^⑥而赫尔本人在 1944 年 10 月宣布退休前也已害了一阵子病。这样一来，总统身边就没有一位懂得战后欧洲问题或深刻地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了。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对德政策，规定对德国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赫尔提到要管制二十五年至五十年），而罗斯福在雅尔塔告诉斯大林说，美国

国会根本不会同意让美军驻扎德国的时间超过两年。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找到机会让罗斯福倾听他的意见。^④

到8月底，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诉说道：虽然美军即将进入德国，但对德政策尚未制订。于是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了一个由赫尔、史汀生、摩根索和霍普金斯四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考虑德国问题。四个人的副手于9月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怀特阐述了摩根索的想法，讨论毫无结果而散。四人委员会于9月5日开会，翌日又开会，这天总统亲自到会。摩根索坚持他的观点。霍普金斯似乎主张把德国的钢铁工业予以废除。赫尔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想法为依据，但是他建议应该把德国的经济“压低到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主张“消除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①这些意见似乎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所作的这些补充并未征得国务院的同意。与赫尔对比，史汀生的主张显得比陆军部前几个月所起草的方案更为胸怀宽大。^②就这样，在盟军已开始进驻德国，敌军在欧洲的抵抗随时可能瓦解的时刻，眼看再过几天就要在魁北克召开重要会议，总统还没有就战后对德政策作出决策，而他授命协助他工作的四位高级顾问却还是各执己见，无法结合。

^③

召开魁北克会议的本来意图是只讨论军事问题，所以开会之初，赫尔和艾登都不在场。另一方面，摩根索却受到特别邀请，于会议中期到达，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提出了他的方案，在9月15日得到两位领导人的草笠同意。方案规定把德国划分为独立的南、北两部分，对鲁尔实行国际共管，把萨尔割让给法国，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波兰，并且规定“把构成军事实力基础的关键工业拆除和毁坏”。^①请英国的读者们不要忘记，当时使总统和首相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战后面临的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在签署上述方案的同时，双方还就向英国提供六十五亿美元的信贷达成了协议，还期望英国打进德国重工业所失去的市场。^②有些人提出批评，说德国工业乃是欧洲繁荣所不可缺少的，摩根索回答说，英国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缺。关于德国西北部划归哪一国作为占领区这个争吵不休的问题，总统也屈从了英国的要求。

背着主管部门作出决策，总是要引起轩然大波。这次美方代表团从魁北克返回华盛顿，马上就爆发了一场风波。消息泄露出来了，舆论反应不利。后来内阁的四入委员会复会讨论时，史汀生和赫尔联合起来反对摩根索，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面对着一片抗议声，总统否认他有把德国降为农业国的任何意图；他还告诉史汀生说，他不知道怎么会在魁北克协议中有关德国的这一段上签字的。他说：“准是不假思索就签了字。”^①他向另外一位官员承认：“他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②正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绝在四人委员会上处理这个僵持不下的难题，他说他不²²能容忍在自己的顾问中间存在这样严重的分歧。^③他还告诉赫尔说，他认为同英国人、俄国人进一步讨论如何处理德国工业的问题没有什么益处。^④他在9月28日指令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T·克劳利负责协调美国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⑤但是到10月20日，他又表示不喜欢“对于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详细的计划”。^⑥民政司利用总统的这种态度，获得了他的指令，终止一切有关战后德国的规划工作，包括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的磋商，到1945年4月，才绕过这个指令所设置的障碍继续前进。

^⑦

总统本人在下一次针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发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竞逃运动之际）对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至于说德国，这个播下了罪恶种子的悲剧性国家现在该要收到十倍的恶报了，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决不同纳粹的阴谋家打交道，决不再让他们对政府机构保留丝毫控制权，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我们将不容许他们保留一点点军事力量——或潜在的军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当中毫无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义感，都热爱和平——尽管在德国人当中，由于残暴政权的统治，这些东西可能被埋没了。对于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丧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么我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们对德意志种族毫无责难之意，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上帝会对人类的任何一个种族作出永劫不复的判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祖籍是德国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忠诚的公民。

对于德国所有那些应对这场人类浩劫直接负责的人们，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德国人民将不会遭到奴役——因为联合国家决不会从事贩卖奴隶的勾当。但是德国人有必要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在爱好和平和遵守法纪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赢得一席之地。在他们攀登这段艰难险阻的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他们有携带枪炮的累赘。我们希望给德国人永远解除这个负担。^①

然而难以弥补的损失已经造成。对于所有那些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倾向于实行“仁慈宽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警告。总统对自己一度同意过的意见，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鉴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遭到过极其严厉的谴责，愿意给自己招惹同样灾难的人便寥寥无几了。在此后两年内，面临政策抉择的美国人总是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摒弃仁慈宽大的政策，只是由于英国人坚持反对立场，强硬政策才没有被完全采纳。

其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颁布的一〇六七号绝密指令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响，这个指令是1944年冬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处理德国问题的一份规划性文件。美国推行占领政策的最初几个阶段实际上是受这个文件制约的。它虽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说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销。^②这个文件不可避免地是总统四人委员会不同意见的折衷产物。这个文件定稿之后，更订生无疑是因为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这场斗争而认为它是一份“相当好的文件”，虽然在两年之后他认识到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极文件”。^①每一个主张几乎都附有保留意见。没有规定采取“旨在恢复德国经济”的任何步骤——所采取的措施仅仅限于为将来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作出必要的准备或者防止疾病和骚乱而已，德国是“作为战败的敌国而予以占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占领“是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规定不采取步骤使德国的生活条件优于毗邻的任何一个联合国家的现有水平。占领当局对德国人的态度要“公正但又要坚定而冷淡”。“切不可”对德国人表示亲切友好。要实施彻底的非纳粹化纲领。大力强调有必要让德国行政机构负起最大限度的责任。但在德国要实行地方分权而并不予以肢解。虽然要实行“工业上的解除武装”，但在某些情况下要对重要工业部门实行监督管制，而并不予以撤销。

草拟指令是一回事，对指令取得一致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斯退丁纽斯接替赫尔担任国务卿以后，美国国务院的影响大为削弱，但它仍坚决反对指令中的大部主张，在这点上似乎得到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支持。^②1944年12月美国政府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国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说，他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文件后来又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在那儿同样是很少取得进展；实际上，据说国务院已指示怀南特对之不予支持。^①最后采取权宜之计，即只将指令发给美国部队，才把程序上的难题撇开了。这样一来，从技术上来说，在1945年7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所属美军有一套政策指示，对所属英军又有另一套指示，对所属法军则什么指示也没有。

同时，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又重新提出分割德国的见解，分割德国的方案本是上述指令所摒弃的几个方案之一。这次分割德国的意见差点儿就通过了；因为三位政治家似乎都趋向于采纳，只是在最后一分钟，丘吉尔提议应当首先授命三国外长去研究一下，提出确切的建议。^②“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关系到八千万人的命运，只用八十分钟来进行考虑是不够的。”^③三国外长又把这一问题移交给由艾登、怀南特和古谢夫（苏联驻伦敦大使）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去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分割德国的意见从此就束之高阁了。^④三国首脑同意把“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线以南部分和上西里西亚、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波兰，作为波兰东部丢失给苏联的领土的补偿。^①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下列要求：把波兰西部边界线沿奥得河延伸到同西尼斯河汇合处。最后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征求波兰政府的意见，并把最后决策国待缔结和约时解决。正如事变过程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处理公式并非毫无漏洞，而三国在赔偿问题上又滋生了误会。在雅尔塔会议上，苏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他们要求德国总共赔偿二百亿美元，其中苏联占有一半。^②其他盟国没有提出反建议，当英方坚决反对25定出任何具体数字时，霍普金斯给总统递了一个条子说：“既然苏方在这次会上作出这样大的让步，我以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失望。如果英方不同意，就随他们的便。”^③于是就在莫斯科设立了由英美苏三方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出具体的计划，以苏联提出的数字“作为初期研究时的讨论基础”。^④这是以掩盖分歧来达成协议的一种措辞。罗斯福还支持英方提出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建议，至于其余方面，雅尔塔会议采纳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占领区划分的意见，这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取得了协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没有明白提到分割或赔偿的问题。公报强调了盟国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从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解除德国的武装；消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一切影响；惩办战犯；以及“协调一致地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公报中还有一段大概是摘引自总统某次演说中的话：“毁灭德国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在根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有希望过象样的日子，才能赢得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地位。”^①

总统回到美国以后，的确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语言为雅尔塔的决议辩护：……无条件投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和被奴役。……我们不愿意让德国人民挨饿或者成为世界上其余人的负担。我们处理德国问题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我建议另行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迟早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组织。^②六个星期之后，罗斯福

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对所有的重要争端还不够熟悉，在就职后的最初几周内，主要关心的是维持罗斯福的政策不变，所以在德国投降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从上面有关美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点。美国人不是生性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偏爱经过长期争论才最后接受决定的人。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急于“动手干”的那股劲头。北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似乎诱使美国人好讲大话，思考问题好作“非黑即白”的结论。美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充裕的条件进行无穷无尽的试验，这就使得美国人对研究细节缺乏耐心，对深思熟虑所必需的延搁忍受不了。美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滋长自信，确认其制度尽善尽美。他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使得他们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加上必要的决心，都能够得到解决。美国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质外，还有反复无常的缺点，容易感情冲动，为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按照美国人的舆论，很容易在制订政策时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执行政策时则容易一往无前，不留余地。美国人坚持己见固然是热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实践中碰了壁，放弃己见也是非常迅速的。归根到底，美国公众的头脑极灵敏，但是在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时不免要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而这种摇摆暂时会使人大伤脑筋。

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 1944—1945 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²⁷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军队中

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难以捉摸。他们一会儿板着面孔固执得很，一会儿又变得和蔼可亲，伸手递糖果给你了。他们的指挥官就议论过这样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对耸人听闻的克龙贝格城堡珠宝盗窃案负责的部队，“在法兰克福的地下贵重物品储藏室里发现了价值将近三亿美元的金条，还有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非货币黄金、珠宝以及保证物归原主的文书”。①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对任何一个战胜国来说，最适宜的政策莫过于宽严结合，恩威兼施，而这也是 1945 年以后在德国最有把握获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宽与严、恩与威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极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在全过程中要使两种要素都起作用。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以求均衡，结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国的倾向就是两头摇摆。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初次充当国际舞台领导角色的国家来说，产生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诚意，人们通常是不会以错误视之的，而当实践证明需要改变时，勇于改变意见，这也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如果美国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长期以来对美国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没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态发展毕竟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宽宏大量、热情和力量，德国的情景一定会变得更为暗淡。

第二节 英国

张伯伦在对德宣战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是同你们，同德国人民作战”，这样就不仅给英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主题，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情感。当然，只是许多同胞，并非全体同胞。两周以后，《笨拙》周刊刊载了 A·P·赫伯特（现在是艾伦·赫伯特爵士）所写的一首诗，题为：

《没有纠纷？》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音乐、诗歌和啤酒实获其心。
尽管如此，他们讨厌地不止一次
挑选出个傻瓜来统治——而且雀跃欢忻。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但砸烂公用坛罐的并非别人。
每一次战火都是他们燃起，
是仅仅偶然巧合，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瓦格纳^①的作品的确精美绝伦。
但他们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轨胡来，
顶好是让他们断子绝孙。
我们同德国人没有纠纷，
他们的事务当然不用我们操心：
不过看来只有大动一次手术

（针对心脏和头脑）才能起死回生！^②

在英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好日耳曼人”这个问题进行的。1940 年发生的事件给公众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题。有一段时期大多数英国人满足于追随丘吉尔的主张，说他们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胜利”。直至 1941 年 12 月，艾登告诉斯大林说：“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阶段对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③但是，随着战败的阴影在消失，战后怎么办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解决德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难道仅仅是设法寻找合适的德国人并且确保德国政府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吗？难道德国人的性格，或者德国的气候，或者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因素，使得所有德国人都容易变得野蛮粗暴和具有统治欲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指望可以使之改变呢？有一派顽固坚持后一种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范西塔特勋爵，虽然他们极少有人愿意面对德国人不可救药的论点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另外一些人，如 E·H·卡尔，在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上并不一定同前面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们声称，如果采取惩罚、肢解或持续强制的政策，“到头来将会证明道义上是令人厌恶，物质和人力上是难以办到，经济上是倒行逆施”。^①持这种见解的人时常争辩说，德国问题只有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才能得到解决。“把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造就成为善良的欧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②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成员则采取中间路线，他们在 1943 年对德国问题进行过研讨，认为不管是完全强制的政策，还是全面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大西洋宪章实际上等于说：不要纳粹，不要武装，但在其他方面可以进

行合作。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级不容许德国人平起平坐，只要情况是如此，就不容许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级以下存在着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就应当是诚挚的，应当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加拖延，不节外生枝地促其实现。……在基本原则目标上目标坚定，并且有能力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促其实现，这比费尽心机起草特殊的防范措施要有效得多。^①

公平地说，这种赞成妥协的观点是英国大多数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普通的英国人相信同德国人打交道应当立场坚定；他们倾向于接受范西塔特的论点，即德国人只懂得实力。但是主张报复的人极少，同德国人当中广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国公众舆论中把一个贸易上的对手予以消灭的想法几乎不占地位；说实在话，在前面提到过的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采取严惩的政策，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失去与德国的贸易，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德国已贫困不堪”。^②主张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说这里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经验所证实的一种信念为依据的，就是说采取极端措施则徒劳无益。1945年的一代英国人决心不再重复他们父辈所犯过的错误。J·M·凯恩斯（后为勋爵）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③和摩根准将所著《军备的末日审判》^④两书的论点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出入。德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这个任务是不能放心地交给德国人自己去完成的，这包括毁灭军火工厂。对罪行负责的人们必须予以惩处，对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补偿。但是企图让德国付出大量的现金赔偿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也许可以找到某种办法让德国在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方面助一臂之力。除了上述有限的措施以外，试图让德国受苦受难，势必要反过来给世界上其余各国带来不利的影响。持下述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采取加强德国各州政府权力而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德国对和平的威胁就会小得多，但不能忽视强行实施这一变革的种种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唯一的出路看来在于使德同人自己改变心肠。实现这个目标肯定有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

1942年成立了以威廉·马尔金爵士（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为首的部际委员会，研讨赔偿和“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一词指的是剥夺德国进行现代战争所必要的资源。^①他们设想了一个让德国支付现金赔偿的方案，从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开始实施，以防止德国从免去国防费用开支的措施中得到好处。^②但是他们基本上赞同德国用物资赔偿，而且对可以从德国取得物资赔偿的数量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还成立了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经济和工业规划委员会，负责广泛地考虑战后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钢铁生产的适宜水平问题。^③对于这些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政府的大臣们都不屑一顾，但是到1943年夏，政府授命副首相C·R·艾德礼负责考虑对投降后的德国需要作出的各种安排。全面占领德国的想法恐怕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从摩根准将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阐明的历史教训，即从德国人逃避执行凡尔赛条约关于解除武装的规定这一事实中得到启发，因而认为下一次盟国必须确保处于有力的地位，能强制执行其拟订的各项措施。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大国占领，提出这类建议的渊源肯定就在于此。^④英国外交部确实一度详细讨论过整个德国由各盟国共同占领的主张，^⑤这个主张在华盛顿也进行过讨论，但是军界的意见一致反对。理由相当明显，虽然其他方案的实际经验可能使共同占领回顾起来很有吸引

力，但在当时情况下采取共同占领的方法困难将是非常大的。由英美双方联合占领德国西部似乎更为可行，但是由于下列两方面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害怕这样做似乎 31 是在“结伙”对付俄国人；二是美国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手脚同英国人捆在一起。④以艾德礼为首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方案得到了“批准”①并发到华盛顿，这一方案以后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起草呈交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审议的方案中有所体现；以后该方案又转送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是他们认为不是“很急迫或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②甚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艾登对莫洛托夫说：德国问题虽然已由专门人员进行过研究，但英国战时内阁尚未进行过讨论。③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完全无视（也许是根本不知道）艾德礼提出的建议，并矢口否认斯大林的说法，即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罗斯福关于分割德国的提议，却指出，德国被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如果不隶属于其他联合体，以后还会重新联合起来。“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彼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即使需要五十年才能实现，也是很大的收获。”④在 1944 年 10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张似乎更为单刀直入，他鼓励斯大林考虑下述方案：建立南德联邦（包括奥地利⑤），单独成立莱茵国，对鲁尔、萨尔以及基尔运河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一方案同摩根索的方案如出一辙。⑥

总之，丘吉尔同罗斯福都不喜欢“对一个我们尚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计划”。①他在 1944 年末给艾登的信中说：无论是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不可避免地紧接着要变得冷静的时候，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上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要想在小小的篇幅里都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仅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毫无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②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 32 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③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④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博取同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 1918 年的投降条件；1945 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 1918 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代的人 would 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写出来后，它们竟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①第

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②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①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强烈地反对〔限制德国工业的主张〕。但是总统，还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要问他——是那么坚持，最后我们就同意考虑。”^②当时艾登不在场（他一经得悉有关情况，立即赶到魁北克并激烈谴责该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要民事顾问恰巧是彻韦尔勋爵，据科德尔·赫尔说，他敦促丘吉尔同意，因为他为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办法去做，英国可以解决战后出口贸易的难题，这个问题在伦敦正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③同时，总统最后作出让步，同意英国提出的以德国西北部作为英国占领区的要求。这一点同艾德礼委员会^④最初建议的，并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总统要求让美国掌握德国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运输。“英国的参谋人员认为原计划比较好，还看到如果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①据说英国的海军急于要控制德国的海军基地和船坞。为了妥协，对原方案略加调整，把不来梅一地划出，交给美方管理，并同意美方有权使用从不来梅到南德的铁路。^②同罗斯福总统的处境一样，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讨论外交政策时，他的主要外事顾问也不在场。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审查那个计划，^③并且说，他在回顾此事时，肯定不觉得他当真会受其约束。或许他也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④

盟国方面曾屡次试图把“无条件投降”政策降低调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释一下。根据上述种种理由，首相不大同意这样做。“打算向德国提出的实际条件，如果详细列明的话，决没有向他们重新保证的意思。”^⑤但是他认识到把德国人“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硬于到底的集团，对他们没有什么希望的”。^⑥他已经作过解释，^⑦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彻底粉碎敌人进行抵抗的意志，并不是说盟国想用残暴的行为玷污他们胜利的武器。1944年2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想法：“无条件投降”一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将遭到奴役或毁灭，然而它具有这样的意思：在德国投降时，盟国将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譬如说，大西洋宪章不能当作一种权利适用于德国，这将是毫无疑问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有权放手行事，但并不是说胜利者有权野蛮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说胜利者想把德国从欧洲各国的地图上抹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我们对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约束。^①

当然，也有好多场合，丘吉尔谈到德国人时是直言不讳的：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登峰造极地把武士和奴隶的特质合而为一。他们自己不珍惜自由，但看到别人享有自由却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

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①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的本能和历史知识都驱使他采取一条为本国许多同胞所赞同的中间路线。他在 1945 年 1 月对艾登说，“‘重新扶助苦难的德国’的政策激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处处受到打击。“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也很明白。”②他要把第二次大战打出个胜负分明、不容争辩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看到在停火以后人们仍怀恨不已。甚至在发表谴责德国人的演说时，他也会中断自己的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同这样的种族过不去而打仗的。”③他告诉 35 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斯大林提议在战后必须把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抓起来枪毙的时候，他是多么愤慨。④在雅尔塔会议上，也正是丘吉尔在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之后，最后一分钟似乎有所犹豫，主张由三国外长把这方案提交一个委员会审议，而终于束之高阁。虽然，他说过“原则上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⑤但他也提出抗议，说不要“用德国食物把这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掉”。⑥也还是丘吉尔，他根据英国内阁指示，反对苏联向德国索取二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并且拒不同意确定任何具体数字。“我的脑子里浮现出饥饿不堪的德国的魔影……我们是安稳地坐在那里说：‘你们活该挨饿呢’，还是想法子去让他们活命呢？如果让他们活命，这笔钱由谁来付？如果你有一匹马，要它拉车，你就得喂它一些粮草。”⑦他把自己的处世态度归纳在他的“一生的格言”中：“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平时：友好亲善。”

1918 年胜利后，英国大选的主要争论是围绕着“绞死德皇”和“挤橘子要把子儿挤尽”这两个问题进行的，这样就使得缔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务大为复杂化。1945 年，诺埃尔·科沃德的“让我们不要对德国人发泄兽性”这句话，最接近于表达英国公众的情绪。有很多原因使现在的情况遇然不同；舆论、官员以至内阁大臣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一部分功劳必须归功于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为怀的良知而不是凭借组织周到的简况介绍会，使得英国人民没有上那些廉价推销的解决方案的当。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于他的谈判对手未能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反，他们似乎合伙引得他接受一些并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内奠定的基础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 1945 年大选中讲的某些过头话，并且使得英国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对德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分歧。在艾德礼和贝文继任首相以后，执行的路线没有急剧的变化。在“两党合作”这个名词创造出来以前，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的确，工党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党政权所可能给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实而显得无大区别，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从英国对德国问题的主要态度来看，在力图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导下，英国政 36 策的推行，只是偶尔在某几个短暂时期内有些动摇。企图在两极之间求其平衡，在决策方面有时候便会陷于无能，而取得和谐的切

实措施，又绝不是经常采取的。不过，说句公平话，毕竟是做过尝试了。

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①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自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9月12日曾宣称：“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②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③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④据哈里·霍普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艾登）象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⑤他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⑥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 37 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 and 美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帕林）。又经过几天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享有一席。^⑦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⑧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象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⑨而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没有外国援助就休想恢复。许多法国人由于意识到这种仰人鼻息的境况，便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去设法补救。战前人们讲笑话，说奥地利的局势不可救药，但是还不算严重。这种笑话大有同样适用于法国之虞。

法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的形势，因此分不出很 38 多心思来考虑德国问题。法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让人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一定要按同等条件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更为紧张，意味着承担无力承担的义务，法国人还是认为参加占领是他

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这种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②法国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如此的困扰，以致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法国什么也没有改变。

一般法国人对待德国的态度确实极少变化。法国人也许不至于否认善良的德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根据这种假定来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法国人对改造德国的尝试，采取嘲弄的态度，对德国人灾难深重的前景却并不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要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③这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④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⑤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1945年4月说过：“法国从未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⑥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容易将其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一番。⑦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满，1945年4、5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特市移交给美国人。⑧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

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象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②

第四节 俄 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③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据官方统计，有七百万人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沦为废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①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于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安全。早在1942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②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二百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百分之五十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十年内以当年产品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百分之八十。③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④说：“一定不要让马踢你一脚。”①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象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②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迁工厂，交41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③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预料德国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能够复原。④早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⑤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⑥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1945年5月9日对俄国人民发表的胜利演说①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

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激起其忿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 42 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 1942 年 9 月讲的一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①直到 1944 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②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③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 1944 年 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④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⑤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 1907 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⑥1945 年 5 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①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¹³一样，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

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唯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①的确，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 1917 年列宁所采取的“妥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①：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 44 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会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①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历史。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要，还有在东欧建立“民主”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没有被同化，1917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

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作是把这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译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员，他们也要休假啊。①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定，但是这一信念⁴⁷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①象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 he 有两个儿子，其实 he 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②在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载一则报道而使红军受到侮辱，那则报道说，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饰用品商号正在为红军制作六万五千件衬衣和四万条裤子。这种情况使双方都不可能判断：无礼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无辜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得罪别人。

人们不难提示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果各方获准彼此混在一起并取得相互了解的话。的确，很多俄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开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国人和极权主义官员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别，前者好奇爱问，喋喋不休，惯于内省，欢乐愉快，从容沉着，对时间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后者在突然记起那些教给他的清规戒律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词，明显地表示出⁴⁸不违反党的路线的决心。苏联当局在对友好亲善和社交活动施加那种严格限制时，很可能考虑到有那么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国人。这不单纯是不让他们“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本性引导他们忘却和猜疑

苏联赖以建国的纪律的基本原则。但不能因此机械地说，如果俄国当局热切地鼓励交往，友谊就会得到保证。当任何谈论和行动可能被曲解时，有机会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无益。的确，使彼此较易混熟的唯一办法是饱餐一顿，而喝酒的作用则更大。

第五节 盟国的宣传

前面所记载的许多事实和言论，都是在事后不多久就透露出来的。普通德国人无从自动地得知其详。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稍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求普通德国人从盟国方面获悉一些情况，以便了解盟国的意图，乃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盟国向普通德国人传达情况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无线电台。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①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②还就德国的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恰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年6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规定^③：“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④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1943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产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1943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年夏）；[莱茵兰城市的]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年1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50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年3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年3月）；大规模报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年3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

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单，1944年10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望使德国挨饿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扶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已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著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而且意味著战争将在德国本土上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年8月）。51 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传单，1944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速度，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个帝国马克的罚款，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作的解释——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 1946 年 5 月离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①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 62 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会党党员(或许还有的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②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 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 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托。

(三) 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人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情仰对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导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①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特性包含 53 以下各点:

1. 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象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然之间露出了原形。”①2. 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有关的趣味,则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作低人

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容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不可能的。3.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德国人的热爱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他们迷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在。5.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①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滥调。

7.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1914年开始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被描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

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的比例：

1. 百分之十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有天生就爱为非作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景。

2. 百分之二十五是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类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 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习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型转化者极少。

4. 百分之十五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1933年前就成年了。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取而代之。然而几年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 百分之十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传统的熏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①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因战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

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①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 1945 年 5 月 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 57 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①与此同时，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公开敌视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之哑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②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在德国处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调，这是令人怀疑的。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 58 徒，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用牺牲希特勒及其同伙的办法来保存个人的自尊，即实用主义地忘记了过去他们曾给予希特勒大力支持，只记得他们有些时候表示过怀疑，发过牢骚或持有异议。他们把接受纳粹党员身分时没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态度在个人的记忆中大加夸张，从而宣称他们从来就不是纳粹分子——而且还能够叫自己相信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不然他们就运用这样的借口——它包含着相当大的真实性——说党员身分只是一种形式，并无内在意义，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这种身分。不过，属于这一类的德国人，他们反对纳粹主义并不象反对纳粹分子那样厉害。

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啦。纳粹主义原是一件好事，却被办坏了。①他们责备纳粹头目，并不十分计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偏重于他们未能尽责。这种辱骂显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与盟国有共同之处，而后者未必意识到内中隐藏着多少意见分歧。①

虽然他们在承认自己的观念带有根本性错误之前，准备先把别人责骂一通，而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被抑制着的错误感，从而产生一股恼火的受挫情绪。从他们对待盟国的态度方面来看，这一点表现得颇为明显。他们倾向于羡慕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和英、美人交谈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也是条顿民族的国家对德国的观点置之不理也许是令人气恼的。他们丝毫不指望法国人会大发慈悲，但现实的利害关系足以制止敌意的爆发。正如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喜欢我们，但总把我们看成若有若无；美国人喜欢我们，但把我们当作淘气的孩子看待；法国人恨我们不下于我们之恨他们。”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尽管他们有黑人部队，有种种蜕化变质的传闻。但是，俄国人的所作所为所引起的敌意，则因条顿民族蔑视斯拉夫民族的积习而火上加油了。一个英国记者在德国碰到一个俄国姑娘，那姑娘对他说，两年前她从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亚，如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时候能够吃到德国人在1945年能吃到的粮食，那就会感到自己很幸运了。一个德国家庭主妇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进来大声说：“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才较高的需要哩。”德国人因听任他们所蔑视的民族摆布而感到气愤难平，但却无能为力。他们把气愤发泄在强烈的仇恨上，发泄在不断争取同情上。任何一则反对俄国人的消息，他们都愤愤然向西方联络部门汇报，暗中指望所汇报的消息会受到重视。这种做法应视为有预谋的制造不和，尽管此事无疑地起了制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动机是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好象也同样兴高采烈地向俄国人汇报。补充这一点，才算是偏不偏）。至于纳粹追随者这一类人，他们的借口就层出不穷了。如果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基本主题，则说法是各各不同的。他们知道的情况是那么少。“当然，我们了解集中营不是休养所，可是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前后矛盾毫不介意，接着又说道：“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什么呢？告密的到处都是，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给关进集中营。”“为什么事事都怪德国不好？别的国家〔一般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也够坏的了。”在盟军越过莱茵河之前，有一个德国人来找盟国军官，要求这位军官制止一个外国工人偷他的自行车。那位军官说，近几年来你们从被占领国家可能已经抢走了大量的自行车。”但是，中尉，”那人气忿忿地回答说，“那时是在进行战争呀。”在某一方面、这些推托之词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人自身卷进纳粹的大灾难，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他们赶着纳粹的浪头，这样做似乎是免遭麻烦的最便当的途径。恰恰相反，这样做，遭到的麻烦比任何时候还要多。

他们的反抗办法是设法摆脱羁绊。在德国，这个办法一直很流行，有士兵，有文官，有圣职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让政治家们去搞吧。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

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

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熏陶。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们会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正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在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作了多少精神准备。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①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毋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无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藉以逃避责任。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他们不愿承认错误或请求宽恕，唯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确是一个错误。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解决的办法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这样，一些人有意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紧张。^①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承担“集体罪责”的观点。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全体德国人民要对纳粹的行径及其后果分担责任。“责任”这个词，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过。英国广播公司费了很大的劲去区分“罪责”和“责任”的意义。前者必然含有谴责的因素，而后者则不然。毫无疑问，驻德军队中的许多下级人员对这两者的区分能力是很差的。“集体罪责”的说法肯定是盟国的个别军官宣扬出去的。但是德国人并不愿为罪责和责任之间的区别而烦心，也不愿去研究个别人的讲话是否代表其上级，这种情况本身是意味深长的。集体罪责是一个考虑极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驳斥。在承担后果这个意义上人人必须分担责任的说法，使得那些设法推卸责任、准备要求获得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脚了。毋庸置疑，集体罪责这一虚构的说法多半是德国人宣扬开来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本能而别无意图。他们竟然把大部分盟国评论员引入了歧途。

对坚定的反纳粹者来说，战争意味着一场恶梦的结束。就他们企图进行

积极的反抗而论，他们的处境始终是危如累卵，无从得知哪一次敲门是盖世太保光临。就他们保持消极态度、闭口不谈思想而论，他们必须长期克制自己，不让一言一行失慎，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态度。由于迫害和移民，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留在本国的许多人，不是锒铛入狱，便是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他们露面时不带有神经病或神经抑制症状，那真是个奇迹。但对他们来说，特别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带来了失望。故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盟国不亲近他们，拒绝和平试探的一切努力，要求无条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们不能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原来的态度是否还能维持下去。他们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理论，即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的。他们希望德国政府交由他们来掌管，而盟国代表则象同事一样在旁协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看到政府为外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所接管，这些人对德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国人看成一样。总有一天，许多责任要落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继续受到和别人一样的战败国国民的待遇，他们所受的困苦、所领的口粮，与其他的人一样。^{①62}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敌的污点，但同时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大多数其他德国同胞也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而结果只能认为盟国对他们视若草芥的时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责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好象是集体罪责这一理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和其他同胞一样，认为盟国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反对纳粹者当然并不否认罪责；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恰恰是那些负有最少罪责的人最愿意承认有罪。但他们确实剧烈地争辩说，盟国本身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从凡尔赛以后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权，并允许他巩固政权的、正是他们，盟国方面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拒绝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也同负其咎，那使在负咎多少的问题上还有争辩的余地。但还有其他许多德国人很想抓住盟国承认负多少责任这一点来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德国牧师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区里的全体教徒，一个回头的浪子并未说过：“父亲，我承认有罪，但我的长兄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伪君子，我决不会弃家出走的。他应该和我受到同样的责备。”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年5月7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要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63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衷，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做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功，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1919年至1923年，1929年至1931年以及1945年至1948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遭经济灾难，^①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创，也过于简单化了，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特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德国的家庭传统，在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于其他许多组织制度，使成长中的德国人树立起这种人生观。果然如此的话，只要这些传统和组织制度原封不动，指望根本改变德国人的特性和人生观则是白费心机。着手改革那些组织制度的盟国官员们只想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对形势施加压力，他们始终没有低估行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能指望他们推行的改革会扎下根来，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这种改革是合乎需要

的。至于其他德国人，他们一定会憎恨改革是对他们最珍爱的传统的打击。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需要设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数人中煽起，在多数人中点燃。

如果说问题是重大的，那末结局也是存亡攸关的。因为在德国，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无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种民主，但却不受征服欲的影响，毫无使用武力以追求这种欲望的决心，则世界和平将会更大地得到保证。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办法可能在一开始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一办法不至于使政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为德国的灵魂而斗争——德国和外国人都可望同时进行斗争——是我们当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场斗争。

第四章 急救，1945 年 5 月至 8 月

我所统率的盟国军队现在已进驻德国。我们来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是压迫者。①在我所统率的部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我们要铲除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要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所制定的那些残酷、压迫和歧视的法律与制度。我们要把频频扰乱世界和平的德国军国主义连根铲除。军事头目和党的头目、盖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恶与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审讯，有罪者给予应得的惩处。②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就是这样写的。下面还规定：授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以军事总督的最高权力：暂时封闭德国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机构（情况许可时，将批准其重新活动）；命令行政人员留守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发布时，盟军已于 1944 年 9 月进驻德国了。因此，我们认为颁布此项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赋予盟国军政府采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威，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武器。就此来看，公告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否定语气。可惜找不到类似的俄国文件可资比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盟国把根除纳粹主义作为首要的作战目标。但在胜利最后到来之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纳粹分子并不留待盟国来“根除”，他们几乎不等本国同胞出来把他们撵走，就干脆溜得无影无踪了。盟国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决定由谁来取代他们的职位。虽然强调把事务交由德国当局去处理，但是有关挑选人员组成德国当局的指导原则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第一批美国军政府人员进入了城镇，那里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坏的迹象触目皆是。他们来到乡村，家家户户挂着白旗，窗根后面有人在暗中窥望。市长和县长是从事先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一般的做法是，军政府官员把市镇或乡村里的神父或牧师、地方学校教师以及少数公民叫来，要他们提出市长或县长的人选。开了几次会，再尽可能地进行多次调查……进出了一个临时行政长官，由他再任命其他专职负责人，诸如警察、消防队长、粮食办公室主任、地方文书、机动车管理员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员。①

初期的军政府工作队是从不适合实战的官兵中挑选的。理由很明显，军队中最能干最活跃的人抽调不出，因为战争尚待夺取胜利。特别是在美国，曾经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资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数来自技术界（例如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或市镇测量员），而来自德国一般行政机构或知识界的人较少。被选中的人大多参加训练班（有时为了消磨掉整装待命的那段时光，学了许多项目），但训练过程中用于学习军事组织和武器使用的时间和熟悉德国社会结构的时间各占一半。②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交到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有关人员中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这种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有一种色彩，利弊各半。③占领初期，军政府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意见的人。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询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①举例来说，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人也许是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

的意见正确可靠。②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行政 67 管理经验。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熏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 1945 年 7 月 7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毋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③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不断地调动。在海德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年就调换了四次。①由这个工作队安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走一段艰苦的路程。②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更少。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一两个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③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当然，共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部种人物。圣职人员的意见他们很少乐意听取。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法。早在 1945 年 6 月 10 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①在这种组织主持下 68 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俄国人喜欢用“法西斯”这个词而不用“纳粹”。“法西斯”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国对鼓动革命形势颇有顾虑，生怕左翼分子会左右局势（正象西欧许多被解放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得到的指示——或者没有指示——迫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冻结局势。他们深信新的管制委员会会尽早制定出如何改组德国的办法。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早期阶段，要肯定谁可信赖，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等到有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务处理好。因此 6 月份在汉堡解散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浓厚了。这种态度对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产生的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②结果使那些本来会坚定拥护这个政权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亲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国人为什么很

自然地鼓励那些为西方盟国本能地排斥的运动，也许比争论西方如果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是否会得到好处，可能更有启发。

到 1945 年 6 月。四个占领区所属州以下的地方行政当局局部已任命了人选。英国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他们不熟悉的国家里推动民主化过程的发展不宜太快，必须予以延长，至少要用好多年时间，正象在他们老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因此直到 9 月才建立了提名选举的区（县）议会。但是美国人认为，学习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将其付诸实践，早在 5 月底他们就在巴伐利亚组成了一个州政府。尽管俄国人对组织负责政府不太关心，但他们还是重视速度的。7 月 9 日的一份公告就宣布五个州政府的成立（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图林根和梅 克伦堡—福尔波门），把占领区划分成这五个部分。6 月 25 日。共产党在柏林登记，①7 月 14 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共同起草了一份政 69 策公告，规定：

1. 共同协力清除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残余，并按反法西斯和民主路线重建德国。

2. 加速重建国民经济以保证供给衣食、工作和住房。

3. 充分承认个人权利。

4. 保障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宗教信仰。

5. 重新赢得信任，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真心诚意地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承担德国方面对战争破坏的赔偿义务。①

各政党需要这样一种广泛性的纲领作为基础以成立联合政府，东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8 月 1 日，一个反法西斯青年组织获准成立，与此同时，其他组织则一律予以禁止。

英国当局在 5 月 20 日颁布了一项公告，说明占领军的目的是管制而不是统治。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也曾强调这样的原则。但欲退居幕后指挥，不久就证明是行不通的。新的德国当局缺乏经验和威信，尤其缺乏物资。如果要在控制饥荒和疾病之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则非占领军莫属，因为他们有权威，有物资，也有能力争取外援。军政府工作队认为使生活继续进行下去乃是他们的任务，并互相竞赛，看谁取得最大的进展（据一个工作队谈到，“我们队里的那些人于得挺不错，但愿司令部不要再把讨厌的难民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他们经常被提醒必须把事情留给德国人自己去干。这一最初阶段的工作正适合那些崭露头角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德日人中，在整个世界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困难虽大，但却是实际的，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困难变得比较捉摸不定，解决方法的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士兵们都乐于在这么大的破坏之后能够从事建设。班子虽小，完成的事业却是壮观的。例如，只有二十八个官员管理了整个英占区的邮政，只有三十个官员管理了水的供应。①整理了街道，清除了瓦砾，修理了自来水总管和污水管，恢复了公共事业。新警察队伍的核心组成了，反纳粹的 70 法官物色好了，法院重新开庭了，临时桥梁架起来了（大部分用军用材料），公路可以通行，铁路重新通车了（虽然由于桥梁被毁，只限于单轨通行，甚至在于线上也是如此）。莱茵河在 8 月间通航了，第一艘载货的驳船从科隆抵达了曼海姆。尽管开办许多学校还为时过早，但已选好合适的房屋加以修缮，并且开始遴选教师。②可是，当时教育家们正忙于粉刷和糊纸，无暇考虑教学理论。住房办公室成立了，着手修缮破坏不大的房屋，同时采取步骤来增加建筑器材的产量。德国的战俘以及国家或党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集中拘留了起来。收集和销毁

德国军事物资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四百万外国工人和囚犯被遣送回国。还有二百多万名（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都被集中收容起来了。有原料和燃料储存的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所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整个面貌的改观，都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说明。不过，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以地方为主进行的。要做的事太多，而且做起来又要求非常迅速，因此没有时间去等待管制中心下达具体的指令。而交通联络又不尽可靠，管制中心无从得知地方单位有何打算，更谈不上对之进行控制了。①重建起来的公共生活初具规模，还不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多作物资交流。在俄国占领区，列车满载煤炭之类的必需品开往急需物资的地区，有时不能抵达，因为在中途被地方司令官没收了。唯一能够川流不息，东漂西泊、通行无阻的是人。

交通的瘫痪意味着消息闭塞，谣言纷起。盟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认为，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因此在第一阶段封闭了所有的报社、电台、电影院和出版社。第二步是建立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到7月14日，美占区有八种“公开的”71报纸问世，英占区也有同样多的报纸问世。②由于缺乏印刷设备，报纸只有四版，一周两期。每个编辑部驻有一两名盟国官员，其中有些是懂德语的，在业务上监督德国人员。临时新闻服务社成立了，多数是通过无线电收听伦敦和卢森堡的新闻（虽然后来在巴特瑙梅姆建立了新闻发布中心）。电台都被接管，有时几乎没有中断广播，照常营业。卢森堡电台一直到11月仍由盟国管制。但电影院仍然关闭着，因为据说纳粹电影未经仔细审查是没有一部可用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准备以盟国的电影取而代之，将英美电影配上德文字幕，但未收实效（为德国专门拍摄影片，所费昂贵，无从考虑）。戏院和音乐厅多半遭到破坏或成废墟。③结果德国人因缺乏材料而无法工作，想演出也有同样的困难。蒙哥马利元帅和朱可夫元帅在易北河上会晤时，朱可夫提到影片对形成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时引起蒙哥马利的注意，他看到形势正在发展，因此命令英占区的电影应刻不容缓地予以开放。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不包含纳粹宣传内容的德国影片。幸好在战争最后几年拍摄的片子多数是逃避现实的作品。经过一番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库存影片的放映工作，准许德国人去看没完没了的再版拷贝的老片子消遣。与此同时，J·阿瑟·兰克④经说服，准备给几部英国片子配上字幕说明。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让德国人申请出版书报或上演戏剧的执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审查，只要执照领取人遵照执照上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办事就行了。审查申请的过程是严密仔细的，“公开”时期可望一直延长到冬季。可是美国人表现出他们急于求成的特性，在他们占领区内发出第一张执照，于是《法兰克福评论报》于7月31日问世，发行额为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份。⑤俄国人对这类问题的政策似乎是更为经验主义的，他们倾向于在更早的阶段让经过挑选的德国人在外表独立的情况下开办其业务。①

72 在这个时期内，有两项最激进的措施是在俄占区推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冻结一切银行存款。这被视为一项原则性的措施，允许提出的款项只放宽到三百马克。在西部占领区采取类似的行动乃是临时性措施；盟国当局不久便因他们已取得德国人的信任而毋需对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结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积蓄度日，而现有的工作可以让急需工作的人去干。在俄占区每个人都一下子处于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寻找工作。俄国的解决办法造成

了许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却促使俄国当局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早日实现。西方的解决办法是把惩办那些在战争中捞了一把的人（并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推迟到后期再说。这笔账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个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细节，于德国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埃德温·赫尔恩勒在7月份携带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从莫斯科飞抵柏林，被任命为新的农业部门的负责人。8月初颁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①组成俄占区的那些部分在战前曾经是大地产所有者的家园。②普鲁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国政策、资助德国军队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这种影响（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有此必要），从经济基础上打击容克地主，是完全应该的。西方的批评事实上不是针对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针对拒绝给被剥夺者以补偿。

土地改革名义上是通过德国的一些组织自发推行的。③自此以后，任何人不得拥有一百公顷（二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上述数字则予以无偿没收。属于“战犯”的土地以及国有，州有或党有的地产也一律没收。被没收土地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无地者，包括从德国其他73地区迁来的难民。不足法定数字的则予以补足。有些土地则分配给乡镇团体，包括医院、学校和农业机构。受益者向国家缴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粮食收获量的款项，这是按估计量而不是按实际量计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项于第一年年底缴付，其余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分期偿清。④

总之，这一措施是严峻的，推行之后将根本改变俄占区的性质。的确，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体农庄的社会组织；百分之六十七点五的土地是分给个体户的。①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种临时解决匮乏的权宜措施，而不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个步骤。但就是这种事实也使返回原状的希望大为减少。农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是很可能引起坚决反抗的，除非通过经济侵蚀手段来使之逐步丧失土地。德国的其他地方还没试行如此广泛的改革。尽管别的地区确实不象这儿存在着大地产集中的现象，但这种变化一定會在俄占区和德国其他部分之间造成持久性的差别。然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单方面推行的，绝不想提交四国讨论。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这一计划大力推行之时，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曾在会上提出过。毫无疑问，俄国人把它视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德国人是有权自己采取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和引起减产。

在西部占领区，农业方面的头等要事是收割庄稼。虽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5月22日估计现存粮食储存将维持六十天②，虽然该司令部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筹集并运入德国总数达十万吨的粮食，包括种子在内，但到了7月份，可供一般消费者的定量已经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当，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熟的庄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暂时短缺。为了收割庄稼，火速地执行了一项计划（“大麦战役”），释放了三十万当过农业工人的战俘，遣送他们回乡参加劳动。①即使这样做，收成结果还比估计产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情况很明显，要使居民在冬季几个月内免于饥馑，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扰乱农业社会的74措施都被看作是疯癫之举，甚至连纳粹征集粮食的组织部大体上原封未动。

战争结束时盟国部队驻屯的位置，当然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决定的，与欧

洲咨询委员会所划定并为雅尔塔会议所同意的占领区边界不尽相符。②盟军的进攻方向把美国人和法国人带到雅尔塔会议划给他们的占领区边界以北；虽然西方军队没有向东推进到丘吉尔所极力主张的那么远，③他们只到易北河为止，但已经深入到划归俄国的占领区边界的北面 and 东面。丘吉尔已经叙述过他致力于与俄国取得谅解，以便进行占领区调整的问题，并把调整推迟到波茨坦会议之后。④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夺取柏林的重要性一样，都没有为华盛顿所理解，因为其时正值“罗斯福心力逐渐衰竭，杜鲁门总统日益掌握广泛的国际问题的权力，两人间存在着严重脱节”⑤之际。

7月1日，下令撤退西方军队。盟国进入柏林问题仍未解决。

把位于俄占区中心的柏林划出一个孤立的地区一分为三，这个建议原来是艾德礼委员会在1943年制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为美国国务院所接受，1943年10月经外长会议批准，提交于1944年1月开始工作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作仔细审定。①就这样它在原则上为雅尔塔会议所接受，但如何使这史无前例的安排得以确切执行则并无进展。1944年5月，怀南特曾向华盛顿提出磋商明确的条件以保证盟国进入柏林的问题，但陆军部认为既然事先无法得知使用何种交通工具，这个问题必须留待军事指挥官在进驻后去解决。②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之后。6月29日，朱可夫元帅、威克斯将军和克莱将军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波茨坦会议预定在7月15日召开。据悉俄国人正在全城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安排。这就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急于要把自己的部队送到现场去接管。他们要求经由三条铁道和两条公路进入柏林。俄国人说，由于红军复员，只能使用经由马格德堡和波茨坦的单线铁路以及从赫尔姆施泰特那边来的汽车公路。此外，再提供两条空中走廊。俄国人还坚持说，西方国家应供应他们自己地区内的煤和粮食，虽然这个城市过去从来没有向西德抽调过许多粮食供应。

克莱将军在五年后写道，他感到惊讶，在离开华盛顿出任美国军事副总督之前，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去走访国务院，也未曾有任何人暗示他这样做。①（从现在获知的陆军部民事局对一切有关占领德国的态度来看，这种疏忽就不太令人“惊讶”了。）②因而他未能意识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内“需要一致同意”，会使该组织无法作出任何俄国人所反对的决议。③他和威克斯将军认为最好是接受俄国的建议作为进入柏林的“暂时安排”，同时保留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出全部问题的权利。他甚至避免用明文把协议固定下来，唯恐有一个正式文件，确立“比一种（已经拟订或取得一致的）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的权利还不如的东西”，尽管盟国的一切交通往来已决定“不受边防海关的检查或军事当局的控制”。④关于二万五千名美军和二万五千名英军于7月1日至4日向柏林开拔的问题已做好安排。⑤7月7日和10日又举行会议，解决粮食供应的安排，并决定以四国委员会或四国军事管制总部作为管制柏林的基础。①倘若四国组成的政府按英美所期望的那样行使职权，那么有关西方国家占领区和柏林范围内的交通权利，即使不作出书面协议，也许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结果是由于政治当局轻易信任俄国人的意图，外交家们又未向士兵作简要的说明，三年后引起了麻烦。

开进柏林的部队所遇到的局面是古怪的。俄国人已做了不少清理工作，尽管他们自己部队住过的房子显出对卫生并不感到兴趣。②，街上的尸体和瓦砾已清除一空，但是不知去向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凡是俄国人所能找到的马匹和七千头牛统统被赶走了。

他们拆卸了公立屠宰场的冷藏厂，搬走了饭馆厨房的炉子和管子，拆走了各类工厂的机器。我们到达时，他们正好完成对美国胜家缝纫机厂的盗窃。在英占区那边，俄国人把城里唯一的现代化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搬走。

不少被掠夺的设备是否有用，值得怀疑，而且由于无知，他们把那些设备弄得残缺不全。①

德国居民有声有色地讲述了许多残暴和恐怖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添油加酱地越传越快。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态度。②此外，部分的暴行是出于误解。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的德国人可能不会受到干扰，而对一个会讲俄语的人来说，建立起有礼仪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城市在长期战争接近尾声、经过苦战而被夺取之时，混乱、射击、抢劫和强奸都难以避免。在西德，这种情况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无可争议，在柏林，1945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严酷的季节。官方的粮食定量是每天一千二百四十卡路里，但只能发三分之二；③5月份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到8月份每天有四千人死亡（1938年的比较数字是一百五十人）；在美占区，7月份每出生二十个婴儿，有十九个无法存活（战前的存活率恰好与此相反）。④燃料缺乏使工业机器停止运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痛苦和受惊的表情。警察和消防队已陷于瘫痪。……自来水总管将近有三千处损漏，尚待修理。……运河和湖77泊里仍漂浮着尸体，而被炸弹破坏的瓦砾堆里还正在挖掘出尸体。……大量没有处理过的阴沟污物，不得不倒进运河里去。……八十四处污水抽吸站只有二十二个在运转。①

俄占区的情况也同样杂乱无章，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苏联当局不等波茨坦会议召开就开始索取赔偿。在他们看来，对适合拆迁的工厂，要获得一份四国一致同意的清单，是毫无问题的。他们任意拆迁各种机器，用随手取得的运输工具运走，经常在中途抛锚而被弃置不顾。由于人所共知的一些理由，看来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交通设备，虽然俄国的轨幅比德国的要宽，但大段的铁路铁轨被整个地拆走。占领区里的大部分线路，包括通向英占区、美占区的仅有一条线路，均改为单线轨道。②他们对炼钢厂、胶合板工厂和氢气加工厂似乎也要优先拆迁。③

此外，很明显的是大量非工业用品也被取走。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掠夺。大多数俄国部队很久未发军饷，现在他们领到了军政府的马克纸币，这是用美国向俄国提供的铅版印刷的。可是俄国人并不认为对印发的数量负有回收的责任。士兵们期待随时遣送回家，一回国，他们手头的马克纸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他们赶紧把纸币换成可携带的财物。如果德国人交出财物，收下差不多毫无用处的纸币是被迫的话，那么他们却也用欺骗的手段把大量的那种废纸塞给无知的农民。

的确，在俄占区存在的那种风云莫测的生活，使人抓住要害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讥讽说，德国人对俄国人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掠夺范围之广，而是因为他们掠夺的手段太不高明。假如一个俄国人想在火车原定不准停车的某一地点下车，他就拉警报索。假如俄国人正好需要一辆机车，他们干脆征调最靠近的一辆，倘若被征调的那辆机车恰好是一列即将开出的火车的车头，那就真够倒霉的了，这列车不得不停在车站上，等找到另一辆机车时再开。譬如在施滕达尔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德国列车车头被卸下来接到开往捷克的俄国列车或接到俄国的货车上去。①一个俄国血统的美国观察家于1945年8月在一幅《菩提树下》的画中概括了俄国在这方面对德国的影响：

78 整条大街上瓦砾比比皆是。阿德隆河前停着而辆卡车。第一辆卡车里铜器堆积如山：大喇叭、小喇叭和长号，上面盖着博哈拉厚毯子。毯子上坐着三个紧绷着脸的蒙古族士兵。他们的军衣撕得破破烂烂。他们在嚼着面包。第二辆卡车斜靠在三个轮子上，阻断了交通。车上是好几千架没有罩子的打字机，站在那些打字机当中的是一头哞哞叫着的母牛。两个年纪轻的俄国军官把卡车的第四个轮子卸了下来，在一盆泥浆水里检验轮胎，一群默不作声、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一旁观看。①当时在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俄国士兵怎样拦住一个德国姑娘，向她索取手表。她说她没有表。那士兵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但尽管言语不通，那姑娘终于说得那士兵相信了。“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有只手表。”他卷起袖子，露出绑在手臂上的一大串五光十色的手表，从中挑了一只最漂亮的赠送给那个姑娘。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俄国人之所以无能，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士兵粗卤无知以及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套周详的行政管理程序。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怎样对待德国人，在他们看来是毫不在乎的。他们对是否公正这一点不感兴趣，而粗卤的别名则是野蛮。他们处置人的生命和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便（对此表示反感最强烈的人，要算英国兵和美国兵）。

再往东，他们又。一次不同盟国作任何磋商，把一直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整个地区交给波兰政府管辖，不顾雅尔塔协定②规定波兰西部边界问题须待和平会议作出决定。而更糟的是，波兰人着手撵走德国居民，并尽其所能大量迁入本国国民。俄国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们已经履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与波兰政府磋商的保证，并说这一问题仍然可以在和平会议上加以考虑，然而目前既然德同农民都已逃走，土地总得要有人耕种，不过这话只有几分真实性。留下的德国人口，数量庞大，前是波兰人对他们不是驱逐，就是虐待，逼使他们自行离去。德国的情况就仿佛还不够糟似的，难民人山人海地“带着他们的嘴巴”而来，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①（捷克的苏台德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更不用提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了）。以前这些地区生产的剩余粮食是供应德国需要的，而现在情况起了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原来居民将给德国大大增加吃饭的人口，而这些地区的产品，却要运往东方，让波兰人和俄国人沾光。

但是，这一措施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防止今后德国的侵略，其困难之处并不那么在于解除其物质上的武装，而更在于确保其人心的转向。然而，如果说蓄意干出了什么事要让德国人在心里留下抑郁难伸的愤懑，同时又煽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火焰的话，那就是抢走了他们如此大的一片领土。心理上的损害，如果可能的话，要比物质上的影响还要严重得多。丘吉尔把俄国的这一行动称为“一个大错，相形之下，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简直是微不足道”。②然而盟国最初的计划曾打算从德国割去东普鲁士，而且长久以来，他们无异议地接受对波兰的补偿原则：即其东部丧失的领土以德国两部的土地给予补偿。③丘吉尔本人在雅尔塔说过他“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①这句话在地理上的确切意义是不明确的，但是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准会牵涉到剥夺德国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某些部分（虽则无需将德国居民扫地出门）。就其所作所为而论，俄国人是犯了欺骗罪，同时出于对安全的那种目光短浅的考虑，使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极其复杂了。但是，俄国人给与波兰人的地区，和三位政治家在雅尔塔都准备给与

的地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重大区别是可疑的。条顿骑士的传统使东普鲁士在德国具有如此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以致仅仅这一地区的丧失就必然会激起很深的怨恨，在奥得河以东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安置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从东尼斯河扩展到西尼斯河并把德国人撵走，这一行动促使德国人的怨恨和问题从本质上产生变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势必仍难预料。如果俄国人在作出这种安排之前，等一等国际间的同意，那么土地的割让可能会有所缩减，或者通过讨价还价，他们可能会取得报酬。毫无疑问，为什么波茨坦会议面临着一个既成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五章 波茨坦

从 1945 年 7 月 17 日到 8 月 2 日在波茨坦塞西利恩宫召开的会议考虑了包括德国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因此对其全部议论加以叙述，就会离开本书的主题，而就已出版的材料不足来说，这一点不管怎样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为了使本书的其余部分便于理解，有关德国的决议必须加以陈述。它分为三大类：（一）“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二）有关德国赔偿的决议，（三）波兰西部边界的确定，以及与此密切有关的“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的规定。^①

（一）“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主要是以国务院在 1945 年春季拟订的一个草案为基础的。^②它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密切平行，几乎不能视为迥太基式的。第（十三）段肯定反映了摩根索要求田园化的思想，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责备“首先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的发展”这一指导方针，要么可能以含糊不清的理由来挑剔一下。强调了地方分权的必要性，但是关于分割的一切想法（实际上在雅尔塔已作出了决定）^③则只字未提。德国不仅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而且某种“必要的德国行政部门”也要予以设立，其目的大概是要使执行第（十四）段中一致同意的共同政策成为可能。

根据贝尔纳斯^④的叙述，这些条款的通过，争论较少。

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⑤

一、政治原则

（一）按照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美英法苏四国、联合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共和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各该国政府的指令，分别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彼等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分，共同处置有关全德事宜。

（二）对德国各地居民的待遇，应尽可能一律。

（三）管制委员会所遵循的占领德国的方针如下：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作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为达到这些目的：

（甲）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冲锋队、纳粹党保安处、盖世太保及其全部机构，参谋人员和各种组织，包括参谋本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机构与准军事机构，以及用以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完全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乙）一切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及其制造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加在本身的责任。德国的残暴作战与纳粹的疯狂抵抗，已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了难以避免的混乱与困苦。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为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际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作好准备。（四）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或根据种族、信仰及政见而造成歧视的纳粹法律，应予废除。这种歧视不论是法律上

的、行政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均不容存在。（五）战争罪犯以及参加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的人，必须加以逮捕并交付审判。纳粹头目、有势力的纳粹支持者、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危害盟国占领或其目的的人，均应加以逮捕和拘留。

（六）一切不是仅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党活动的纳粹党成员以及其他敌视盟国目的的人，不得担任公职或半 82 公职，不得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占据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在政治和道德品质上能协助发展德国真正民主制度的人所取代。

（七）德国教育必须完全加以管制，以彻底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的理论，使能有效地发展民主思想。

（八）司法制度应按照民主、法律之正义及一切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均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加以改组。

（九）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分散政治结构及发展地方职责为原则。为达到此目的：

（1）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特别须经过选举委员会，在符合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的原则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

（2）德国各地的一切民主政党及其集会和公开讨论的权利，应得到承认并加以鼓励。

（3）代表与选举原则，在证明其可能有效地实施于地方自治时，应尽速在区、省和邦政府中推行。

（4）目前不成立德国中央政府。但某种必要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是财政、运输、交通、对外贸易以及工业等行政部门，应予设立，受国务秘书领导。这些部门将在管制委员会的管理下进行工作。

（十）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亦将受到尊重。同样，除了维持军事安全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

二、经济原则（十一）为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武器、弹药、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航海船舶的生产均须禁止和防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作战经济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限于被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时期的需要，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规定的各项目的。被核准的生产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所拟定的并经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将其迁移，如不迁移，则予以摧毁。

（十二）尽可能早地使德国的经济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措施所 83 造成的过分集中。

（十三）在组织德国经济时，首先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的发展。

（十四）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目的，关于下列各项将确定共同政策：

- （1）采矿及工业的生产和分配；
- （2）农业、林业及渔业；
- （3）工资、价格及定量配给；
- （4）整个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 （5）货币和银行，中央赋税和关税；
- （6）赔偿及消除工业中的战争潜力；

- （7）交通运输。

实行这些政策时，应考虑适合不同地区的情况。

（十五）盟国的管制应施加于德国经济，但以达到下列各项目的所需要的程度为限：

（1）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赔偿，以及经核准的进出口计划等；

（2）保证所需物资与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以满足德国境内占领军及流亡难民的需要，确保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除英国及苏联以外的一切欧洲国家）；

（3）根据盟国委员会的决定，确保各占领区间日用必需品的平均分配，俾使在全德国出现平衡的经济并减少进口的需要；

（4）管制德国的工业及其在国际上的一切经济和金融往来，包括进出口在内，以防止德国再发展战争潜力及达到上述其他各项目的；

（5）管制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国公私科学团体、研究实验机构及实验室等。

（十六）为设置及维持由盟国管制委员会所规定的经济管制，应建立德国行政机构，而德国当局必须最大限度地宣布及执行此种管制。因此务使德国人民认清，此种管制的执行及执行中有任何违反之处，概由他们自行负责。任何对德管制如有违反占领目的者，一律禁止。⁸⁴（十七）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对运输作必要的修复：

（2）增加煤产量；

（3）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生产；

（4）对房屋及必需的公用事业，作紧急的修复。

（十八）盟国管制委员会应采取适当的步骤，对于尚未归参加对德作战的联合国家所管制的德国外资产，实行管制，并加以处置。

（十九）德国偿付赔偿时，应留下充分的资源，以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为实现德国的经济平衡，应规定必需的资财，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应首先用以偿付此种进口。

以上规定，对于赔偿协定（四）段（1）（2）两项所指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品，均不适用。^①

有三点值得评论一下。第一，（十四）段虽然要求确定共同政策，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当然其意图是要由管制委员会来拟定共同政策。但管制委员会是一个四方组织，只有在四方成员都同意时才能行动。实际上，由于管制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对若干问题（例如货币改革）制定共同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西方大国对波茨坦决议所规定的那些应该交由中央行政当局处理的事务，不愿自行其是。于是，在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将许多紧迫的问题搁置起来。但是，在波茨坦作出决议之时，俄国人早已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对土地改革，赔偿和奥得—尼斯河界线采取了行动。如果这种情况说明了俄国人在总的方面打算遵循的路线，那么，认为管制委员会能就共同政策取得协议就成为鲁莽的假设了。

第二，要求制定共同政策的（十四）段在末尾合情合理地规定，在实行这些政策时，“应考虑适合不同地区的情况”。这是适合一时需要的措辞之一，一位美国政治家曾称它为“模棱两可之词”。这句话在老练的律师手里

可以用来摆脱似乎硬性的约束。任何协议附上这样的规定只会招来麻烦，因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协议各方是有诚意的。

第三，一经仔细考察，就会看出这些段落在允许德国所享有的生活水平方面构成一种含糊概念，而在这关键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却变得最不能解决问题。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基本生活水平不得“超过 85 任何一个邻近的联合国国家现有的水平”，管制当局接到指示，要保证商品与公用事业方面的生产，“必须保持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后来的很多讨论都是从这个假定出发，即允许德国享有相等于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保证”和“必须保持”等措辞的含意何在，明眼人一望便知。但通过论证也可以这样说——在讨论工业水平时俄国人就是这样说的①：“不超过”这三个字使得这句话丝毫没有构成任何承诺。如果因为保持德国享有欧洲平均生活水平而造成协议的其他部分无法执行的话，按照上述解释，只有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打开局面。国务院于 1945 年 12 月发表一项美国政策声明，承认“既然柏林宣言对占领期间的德国生活水平并未作出规定，各占领国自无义务提供足量的进口物资以保持德国生活水平相等于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②事实真相是，德国投降前的考虑过分纠缠于削弱德国的力量和优势问题，以致没有重视可能产生的情况，即碰到的头一个问题是防止德国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或者（象丘吉尔说过的那样③）与其说是个压制德国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个扶持德国的问题。因此在需要确定最低水平时倒认真考虑规定了最高水平。而实际上，这一条款与整个赔偿一章的关系，在协议的执行中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俄国人自始至终所关心的主要是赔偿问题。贝尔纳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成了波茨坦会议上突出的争论点之一。④据说雅尔塔会议所设立的赔偿委员会⑤从莫斯科带来一份文本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但相对他说，它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委员会一直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⑥还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只是在到达波茨坦时，而且实际上是在会议进行时才得知俄国已经在 86 大规模拆迁赔偿物品。他们指责俄国人，不仅在于这些做法，而且在于俄国人把大片领土转让波兰给德国所造成的后果。杜鲁门总统问道，“如果我们对怎样赔偿还没达成协议的时候德国就丧失了一部分领土”，⑦赔偿问题又怎么能得到解决呢？关于这第二个责难，俄国人否认这两件事有联系。对于赔偿问题，迈斯基想拟定战利品的定义，以证明拆迁沐浴设备和银制品之类的东西是正当的，但他手法笨拙，事与愿违，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以致永远从国际生活中销声匿迹了。于是莫洛托夫坦率地承认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提出在俄国的赔偿要求中扣除那一部分。美国人一再认为俄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全面处置赔偿问题无从进行。他们争论说，盟国之间的公平分配已成为不可能，因为其中一国早已自己动手并隐瞒其所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满意的解决办法是让四国各自从其占领区内提取赔偿。由于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可资利用的工厂座落在俄国占领区，这就使得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如果再从西方国家占领区百分之六十的工厂中抽取百分之十加给俄国人，那么他们所要求的占总数一半的赔偿份额就会得到满足。

但是总数究竟是多少呢？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逼着要定下一个确切的金额，并声称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在雅尔塔已经一致同意的了。用巧妙的起草方法来取得一致同意的危险开始出现了。因为赔偿委员会过去只是奉命将那个数字“作为研究的基础”。⑧贝尔纳斯试图解释说，“假如你把某种

东西当作讨论的基础，你不一定非要自己接受它不可。”他没有得到多大的成功。然而，他的确设法使斯大林相信，在波茨坦，美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是不打算定出任何明确的数字的。大元帅……于是开始讨价还价。他首先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大大增加赔偿数字。后来，他又建议从西方占领区拆迁资本设备（用以交换食物、煤、木材等产品）的总数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十五。我说，如果他肯撤回其他要求并同意其他两个有争议的提案，我们就同意百分之十五。他表示同意，会议随后不久就结束了。①赔偿一章如下：87 德国的赔偿②

（一）苏联的赔偿要求，将以拆迁德国境内苏联占领区的物资及适当的德国国外资产予以满足。

（二）苏联负责在其所得的赔偿额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

（三）美国、英国以及有权获得赔偿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将自西方各占领区及适当的德国国外资产中予以满足。

（四）苏联除在本占领区获得赔偿外，尚可自西方国家占领区取得赔偿：

（1）在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且应自德国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的可用的与完整的工业资本设备中，先从冶金、化学及机器制造工业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以交换同等价值的食物、煤、钾碱、锌、木材、陶瓷、汽油产品以及其他商定的商品。

（2）在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且应自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的工业资本设备中，抽取百分之十，应就赔偿项下交与苏联政府，苏方无须付款或以实物交换。

上述（1）（2）两项规定的设备拆迁将同时进行。

（五）从西方占领区作为赔偿拆迁的设备数量至迟必须在今后六个月年决定之。

（六）工业资本设备的拆迁将尽速开始，并在第（五）段所规定的作出决定时起两年内完成之。第（四）段（1）项所规定的物品交付，将尽速开始，并由苏联自开始之日起，于五年内按照议定的分期办法交付。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因而可供赔偿的工业资本设备，其数量及性质将由管制委员会按照盟国委员会（在法国参加下）所制定的政策予以决定，并交由该被拆迁设备的所在占领区的司令官最后核准。

（七）在应行拆迁的设备总数确定之前，按照第（六）段最后一句所规定的程序决定可以交付的设备，领先予交付。

（八）苏联政府对于座落在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的德国企业以及除下列第

（九）段所规定以外的德国国外资产，88 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英国及美国政府对于座落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以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十）苏联政府对于盟军在德国缴获的黄金，不作任何要求。

波茨坦计划的实质是要使可供赔偿的工业设备数量（就西方占领区而论）服从于全面的经济计划方案。准许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而如果德国人民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能按这一水平生活的话，首先要能生产出口产品，以偿付必需的进口物资。按照这一水平，如属过剩的工业设备是可供赔偿的，这就包括将予铲除的整个军火工业和将受严格管制的大部分具有作战潜力的工业。遭战争破坏的德国，满目疮痍，一片混乱，流

亡难民充斥于市，一旦失去设想的那种工业规模，而又要达到所允许的那种生活水平（如果确曾许诺过那种生活水平的话），德国是否负担得起，是否力所能及，还有待于观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接受那些原则之前，似乎并未对其实用性作过一番现实的评价。①波茨坦会议所一致同意的只是一种准则而非解决办法——这或许就是会议获致协议的原因所在。它被说成是经过“一番孤注一掷的努力，打破长期僵局，而在最后一刻临时凑成的东西”。①这一准则实行起来应如何解释，为了找到这种解释而进行的争论过程，是留待管制委员会去处理的第一项任务。

还有其他两点要注意。根据雅尔塔会议设立的赔偿委员会曾受权考虑使用劳动力来作为一种赔偿手段的问题，②但这一问题从未作过研究，在波茨坦似乎也从未提及。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协议对于从现有生产品中取得赔偿的问题并未明言，虽然在赔偿委员会的讨论中曾经 89 指出这将成为一个争论之点。雅尔塔议定书曾特意准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提取赔偿，③波茨坦协定在关于德国一章的前言④中声称，“本协议的目的是执行克里米亚公告有关德国部分”。另一方面，波茨坦赔偿一章中的第（一）段只讲到“拆迁”苏占区的物资，这一字眼的含义可能稍加引伸便把现有生产品包括进去了。⑤但是乍看起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原则第（十九）段中所写的两句话，即“偿付赔偿时，应留下充分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应首先用以偿付此种进口”。这两句话的通常解释似乎是这样，现有的生产品在被批准的进口物资未获偿付之前，并不供偿付之用。但是俄国人后来争论说，在偿付赔偿之后，这第二条才可适用。有人反驳说，如果照此办理，德国人就不能指望达到那种曾被许诺过的生活水平了，这时俄国人求助于那个含义隐晦的“不超过”一词，从而否认曾对何种生活水平作过许诺。再者，赔偿委员会的美方成员波利于会议后返回美国，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等到拆迁的工业资本设备的性质和数量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出决定和德国的未来经济有了更明确的解释”，①才能就从现有生产品中取得赔偿的数量和期限问题达成协议。总而言之，他当时并不抱着后来美国人所持的见解，即认为从现有的生产品取得赔偿的可能性已被波茨坦协定所排除。

波茨坦协定是一纸不能令人满意的文件，因为有一两个最重要的段落，不是模棱两可，就是至多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②在由美国官员事先草拟的第二章和在会议期间通过政治协商仔细斟酌订出的赔偿一章之间缺乏一致性，而有重大关系的正是赔偿这一章。人们的确怀疑，90 俄国人之所以轻易地接受前一章，是因为在后一章中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又因为他们对前一章的约定怎样施行于他们的占领区毫不在乎，同时还可以使用他们在管制委员会的否决权来抵制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三）丘吉尔和贝尔纳斯详细叙述过美国和英国代表团所作的果断坚决的努力，要使俄国人认识到把那样多的德国东部领土给予波兰人将产生的危险，并使他们认识到大量难民的涌入将使西德负责当局处境困难。俄国人坚持说，上述地区的所有德国人都已逃跑，那里除波兰人外，无人从事粮食生产。倘若德国需要粮食，他们应向波兰购买。斯大林说，把困难加在德国人身上要比加在波兰人身上好得多，德国的工业越少，英国人的市场就越多。①当贝文接替艾登的时候，他强烈反对新的边界。俄国人和波兰人怎样都不肯退让。西方大国只能坚持说，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留待和平会议

解决。可是，在此期间，他们感到他们将不得不暂时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即这片苏占区的土地是在波兰的管辖之下，同时，在议定书中，对这一问题的协议也被记载了下来。②然而，作为补偿，他们③倒是使俄国人对“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同意了下列条款：三国政府对此问题从各方百加以考虑，认为关于逗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德国居民或有关人员遣返德国的工作，应予进行。他们同意应有秩序地并合乎人道地进行此项遣返工作。

由于大批德国人涌回德国，势必加重占领当局原有的负担，三国政府认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首先应对此问题予以考虑，特别应注意各占领区内这些德国人的公平分配问题。因此三国政府指令各自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尽速向各酋政府呈报已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返回德国的人数，并根据德国目前的形势估计今后实施此项迁移所需的时间及人数比例。

上述情况同时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 91 府及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在三国政府未曾审阅各自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所呈报告以前，停止进一步驱逐德国人。①

波茨坦会议在随后几年所显示出来的结果证明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任何有事后认识之明的人都会从协定的字里行间辨别出那些麻烦的种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更坚决大胆地抓起棘手的问题。人事更动无疑是有影响的，英国方面的人事更动正好发生在整个会议最关键的时刻。杜鲁门和文德礼掌握不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具备的全部谈判背景，虽然人们准会产生这样的推想，即丘吉尔因为注意到杜鲁门在接替罗斯福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于是有意邀请艾德礼去波茨坦，好保证以后的接待工作不致脱节，而且可以向他的继任者交代清楚哪些是他认为存亡攸关的实质问题。有些事也得归因于急于求成。解决问题要求干练的官员们集中思想，要求对外交报告进行审查，还要求政治家们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冷静思量，而现在则不然，聚集在外国的某个城市，在只有几天停留时间的情况下，被迫安排在早餐和午餐之间，或午餐和晚餐之间，甚或在晚餐之后，仓卒从事，干脆“处理”，以烟云过眼的印象和肤浅的交谈为基础，而交谈则是靠战战兢兢、局促不安的译员所作的不完全的翻译……并在一科既是严格保密又是相持不下的气氛中作出决定。结果如何，可以预料。①

然而，认为开一次比较长的会议就会有所作为，从而减少东西方之间的分歧，那是毫无根据的。诚然，人们不得不猜想，有许多问题可能故意留下含糊之处，那正是因为要想明确规定，反而暴露分歧，危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如果西方立场坚定，波茨坦本来就会同玫瑰宫相似，而且通过管制委员会去管制德国的尝试，可能根本不会实现。也许那样只会有好处。也许把真实情况立即摆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面前是更为可取的。丘吉尔曾经指出，他本来就想做到这一点，的确，如果按他的主意行事，西方大国来到波茨坦（假定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还会召开的话），会用其仍然掌握着的不少俄国占领区地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评价谁的政策较为明智，还为时过早。92 我们暂且还是想法理解一下，任何一个政治家在胜利的时刻，决定把争端搁置一下或者促使其发展所需要的那种感情为好。

第六章 管制机构

盟国管制委员会是盟国驻德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权力是由英美俄法四国司令于 1945 年 6 月 5 日在柏林签署的第三号公告授与的。^①管制委员会在 7 月 30 日召开首次会议，8 月 30 日颁布了第一号公告，向德国公众宣布委员会的组成。^②这份公告确定四国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颁布的法律、公告、命令、法令、通告、规章和指示等继续有效。

管制委员会由兼备总司令和军事总督职权的四人组成^①，每月 10 日、20 日和 30 日在柏林美管区的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集会。就在这个大厦里，一年之前，纳粹法官弗赖斯莱尔曾经将许多与 1944 年 7 月 20 日未遂事件有牵连的人处以死刑，而他本人则在盟国的轰炸中丧命了。经四方同意，各国轮流担任主席一个月，在俄国人的坚持下美国先任主席。各国均配备自己的秘书，在担任主席期间负责提供官方的会议记录。决议及记录文本必须取得一致同意。每次会议后，要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公报。公报内容也要求一致同意，如遇困难问题，则交由一个小组委员会来汇编。开会有争论，甚至无法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时，则由各代表团非正式地向本国记者简单介绍情况（并不存在向德国新闻界介绍情况的问题，因为为各占领区报纸服务的新闻社都归盟国经营，并由盟国官员担任其驻柏林代表）。每次会议后，担任当月主席的国家要招待各方，名为“便饭”，却有一次比一次丰盛的趋势，主要是俄国人在增加份量。每隔一个时期总 93 要通过“节约决议”，但只是暂时起一下作用而已。这一惯例提供了一种非正式讨论问题的机会，虽然还不能说它促进了意见的一致。

盟国管制委员会倾向于变成一个相当正式的机构。提交这个机构研究的总是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或者是暴露出严重分歧不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在委员会内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则提交各国政府去磋商。在下一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有时在委员会内确乎能够达成协议，但委员会并不完全象一个开展辩论或进行协商的场所。与原来的意图相反，大量工作是在下一级即协调委员会中完成的。其实，军事总督也就是总司令，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战绩挑选出来的。协调委员会则由四个副军事总督组成，他们把全部时间用于管理德国，千头万绪，一手掌握。^①协调委员会的重要性不管怎样高度估计也不为过分。它每周开会两次，为盟国管制委员会准备议事日程。它本身也有同样的议事程序的一般规则，是并不正式公布会议情况。

协调委员会所属管制委员会分为十二个管理局，即陆军管理局，海军管理局，空军管理局，政治管理局，运输管理局，经济管理局；财政管理局，赔偿管理局，支付与归还管理局，内务与交通管理局，法律管理局，战犯与流亡难民管理局以及人力管理局。各管理局的划分及其任务的分配，曾由欧洲咨询委员会于战争结束前六个月作出规划，主要是以德国投降时预期还存在的各个部为基础。^①占领国各方^②根据各局的划分成立相应的管理处、配备本国代表。^③管理局的议事程序与协调委员会大致 94 相同，主席由当月担任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的国家的代表担任。

职能的划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有些打破常规的现象是因为考虑到德国的惯例（例如住房划归人力部门）。为切合当时情况，有些管理局如经济管理局和内务管理局的任务就过于繁重。举例来说，经济管理局不仅要掌管粮食和燃料的供应，还要制定出工业水平计划。^④内务管理局负责公安（这就

要管理非纳粹化问题，因为这一工作被视为警察部门的任务）、公共卫生、教育和邮政事务，更不用说宗教事务和美术方面的问题了。每个管理局为了处理本身的工作，成立了若干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在 1945—1946 年冬季，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达到高峰期间，各种委员会共达一百七十五个以上，^⑤但在职责上有些重叠现象，同时在协调委员会一级以下的各管理局之间有关协调问题未作充分的规定。英方后来曾经试图把各管理处归并成“行政管理”和“经济小组委员会”

两类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种办法从未运用于四国组织。^①

四国代表开会讨论问题不是十分迅速的。没有同声翻译设备。即使有此设备，是否有足够称职的译员能广泛予以利用也成问题。除了政治管理局（只要译成俄语和从俄语转译），其他各处开会时每篇发言都得翻译两遍。这就使到会者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思考如何作答（特别是在三种语言中懂得两种的人更是如此），而且使针锋相对的敏捷的辩论几乎无从进行。通常各国代表作三分钟至十分钟的发言，表达其观点。发言大体上按圆桌顺序轮流，但也决非一成不变，直到最后意见似乎趋于一致时为止。为了取得积极成果，重要的是要紧扣主要 95 论点，避免发挥宏论，因为这样做不是无人欣赏，就是分散了讨论的中心。各方都有本领在细节问题上磨蹭时间，然而超群绝伦者也许要数俄国人，他们有一次“一定要讨论兔肉、干果和浆果是否列入德国食品资源这一问题，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他们承认这些东西并无可资利用的数字”。^①

不幸的是论战成为常事，因为对另一方的论点有必要予以反驳。但一进行论战，通常就不考虑任何可以达成协议的办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里有一个餐厅，委员们惯于在一起用餐。一个老练的会议主席往往把中午的体会时间拖延到对某个争论问题作过初步酝酿之后，希望散了会在餐桌上较为轻松的气氛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在续会时正式提出来。对就餐时间加以策略性地利用，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俄国人另有一功，他们比英、美人起身迟，饱饱地吃一顿早餐，十一点钟开会还感到有点仓促。下一餐他们一般要到四点钟才吃，因此肚子饱饱的，争论到下午也无所谓；而别人已是饥肠辘辘，却还要进行比较合乎推理的思考来使对方让步。^②

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设计者原来打算每个管理局都没有一个相应的德国行政管理机构，以便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交由那些机构去执行。虽然波茨坦会议决定不设立中央政府，委员会却考虑在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领域分设中央各部。但由于有待解释的原因，^③这些部并未建立，而在西部，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迟迟没有在占领区一级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就使盟国各方所负担的任务比原来设想的要重得多，因为他们既要负责向德国地方当局转达已达成的一切协议，又要监督其执行。不设德国中央各部，对大多数占领国来说，就不能储备大量专门性德国技术资料以供咨询或参考。碰到要为管理局的会议准备材料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时，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资料来源中去搜集整理，这样就要在柏林维持一个本来无此必要的较为庞大的班子。俄国人确实早在 1945 年 7 月就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若干德国中央行政机构，从而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但当时由于其他影响在起作用，敏协俄国人所提出的事实或数字都不尽可靠。96 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最后结果是使占领区的执行人员与一百英里外的柏林决策总部之间的关系，在组织上和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英国的组织机构是按下列方式建立的：军事副总督只负责军政府工作。

①下面有两个副手，都是陆军少将。一个（负责政策工作的副参谋长）常驻柏林，掌管协调一切有关四国磋商的问题；另一个（负责执行的副参谋长）常驻占领区，掌管区内的一切工作。②军事副总督本人通常在柏林度过一周的中间几天，在占领区度周末：每周分别在两地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各管理处处长之下也有两个（或更多的）副手，大致以同样的方式安排每周的时间和各人的任务。管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哪一方面，一开始很不明确。由于柏林满目疮痍，因而最初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在占领区。到 1945 年秋季，问题已很明显，许多关键性人物必须留在柏林，工作重点需向东转移。十八个月后，四国机构开始拆台。顺序又倒转过来，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摇摆不定对行政机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占领区总部（移到柏林后一度改名为“占领区执行部”）设在威斯特伐利亚邻近的一些小市镇上，其中最闻名的是卢卑克，本德、赫尔福德和明登。①这多少是出于偶然。在战争刚结束时，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它正好到达的地点巴成因豪森。当时认为军政府总部紧靠司令部是合乎理想的。没有一个市镇足以单独容纳所有的工作人员，因此分散在几个市镇。总部设在这个地段，有利条件是：大体上处于占领区的中心，而且座落在通往西南和东北的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连接点上，此外，如果想把占领区总部设在大城市里，就会遇到严重的住房问题，因为所有大城市都被炸得破坏不堪，要么把德国居民大批迁走，否则就无房屋可供他们安身，要么另行建造专用的大楼。威斯特伐利亚的“市镇”实际上未遭破坏，把德国人挤一挤就可腾出住房了。然而住在被轰炸地区之外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②，就好像是想从莫尔默、莱德伯里、杜克斯伯里、伍斯特、佩尔肖尔和伊大夏姆等地来统治英国一样。负责监督德国行政管理的那些人把德国的生活条件想得过于美好了。他们遇到有点名望的德国人是比较少的。为了与另一个管理处讨论政策问题；需要乘坐汽车行驶十英里，这种情况对协作毫无好处。最后一点，以威斯特伐利亚为中心，对有些管理处极不方便，它们的工作性质决定其主要活动必须在有特殊设备的地区开展。如果 1945 年夏季在汉堡或其附近搭起占领区总部的帐篷或临时营房并逐步改善其条件，①这也许会令人更满意——虽然不大舒服。1946 年间，永久性的占领区总部按计划在汉堡动工建造，将来可以移交给德国人用作办公楼或公寓。这个计划，在英国遭到严厉的批评，其理由是建筑材料本来应该用来改善德国的住房条件：它突然受到管制工作委员会减员的影响。实际的建筑计划可能偏向于富丽堂皇，而且惹人注目。便如果它在 1948 年初完成，本可以把其他住房交还德国人使用，提出批评的人忽视了这项计划想要解决困难的意图。

最初，占领区总部的下一级是军部，共有三个，即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堡的第八军，驻汉诺威地区的第三十军和驻伊塞隆伪第一军。洛军军长同时也是其所辖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地区的界线主要是按军事上的方便来划定的），有两个旅长作为副手，一个负责军务，一个负责军政府的工作。此外，更下一级的军政府单位；原来是从属于军事组织的，并未考虑到德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但不久在州或省一级开始形成行政机构的雏型，①军一级军政府人员便自然地围绕这一组织来开展工作。军以下的部队单位也相应地分散驻扎，对州政府下属的 98 德国行政机构②进行管制。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从建立在英国军队组织基础上的军政府体制过渡到建立在德国地方政府组

织基础上的管制工作委员会体制的过程。这种过渡在 1946 年 5 月 1 日起了关键性的变化，因为那一天各军军长③放弃了军政府的一切职责；而由文职的州行政长官取而代之。州行政长官的地位与战时英国地区长官有类似之处，其任务是负责即将划归英占区的四个州④的德国州政府联系，他们把军一级军政府的班底和所属地区内下一级军管机构的班底都接收过来，直接归占领区军事副总督领导，每月出席一次由副总督召开并由各小组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这种会议很快成为占领区最重要的会议，虽然许多日常事务仍然经由占领区总部处理。

管制委员会中英方大多数管理处在全球工作人员中均派有代表，直至区一级，不过政治管理处起初在占领区以下各级并无代表，其他某些管理处的代表只派到州一级。县级管制机构通常仅由六人组成，因此职责不大可能专门化。这种安排导致服从双重领导，例如一个技术官员，他既是支队司令官（或地区长官）的部下，同时又要对上一级有关专业领导负责（象在正规军事组织中那样）。有时候，这不免产生麻烦，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指挥系统的工作还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命令从上下达颇费时间，占领区总部与基层人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总部切望缩小地方的管辖特权，而基层人员则认为占领区总部（更不用说柏林）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

但要了解组织情况的全貌，还必须知道占领区内设有蜂窝般的专门单位，它们仅向占领区总部、柏林、伦敦负责——有时甚至好象是对它们本身负责。在埃森有北德煤炭管制局，在汉堡有北德木材管制局，在比勒费尔德有管制其他工业的许多机构与铁路总局，在汉堡和科隆有德国人个性研究部，有公共舆论研究所，有广播管制单位，在比勒费尔德附近有一个文具和印刷部门。此外还有搜集历史文件的单位，有搜集工业情报的单位，有营养调查队，以及其他许多单位，且不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红十字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要谈一切与其说和管制工作委员会有联系不如说和军队有联系的许多单位了。每个单位都要求供给住房、粮食和运输工具，而且往往指望获得其他舒适条件。如果供应发生困难，各单位就自己主动设法。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组织在几星期内发展成管理二千三百万人的政府，要对出色的一群专家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是轻而易举的。谁想要绘一幅完整和连贯的组织图表（如果能跟得上一切变化的步伐），可能会画出活象碎纹石予路那样的东西。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德国人则倾向于放弃这种打算而任其发展。①回头来说伦敦，军政府作为一项军事事务，开始是由国防大臣负责的，通过陆军部民事局来过问。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如此紧密地与军事相联系是不恰当的，而外交部又不情愿在本身的许多职责之外再负起管理近五万人的这样一个组织。因此在 1945 年 10 月采取一种权宜措施，把责任交给 J·B·海因德，授与他兰开斯特公爵郡大原这一挂名头衔，并设立一个在他监督下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制局”（在战地很快就以：“海因德营房”闻名）。德国及其管制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要求有一个专门的部和大臣来管理此事，但采取的权宜措施却存在着某些缺陷。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乃是一个低级的大臣……负责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它一部分属于军务……很快就和外交部的职责和政策混合起来。这个低级大臣……不得不在白厅中有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求得平衡。其他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准会在最初阶段就插上一手。这位尊贵的先生一定……有点儿象小鱼在大鱼间游荡的感觉。①1001947 年 3 月帕克南勋爵接替海因德为兰开斯特公爵郡

大臣，并在外交部设有一个办公室，与外交大臣联系比较密切，②这时指挥系统便大大简化了。与此同时，仓促成立了一个新的部来解决日常的一大堆原则问题，这样它原来打算结束的混乱情况并未立即有所改变。

管制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供文职工作人员。当然，军政府的各单位几乎都是由现役军官组成的，但其中不少人已到复员的时候了，虽然可以设法把复员推迟，但违背个人意愿，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能无限期推迟。一批军官准备转入管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但对其他人，还得寻找一些多少适合资历条件的接替者。①在德国和英国都成立了口头审查委员会，但象大多数新程序开始时那样，它经历了若干暂时的困难。候选人员不单要（由那些对于必要的才能有所了解的人）去物色并对之进行口头审查，而且谈条件订合同往往花去几个星期时间，准备行装安排行程也要几个星期。如果来了一道不能说不合理的命令，要求所有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的人必须先经过一套基本指导课程的训练，这样准备期又要再次延长了。即使是曾经去过德国的人，也要进训练班，用为他们可以给未去过德国的人介绍情况。尽管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这一品质一般说来颇不易得），但要一个军官从德国回来，复了员，又应募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不出六周时间就以文官身分重返原来的岗位，这确乎是困难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说的活也许是生动的夸张之词，他说：“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来说，几乎在一切公务程序中列为首位。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②但是在1946年10月19日等着去德国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领到六周以101上的干薪。①大体上说，从主要是军人转到主要是文职人员的这一过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德国“为了使城镇重新活跃起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却得不到什么帮助，由于无从确知接替的主要官员是否会在现任官员离职之前到来，接替者到任之后是否能胜任愉快。虽然有现代通讯设备，却很少有可能从伦敦获得何时派遣接替人员的确切消息，因为开展组织工作的职责是由那么多部门分散掌管的。

招聘人员的主要困难当然在于无法肯定在德国的职业前景如何。虽然那时有许多人信口开河，说什么要占领二十五年，可是财政部却（也许幸而）持怀疑态度。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签订了某些长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过七年，而且在这个期间担任文职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从正规部门中抽调固定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是按这个办法执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员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凡是以正规文职人员为核心的管理处（诸如政治管理处和人力管理处）都是属于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愿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调，而各部门因为面临着国内的大量问题，并不是都想把本单位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从前的敌国去服务的。德国的生活有许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弥补缺陷的优越之处（例如优厚的津贴），这一切并不完全合乎应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年起出国人员许多都不情愿定居异域，另外一些人则一心想回国，不肯失去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因为国内有那么多文职工作要人去干。①为前途焦虑也许是过分了。任何一个在德国干得出色的人很可能会从这个或那个组织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职务。②但是这种焦虑是存在的，从而使提供能够有效地处理管理问题的人员增加了困难。不管怎样，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总要有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尽管口头审查委员会精挑细选，还是混进了一些不称职者，不得不予以撤换。配备不当和意气不投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某些组织形式证明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必须予

以改变。但管制委员会就是没有时间能够安定下来。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燃眉之急，而且变化无常。委员会的人员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于情况在变化，人员在裁减（1946 年以后），这个组织的确切性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总的说来，英国似乎和其他盟国一样成功地解决了人事问题。

管制委员会中的英方因为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三个盟国面时常受到批评。然而，俄国人的方法不同，法国人的条件不同，无从比较，因此只能试图和美国作一对比，即使这样，某些情况还必须提醒一下。不错，1946 年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编制总共有二万五千八百十三人，^①而美国占领区在 1945 年 12 月只有一万二千人，次年 4 月裁减到七千六百人。^②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是由美国军队担任的，而英方则专门有一批人担任这项工作，人数超过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数字还包括情抵处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则仍由军队担负这一任务。除去这些数字，英方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还要提醒一下，英占区工业最集中，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美方人员编制之小，多半由于迅速裁减人力，方针审慎仅是部分原因。虽然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过于谨慎小心，长期把持着行政事务而未移交给德国人，但也有些人批评美国人在德国人尚未充分稳固足以发挥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务移交出去，使自己处于无法确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的地位。时隔仅仅十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一问题似已开始显得无关重要，因为英方编制从 1947 年以后就逐步缩减了。

美占区的组织方式与英占区大同小异，因为两国管理德国的计划是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于 1945 年 7 月 14 日解散）内共同制定的。开始时两组军官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一方以军事副总督克莱将军为首，他统帅着柏林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首，他指挥着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民事 103（G5）处的人员。在美占区的两个军区和柏林的美管区都配有附属于地区司令的军政府人员，并通过他们向法兰克福汇报情况。有几个地区司令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把自动决定问题的广泛自由使用于军政府，这是美国工作人员守则中允许战地司令享有的权力。其结果是，柏林的决策部门几乎管不了占领区里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法兰克福递送备忘录，要求让各级传阅。备忘录如果不作一番改写，下级就不会当作命令去执行，这一困难法兰克福是深知的。撇开这点不谈，法兰克福的人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决策者是他们而不是柏林。他们接受华盛顿的指令，或者向克莱将军转达以备四国谈判之用，或者向地区司令转达以便在占领区内执行。^①这种做法无视国际协议授权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的事实。1945 年 10 月，军政府人员脱离军队领导，从属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军政府办公处，前者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部分，但于 1946 年 3 月撤销。那时美占区已经划分成三个州（巴伐利亚，大黑森，符腾堡—巴登）；管制委员会的人员作了相应的改组，由军政府的行政委员（大部分是文职人员）领导。行政委员直接向柏林汇报情况。^②

在华盛顿，仍由陆军部负责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工作。但总司令的政治顾问和政治管理处则对国务院负责。有一段时期，由于华盛顿未能协调各个部所发出的指示而造成混乱情况。有好几次各个部的驻德代表接到了对同一问题所下达的互相矛盾的指令。这一困难大体上用下列方法予以克服，即一切指令均通过陆军部发出，而下达政治顾问的指示仅仅视为建议。在德国也制订出一种对照电文并于必要时要求澄清的程序。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

在华盛顿，国务院主要与国会外交委员会打交道，而陆军部主要与拨款委员会打交道。①经常有人建议 104 国务院把职责接收过来，但贝尔纳斯未予支持。②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因 1945 年秋部队复员而受到的影响，甚至超过英国，到 11 月份，三百万人的部队中已有二百万人回国。③关于前已谈过的招募人员问题，因距本国较远而更加困难。“美国军政府办公处的几乎每个单位不是人浮于事，就是人手不足或配备很差。”④1945 年 7 月 31 日，美占区军政府有一百六十五名医务人员；三个月后只剩下七十七名。按照计划，要求在 11 月 30 日的人数为五十九名，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备二个月以上的经验。⑤造成混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负责提供人员的部门内部经常变动，因此谁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完一个人的申请手续，各种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阁，谁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这一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政策问题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底。例如，在华盛顿制订对德国工业管制计划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派到柏林去执行旨在贯彻波茨坦协定的计划。①只有少数几个重要岗位，其人员保持着合理的连贯性。

俄占区的苏联军事管制机构是在 1945 年 6 月 9 日组成的。②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个州之间也没有中间一级机构，理由很简单，柏林本身就处于俄占区的中心。但与美国人一样，中央权力开始时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负责州的司令官打交道。③俄国组织机构的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俄国人在 1945 年 7 月就着手建立德国中央行政部門，④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时俄占区的这种机构就可以作为核心，过了好几个月，英占区或美占区才开始成立占领区一级的德国机构，即使在这时还是强调这种机构的作用在于咨询而无执行权。⑤另一方面，俄国人很快就开始 105 向德国中央机构颁发指令，由这些机构向各州传达必要的指示。这样便自动限制了当地俄国司令的自由行动。他们仍对军政府负责。上级只是通知他们向德国方面发出了什么指令，要他们监督那些指令的贯彻执行，而不是告诉他们遵循什么政策（他们可能服从或可能不服从的指示）。莫斯科也停止直接同他们打交道，但与占领区内独立工作的组织还保持直接联系，这些组织多半是与工业和赔偿有关的，其自主权限制了卡尔斯霍斯特司令部的权力。①红军对军政府负有更多的直接责任，在其他占领区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委员制度使红军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州以下似乎很少驻有部队。由于建立了德国州政府这种形式的可靠工具，俄国人不需要进行严密的控制。几乎无法证实俄国人是否遇到其他盟国所遇到的人力问题，但从战争中伤亡人数之多和重新建设的需要来看，人力问题可能是存在的。在最初几个月内，他们肯定是人手缺乏，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官员直到 1945 年 11 月或 12 月才到达柏林。②另一方面，他们大概能够命令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人去德国服务。

法国驻德国的机构是以法国人根深蒂固地反对建立任何一种类似德国中央政府的机构为根据的。③因此，他们的主要司令部仍留在巴登-巴登。柏林的工作人员无权指挥占领区的工作人员，两者都直接由巴黎管辖。柯尼希将军即使出席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尽可能少去柏林。④结果是法国驻柏林人员班子小，级别低，而且缺乏权威。在四个占领国中，他们对四方讨论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要算最少（这也许最终意味着他们浪费的时间比谁都少）。他们住在法管区北部边缘的弗罗赫瑙，经常遇到供应困难，特别是运输方面的困难。

在法占区内，组织机构分力行政管理总署，财政经济管理署和法律与公安管理署，都设在巴登—巴登。各州总部的管制当局集中组成一个州高级代表团。①这一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看来无从得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 106 这个机构给人的印象是比英、美的体制更能保持平衡。从表现的特征上看。法国人在设立他们的组织时似乎丝毫不去考虑中央机构的形式，即使设想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他们对占领区控制极严，委派德国人做的事比别的占领区要少得多。1946 年 12 月，据说他们有一万一千人参加军政府。②这就是说每一万个德国居民有十八个法国人来管制，英占区是十对一万，美占区是三对一万。据报道，在巴登—巴登的法国人多于德国居民。③不谈一谈柏林，便无从看到盟国组织机构的全貌。④柏林由一个小型的管理委员会来治理；四个管制区的司令在一个叫做军事管制总部的机关里聚首开会。每个司令有两名副手，一个负责驻军，另一个负责军政府。负责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一个附属委员会，它对军事管制总部的关系犹如协调委员会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关系。在它下面也设有各个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市政工作。在德国方面，柏林由议会（市议会）和执行部门（市政厅）来治理，由一个市长领导，接受军事管制总部的命令。各占领国在其管制区内负责管理自治区（专区）的行政机构。在 1945 年 7 月前俄国人单独管制柏林的那几周年，他们把那些合意的人安置在市政厅和专区的大部分行政岗位上（虽然不尽是共产党人）。其中有些人证明为极不合适，①西方盟国不得不把他们撤换掉。在 1946 年 10 月市议会选举前要更换市政厅的人员是不那么容易的，而且需要运用某种机敏的手段，来防止市政厅在未经军事管制总部授权和在违犯占领国意愿的情况下，对专区的行政机构进行干涉。但在 1945—1946 年冬季，军事管制总部确实成功地制订出一个联合粮煤计划，同意确定全城定量和税收的共同标准，并在克服了某些困难之后，成功地确定了举行选举的基础。当然，对这样一些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后果一定比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意见不能一致所产生的后果更迅速；更具体地暴露出来。而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还没有哪个占领国愿意承担公开破裂的罪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七章 德国状况

如果不考虑到占领时总的形势，便无法理解和评价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前面几章旨在提供种种背景知识，下面几章则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阐述。然而，所有这一些都好像是一个人在用纯科学资料来解说布吕格尔的一幅画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节的色彩却未加描绘。不过，要使一个从未身历其境的人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印象，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凯斯特勒的笔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萨瑟兰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画艺。占领期间生活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是喜剧与悲剧并存，是宽厚与同情和凶残与罪恶共处。但人们无从知道打着呢说“整个世界在可怕的动荡之中”的乔克塞·戴利什么时候才可能不打断博伊尔夫人哀悼亡儿的哭泣。以下各页充其量只能聊以弥补一下这种缺陷。^①

也许要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货币暂时不起作用了。就盟国方面来说，货币已为等级所取代，膳宿供应与交通工具这两项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军阶而定。我们在国内讲笑话，说到一个人发迹的情况，他是从用方桌一跃而用写字台，从用玻璃水瓶一跃而坐扶手椅，从用毛毯一跃而欣赏绘画。可是在德国，实际上整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基础上实行配给。一个人的军衔或准军衔决定了他住什么房子，在何处就餐，用几个仆人，享受怎样的旅行待遇，住什么样的旅馆，甚至决定他来卧车睡卧铺的权利。什么东西部由当局来提供，大部分由为此目的而从德国国外进口的库荐品中提供。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 108 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男小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

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①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需要进行分配”（或者不如说按其职务进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贱事务都是由德国人来承担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员会集团内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级。诚然，“次等军价”中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不管怎样，在 1947 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这些人的家务也是指使别人代劳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重享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们本国已为战争所破坏。有时人们怀疑，相形之下，俄国人是不是头一次过着这种生活。

这种仰仗军价来向当局获取各种方便的做法必然要产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错误理由去获取自己无权享受的特权，他们便向有恩可施者摇尾乞怜。行政岗位上比较低级的官员面对朋友或上级的求情说

项，如果不受诱惑的话，就感到相当为难。“好朋友的圈子”显得太突出了；善于“钻营”受到不恰当的尊敬。显得荒谬的是，采取旨在肃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总是难以用一般的措辞来订出条例，惩办一切坏人，好止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从事他们的许多必要工作。可是，条例订得越严，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给逮住的坏蛋却越少。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员日益需要拥有一切自由决定权。就是这样，如果想彻底执行一项政策而不破坏任何条例，那就非要有相当机敏的才智不可。若干主要中心，分散隔离，相距遥远，因此走动是很重要的，然而德国的交通工具不能正常地使用；而尚未用旧的盟国车辆在德国司机和工匠手里很快就报废了。因此要在规定时间内从一处抵达别处，就成为一种蛇爬梯子的游戏了。公余之暇如何消遣，这是另一个问题，对那些远高大城市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许多人的生活绝不是快乐的。宿舍一般不舒服，冬天很冷，伙食不一定合胃口。汉堡附近一个军队里的伙食，据说“比战俘集中营外的任何食品都要凉”，①没有多少英文书籍可看，也没有多少业余消遣设备可满足人们的癖好。各种福利协会如娱乐报国团（ENSA）、皇家学院准校友会（AKC）等所开办的英语电影院和剧场，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弥补上述缺陷，但未能完全奏效。爱好音乐的人倒是最幸运的，他们享有进入德国歌剧院和音乐厅的特权。也许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潜在的麻烦是大家思想上不作久留之计。一个人既然指望几个月后回国或者调至别处，就不值得煞费苦心去作出种种安排来使自己免于无聊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初有比较多的人没有认真努力去弥补他们不懂德语的缺陷，这是英美管制班子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他们讲话中一般通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词，例如“完蛋了（kaputt）”、“什么都没有（garnichts）”、“一直下去（g'rad aus）”、“公平（fair）”、“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和“不利的（gehandicapped）”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无事可干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或跳舞。这个问题本来是不会如此尖锐的，如果有许多工作可做的话，但除开头几个月外，工作量的分配是不适当的。有人在1946年说道：“这个机构好象战争初期的勤务部，上层都是过度辛劳，而下属则多半是任务不足。”如果说失之于权力未能分散，那是没有击中要害。权力分散只会引起混乱，除非在分散之前就制订好若干基本原则。这点只有上层才能做到。但是在德国，由于种种原因，情况瞬息万变，以致一套原则刚刚制订好，马上就不适用，又要重新修改了。当然，在德国也正如在别处一样，总有少数人是根本不想努力工作的。

这一批人远离本国，多半是单独聚居，与德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当然，下层的官员们在公务方面经常要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级的司令部里，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员。在高级，打起交道来几乎完全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进行，用的是英语。他们的工作是与其他有关部门（包括国内的有关部门）协调政策和草拟必要的指令向下颁发。在办公时间以外所接触的德国人往往限于侍者、司机和其他仆役，这种鸿沟的存在有几个原因，而正式禁止与敌国人亲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这一禁令于1945年7月14日解除了）。很少有几个官员能操流利的德语。管制机构的人员中懂德语的极不普遍，而德语几乎是他们每天都要使用的。许多人在原则上厌恶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负战争的责任，应对纳粹统治的种种暴行负责，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德国人过往甚密。后来的接替者，因为役有亲眼看到德国在欧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厌恶之情便不那么强烈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

在占领区司令部的周围，当地的德国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国人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意和盟国人员交往。同时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运来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条禁令，盟国的口粮不可供给德国人（为盟国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顾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导致禁止在盟国餐厅或俱乐部招待德国人了。还有一个类似的禁令，就是盟国车辆不许德国人乘坐。由于德国人粮食匮乏，住房设备简陋，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动辄使人为难，进入德国人的饭店和咖啡馆，也因一些明显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于社交往来的一般条件既不存在，与其在缺乏这种条件的情况下花费力量勉为其难，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员会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许当局在早期是原则上赞同与德国人交往的，那就应该采取若干实际步骤使这种交往简化，时候一到，那些最严重的障碍就消除了。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会产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时，如无正常的社交来往，一些为非作歹的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如果说在盟国占领军的圈子内货币已为军阶所代替，那么在德国社会生活中金钱也已不起作用，日益为物物交换所取代。〔在西德〕“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进行得荒谬绝伦，达到了扼杀经济活动的地步。军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条，即物价飞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恶的，于社会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饥挨饿，政府机构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图用具体的军事命令来管理各占领区内的经济，这只能使经济瘫痪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经济核算的尺度，取代货币的是以货易货、补偿交易、以实物支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返祖形 111 式的经济交往。其恶果有二：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特别缓慢，二是农村饱而城市饥，情况悬殊极大。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听任物价飞涨所可能产生的情况还要严重。

①这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须留待以后去讨论。②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社会后果。货币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设想为前提的，即农民愿意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城市里出售，换取现金。如果这一设想已成泡影，那么城里人要生活，只有到乡村里去用实物来交换粮食。如果工人们不得不去农场亲自搞粮食，那么用于工作的时间就迅速减少了。而且，不管怎样，为了无人肯接受的金钱而干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旦诚实的劳动不复为人所爱，德国的道德标准就要遭受又一次打击，这种道德标准已被两次失败的幻灭之感、通货膨胀和十二年的纳粹教育逐步破坏。采用什么手段的问题成为如此突出，以致卧的是否能证明手段之正确，已属无关宏旨了。老百姓的道德心丧失了，这是盟国肩负其责的一个方面。象法国革命中的西哀士一样，每个德国人所唯一关心的似乎是能够说一声：“我活过来了。”

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盟国的道德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少数盟国人员出来是为了贪污舞弊的。还有许多人手里掌握着德国人想要的东西，如汽油、食品、衣服、燃料、香烟之类，德国人非常愿意拿照相机、手表、首饰或马克来交换。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使征服者的道德败坏，被看作是一种羞国主义的表现。而在盟国方面，战争时期曾经产生过高度自觉纪律的那种共同努力的观念，现在比较淡薄了。往往很明显，譬如在黑市上公开拿不是分配给个人消费而是交托给自己保管的物资去以货易货，这类行径也不认为是丧失原则。为什么要反对出卖（而不吸）分配给个人抽的香烟，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在几年之后，英美

的纳税人接到税款单时，不少人就为之瞠目结舌了。只要看来吃苦受害的似乎只是德国人，许多人就感到心安理得，认为有权去捞点油水，补偿一下个人生活遭到战争破坏的损失。1945年10月，驻柏林的美国军队通过货物112交换赚取不少德国货币，能汇四百万美元回家，超过他们实际领取的薪金，而且这还是在支付了他们在当地的一切生活开销之后的数字。^①为什么要反对以香烟代替不值钱的马克去赏茶房酒钱，对这一点甚至更难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人替你做许多零星杂事。女踝坚持只用金钱做酬劳，那就可能无人替你干活。实际上你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以货物换取服役的交易，而这种交换究竟刻了什么地步才变为黑市买卖，那是不易明确的。高级领导也许谴责黑市交易。但他们本身也高不了以货物换取服役——即使他们总是不很清楚为他们安排的照顾背后究竟搞了什么名堂。然而，如果象有些人那样把整个管制机构都说成是烂摊子，那是十分错误的，达到了诽谤中伤的地步，而且看不到他们为了把一个几乎被其过去的统治者蓄意毁掉的德国从内战、饥馑和疾病中拯救出来而付出的大量无私的艰辛劳动。英美管制班子中大多数成员勤勤恳恳，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无人感激的任务。确实，上层人物在作出许多决定时，总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

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无官无职的公民”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对德国人残忍”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113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年12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

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脚踏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①。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 114 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②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四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五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四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③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八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①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②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格-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 年 11 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③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地成立公共取暖室^①，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

1946年8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②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③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年4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①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116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识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①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象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仅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

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 117 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各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导致另一类冲突的内在因素，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挑战。

第八章 难民问题

在我们转而考虑占领政策的各个方面之前，最好先谈一谈盟国和德国人不得不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即难民问题。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五大类：

(1) 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居民奉政府之命或出于自愿，疏散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村地区。据说到战争结束时，其人数已达一千万。^①有些人在轰炸一停止便又返回城市了，但有些房屋被毁者则仍留居农村。这些人并未增加德国的人口，却增加了农村与未遭破坏地区的住房压力。当然，有许多疏散者的老家已为占领区边界所阻隔，由于明文禁止占领区之间的往来迁徙，他们只好悄悄地往回搬。对这一类情况作了特殊的安排，1946年10月估计有五十五万七千人从西方国家占领区迁至俄国占领区，有一百九十万从俄国占领区迁至西方国家占领区。^②

(2) 在欧洲胜利日，德国有六百万外籍工人，到7月份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外籍工人的数字已减至二百五十万人。大部分收容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辖的流亡难民营里。他们主要是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人和俄国人，还有一些南斯拉夫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重回故土，担心遣返后可能遭到不良待遇（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类似的问题在俄占区内发生，可能立即就被处理掉了）。10月份，英美当局开始遣返五十多万波兰人。对个别人并不强迫他们违愿离开，但也不鼓励他们留居。对其他国家的人也采取同样措施，到12月1日，只剩下九十万人，其中四十万人在美占区。^①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在英占区，到1946年6月还有三十五万人。^②俄国人提出波罗的海国家人和乌克兰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予强制遣返，理由他们都是苏联公民，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其他非德国难民从更远的东方源源不断地大批涌入西德。直到1947年4月，为了想堵住这股人流，才不许新来者前往集中点。这时西方国家占领区共有六十四万九千名难民。^③后来采取官方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移民方法，逐步组织这批人迁居到英国、西欧、巴勒斯坦、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但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朗内这项工作尚难收效。而且走的人总是年纪较轻，能力较强，身分较高，留下的则都是年老、多病、丧失能力和不守法纪的人。他们感到前途茫茫，不免干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情。他们的口粮定量比德国人的定量高，因此要额外进口供应品来养活这批多余的人。由于反正有救济当局来养活，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工作。这些人是德国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而且不断引起麻烦。

(3) 在战斗结束前，有一批住在德国东部各省或东欧非日耳曼国家中的德国人在俄国军队来到前就逃跑了。据说在美军开到时，美占区内已经逃来了一百五十万人。^①这些人中如果有谁溜回老家去取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去看一看那边在新情况下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几乎肯定会再折回西方来的。

^②

(4) 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扎尔人一摆脱德国的控制，想起过去纳粹利用他们之中的德国侨民团的情况，就立即驱逐那些侨民，送他们回德国本土。我们看到，在被俄国人置于波兰治理之下的那些德国地区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③可以预料得到，在胜利之初的一阵激动中，这种举动是仓促行事、并无组织而且是不近人情的。被驱逐的决不能带走他们的全部财物，而是被迫留下许多东西和大部分金钱。他们不顾交通运输情况的混乱，七零八落地

通过欧洲，到达俄占区时已奄奄一息，身无分文；他们还想朝西去，却只能发现西方盟国在对大批战时难民 119 安排好之前，要暂时封锁一下占领区的边界。

这种形势使波茨坦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予以注意，从而要求管制委员会对此作出报告，而在报告提出之前，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暂时停止驱逐德国侨民。①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闻，即使接受此项要求，也会采取种种手段，诸如不发口粮配给卡、不给工作等等，逼得德国侨民无以为生。例如，布雷斯劳的情况是在 19 月 6 日，即盟国的计划准备提交管制委员会之前二十天发生的：拂晓，五个波兰民兵命令一位教师和他的妻子在十分钟内离开寓所。他们的钱全给拿走了。教师夫妇和其他一百三十人到达集中点之后，他俩的手提行李包遭到检查，本来东西不多，又轻了许多。……马车把他们送到车站，赶进装牛的车厢。车上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晚上六点起就锁车厢，早上六点才开锁。……这批乘客连续旅行了十一天。十一个晚上有九个晚上遭到抢劫。②管制委员会于 11 月 20 日最后批准了计划，③规定迁徙的德侨不下六百五十万人。三百五十万人从波兰和波兰所占地区尽可能取道海上归来，其中二百万人被安排到俄占区去，余下的去英占区。一百七十五万苏合德人从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占区去，还有七十五万人去俄占区。五十万人从匈牙利去美占区，一百五十万人从奥地利去法占区。迁徙定于 1946 年 1 月开始，持续七个月，头三个月只安排迁徙五分之一。难民在迁徙时有食物和医药照顾。后来的几个协定都保证难民可随身携带一切能带的私人财物，每个人最多带五百马克。

制定计划是一回事，但执行计划则往往是另一回事。来自波兰的首批德国人致 2 月 26 日才抵达英占区。①4 月 11 日英方占领当局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波兰政府没有遵守诺言。②提供的迁徙条件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只是由于俄国的协助，难民们才免于一路吃苦。迁来的人中，生病、年老及体弱的比例过高。到 6 月份，迁来的人只有百分 20 之十八是男性，而男性中有百分之四十不适宜于劳动。③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迁至美占区的人，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也是一贫如洗。④捷克拍留着年青干练的工人不放。由于对此种种提出了指控，遣返安排才有所改进，但情况从未变得令人满意，在迁徙中难民们备尝艰辛。遣返过程比预定的时间要长。1946—1947 年冬季，遣返工作中断。到那时，英占区和美占区预定接收的难民都来到齐。①

(5) 最后一类是从俄占区逃到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德国人。初期逃出的人并没有后期那样多。一个原因是在 1947 年底以前俄占区内的生活条件比较起来还算不错。②另一个原因是认识“人民民主”是虚伪的，也需要一些时间；许多非共产党人迟迟不愿断定他们只有牺牲他们的正直，才能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从另一方面来说，偷越占领区边界并不困难，有些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留在东德心神不安，就随着相当数量的商人，黑市投机分子、罪犯和特务偷越边界来到西方占领区了。当然，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更远的东方。1946 年 10 月份，据估计俄占区居民有九十二万二千人逃到西方占领区，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英占区，其余全部在美占区。③这些难民有许多是偷越柏林分界线过来的，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收容所来收容他们，直到把他们运送（通常是用飞机）到西德。根据以上数字来计算，从欧洲胜利之日起，平均每天流入的难民数为一千七百人。

大约有一千万人加进德国的正常人口之中，这在经济方面给盟国和德国

当局增添了不少问题。即使没有这许多人流入，情况也并不见得很好，膳宿供应也不见得绰绰有余。实际上把一切可用的场所、临时营房和收容所都利用起来，也不足以解除老百姓居住得拥挤不堪的困境。俄占区和法占区情况最好，俄占区好的原因是逃往西方的难民大大抵消了从东方迁来的难民，法占区好的原因是它离难民流出的地区最远，而且法方当局以不止他们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接受组织迁徙的一批批难民。^①然而在整个美占区，流入的难民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英占区，流入的难民则仅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四，但由于英占区人口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住宅缺乏，这就构成了差不多的负担。^②

在一个社会集体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欢迎的，即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许多难民是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侨居德国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讲的话几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国特征。有些地区流入的人口改变了居民的整个特点。例如黑森，本来是新教徒占优势，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则接近于旗鼓相当了。^①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巴伐利亚，定居了大量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这一些结果自然不为原来的居民所欢迎。他们心怀不满，因为不是勉强让房屋与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额外的救济税款。有些难民精力充沛，有才干，因此飞黄腾达，他们不消多少时间就在新环境里变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儿不一定能得人望。还有许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并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炉灶，恢复原样的。这样一些人适应不了环境，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为社会的负担。难民们纷纷涌到农村，而不是去城市，因为农村地区有许多完好无损的房园。^②结果农村变得拥挤不堪。因此，难民问题不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村贫民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难民的存在成了德国，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来的居民给他们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们搞走，另一方面，难民本身因遭受外国的驱逐而感到愤恨不平，又遭受本国同胞的勉强接待而心怀不满，从而缅怀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中无疑地变得更美了）。唯一能使双方一致起来的是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收复了奥得河那边的失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纳粹利用定居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么住有这类少数民族的国家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许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继续定后在重要的前线地带，就等于要他们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因为1938年的记忆犹新。波茨坦会议只是承认和设法调整它无力阻挠的既成事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同意把德国东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划归波兰，尽管他们对西尼斯河线并不赞成。真正要对这种结局负责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国和俄国人，甚至也不是波兰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这种政策的可怜牺牲者们懂得归罪于谁，那反过来将是对人性要求过分了——即使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境遇也不会变得愉快，他们的愤恨也不会稍减。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很可能产生过激政策。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办法是使西德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一来，难民的人力和才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社会所吸收。但无法把他们全部吸收到农业中去。这就暴露出波茨坦协定的又一个缺点。协定的一项条款规定剥夺大量的德国工业，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化工业所必须履行的责任。难民们并不定居在工 123 业

区，前面已经说过，情况适得其反，因此解决难民问题，要么把他们再迁徙一下，要么在新地区兴建工业。这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做了。这样做，再加上德国经济的恢复，大有可能不使难民问题变得十分紧迫。尽管如此，在德国居住着那么多想起德国失地的人，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义感情的一种因素。毫无疑问，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会立即使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不管怎样，难民们的阅历很可能使他们因经济衰退而采取极端措施。由于许多难民的生活并不十分有保障，经济衰退对他们的打击将超过别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时候，还能记得奥得河那边生活的人将所剩无几了。但这个日期本身就告诉人们，欧洲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危险。

第九章 经济事务

第一节 中央行政管理部門的僵局

在 1945 年整个秋季，经济管理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努力从事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以便把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具体化，并开出可以从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作为赔偿的设备清单。^①但是远在制订任何计划之前，就需要逐步提出整个波茨坦政策所依据的种种设想了。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从波茨坦回国不久，便接见了来访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及其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法国领袖们明确表示，既然没有邀请他们出席波茨坦会议，他们认为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就毫无约束力。特别是他们对于任何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制德国的建议感到遗憾，他们要求把莱茵兰从德国划出来交由法国治理，建议建立对鲁尔区的国际管制，还请求允许他们吞并萨尔。他们害怕德国丧失了东部诸省后会将重心西移，而俄德联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带到莱茵河。^②他们听不进美国人要他们宽心的话。1945 年 9 月当皮杜尔出席伦敦外长会议时，重申了法国的反对意见。^③但是，由于 124 那次会议不是真正与德国有关，所以在给予法国人若干临时妥协性的答复后，就把问题搁置起来了。

然而到了 10 月底，管制委员会接到了关于按波茨坦协定筹建五个德国中央行政管理部門的具体提案，克尔兹将军声称，遵照他本国政府的指令，他无法予以接受。这样就把管制委员会想要建立德国统一经济管理机构的措施束之高阁了，而没有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则很难把德国作为单一的经济整体来对待，也很难实施共同的政策。不管怎样，要使四个占领国对该办之事取得一致意见，要协调五个行政部门的行动，都将是困难的。但只要管制委员会还必须对这些部门下达指令，那就还有可能克服达成协议的障碍，制定出一项明确的政策，使之得到一致的贯彻。在奥地利，以及（有一段时间）在柏林，都达到了这个目的。然而在德国，一旦各占领国负责在各自占领区内贯彻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得都一模一样，而管制委员会指令中的缺陷必然会被武断地用种种参差不齐的方法来加以弥补。四个占领区标明某个国家驻扎部队的界线（这是本来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很象国家的边境线了。

但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是无权采取任何行动的。人们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出，法国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个问题只好权且留待以后通过外交途径来磋商。海因德在 12 月份说道：“我国不想看到四国管制机构的垮台。”大约与此同时，贝尔纳斯说，美国准备不等待法国同意就在德国推行中央集权化措施。^④过了四个月，四国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报到这个问题了。

这是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呢，还是侥幸逃脱了一场危机呢？有些批评家一直不能理解负责的政治家们为什么允许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而没有把委员会要实施的政策事先征得它的同意，又为什么当它否决该政策的上个重要部分时迟迟不采取行动。索科洛夫斯基不能相信美国人不在暗中鼓励法国人，他对克莱将军说，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只要美日中断法国人所依靠的物资供应，就能迫 125 使法国人就范了。^⑤如果立即大胆抓起这个棘手的问题，使中央部门开展工作。德国可能仍会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存在，这一点确实是可能做到的。要理解这种局面何以能听其发展，有必要提醒一下，法同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雅尔塔的妥协，^⑥其代价之一就是不让它参加波茨坦会议，而盟国领导人的更迭可能也影响了立即领会这种立场的含意。要理

解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有必要超越德国的范围来观察。正是在这个冬天，有关与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缔结和约问题，法国和中国参预起草和约的权利问题，对日本的管制安排问题，俄国对波斯的政策以及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等，外长们经常展开剧烈的争讼。也是这个冬天，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伦敦召开。人们仍然希望安理会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世界上一些带根本性的紧张问题，因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转向这一方面了。与过去的许多冬天适成对比，注意力已不集中在德国了。下院在 1945 年选举和 1946 年 3 月 18 日之间没有对这问题进行过正式辩论。^①情况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联合国机构能够象其缔造者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盟国在德国内部的分歧就可能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对很多世界性的问题意见不能一致，那么在对德政策取得一致方面，即使有任何进展，很快也会反复的。

有人常说俄国人是决心不执行波茨坦协定的，还说如果法国人没有否决中央部门，那么关于俄国人要想在德国的必要进口物资获得偿付之前，就从其现有生产品中提取出口物资（这也是法国人采取的一种做法）的权利问题，也马上就会陷于僵局的。这个特殊困难是为局势所固有，因此上述论点很有份量——然而把责任明确地归之于俄国人，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克莱将军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他说：“我听到波伦先生评论道，法国人用他们早先的否决解救了我们。后来我听到比德尔·史密斯大使说，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能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对付俄国人。”^①要避免把俄国人已经在柏林为其占领区建立的行政机构作为中央部门的核心，确实是很困难的。虽然这些机构中的人员决非都是共产党人，但 126 俄国人必然会使他们在任何组织中的代理人掌握全德的权力。对这些部门下达命令非常容易引起摩擦。而且几乎不用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各方必然要竞相耍弄阴谋，行施诡计，每个占领国都企图按照对自己主张有利的方式，操纵所有占领区的德国行政机关。

9 月 10 日，管制委员会下令减少“对占领区间商品和服务行业正常交易的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但差不多与此同时，管制委员会却禁止德国人从这一占领区迁移至另一占领区。委员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税收、住房和劳动关系的法律，但对于发展占领区间贸易或作为先决条件的直达运输问题却没有提出值得注意的计划。12 月 17 日，罗伯逊将军和克莱将军建议对德国人开放所有占领区的边界。克尔兹加以反对，并没有提出理由。索科洛夫斯基原则上同意，但却说：“现时无法切实执行。”^②事实上当时各占领区主问很少交流物资，大部分生产是依靠当地的原料，并在当地销售。即使大力重建中央管制机构和直达交通运输，也很难使贸易再度正常进行。有技能的盟国人员本来有限，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忙于使地方机构运转（尽管进展缓慢），就是忙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这一计划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德国的中央经济政策。

第二节 工业水平计划

经济管理局的工业水平委员会在 1945 年 9 月 18 日首次开会。①委员会手头有一份美国的报告，这是在五个星期之前由卡尔文·B·胡佛教授根据极不充分的统计材料所编制的（他在文件完成前一周就回美国从事他的教学工作了）。委员会决定，为了遵循波茨坦准则和为了把德国拉到欧洲平均水平，德国的生活水平就要降到 1930—1938 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四，这恰好是 1932 年所达到的水平，而 1932 年乃是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的衰退年。②讨论一开始，俄国人立即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波茨坦协定中有关德国生活水平的条款写得含糊不清。③其次，俄国人坚持在计算生活水平时，必须把一切工业能力也同样拉到欧洲平均水平，而对于那些（由于拆迁或限制）大大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的工业能力则不作任何弥补。这将意味着有意要把德国弄穷，即使为安全着想没有必要这样做。此外，他们不同意在确定工业资源水平时，特别是电力供应水平时，应对德国比较缺乏自然资源以及人口高度集中这两点作任何考虑。至于在计划生效那一年德国可能有多少人口的问题，也同样有争论。①当委员会进而考虑个别工业的许可水平时，这些根本性分歧自然会导致所提数字差距极大。一般说来，英国和美国提出的数字相当接近，法国建议的数字要低一些，但三个西方盟国之间要达成妥协是不难的。进一步的协商是要和俄国的数字取得协调。俄国的数字往往定得很低，看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这种协调工作经常是使俄国数字和西方协调数字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采用四国数字的平均数。

钢铁工业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战前德国每年用五百万吨钢（总产量是一千九百多万吨）去制造各种各样的钢铁器具，诸如钉、铁皮、餐具、炉子、管子、工具和家庭用具等。即使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还有九百六十万吨钢划归民用。②英国因此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定为九百万吨，而胡佛报告中的数字是七百八十万吨，法国建议则是七百万吨。俄国人开头提四百六十万吨，通过对预算的统计基础展开争论，后来俄国人把数字提高到接近五百万吨。克莱将军在提出建议数字之前已经向高一级的机构即协调委员会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凭特有的精力来干预此事小他本人同意七百八十万吨的数字，但他接到了国务院的建议，认为适当的数字是三百五十万吨。①因此他建议以五百五十万吨用作国内消费，他之所以能比较心安理得地这样做是因他本人有一种印象：即 128 战前德国的消费量为“大约九百万吨或一千万吨”。②得到内阁全力支持的英国人为确定一个较为现实的数字而坚决斗争，后来这个问题转到了管制委员会去。1946 年 1 月 10 日，管制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虽然要给德国留下生产七百五十万吨钢的能力，但任何年度的产量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尽管这样，对这两个数字的解释仍有争论，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华盛顿直接向伦敦提出才好解决。

一旦这些关键数字获得解决，计划的其他部分进展就比较容易一些了，虽然计划的完成还要求进一步作出一系列的妥协。这类妥协，对经济事实可稍加忽视，而对政治压力却不得不多加注意。在最后阶段因追求速度而妨碍了充分磋商，这就产生了计划本身的某些脱节之处。例如化学工业的能力就定得太低，以致不能供应其他工业按许可水平开工所需的原料。③但是美国领导人准备冒这样的风险，即由于挑剔细节而把辛辛苦苦制成的整个计划搞垮。英国人了解这个政策的弊病所在，但不准备在这一点上和盟国发生裂

痕。因此他们决定仅仅做出如下规定作为接受这个计划的条件，即德国的西部边界要保持不变，中央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起来，德国应被看作一个经济整体，应该为它的出口找寻市场，德国的人口在 1949 年不应超过六千六百万。1946 年 3 月 26 日，管制委员会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两天后，即距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日期大约两个月，①工业水平计划便公诸于世了。

该计划把德国工业分为三类，一类是要予以禁止的，另一类是允许存在但要限制产量的，第三类是听任自由发展的。与这三类相应的工业大致如下，一是直接具有军事性质的工业，一是能够用于军事但基本上还是民用的工业，第三是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工业。因此从这方面看来，这个计划是试图对付发动全面战争所出现的问题的，在全面战争中，这样一个广泛的经济生活领域，可以从和平目的转而服务于军事目的，而一旦战争爆发，除非是与战争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生产，其他则几乎难以继续下去。29 如果说解决方法不能令人满意，这与问题的复杂性不无关系。

十四项工业要予以禁止，十二项要加以限制。②这些工业的全部设备除为达到规定的生产水平所需者外，都要用于赔偿，即使不用于赔偿，也要予以拆除。对于另外六项工业，规定了生产水平，但明确指出所规定的生产水平乃是通盘计划时的估计数字，而不是一种限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对俄国和法国的胜利，因为俄国人一直要求有权把目前超过规定水平的一切生产用于赔偿。③根据估计，到 1949 年，德国的出口要达到三十六亿马克，或仅略低于 1936 年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按不变价格计算）。出口物资的大部分将是煤，药品，纸和纺织品。进口将不超过三十亿马克或相当于 1936 年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食物和饲料将不超过半数。这样就会有相当数量的剩余——根据统计数字来判断。然而，出口要达到 1936 年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工业计划产量的总水平（除了建筑）却只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④因此必须拨出比例相当大的工业产量用于出口，提供国内市场的则相应缩减了。但问题不尽如此。战前德国的出口约有三分之二是出售金属、机械和化学品，而这些工业恰恰是受到最严格限制的。这类工业产品的减少又不得不用煤和消费品工业产品来加以填补。虽然这方面在技术上未加限制，但其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按该计划推算，到 1949 年，这方面的生产各不相同，如煤可能达到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上西里西亚的产量业已丧失），纸张和印刷只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且还必须从这些已经缩减了的产量中提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出口。国内的生活水平就得厉行紧缩。130 即使我们假定计划具有可靠的数学根据，但关于数字如何取得的情况则很难令人聊信。计划中对德国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只有碰上好运气才能够达到。自 1946 年以来，自由世界已对经济计划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根据这种经验。很少有人试图对产量和经济发展作一番核算，除非是进行大概的推测、而且要预计到会有大量差错。工业水平计划的虚假就在于它计算得十分精确，而且没有为难以预见的情况留下余地，显而易见，这是又一次为了避免盟国之间的分歧而不顾现实。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计划的编制者似乎是受了作为他们计算基础的战前数字的迷惑，似乎是在假定他们正在处理一个已经确立的、正在经营着的工业。诚然德国工业遭受战争的破坏，不象人们起初想象的那样严重，⑤但是它已处于一种难以迅速恢复的停顿状态。同时，世界形势也决不是战前那个样子。譬如，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未来若干年中，粮食和原料与工业品相

比就要少一些——但没有为贸易方面的不利变化而自有余地。我们应该看得清楚，把德国经济资源从用于军备转到从事和平时期的生产，从重工业转刻轻工业，会造成好几年的脱节现象——然而这一点几乎没有加以考虑。东部失去的领土，其生产占战前德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谁也说不出来怎样去弥补这一损失。甚至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注意到库存问题。投降时国内还有相当多的物资，能使一定数量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这一情况便把一旦库存告罄该怎么办的问题掩盖住了。连“管道”都没有，更别提里面空无所有了。重建库存使之达到合理水平，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汇。外汇通常要靠出口物资去换取，生产出口物资则需要进一步的原料供应（包括食物，因为工人必须生活），而原料又需要进口。在某种意义上讲，以积累库存形式表示的德国资产，业已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中挥霍光，虽然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情况，“挥霍”这个词似乎用得不够恰当。事实上这不是重新开始发展一种停滞的经济的严峻问题之一。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刺激问题。德国工业战时纪录 131 毕竟还是突出的：1944 年的生产比 1938 年高百分之四十。^①但在 1944 年，人们仍然认为尚有可为，即使当时的情况只是为了避免失败。到 1946 年，那只驴子几乎丧失了它所有的胡萝卜。盟国已接手管理这个国家的责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道德感衰退了。金钱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停止。即使口粮配给标准让德国人使劲干，却也没有什么东西来诱使他们这样干；因而他们的显著个性就一笔勾销了。雇主方面很难得到信贷，没有几个人打算定货。工业水平计划，甚至波茨坦协定本身，都是作了这样的假定，即德国人会全心全意和占领国合作来重建他们的国家。然而与其说是要求他们重建国家，倒不如说是要求他们把生活下降到仅仅足以糊口的程度。如果他们不合作，又怎么办呢？俄国人准备使出残酷无情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少为此而烦恼。他们惯于采用专横的严厉手段，只有使用这种手段，计划中所要求的物资转移才有可能贯彻执行。但就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言，一旦政策不再是纸上的蓝图，而使其结果在实践中显露出来时，他们国内公众所能容忍的强制手段和铁石心肠是有限度的。同时为了不致于危害他们的另一目标——建立民主生活方式，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有其限度的。

工业水平计划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效果（因为没有实行多久就被放弃），而在于它暴露了盟国在建立和平问题上所具有的本质性的矛盾。这样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追述计划出笼时英美方面感到气愤的情景，只要提一提这种气愤是对要求一个确实实的和平所作出的反应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可以了。

第三节 赔偿物资暂停交付

在这整个时期内，西方各占领区的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整个冬天，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口粮配给量要维持一般消费者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还有点困难。有人认为足够维持生活水平的最低限量需要有二千卡路里，①由于难民涌进，人口剧增，而 1945 年的收成又比预期产量降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②美占区只能从本土 132 身的资源中提供每天九百四十卡路里的定量，③而英占区据估计在战前就奠定其所需粮食的半数，现在只能提供四百卡路里。④因此在 1945 年 6 月 1 日到 1946 年 4 月 15 日期间，英占区必须输入一百万吨粮食，美占区必须输入五十多万吨粮食（时间上略有不同），为了避免英美人员依靠德国的供应而输入的所有粮食则不计在内。⑤尽管有粮食输入，1946 年 3 月间的供应还是开始呈现短缺，英占区的配给量不得不降为一千零十五卡路里。到月底；美占区的配给量降为一千二百七十五卡路里。

盟国的目标是尽快把配给量恢复到一千五百卡路里。要把定量提高到二千卡路里，在当时情况下只能是遥远的希望。因为即使保持一千五百卡路里的水平也需要大量进口，而在当时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办到的。3 月初，由于粮食严重缺乏，美国政府停止对德国的一切装运，虽然在那个月底答应运送五万吨（是真正需要的一半），事实上只运送了一万六千吨。①5 月间，赫伯特·莫里森作为枢密院长，专程去华盛顿解决为德国筹措粮食问题。英国已经把手中将近五十万吨原来留作已用的粮食转交给德国，现在马同意从库存的粮食中再拨出二十万吨。②但是英国本身的粮食情况比战时任何时期都更糟，1946 年 7 月不得不实行面包配给制。幸亏美国政府“无保留地承担了任务，根据现有资源的条件，尽量供应德国”，但是能够供应多少，还得等着瞧。

在德国内部，正在尽一切可能增加粮食生产。已经作出安排，要在英占区耕种六十五万英亩草地，使下一季 133 谷物增产百分之十，土豆增产百分之七十五。牲畜因屠宰而减少，这不仅是为了要提供肉食，而且也是为了减少对可耕种的牧场和饲料的需求。属于奢侈品的作物则禁止种植。用作酿酒的谷物量则严格削减。当局鼓励在城市花园和分配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即使遭到偷窃使原定的消费者吃不到，但至少有人吃进嘴里去了）。还采取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内可能采取的步骤迫使农民交运他们的产品，但粮食生产由于缺乏种籽，肥料和设备而受到了影响，很明显，在几年之内还必须依靠相当数量的进口。①然而，德国的经济是无力偿付进口的。事实上有一定数量的煤正在出口，以应付被解放国家的迫切需要。因为英国没有煤出口，这些国家更要依靠德国供应了。但是由于德国的煤产量是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一出口就使得本国工业即使处于瘫痪状态也无法得到它所需要的煤。情况更严重的是，在削减了 3 月份的口粮定量之后，鲁尔区的煤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尽管矿工还有补充定量。因为缺乏煤，钢铁工业产量达不到计划所允许的五百八十万吨，只生产二百万吨。这又反过来对其他工业产生影响，首先是煤炭工业，原因是得不到必不可少的重建所需要的钢。钢铁生产的降低还要造成肥料的缺乏，从而影响国内的粮食生产。然而，即使有了煤的收入，英占区和美占区在 1946 年全年的总出口也没有超过五亿马克，而计划则预定 1949 年所有占领区的出口收入是三十六亿马克。如果不再进口原料，就连这种生产水平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约在 1945 年和 1946 年

之交，经济管整处主任德雷珀将军告诉克莱将军说：“我们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亿美元来支付粮食以外的必要进口。”^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英占区约有百分之七十的进口是由英国的纳税人来偿付的。在美占区，情况也没有多大差别。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负担有增无减。然而，不仅赔偿物资正开始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各占领区向俄占区运送，而且俄国人并不想抵赖这样的明显事实，即从俄占区向东装运的不单单是机器设备，还包播原材料 134 和制成品。如果按照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经济单位的政策来利用这些物资，就可以减少进口的需要或增加出口的收入。因此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认为把德厨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不仅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且成为一种迫切的经济需要了。

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外长们于 1946 年 4 月在巴黎举行会议。法国人坚持要分割鲁尔区和莱茵兰。贝分纳斯代表美国建议必须指派代表对德国经济问题加以考虑，特别是有关下列问题：（1）鲁尔区和莱茵兰的前途。

（2）为了整个德国，特别是出口、对留给德国的资源的利用。

（3）在以后九十天内就实现经济统一的程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4）各占领区边界只作为占领地区的划分之用。

（5）德国的西部边疆。但是，莫洛托夫不仅拒绝考虑这个建议，还重新提出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说什么罗斯福在雅尔塔已经同意过这个数字，而且声称偿付赔偿“当然”必须包括当前生产出来的物资。^①

与此同时，柏林也逐步呈现出类似的僵局。4 月 8 日，克莱将军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俄国代表在经济管理局中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进出口问题必须分占领区来处理，一直到整个德国的贸易有了盈余，赔偿费已经付清的时候为止。俄国人为了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援用波茨坦协定的条款，认为在实行共同政策时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②据此，他们认为整个俄占区的情况是不能运用波茨坦协定的基本原则的（或者更可能是不能运用他们感到不方便的那些原则）。克莱将军由此得出结论：苏联政府准备继续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直到他们的一百亿美元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工业水平计划是以进出口平衡计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计划，赔偿计划就无效了。”^③在这个月的其余日子里，美国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并建立一个类似 135 进出口代办处的机构。^④然而，法国人和俄国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法来阻挠这个问题的讨论。4 月 26 日，克莱将军在协调委员会再次批评以占领区为基础的进出口计划方案，并说他下理解如果不建立一个中央机构，怎样能够执行总的计划。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德拉特文将军否认在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联系。

这种顽固的反对迫使克莱将军采取果断的决定。5 月 3 日，他在协调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从美占区起运的一切赔偿物资，除二十四个预定的赔偿工厂外，将停止交运。^①他本来觉得不能轻易地放弃工业水平计划，就在五个星期之前，他为了完成这项计划，曾经准备作出那么多的其他牺牲。但是他无疑地感到在此期间经济情况变得如此恶化，使他别无抉择。他的行动曾经遭到批评；理由是：即使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在俄占区当时也没有多少粮食可以送往西德（虽然看来有一些粮食已运往俄国，而且如果俄国人不进行土地改革，运去的粮食可能还要多一些）。有人也指出，由于原料缺乏，西部保留下来的工厂不可能增加多少工业产品。这类批评都没有击中他的埋怨的要害、那就是，俄国人将其占领区的现有产品作为

赔偿运走，那些产品如果作为出口物资来销售（或用以替代进口物资），就可能减少英美纳税人为拯救德国免于饥馑所不得不支付的税款。抵国事实上正在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道主义，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而这种赔偿是未经四国当局认可，而向德国人强行勒索的。无庸否认，把西部那些本来要移交作为赔偿的工厂保留下来，并不能直接缓和西德的经济问题，因为困难在于缺乏原料，而不在于生产能力的不足。人们也弄不清楚，为什么除俄国外，运交其他西方国家的赔偿物资也在一开始就停止，除非这样做是针对法国人的，因为他们也在公开拿走现有产品作为赔偿（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又向法国运送赔偿物资）。但是这一措施确实是唯一能够向俄国人施加压力的一种办法，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对这方面是极端重视的。此外，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钱大量地倾注于他们的占领区，还要指望他们把占领区内贵重的设备交给一个正在从它的占领区内谋财获利的第三国，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然这项措施是失败的，因为它未能使俄国人改变政策，而仅仅是制造裂痕，从此以后，裂痕就越来越大。俄国人并不承认波茨坦协定排除用现有产品作为赔偿的做法，他们声称克莱将军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设想克莱将军准是受了保卫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的鼓动，他们指责他是美国卖业界的工具，而充当他助手的德雷珀将军则垒华尔街直接派来的。他们认为克莱的行动证明美国政府已经快定对俄国和共产主义采取敌对态度。为此，这种行动就证明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但是前几个月的经验使人感到，即使克莱将军再忍耐一点，再施展一下外交手腕，他也下会受到重视的。诚然，同俄国人谈判的根本困难之一就在于他们很难理喻，然而在对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时，他们又装得气愤不平。

实际情况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除了诉诸战争外，没有别的可靠办法能阻止俄国人在其控制的区域内为所欲为。历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俄国人施加这种有效的压力是否值得，盛者为了维持某种表面上的四国友好关系，限于提出口头抗议是否会更好一些，如果拒绝采用这第二种办法，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让争端早点脓化出头，不必花费八个月的时间去制定一项一出笼就成为一纸空文的计划，是否更为上策。

假如在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8 月这个期间，也象在下一年那样大力处理德国的重建问题，库存也许不至于用得精光。西方应在什么时刻理解到他们所如此重视的对俄合作，是不能通过合理条件获得的呢？任何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记住，在这种形势下，双方的论据一般他说是接近平衡的，而对每一方的权衡则取决于在什么气氛中看待这些论据，气氛是逐步改变的，因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看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不可取的，而那个令人反感的答案倒是正确的。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5 月的九个月间，气氛有了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在 137 美国，因为战争的热情冷却下来了，严峻的和平的实际含义显得清楚了。说英国和美国在德国一开始就自行其是，会干得更好些，这无异是说一个人会干得更好些，如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预见到他在老年时代所赞成的观点的话。^①

第四节 “双占区”

克莱将军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使西德的根本问题有待于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为了重新开动工业机器，怎样筹集资金向国外进口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关键在于煤炭工业。伽果煤产量不能提高，工业机器的所有其他部分只会维持最低速度的运转。但是要提高煤产量，首要问题是要给予矿工们更好的食物和更多的刺激。因此这又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了。此外，其他工业即使得到了更多的煤，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除非再供应其他原料。最后一点，必要的进口当然要用出口来偿付，这显然需要时间，而在着手进口更多物资之前，出口量多半会下降而不会上升。首先，资金问题和物资的采办一样，要在德国国外去进行安排。1946年7月11日，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后的第三百六十三天，贝尔纳纳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美占区愿意在经济事务方面和任何一国的占领区合并，如果那个占领国也愿意的话。这番话代表了克莱将军在5月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向本国政府建议的想法。^①当时的国务大臣诺埃尔-巴克于7月29日代表贝文宣布，英国接受此项建议。^②同时，6月20日，麦克纳尼将军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再次建议按彼茨但伪提议成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并且暗示如果不采取行动，工业水平计划必须重新考虑（占领区间的经济联合，将被视为通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个步骤，而决不是与此相抵138触）。柯尼希将军在8月10日另外提出了法国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中央机构应是盟国间的机构，主管人由各占领国委派，下属官员可由德国人担任。我们推测一下，如果这个反建议在上年10月提出，会发生什么情况，倒是很有趣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反建议于8月30日遭到否决，主要是由于俄国人反对。虽然在前些时候召开的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曾经不成熟地提过，他的政府将考虑某种“连结”各占领区的方式，但他从未拿出明确的提案。英国人和美国人无意等待，在9月5日宣布了他们两个占领区联合起来的协议文本。

协议规定建立若干德国委员会来制定两个占领区中有关经济、粮食与农业、交通、运输、财政和行政事务的政策。由于他们想打开一扇进一步和俄国人协商的门，所以着重强调这种联合不是政治上的联合，仅仅涉及经济领域。然而，这个理论却产生了难题。首先，为了避免人们产生有个西德首都的印象（同时也由于房屋问题），因而在地理上把各个委员会分散设立：经济委员会设在明登，粮食与农业委员会设在二百五十英里外的斯图加特，运输委员会设在比勒菲尔德，其他几个委员会设在法兰克福。这对协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其次，他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委员会置于某种形式的民主管理之下。虽然英国人最近为这几个部门建立了占领区一级的权力机构，^①但他们和美国人都还没有着手成立一种类似选举产生的占领区立法机关。因此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使各委员会对之负责的机构；的确，这就是美占区为什么没有建立区一级权力机构的一个原因。于是决定把各委员会隶属于由联合占领区八个州的总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此外，各个委员会还有其本身协指导委员会，由各州的有关部长组成，有权增选一个第九位委员作为无表决权的主席和最高行政官。中央委员会和部门委员会都设有与之平行的英美管制小组。

这样每个委员会都象一个由八个部长领导的部，依靠对八个部长中的一个部长负责的地方工作人员来执行它的决议（因为委员会本身没有执行权）。

每个部长认为他的首要义务是对本州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这就使得作出决议非常困难，而保证决议的执行也同样困难，毅然承当不受欢迎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与管制小组发生了冲突，因为管制小组认为必须优先作出为克服基本经济问题所必需的根本措施。一个特殊的例子是集中食品供应工业区问题。在 1946—1947 年冬天，德国南部各农业州对就此问题下达的命令都置之不理。所以在 1947 年 4 月巴伐利亚只向北方运送了三百三十吨肉，而不是三千三百八十七吨。②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多从英占区一些机构中抽调的，而英占区内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很强。但在美占区内，有三个州已经成立了基督民主联盟政府，所以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观点在管制委员会中很占优势。这就导致中央计划的鼓吹者和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1947 年夏天进行了一次果断的改组，①但新组织机构的工作并无多大起色，直到 1948 年，各委员会对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并授予某些政治权力的三占区经济委员会负责之后，这种体制才能顺利开展。事实上这一过程始终是下述情况的临时妥协，即要建立某种中央机构，又想从头慢慢建起，而且不愿意因在西德成立一个规模完整的政府而导致对俄关系的永久破裂。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人们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设计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机构。

双占区组织的协议原先不包括两个占领国所负财政职责的分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盛顿谈判产生了一个补充协定，该协定于 1946 年 12 月 2 日签字，并于 1947 年 1 月 1 日生效。②这时英国政府对英占区每年必须花费八千多万英镑，越来越感到忧虑。英国向德国人支付的这种赔偿——事实确是如此，而且现在还有增加的危险——是英国纳税人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的一个负担。此外，我们原定用于有限的必需进口计划的外汇，包括大量美元，在支付本国的进口之前却被用来优先偿付德国的进口。这是我国人民得不到更多食物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得不把我国很少的资源用来喂养德国人，而我们从德国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酬劳。①因此，贝文要求美国人承担联合费用的百分之六十，美国 146 人在答复中指出，由于美占区人口比英占区少，他们负担的份额应在半数以下。最后双方同意对半分摊。另一方面。根据估计，英占区已从出口方面比美占区获得较多的收入，虽然这种收入没有按照 1945 年协议所筹划的那样集中起来，而且一部分已经用于购买粮食了。美国已拿出一笔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的款顶，英国拿出一笔相当于这一数目的可兑换的英镑（再加上其他次要项目之后），共计有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的一笔资金交由设在明登的（美国—英国）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和华盛顿的联合收购委员会处理。②有两年光景，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完全负责重新打开德国的对外贸易，消除那些使德国与战时受其侵略的欧洲国家之间产生隔阂的心理上和物质上的障碍。

进口分为两类，第一类即甲类物资，是在德国防止疾病和动乱所需要的（主要是食物），第二类即乙类物资，包括使德国后立所需要的原料。甲类进口物资是要提供足够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粮定量，一俟世界粮食情况许可，就要提高到一千八百卡路里（这实际上是坚持 5 月份莫里森的诺言）。德国出口收入首先用来偿付乙类进口物资。在这笔帐上还没有盈余时，占领国不仅要弥补不足之数，而且要承担甲类物资供应的全部费用，虽然预计到一定的时候出口数量将增加到足以挑起这副担子。根据协议，在选择进口来源时，尽量用英镑来偿付不需支付美元的物资，从而减轻英国财政部的美元

负担（第二年，由于不能兑换，全部美元费用由美国负担）。允许有潜力的德国出口商直接与海外顾客联系，但在开始时，一切合同须经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批准。1947年核定的“出口指标”是三亿五千万美元，实际上只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1948年取得较大的成绩。主要是由于克莱将军的坚持，对德国货物的付款只接受美元，这样就把德国和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引起毗邻国家（如荷兰）的不少批评，因为它们不久就有了剩余农产品，本来是想用来换取德国货物的，但它们缺少美元，货物卖不出去，蔬菜无人去吃，尽管德国正处在饥馑的边缘。这项政策确实保证了德国的全部出口收入能够换成天下通行的货币，可以用来支付最必要的进口物资。假使有些收入是不可兑换的欧洲货币的话，那就只能用来购买有关欧洲国家碰巧可以提供而德国可能并不那么必需的东西。其结果之一是减轻美国和英国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可能出口的物资做不成交易，因为买方缺少美元。德国是要在贫乏的国内市场上多添一些货物呢，还是在人民的食谱上增加一些花样，怎样做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贝尔纳斯于9月6日，即在双占区协议中的第一项协议签订之后，在斯图加特为这些协议辩护。他在发言中总结了上一年四国讨论时提出的论题并作出了最高一级的认可。如果不按波茨坦协定的期望和要求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的话，盟国管制工作委员会所同意的工业水平应予变更。……

根据原来的打算，这个〔非军事化和赔偿〕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给德国人保留的工业水平要使他们在没有别国援助的情况下，能维持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①

在确定德国的工业水平时并未同意从现有生产品中扣除赔偿。②把现有生产品用作赔偿将与现在按波茨坦协定建立起来的工业水平完全不相容。……美国不会同意从德国索取多于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赔偿。③然而，波茨坦协定的执行一直遭受阻挠，原因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使德国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起作用。

贝尔纳斯继续声称，如果没有经济统一，就无法达到盟国委员会所规定的水准。美国的观点是，德国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应予建立，以便推行一项共同的财政政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运输、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组织。

必须给予德国出口物资的机会，以便进口足够的物资，使其经济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假如具有丰富142煤铁资源的德国变成一个贫民院的话，欧洲砌恢复，特别是德国毗邻国家的恢复，必将很慢。①

摩根索的基本论点是，德国对欧洲是不必要的。自魁北克会议以来，美国的思想一直是倾向于一种强硬的和平，从今以后就要改弦易辙了。这是实际经验和俄国人的顽固不化合二而一的结果。问题已很明显，首先，强硬的和平只能通过美国舆论所憎恶的措施来实现。其次，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俄国人的合作还是靠不住的。初看起来，斯图加特发言似乎并未大大超出波茨坦协定的范围。但它坚持波茨坦协定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于两个重要问题（德国生活水平和用现有生产品赔偿），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波茨坦协议措辞上的含糊之处，而这是俄国人所不愿接受的。发言也指明了美国不可能从欧洲撤退：只要占领区继续下去，美国军队就要参加。被征服的德国的经济需要，美国预算费用，共产主义胜利的景象，这些都证明比厌恶战争所引起的种种理论要有力得多。英国人长期以来，为了维护一个能生存下去

的德国的利益，首当其冲地反对俄国的要求，从今以后感到主导权已经不在他们手里了。

不是说英国对此持有异议。相反，贝文在 10 月 22 日说，英国政府“几乎完全同意贝尔纳斯的话”，他感到特别满意的是，“美国的政策并不要否认德国人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他也说明德国工业对欧洲的重要性和把波茨坦协定作为整体来贯彻的重要性，而且还说：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看到德国不致变成欧洲中心的一个永久贫苦的地区，德国人应能保持适当而合理的生活水平。如果允许这个贫苦地区的情况发展下去，只能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拉下来。

〔在福利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①

英占区和美占区联合之后，便采取必要的步骤去重建西德经济。联合的表面目的是把两个区的资源集中起来，以便彼此在需要上可以互相补充。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实际上是次要的，因为所需要的资源在那个阶段根本无从在德国国内搞到。美占区生产的粮食确实比英占区多，但数量仍然太少，连满足本身的需要都不够，更不用说有剩余粮食可补英占区之不足了。把两个占领区联合起来也不会生产更多的煤。联合协议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是建立一种机构，对粮食和原料进行必要的进口并提供资金。事实证明，虽然粮食和原料的缺乏在英占区表现得最为尖锐，但英国当局本身既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也不能为之付款购买。其中缘故简单明了。几乎所有的供应物资都不得不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进口，大多数来自美国，而英国本身的商品和美元都是极其缺乏的。西德没有美国援助则不能振兴，而美国也不准备向一个自己对之根本没有责任的地区提供援助。既然要使一个单独占领区生存下去的希望如此渺茫，似致向其投资将冒严重的风险，那么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双占区”倒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单位。1946 年夏末，由前总统胡佛率领的一个小组所进行的访问，出了不少力，向美国当局证明继续向德国运送粮食是多么必要。联合并没有结束英美纳税人的负担。有好几年，他们不得不源源输送金钱，而且很难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全部收回。①战胜国为战败国出钱，这也许在许多人和多尔顿同样感到愤慨的一种现象，也是和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现象。问题只能用这种想法来加以辩解，就是说支出额少一点，时间就拖长一点，仍然让德国成为“欧洲中心的一个永久贫苦的地区”。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联合已经搞得太晚了，未能使德国避免 1946—1947 年冬天的困难。但在那黑暗的时刻来临时，已采取了必要的复元措施（除了币制改革），虽然当时还难以置信，万事齐备，只需要时间和精力来付诸实施罢了。德国人当财习惯于讲这句话：“全面投降意味着全面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以心无愧地说，他们并没有逃避这个责任。

第五节 俄国和双占区的关系

1946年7月，贝尔纳斯在巴黎问莫洛托夫：俄国在德国真正想要什么？莫洛托夫告诉他说：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费和参加囚大国管制鲁尔区。^①如果说这是漫天要价，那144么斯图加特讲话^②对于俄国获得优先机会的权利必然会是一种威胁，因此俄国和俄占区的新闻界发动了一场剧烈的谩骂，以致克莱将军不得不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抗议。^③不管怎样，有很多迹象表明，大约在1946年初夏，俄国人对自己的赔偿政策作了一番估量，断定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拆运机器而不丢失重要零件，很难办到，而要把机器重新安装起来并用俄国劳动力有效地使之运转则更为困难。一个俄国少校问一个德国工程师：拆除某一个装置需要多少人力，花多长时间。德国工程师告诉他，需要二百个工人于四天，那个少校便回答说：“那我给你二千个工人，但必须在两天内完成。”^④这个故事描述了他们的一般做法。为了弥补熟练人员的缺乏，他们把许多德国犯人扣留在俄国而不遣返，^⑤还“说服”一些德国技术人员离开他们在俄占区的家乡和家属到俄国去工作（不顾波茨坦协定中并无只字提及把劳力用作赔偿）。但是这种“说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6年11月罗伯逊将军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使俄国人尴尬的问题，终于使俄国人放弃了这种做法，至少是暂时放弃。利用俄占区的前景越来越受到注意。

这种方针的改变可能与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日益增长有关，他们想利用东德为基地，向西传播共产主义。^⑥远在1945年12月，俄占区的一批工厂已转归俄国所有，而不是予以拆除，并将其产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运送到俄国去。^⑦据说1946年曾从俄国把棉花、羊毛、麻和皮革输进俄占区使工厂继续生产。^⑧在贝尔纳斯的斯图加特讲话之后两个星期，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从俄占区把谷物和家庭用煤运往西德换取钢铁。1947年初，又同双占区签订了一项包括价值一亿零五百万马克货物的类似协议。^⑨莫洛托夫7月份在巴黎表示愿意考虑每年生产一千万吨钢，并且承认德国的和平工业应该有机会在145更大规模上（超过工业水平计划的规定）发展只要这种工业发展确实是为了满足德国人民和平需要所必不可少的。^⑩1946年10月，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被允许的工业水平应该提高。索科洛夫斯基对管制委员会说，他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为二千一百万吨（这些话也许一部分是出于宣传，企图与西方盟国争夺德国人心，不过看来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动机）。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用现有生产产品作为赔偿的问题对俄国更为重要了。他们还对通过鲁尔区的国际化而分享其产品的前景越来越感兴趣。

这种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战争时期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曾为此进行游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建议把鲁尔区置于联合国家管辖之下。^⑪摩根索的计划和史汀生的强烈抗议都包含着这一点。^⑫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向丘吉尔提过类似的建议，丘吉尔说他“对这个主意也不反对”，^⑬在雅尔塔他又对此表示同情。^⑭法国一直强烈要求这样做。斯大林在波茨坦又提出这个问题，但那时美国人已另有打算，此事就被搁置作为对赔偿问题取得协议的一个部分。^⑮当时这种想法引起了贝文的注意，因为他不“主张把那种性质的另一个武器库奉送给德国那样一个好战的民族而不受任何控制”。^⑯他在1946年2月21日说道，他心里仍然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的直

觉是要把这个地区放在国际管制之下，为欧洲的共同利益来利用它的生产。

②可是实际困难似乎逐渐表现出来了。不管政府属于何种性质，鲁尔区的居民显然仍将是德国人。如果政府官员是在国际基础上配备的，那么他们和当地居民可能会不断产生摩擦，这些居民实际上将被剥夺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然而，假定政府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其余部分重新联合，而且他们是很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又怎么能阻止他们呢？这就只剩下了一种主张，即在一个作为德国一部分而由德国人治理的国家里，由一个国际权力机构来经营鲁尔工业，这是一种本身就孕育着许多困难的概念，尤其是这个权力机构是要按照管制委员会的原则办事的话。③1946年10月22日，贝文宣布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法国关于使莱茵兰和鲁尔区成为独立国家的建议，虽然他认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安排，即在停止占领德国其余部分之后，在这两个地区留下一支盟国部队。④不管怎样，对俄国人来说，问题一定变得越来越清楚，无论作出什么安排，他们参加伪机会是很少的。

毫无疑问，他们断定人家曾经有意欺骗他们。因此当1947年3月外长们在莫斯科开会考虑德国问题时；莫格托夫重复提出一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同时要求废除双占区联合协议。他提出作为回报的仅仅是答应重新考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大概他认为俄国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什么也不答应，因此他把价抬高会失去什么。美国人可能准备考虑允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拨给一定数量作为赔偿，以换取对方同意一个较高的工业水平，他们不打算拿它来换取波茨坦协定业已规定的经济统一。①不管怎样，俄国人正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取得现有生产品，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怎么关心工业水平计划中关于决定拆迁什么厂和留下什么厂。他们一定认为在西方重新运交赔偿物资中，他们可能得到的额外物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内自由行动所可能受到的限制。就西方盟国来说，它们认为自己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把西德树立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有在得到比俄国人准备提出的还要具体得多的合作保证作为报答时，才能众弃这个计划。因此，莫斯科会议以僵局告终，当第二年秋天在伦敦继续讨论时，各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那时，俄国人已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拒绝147在马歇尔计划中进行合作。管制委员会继续开会，到1948年3月为止。委员会有时能够在个别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具有消极的反纳粹性质的问题上。①管制委员会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是为莫斯科会议准备一份报告。但甚至那份报告也主要是一纸阐述分歧意见的声明。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协议毫无进展。在许多特殊计划方面，关于币制改革就无法制定一项共同计划。这里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纯粹是有关新币发行的控制问题。美国人在发行军政府马克纸币以后，②不准让纸币印版转入俄国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国人也不准让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工作。进一步的障碍不只是盟国间缺乏信任，而是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机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建立某种中央发行银行，几乎是币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国仍然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银行就很难发挥作用。俄国人把币制改革看成是社会重新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盟国则将其看作是恢复战前安定的一个途径。由于西部的情况好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就越加严重。因为从一方面看，如果要继续进步，币制改革越来越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独行动，显然会加深东西德之间的裂痕。拒绝向一个方向移动，反而要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节 “异乎寻常的严寒期”

在战争期间，纳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债和货币流通量^①，但由于严格执行物价和工资冻结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应的增产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货币保持了它的票面价值，却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占领当局从本国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物价飞涨乃是一桩坏事，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避免。因此他们忠实地维持纳粹的稳定物价政策，虽然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们却放弃了复杂的组织共同基金和补贴金的措施。这种措施在所有国 148 家，包括英国，一向是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需的。^②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因为俄国人印发了占领区马克。管制委员会在 1946 年 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税收来吸收一部分多余的货币，但这样做产生了新的赤字，而原来有的赤字却并未消除。在 1945—1946 年的条件下，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销售价格却受到和其他价格同样的冻结。结果是如果物价管制行之有效，企业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两种物价制度，一种是官价，一种是黑市价格，更经常发生的现象是相当数量的产品并未进入市场，却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处理了，或是留待能获取相当利润时抛出。“据一个具有特殊地位能够作出判断的德国人估计，重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品，现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虽送管制委员会的报表中。”^①

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②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 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动产”，或者用来喂牲口（从而逃避他们所痛恨的屠宰法规），或者囤积起来，直到钞票值了钱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绝。到 1947 年 3 月底，美占区内上交的小麦和裸麦，只有正常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麦只有百分之五十二。^①据报道，英占区在 1946 年 10 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应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酿酒的案件。在 149 汉堡，黑市几乎和合法营业一样重要。配给证和票证可通过行贿或偷窃手段从食品办事处搞到，并以高价出售。^②

这就成为进口方面的最大困难。尽管 1946 年 5 月华盛顿作了安排，^③整个夏天向德国运送粮食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世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要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固然是个问题，而美国海员的罢工又造成了运送的拖延。同意于 5 月份供应的粮食，应在 9 月份全部运到，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运来。^④在这种情况下，10 月 14 日把一般粮食消费者的定量标准恢复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了。毫不奇怪，从一开始，这一行动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兑现。在北莱茵威斯特

伐利亚州，10月底官方所能供应的面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万克，而且没有谷类食物。据说在杜塞尔多夫，甚至比这个标准还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尔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乌珀塔尔送出的一份报告则声称，那里巴有十天见不到面包了。^⑤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煤，产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鲁尔区劳动力短缺，矿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进矿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开了小差。^①虽然矿工本人有额外配给量，但他们的家属却得不到什么。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给家里人找吃的，这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②此外，他们需要用一笔钱去黑市购买比限价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面包和面粉之类的食物，他们的工资就显得太低了。^③1946年9月的产量停留在1945年12月的水平上，而五百万吨的库存已经用完。

恶性循环开始了，缺少煤，钢铁工业就不能生产足够的钢，以供应煤矿进行必要修理的需要。1946年秋，煤的产量大约是每月五百万吨，而西方占领区所定的基本最低需要量是四百二十万吨，出口是介乎一百十三万吨到一百七十四万吨之间。^④150 要说服其他西欧国家相信下面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即它们如果同意给德国留下更多的煤，便有获得德国工厂产品的好处。这是因为其他西欧国家也都缺煤，没有理由偏爱德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完全断绝对老主顾的供应也非上策。^⑤到1946年9月为止，煤的分配，包括出口，由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但就在这个月，俄国人宣布，他们只能把该占领区司令官认为在其需求之外剩余的煤提供出来，于是英国人最后也不为集中储备提供他们的供应量了。然而英占区出产的煤实际上仍继续和美国人、法国人协商分配。根据协议，10月份出口量削减十万吨，以后从12月到翌年3月每月减为五十五万吨。1947年4月，最后根据可调整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保证向西方国家占领区供应合理的最低数量，但出口数字将随生产上升而自动增加。

1946年10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矿工工资可增加百分之二十，11月份英占区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煤炭生产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的代表来执行一项决议，即运用一切可行的提高生产的办法，并采用各种能够想得到的鼓励方式。^①不足的供应，特别是住房、食物和消费品都保留给煤矿区，限价出售，保证矿工拿了工资能够买到东西。采矿事实上成了占领区内最有特权的一种职业了。这样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2月初，日产量达到二十万吨，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到1947年1月，日产量是二十万八千吨。^②

然而粮煤供应困难，意味着西德在进入1946—1947年冬季时，这两种物品既无库存，也无从分配。任何地方只要粮食一到，就得分发；粮食不到，配给量就无着落。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个大量使用水路运输的国家里，这是自我麻烦。铁路运输已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车头和车厢的载运量，公路运输由于缺乏轮胎和零件同样受到限制。一旦水路冰封，通过这些水路运送的货物将无法转到别的运输线上去。供应物资不能分配，定量无从维持，煤气和发电厂无煤可烧，火车和卡车因缺乏燃料而不能开动。德国没有物质条件来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精神上的准备也不充分。欧洲胜利日到来以后，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大的战斗”，曾经作过大量宣传。人们下定决心，准备受苦受难，结果，1945—1946年的冬天异常温和，并无太多的麻烦或埋怨就挨过去了。但是人们过于轻信，以为今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上第二个冬天在各方面都比前一个冬天要艰难得多。

在伦敦或德国的英国主管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所抱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是侥幸的。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政策完全正确。①情况也许是这样，他们本应当向美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加速粮食的运送，向其他盟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减少他们对德国煤的要求。他们本该更迅速地使煤的生产占绝对优势。②但是，这些事都不是直截了当地去做，而是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步骤。再者，他们一再否认对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应过于经常地以一种保证的形式出现，说什么对付这个问题，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正在做！将来也会做。关于配纺量的一些声明，不知不觉地说得太乐观了；有一个困难问题是经常信赖那些与最低层的情况不相符合的书面数字，而最低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那些负责人似乎断定，既然在那时候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来改善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努力增强信心。不幸的是其结果往往看来似乎是心安理得。

1946—1947 年的冬天，在英国也是严寒。但在德国，严寒的天气从 12 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翌年 3 月下旬。至于粮食匮乏问题，到 1947 年的收割季节才真正解决，据说 5 月下旬乌珀塔尔的配给量每天只有六百五十卡路里，别谈保证超过八百五十卡路里了。美占区的平均配给量当时是一千零四十卡路里。①与此同时，克莱将军宣布，从美国运送的粮食有十三万吨逾期未到，德国筹集的粮食比原来的估计短缺二十万吨。公众的情绪进一步低沉了。扒窃煤车的现象到处都有，造成公用事业的供应比以往还要困难。黑市买卖和出卖配给卡的情况几乎到处都是。德国的平民百姓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家里又没有任何燃料（已有必要取消原定的配给量），其景况是难以忍受的。幸亏这种匮乏情况并未延续很久，对人的体质还不至于造成长远的影响（也许除了那些家庭主妇和孤苦伶仃的人），不过痛苦还是不少的。占领国和民主制度的威望一蹶不振。鉴于英美公众为使德国人的处境不再恶化下去而作出了牺牲，这尤为不幸。除了币制改革（时机尚未成熟），其他的根本补救方法都已经着手实行了；真正可惜的是那些方法未能更快地显出成效。德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是健全的，仍然完好无损的那部分工业设备是足以为和平时期的目的服务的，尽管这年冬天的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之一遮盖了上面这一事实，从而造成一种认为德国虚弱的夸张印象。然而；日益明显的是，德国的复兴必须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尽管盟国作过重要的贡献，但在它们管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对德国人来说，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来掌握，这个观念没有其他的推动力能够取代。为安全着想而要德国人丧失这种观念，所付代价太高，这是英国人所不能做的，是美国人所不愿再做的。

第十章 财产的管制

财产分配的方式是决定任何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在盟国政策中比这点更占重要地位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主要归因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与鲁尔和莱茵兰地区的工业家们对德国事务的影响。要根除这两个祸害，当然得剥夺这两个集团能够施加影响的物质基础。可是，波茨坦议定书中提到这个问题的只有一段（关于经济原则的第十二段），要求分散德国经济，以消除“目前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如何来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呢？当然，问题在 153 于波茨坦协定大部分是以美国的草案为依据的，而在占领国中，美国人对这方面又最不感兴趣（法国人可能是例外），他们赞成解散卡特尔，鼓励竞争。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明确主张，他们不打算和西方盟国合作，而英国人在社会党政府执政下，也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拿不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整个占领时期的历史就是俄国人实现他们主张的过程，不管是好是歹，他们对易北河以东德国社会的性质实行了一项永久性的改革。另一方面，英国人起初满足于一些原则性的措施而不实现任何永久性的财产转移。因此，当政策上遇到的实际困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德国人的支持减少而美国人的影响增加的时候，已采取的步骤就可以在不剥夺新业主的情况下改变过来。在西部已经采取的这种行动几乎完全是由于美国的鼓励。

第一节 土地

在俄占区内，土地改革的一般特征已经叙述过了。①其结果是大部分土地都分成十二英亩到五十英亩的单位，归农民所有。②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思想上一般都不那么革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可用土地看来已经作为公共财产拨给了社团、党派或研究机关。可是，必须记住，这类土地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这样归属的；社团公有在德国决不是无人知道的。但是，新业主并不能随便耕种分得的土地；有一套细致复杂的组织建立起来去计划生产，每一个业主须按照定额完成任务并交纳农产品。工具由农业合作社大量拨给，按需要分配；这对顽抗倔强的人显然是一种惩罚方法。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对土地公有化进一步采取什么重要措施。

这些改革对产量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因为其他不利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肥料的匮乏，机器和劳力的短缺，以及土地肥力由于战时过分生产而耗竭。但是，这些出素在整个德国是相当一致的，而东部和西部产量的下降却有显著的差别。①小土地所有制总是没有大土地所有制效率高（或许除开某些特种产品），这是农业经济中司空见惯的事；而按照现有规模进行土地再分配，在开头一两年必然会妨碍生产。这就是对此种措施的批评所集中的要点之一。在德国是如此，在西欧也是如此。固然，故意地减少粮食生产总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但是俄国人的信条是，首先要做的事就应先做，他们总是先考虑社会利益，把物质福利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下两年俄占区的口粮还是比西部高，那么俄占区原来可以送到西部的剩余粮食就不存在了。②

在西部占领区内，土地改革远不是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比较起来，那里大地产是极少的。然而三个占领国都声称支持这个原则，虽然答应对被没收土地的所有主予以补偿。在英占区内，大农场都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不能分开来经营，否则会立即减产。讨论一直进行到1947年9月，才公布了一道法令草案，规定三百七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都要交出来（在东德是二百五十英亩）。①这项措施由德国人来执行，进度很慢。②同样，在美占区，只是因为美国大施压力，各级州政府才通过了取得居留地和土地改革的法令。对占有土地二百五十英亩以上者要按照比例相应增减制征税，结果一块七百五十英亩的地产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土地登记是执行计划最主要的前提。在巴伐利亚州，一直到1947年，逃避登记是普遍的现象。虽然巴伐利亚州的宪法规定，“为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可以征用农业和森林土地，美国人提出的要求却未收到任何效果。在符腾堡—巴登州，情况也是如此。大黑森州的宪法授权征用历史上曾经是政治弊病和军事力量中心的大地产，但是这项条款很少被利用。在法国占领区，大致也是这样。当莱茵—法尔茨州的宪法于1948年155制订时，有一条规定是实行土地改革，但征用大地产时，须有农会的专家核准为先决条件。巴登的宪法实际上漠视了这点。没有人能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各占领国都违反了德国人的意愿。③要不是盟国施加压力，德国当局是什么都不会做的。而且几乎看不出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徒然地迫切要求他们的同胞把土地转让给他们。德国方面的主要刺激来自难民和社会主义者。

第二节 工业财产

西德大工业垄断者的财产，是按照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第五十二号法令的规定充公的。1945 年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 I·G·法本，即德国化学染料联合企业的全部财产，它在西德拥有一百六十九个工厂。^①11 月 16 日，克虏伯公司，连同其所有附属机构，也被同样处理。12 月 22 日宣布在英占区内所有的煤矿主无偿地把产业交给“德国人民的托管人”英占区当局。“这些工业将永不归还原主。”对钢铁工业，行动较缓，但以后做起来也是一样；1946 年 8 月 20 日发出了一道布告，把所有权移交给托管人军事总督。这个行动的目的，说是要减少生产能力，以适应和平的需要，打破经济力量的集中，准备重新组织工业体系。贝文在 1946 年 10 月 22 日的演说中，^②追溯以前的情况时说道：〔鲁尔工业〕以前掌握在与德国军事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巨头们手中，他们对希特勒的资助，在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侵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先生及其一类的人恢复以前的地位而加以滥用，以致酿成悲惨结局。我们的意向是，将来这些工业企业应为公众所有，归公众管理。……对这些重工业实行国有化的要求，在德国没有比今天更为强烈了。^③156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步骤当然是空谈。在 1945—1947 年这个时期的德国，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管制，当然，关键工业的管制以及这些工业赖以维持生产的原料的管制都掌握在盟国手中。美占区内 I·G·法本的资产，在 1945 年 7 月就已被美国人没收了。^④英国人没有等到 1945 年 12 月 22 日的通告发表，就在埃森设立北德煤炭管制局，自从上一年 4 月间该区被占领以来，这个机构就一直在发展着。当时，只要一个工业企业能够投入生产就是成就，根本谈不到分配利润的问题。以前的许多产权所有人或被指控为战犯而关在监狱里等候审讯。这可能在盟国方面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改革比实际进行的多。假使当时有可能设立德国煤炭和钢铁委员会并授以实权，那么各种机构将会成立，后来就较难把那些工业再归还原主了。但是，当时认为这样的委员会需要对某种由代表选出的机构负责，鉴于这些工业对西德十分重要，因此认为这种机构不能只代表一个州。可是，在这个阶段，德国没有高于州一级的这种机构——确实，在英占区，州立法机关的选举一直到 1947 年 4 月才举行。^⑤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不清楚的，就是如果让德国人自己来决定，他们是否一定会赞成国有化。即使工会，对卡特尔和托拉斯也不是那么故意加以反对的，而大工业家的统治，大部分一向是温情主义的，并不是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国有化，也不一定能在整个西德赢得多数。在一个占领区单独实行工业国有化，也不切合实际，肯定和波茨坦宣言保证实行共同经济政策的精神不相符合（美国人曾经利用这个论点，否决了大黑森州宪法中关于工业收归国有的一项条款）。甚至在钢铁工业被宣布为公有财产之前，英国人接受了合并的原则，给了美国人在决策方面的直接发言权。现在美国人相信的是非卡特尔化，而不是国有化。

这样，在占领的最根本问题上，西德出现了政策上的冲突。导致德国工业支持民族主义扩张的过失，是由于工业规模过大和权力集中呢，还是由于工业的私有制？一方面，可以认为，造成沙文主义的各种力量，象对“鲁尔 157 工业巨头们”产生影响一样，会对管理国有化工业的部长们产生影响，所以所有权的转移不会改变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规模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形成权力大大集中的倾向是由于基本经济力量的压力，因

此，如果象卡奴特王那样硬要对之加以阻挠，肯定会遭到失败。如果对卡特尔化有坚决的要求而没有强大的抑制力，仅用立法手段去加以阻止，也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两种哲学部提出这样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即一旦认为把职权交还给德国人是经济恢复的先决条件，则任何一种违反他们的意愿而强加于他们的办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就很成问题。如果单纯改变经济组织，而没有随之改变可以影响管理经济组织的德国人的心理，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

至于鲁尔区力量的集中，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煤业和冶金业垄断组织巨头斯廷内斯的继承者联合钢铁公司，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占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煤矿。①克虏伯公司占有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十一，煤矿百分之八，而赫施集团则占有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点五，煤矿百分之四。在 1938 年，六个集团共生产鲁尔区全部钢铁的百分之九十五；②鲁尔区的矿有百分之五十五与钢铁业有直接联系。③这样，煤价在牺牲矿工一些工资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由此产生的损失却从廉价生产的钢铁所获的利润中得到补偿。

英国当局并不严格反对分散力量的一切主张，确实，作为波茨坦协定的一个真心诚意的签字国，他们也不能这样做。可是，美国原来的建议，却把工业力量过分集中的定义规定为：雇用的工人超过三千，在任何领域里掌握的生产能力超过百分之二十，或者每年营业额超过二千五百万德国马克。英国人则一开头把工业力量过分集中的定义规定为：雇用工人超过十万名。此外，美国人要把非卡特尔化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除非军事总督特准予以豁免。而英国人则要求军事总督在采取相反的行动之前，对任何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一定要确证为事实上的过分集中。①英国赞成组织规模大，便于严密控制，而 158 美国却赞成组织规模小，给予实际的行动自由。②

美国的建议提交管制委员会，没有结果。俄国人认为这些建议不恰当，还利用英国人的犹豫不决来证明英国人支持大企业。后来决定占领区合并，英美观点才比较趋于一致，并于 1947 年 2 月公布了实质上相同的法令。克莱将军同意以一万工人为限额，一面却已经允许了某些豁免，结果引起他那些比较激进的顾问们的愤慨。可是，英国的法令对超过限额的企业，并不是强制执行的，而美国法令却是这样做的。③对钢铁和煤炭企业则另予特别待遇。

1947 年初，伦敦的管制局重申政府关于基础工业国有化的意图。同年 3 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贝文试图与马歇尔将军就这项政策取得一致意见。①然而这位国务卿因为没有和克莱商议，表示不能同意。这时，克莱已经回到德国，他对这种企图十分不满，认为是要背着他对他所强烈反对的事作出决定。因此，这件事就送请克莱将军和罗伯逊将军来作决定。他们二人同意不采取任何不利措施来损害德国人将来希望建立的经济形式，让他们在再度掌握自己命运时从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之间自己作出选择。虽然这种解决问题的开明打算是无可非议的（英国保守党有时也曾赞成这个方案），但结果是，从此对国有化再也不采取什么措施了。②只有美国能单独对德国提供必需的外援，从而能控制德国的经济政策。1947 年秋，在英国无法维持英镑兑换时，美国人承担了提供双 159 占区进口计划所需的全部美元开支。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推迟实现国有化的方案，希望一朝举行选举，可能会产生一个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政权来保证实现国有化（事实证明，这是徒然的）。在战事方酣之日，有些人会愤怒地反对把对世界和平具有这样严重

后果的事让德国人自作主张。事实是，任何由英国管制人员片面强加于德国人的比较激进的政策将是违背美国人的意旨的。而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政策是明智的。^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用民主方法来支持这项政策，肯定是个尚可议论的问题。但是，非卡特化是否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或永久的取代办法，也是个问题，因为要旷日持久；不会有什么成就；在这里就不须加以叙述了。

在俄占区，虽然国有化开始得慢，那里的情况就不一样，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是使工厂开始生产。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战争结束阶段接管了为厂主或经理人所遗弃的工厂，后来这类厂仍由他们进行管理。只是在非纳粹化委员会宣布没收纳粹分子及其同谋者的财产之后，才通知州政府去接管任何规模的工厂。到1946年夏，接管了大约七千个工厂，其中两千个厂和合作社联合管理，还有两千多个厂和“有民主倾向的人士”共同管理。^①在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等地区进展最快，也最彻底，在图林根和勃兰登堡进展最慢。就象在农业方面一样，整个进程做得象是德国人自愿的行动；1946年6月在萨克森举行的一次公民表决，据说有百分之八十的票是赞成国有化的。但是，直到1946年底，纯粹德国的企业只有百分之四十收归国有，尽管这些企业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②

然而，仍在私人手中的工厂是不准自行其是的。在初期就引进了俄国计划生产的方法，对每一个企业规定了定额。尽管俄国人毫不迟疑地采取制裁手段，或许使漏报产量的情况不如西部那样严重。使生产计划与消费互相联系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根本情况是供不应求；只不过是根据现有的总产量，计算一下可能增产多少，从而确定原料160供应、分配、零售和出口的定额罢了。还有是通过银行去进一步加以控制，银行是受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管辖的公共机构。^①

然而在工业领域里，有一个特殊的飞地，1945年12月间，苏联军政府公布了属于德国政府、纳粹党及其他非法团体的二百个企业的两份名单，这些企业不予拆除而转为俄国所有，“以提供就业机会，并以部分产量维持德国经济”。这些工厂由柏林的一个中央机关控制，和这些厂有联系的，有负责运输和银行业务的专业附属单位。1947年设置了中级管理机构来管理每种工业的所属工厂。这些企业里的所有高级职位都由俄国人担任、德国的地区行政机构对之无权过问。而各厂所需原料，尽可能从德国资源中供应，如果主要原料确有短缺，则可以从国外进口，甚至还可以从俄国进口。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产品在德国销售，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德国人的慈悲，而是因为这些工厂是生产重要产品的，没有这些产品俄占区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个巧妙的策划，几乎使俄国人同时一举两得，且不提1947年春有些厂归还给德国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效能了。^②

可以看出，同西方盟国相比，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需要具有明确的意图，而且敏于采取应急措施。但是，仅从本卷所包括的很短时期内的有限资料来进行这种比较，是危险的，因为从这样一个有局限性的角度来看，俄国人好象在分散工业家们的力量、重新开始生产和取得战争赔款等方面，做得比较好。到后来事情才变得一清二楚，原来他们是以脱离劳动群众和放慢生产为代价而做这些事的，最后要使占领区工作维持下去，不得不实行残暴的专政。可是，在所有权和组织形式方面所进行的过激的变革，要使之全部恢复原状，是永远办不到的了。

第三节 财产的管制

最后，还须提一下关于西部占领区内对属于国家、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出名的纳粹党人或其同情者以及被逮捕或开除公职的人的财产所采取的政策。这种财产多数被充公，由管制工作委员会保管。在英方和美方的法律 161 管理处里设立了财产管理分处来处理这类事项。既然很清楚，不能让所有的财产（大部分是工厂和设备）搁置起来，只有准许盟国人员或和纳粹没有瓜葛的德国人去使用和经营，一般要付租金，所收的租金存入冻结款项帐下，财产所有权不准转移。开头的用意是，到将来某个阶段，四国对所有这类财产的处理将作出决定，在这以前，财产必须予以冻结。以后看来四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便另外产生一种假定，就是说占领当局把权力归还德国人时会对财产作出安排，这将成为执行财产转移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也就会决定由谁来接收冻结的资金。由于财产管理分处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律师，因而采取此种不表示确定意见的态度是合适的，但是在盟国政府对财产如何处理问题没有集体地或单独地作出任何其他决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本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选择适当的新厂主是个问题。往往还有一个危险，即在盟国权力管辖下进行的财产转移，在占领期满后，可能被德国政府取消。此外，占领当局还须对各个人秉公处理，这样就可防止他们永远剥夺他人的财产，即使是有所补偿。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财产对社会非常重要。倘若能够选出适当的德国人来暂时使用这种财产（而且也不得不这样做），这就很难说为什么有时不能让个人永未取得产权。为了对付将来的德国政府有可能取消以前的决定，应在占领期间进行许多改革；让别的德国人成了实际上的所有主，至少将使取消过去的决定较为困难。任何性质的再分配拖延的时间越久，以前的所有主收回财产的机会就越大。而以前的所有主被剥夺使用权，是因为他们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给予积极的支持。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占领当局宣布要予以根除的。这个问题是个人非纳粹化问题的主要部分，但到处都一样，①英美人虽然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不让一些人占据要职，却对于保证适当人选担当重任并尽可能使他们固守岗位则很少注意。按当 162 时的情况来看，好些拥护盟国的德国人取得的财产所有权是靠不住的，而他们却需要这些财产来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因为，当最后和德国当局进行财产交割时，讨价还价的事情太多，几乎没有时间使所有这类情况都得到充分的保证。盟国不愿干涉私有财产，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干涉，占领的根本目的能否达到，就成问题了。在取得这种财产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毕竟还是进行过粗暴干涉的。而盟国进行干涉的恰当时机，就象占领工作的许多方面一样，应该是在占领开始的时候，那时人们指望采取彻底的措施，而且盟国当局有充分时间掌握新的所有权，直到它能熟悉情况为止。

第十一章 解除武装、归还和赔偿

在占领的头二年，很多盟国军官在德国忙于寻找和销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和防御工事，解散德国武装部队所属各部门，以及系统地销毁一切军事档案，包括人员名单。^①然而，这项工作很少涉及政策问题，就不详细记载了。无论如何，在西部占领区内，这项工作是做得认真彻底的，虽然俄国人在这点上表示怀疑，甚至不断有怀疑的感觉。英国人把尚未释放和复员的德国武装部队人员置于他们的军官管辖之下，这种办法为俄国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向西方军队投降的有七百万士兵，解散肯定需要时间，因此不能让他们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保留原有的编制，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来和他们打交道，从行政管理的意义上讲是妥善的，但使俄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这点来加以宣传，说什么保留这些编制是想利用德国人作雇佣军来打俄国人。1945年11月初，这件事在管制委员会内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结果英国提出了一项计划，把剩下来的一些部队单位予以解散，并在解散前，先把它们分散开来。当然，德国人继续在各占领区当占领军的仆役、司机和其他从属人员，而英国人认为管理这些人员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编成服务组，置于工长监督之下，不准佩带军章。这个办法是无可非议的，甚或有利于安全，可是俄国人始终抱着怀疑态度。

另一个引起摩擦的原因是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问题。在1945年秋，穿这种制服是管制委员会所禁止的，可是当时缺少衣服，许多退役军人（特别在他们无家可归的时候）没有别的服装可穿。在西部占领区内，只令取下一切军衔标记，不反对穿德国军服。俄国人的做法却不同，下令不准穿军服，明确指出必须执行命令，这对退役军人未免苛刻，逼得他们想出种种应付办法。俄国人对西方盟国不这样做很不理解，把他们的人道主义动机误解为对军国主义暗中表示同情。当1946年4月间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俄国人再度谴责英国人未能对德军解除武装。这个申诉提交给了管制委员会。管制委员会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巡视所有四个占领区并汇报解除武装的进展情况。但是美国人坚持这个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应包括拆除军事工业，俄国人却不同意。结果管制委员会未能打开僵局，只有交给各国政府来处理。最后这个专门委员会始终未能出发到各占领区去进行调查。

实际上，在指定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英占区内的退役士兵只有七千名尚待遣散，他们都不是德国人，不愿回乡。还有十万六千人在服务组工作，三千四百人被监禁着。到1946年7月，找到的武器和弹药约有四分之三已被销毁，包括所有的飞机，剩下的军需品大部分需要倒入海内，直到1947年初才最后处理掉。大约有同样数量的主要军用建筑物被毁掉，还有一百二十个飞机场移作生产粮食之用。对次要的建筑物，由于有一些盟军需要使用，拆毁工作进展较慢，而对剩下的一部分，是否可以充当和平用途，必须逐个加以考虑，但管制委员会的计划规定到1951年6月完成清理工作。^①在美占区，工作大致是平行地进展的。而大量事实证明俄国人把他们认为有用的物资保留下来，并在其占领区内生产大量军需品。^②

在这整个时期内，一揽战犯仍被监禁在德国以外，其中大多数是在大战结束阶段前被俘的。鉴于当时德国缺乏粮食和住房，却有充分的人力，而别国却需要劳动力，因此这些人的尽早复员并不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例如，在英国，如果没有战俘劳力的话，农产量肯定会下降，这样可以用来援助德

国的粮食就会减少。③此外，感到担心的是，把没有亲身经历过德国崩溃的笃信纳粹主义的人仓卒遣返，就会加强德国国内敌视民主的力量。如果认为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只有把亲纳粹的分子留在国外十多年，才能适当地解除忧虑。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决定按照各人的政治历史情况来甄别战犯，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可靠分子”（也就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在遣返前给以某种训练。这种训练和德国国内教育部门所进行的工作是同时并进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十二年纳粹统治所造成的一般知识的缺乏，俄国人则给他们的许多俘虏以不同的训练，灌输另外一种不同的思想。

1946年8月间，英国人在议会的压力下，提出了一个从英国遣返战俘的计划。对“可靠分子”、因特殊情况应予照顾的人以及具有技能为德国所迫切需要的人，予以优先考虑。第一个月遣返三千人，以后的平均遣返人数增加到每月一万五千人。①那年9月，估计在英国适合遣返的战俘有三十九万四千人，在英联邦其他地区还有五十万人；在中东的战俘，由于缺乏运输工具，遣返特别成问题。②在俄国的战俘，估计为八十九万（1947年3月莫斯科会议上官方发表的数字）到三百五十万人；③如果后一个数字过高，那么前一个数字肯定太低了。大约有十万名病残战俘已于1946年夏季遣返，还有十二万个“可靠分子”于8月底在东德普选前被释放了。法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名战俘，其中有许多是在前几个月里法国被说服释放其他国籍的战俘时，与美国交换来的。④这些德国战俘直到1948年4月才全部释放，其中有七万五千人自愿留下。最后一批德国战俘是在1947年6月离开美国的。据说，南斯拉夫、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那时共有十六万名战俘。

①

管制委员会的另一个行动是寻找德国在1940年和1945年间从被占领的欧洲攫取的私人财产，并将其归还原主。这类财产的清单读起来好象一家成批回收废品店的存货单，处理的产权有：一千一百三十个教堂里的钟，二千条驳船，一千一百只小船，七百个火车头，一千六百七十匹马，二千八百辆铁路货车，一万四千五百件衣服，二千六百台无线电收音机，大量的机械，霍勒里斯机器，家具，可移动的油泵，马戏场设备，从万森博物馆攫取去的一整批殖民地树木的科学珍藏，荷兰女王的皇家火车，实验室，镭，无轨电车，马达救火机，地毯，钢琴，飞机推进器，高加索的卡拉卡尔羊，雪茄烟和三十六节货车装载的艺术品。②若讲掠夺，德国人树立了一种典范，真是无奇不有。

非军事化的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拆除兵工厂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以及超过和平时生产需要的多余工厂。盟国的领袖们在波茨坦同意于两年内完成整个工作时，③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后来变得多么复杂。在实际拆除工作开始前，必须采取五个步骤：

（1）对个别工业准许什么生产水平，要确定下来。（2）经济管理局必须决定在这个工业中为达到所准许的生产水平，哪些厂是需要的，哪些厂是多余的。

（3）对每个多余的厂必须按照协议的原则进行估值。

（4）对可以利用的工厂，必须列具名单交各个有权获得赔偿的国家传阅，以便它们能投标认购它们所需要的厂。

（5）工厂必须在各申请国之间进行分配。对于一些准备全部关闭的工厂，头两个步骤当然可以不采用，七十四四个厂就这样选定下来，于1945年秋

预先交出名单，尽管英国人表示反对。①另一方面，后两个步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因为管制委员会首先要在东 166 西方之间进行分配，接着指定分给西方的工厂必须由驻比利时的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来进行分配，这个机构是按 1945 年 12 月巴黎赔偿协定为f此目的而设立的。②在那次会议上，还共同拟定了一份表格，指明总数中哪一部分应归哪个国家。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直到 1946 年 6 月才进行分配，那时有个别的厂当然早已被拆迁了。例如法国人早已把曼海姆电厂拆迁，以供卡昂地方的需要。③

克莱作出关于暂停移交各厂的决定，④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因为，除了预先交出的那份清单上所列各厂外，工作都在其他各个初步阶段进行着。此外，在 6 月 28 日，经决定，对美占区内专门从事军用物资生产的一百十七个厂免予摧毁或拆除。英国人作了同样的决定。⑤这就使协调委员会能够在 1946 年 10 月签署一项共同议定的关于摧毁一切战争潜力的计划。每一个占领国要公布其占领区年兵工厂的名单，然后制订出摧毁这些兵工厂的计划。其他属于准备减产而不予淘汰的工业，其工厂的命运如何，须待工业水平计划是否修订再作决定。结果，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于 1946 年年底所接受分配的工厂只有三十一个，价值为六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这一机构的任务看来变得只管分发机器了。⑥修订过的英美双占区工业水平计划是在 1947 年 8 月遭到法国的抗议之后公布的。这个计划把要拆除的工厂从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减少到六百八十二个，其中三百零二个肯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剩下的三百八十个厂，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选定的，即在任何一个工业方面，要拆迁的厂，其生产能力仅相当于希特勒当权时期为准备战争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工厂的生产能力。⑦在 1949 年，甚至这种要拆除的工厂数字又按比例减少了。

不能认为盟国拆除兵工厂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后来的估价可归纳如下：西部占领区赔偿的最高数字估计占工业总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用作赔偿的工厂主要是那些以和平时生产结构来衡量存在着生产过剩现象的工业，如钢铁、化学和工程等。事实上，西部占领区的赔偿只达到计划数字的四分之一，而且分几年偿清。奇怪的是在 1949 年达到最高点。直到 1946 年底，才拆除了一百个厂，按照战前价格估计，值二亿一千丑百万德国马克。到 1949 年底，累计达到七亿一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原来的估计数字 167 是三十亿德国马克。赔款额总数等于 1949 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虽然东部占领区的战争破坏和战争赔偿都比西部严重和庞大，即使在东部这两种数字总计也没有超过 1936 年以来工业资金增加的数目。

战后的德国具有比战前同一地区里更大的生产能力，赔偿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人口增加了，但必须看到，战前很大一部分工业是从事军备生产的。农业和运输方面损失最小，因为有从别国掠夺来的牲畜和车辆作补充。⑧

但在 1946 年，甚至在 1947 年，不可能预见到事态发展的结果，以致盟国拆除兵工厂的政策引起了几乎德国各界人民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准备接受摧毁军火工厂以及诸如修理潜艇的掩体装备等，但是原计划包括双占区内不属于这一范围的一千三百三十四个工厂，甚至在 1947 年的修正计划中还包括三百八十个工厂。面对着一连串的反、抗、议、罢、工和恫吓，有些行动，诸如汉堡的勃卢姆和沃斯造船厂或埃森一博贝克的克虏伯钢厂的拆毁等，还是

不得不进行到底：这些厂雇佣的工人（往往是流亡难民）冒着个人生命危险进行反抗。果然不出所料，德国当局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拆毁这些厂，而盟国却须对各方面的要求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越发延长了本已拖延很久的进程。这种拖延是整个事情最令人不满的方面，而所以拖得那么久，是由于盟国想对这样严峻的问题尽量做得细致周到以及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

因为，如果全部拆毁工作能够按照原定办法于 1947 年 8 月前完成的话，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德国人在对战败所受的打击记忆犹新的时候，可能不会竭力反对拆毁工厂的政策，而且，在几乎不可能获得新厂的时候，移交的机器对接收者来说价值要大得多。实际上，许多机器运到时已开始变得陈旧，①而对德国人来说，用新厂来填 168 补这个如此方便地腾出来的场地，是件荣幸的事。德国政府甚至以补偿盟国充公的财产为借口，能对重新装备的费用予以补贴。但是，如果要尽快地完成拆毁工作，那么或者要把计划范围缩小，或者要采取一种简便得多的手续。

事实上，这一进程拖延拉长，伤害了占领国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获得的持久利益非常少。一旦德国人恢复了信心和精力，他们就寸步必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拆毁了的工厂的工人，美国人本来不打算给他们提供另外的就业机会。在英美双占区有五十万失业者，更多的人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受到这种影响的工厂，其人员对于寻找其他工作的前景，对于盟国的政策加在他们及其同伙身上的压力不得不感到恐慌。即使向他们解释受影响的工厂在工业中所占百分比很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他们即使不是依靠这很小一部分工业过活，他们也知道有别人靠此过活，而且有理由设想，如果这个百分比扩大，自己所在的企业也可能成为牺牲品。这样一来，要煽动民族主义之火是不乏可加的油料的，而实际上西德的全部人口，不论工人和雇主，不论保守派和社会主义派，不论男女，都加入了反对盟国政策的行列。广义地讲，事态已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使说拿走的物资只是用以赔偿纳粹政策对别国所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说服力，就算不谈发动战争是犯罪的行为。若说这些厂对平时期的需要是多余的，德国人立即会回答，新德国因人口增加了五百万，国内生产的食物缺乏，所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工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在所有的占领区内，关于推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和范围，向德国人所做的解释工作太少了。但是，即使情况有利于进行这项解释工作，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想大力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话题，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不是消释疑虑。

要给德国提供一种合理的生活标准，要使民主制度 169 有生存的机会，要想得到德国人的合作（这是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拆除工厂的政策不得不放松执行。如果迟迟不放松，达到其他那些目的也就要推迟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没收个别德国人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财产，以及诸如专利权、商标等。德国人埋怨这是违反国际惯例。对于这种埋怨可以立即援引纳粹党自己过去违反这类惯例的事实来加以反驳。今天个别人，作为参与国家所有行动的一分子，也不能指望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从他未能阻止这些行动的意义来讲）。实际的困难是难以使遭到损失的人甘心蒙受损失，而为了不使关系永远坏下去，这种协调也是必须做到的。经验只显出在计划阶段有些英美人原已预见到的进退两难局面罢了。惩罚性的解决办法怎样才能使迟早总要找到的积极解决办法不至于受到挫折呢？

设备的拆卸和转移，同二十五年前用外汇支付赔款的办法相比，结果证明在技术上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指望德国对遭其破坏的一些国家重新提供设备，并暂时用其现有生产产品来供应这些国家的需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结果可能是合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的。^①但是这会引起别国生产者的强烈反对，要不然，他们可以承担填补这个空隙的工作。此外，用现有的生产产品来支付赔款，意味着减少出口方面的岁入，会引起英美当局的强烈反对。同过去一样，看来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从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取得赔偿，那就是把他们当作农奴看待，让他们为胜利者当奴隶。可是，这样做的人是不会讨人喜欢、受到效法或支持的。而如果奴隶关系在原则上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末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第十二章 非纳粹化

非纳粹化也许确实是占领工作方面最有争论的部分，但是由于记不清这个政策为什么提出来，其目的又何在，所以很大一部分指责是极不中肯的。脱离当时的背景来研究问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此事也不例外。追溯一下非纳粹化的由来，可能不会使争论结束，可是至少会把争论集中在一点，即在当时的情况下，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一个多少要用自由主义政府装饰门面的现代工业国家的人民，如果不是被一种从事于十字军东征似的神圣事业的信念所激发，他们是不可能被引诱去经受战争的艰辛劳顿和单调无趣的。如果对他们说，战斗是为了生存，这句话无论多么真实，似乎还嫌不够；必须使他们感觉到，为生存而斗争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事。张伯伦在 1939 年 9 月 3 日说过：“我们将要与之斗争的是那些邪恶的东西”，随着战局的进展，人们愈来愈倾向于认为邪恶就是纳粹主义。罗斯福说过：“无条件投降意味着纳粹主义和纳粹党的完蛋，纳粹主义一切野蛮的法律和制度也随着完蛋。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切军国主义影响的消失。”①丘吉尔也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一道战斗下去，直到……把纳粹主义连根拔除，使纳粹党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为非作歹。”②他们所允诺的是不但要根除纳粹主义，而且要树立正义。“德国所有那些对人类痛苦直接负有责任的人，应予以严厉的惩罚。”③“正义一定要伸张，凶恶残暴之辈必须给以应得的惩罚。”④俄国人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虽然他们的主导思想表现得比较露骨。在战争结束对，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一透露出来，终于证实了以前已经传开的确有根据的关于集中营里种种暴行的消息。人们一致认为，对犯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的人，如果继续让他们掌权，则侵略的丑恶惨剧还会重演。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去拔除德国公共生活中的种种弊害的毒根。也有好些人，不一定是嗜血成性或野蛮残暴，他们感觉到有充分事实证明，纳粹分子的行为不论用什么样的文明标准去衡量，也是邪恶的，决不能不予制裁。纳粹党魁们对文明社会的原则漠然不顾，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因此，战争一结束，普遍一致的意见是“纳粹主义必须根除”。“根除”这个词用得非常有意义；一个政治信条往往很容易被当作恶性肿瘤看待，以为能用物质手段去加以处理。能在惩罚罪犯和肃清其支持者的影响之间划清界限者，为数不多。而肯花点工夫去确切解释一下“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考虑一下一个过于概括的定义具有什么含意，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①如果其含意是认为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德国已经深深地扎了根，以至于不能根除，那毕竟是太悲观了。惩罚的政策比较强调惩办，而积极的政策则必须假定有转化的可能。所以在任何占领政策中，某种非纳粹化的措施肯定是一个必要的因素。

清除纳粹分子的另外一个理由当然是为了安全。一旦采取完全占领的政策，对反抗行动的可能性就要予以很大的注意。在占领初期，纳粹主义实际上出人意外地消失了，这和严厉的防范措施不无关系。②纳粹党曾有八百万成员，③另外在各附属组织里还有四百万人，④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在第三帝国摇摇欲坠走向崩溃的时候，关于纳粹党人策划地下活动的传说和韦雷沃尔夫组织在准备行动的威胁甚嚣尘上。⑤那些对德国传出的迹象进行研究的人们倾向于持有这种严肃的想法。即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件事可能被纳

粹党人利用来否认德国已经屈服，或者否认积极的作战状态以及它所证明为合法的一切行动已经停止。事实上这些顾虑是受了宣传的影响，而不是产生于现实情况。上述种种顾虑，对于盟国司令官所应持的态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一开头就下决心坚持彻底清洗。把非纳粹化工作交给公安部门去负责，在初期是比较有道理的，到后来还这样做就不那么合理了。

但是，在考虑实际贯彻执行非纳粹化措施的时候，出现了五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当初对这五个问题都清楚地加以阐述，以后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1) 哪些人该撤职？显然，头头和一切比较危险的人物必须撤掉。可是，谁该算是头头？显然不可能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拘留起来，或完全不让他们担任公职。事实上，什么是纳粹主义？特别是对那些只是为了保持职位而参加纳粹党的人该怎么处理？

(2) 假定能把那些需要撤职的人员大致分成几种犯罪类别，那么对每个人该属于哪一类又如何来鉴定？简直不能指望他们对自己进行甄别，也不剪能指望他们甘愿静候别人来对他们作鉴定。盟军中懂德语并了解德国政治情况、有把握做甄别工作的人员也不多。倘若让德国人担任这项工作，恰当的人选怎么定？例如，不可能用德国的审判官来担任这项工作，因为所有的审判官必须是纳粹党员。反纳粹的人并不等于是当然的适当人选，而且也不能只凭他们个人的白述就接受他们。对那些自称是有名无实的纳粹党员的声明，怎么来加以鉴别？很清楚，会有许多人提出这种声明而又拿不出充分的证据。(3) 鉴于以前绝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都是纳粹党员（无论是通过挑选或者是为了情况所需要），把他们全部撤掉，将使管理国家的工作极端困难，尤其是在战争及其失败造成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方面要求具有很高标准。怎样找到足够的干练人员来管理国家？何况在德国投降前的设想是强调尽可能让德国人自己管理自己。

(4) 从长远着想，对所有被撤职的人员怎样来处理？不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们关起来，甚至也不可能不让他们担任公职。这样做会引起骚动，使人忘掉他们受惩罚的原因，并会在许多民主国家内引起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某种大家认为公道的量罪处罚的制度必须建立起来。为了做到公平合理，各个案件需要按照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款和量刑标准来加以考虑；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反盟国自身认为一直在为之奋斗的法治原则。但是，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机构和搜集证据来审理八百万人，这是一桩庞大而又耗费时间的工作。

(5) 而且，除非犯罪者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思想有所转变，撤除公职除达到惩罚的目的外，完全是弊而无利的。因为，有关人员只要有才干，一旦惩罚期满，在社会上还会重新掌握领导职位。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受到的处分可能一到占领结束就会煽起他们的仇恨，播下民族主义反动的种子。能够做些什么事使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呢？怎样来证明他们的思想确已转变了呢？173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提出惩处战争罪行的方案。这些方案的拟订以及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进行审讯的情况不属本卷范围，但是必须记住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乃是非纳粹化的主要背景。此外，把纳粹党党卫队等组织作为它们本身就是犯罪组织而予以起诉，使彻底搞好非纳粹化工作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据决定，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看管起来，在原则问题未澄清前，不可能进行审讯。

考虑到盟国的政治家们都强调必须“根除纳粹主义”，出乎意料的是，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都认为非纳粹化是理所当然的原则，而没有试图决定确切地该做些什么事。这个原则的实际含意似乎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中才第一次详细载明，其中第六条的原文如下：

所有参加纳粹党的活动而不是挂名的党员，所有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以及所有其他对盟国目的抱有敌意者，都要撤销公职，都不得在半官办及私人企业或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企业或组织包括：（1）市政、经济和劳动组织；（2）德国政府或其附属部门拥有重大财政利益的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3）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4）教育机构；（5）报刊、出版社以及其他发布新闻和宣传材料的机构。凡有下列行为者均不得视为挂名参与纳粹党的活动，而应认为是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1）在党内及其附属组织内，或在宣传军国主义的组织内担任过地方到国家一级的职务，或以别种形式积极参与过这方面的活动；（2）受权或肯定参与过纳粹的任何罪行、种族迫害或歧视行为；（3）曾经公开宣称笃信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4）自愿向纳粹党或纳粹官员和领导人提供巨大的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或在政治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对以上各类人，不准因为行政方面的需要、方便或权宜之计，留在上列各类职业范围内。

把领袖们反复申述的内容详细地写进指令，这样认真做的原因是出于华盛顿方面恐怕军事管制当局对德国人不够强硬，①这恰巧极其清楚地表明了打算进行的工作规模之广泛。如果要把纳粹分子驱逐出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驱逐出政府部门和教育、新闻事业，实际上德国人生活中将没有一处不受到影响。然而鉴于在对德国工业家们的一些审讯中透露出来的情况，很难说这样大幅度的清除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果要把工作搞得彻 174 底的话。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当然是要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遵照执行的，尽管，如前所述，②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下级的美军司令官们也往往自行其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计划的主要附加条款是开列出有嫌疑组织的名单，并把这些组织中各种不同职务的人员分为三类：即“必须下令逮捕”，“必须撤职”，“是否撤职尚须斟酌”。还决定那些在 1937 年 1 月以后参加纳粹党的人应视为确系“挂名”党员，理由是到那个时候（纳粹党员名册由一度保密转为公开）重要的职位必须由党员掌握。这个决定虽然是合理的，但也表明问题是多么复杂，因为这样一来，盟国就不能起用那些早年参加过纳粹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原希望该党真会实行其申明过的某些宗旨，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脱了党。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根据既定政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可说是制订得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这些指令给了下属官员们一个相当明确的指导。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一种不能预测和必然要变化的情况，看起来好象是不明智的，但是任何其他安排也会大大增加立刻发生的种种矛盾。①

当然，计划和现实不久就有距离了。虽然某些出名的纳粹党人转入地下，②但在 1945 年 9 月美占区已有六万六千五百人被拘禁，同年年底，英占区有七万人被拘禁。另外，从 1945 年 5 月到 1946 年 9 月之间，在英占区有十五万六千人被撤职，还有八万六千人申请到具有禁止性质的部门工作而遭拒绝。①对有关必须撤职和是否撤职尚待斟酌的指令应如何解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如找不到适当的人来代替时，纳粹党员可以留在关键岗位上，这些

问题都发生了困难。7 月份，美军某一司令部发出一道命令，规定从所有这类关键岗位上撤销纳粹党员的职务，一律改为斟酌执行而不是强制执行。这分明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的规定，②而巴顿将军却把纳粹党员和非纳粹党员的关系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关系进行类比，认为拒绝执行非纳粹化的指令 175 是正当的。多亏在德国的美国新闻记者们直率的报道，结果在 10 月间把他撤了职。有两个独特的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一是法格茨先生被美方任命为不来梅市的市长，然而他曾经当过纳粹省长的柏林代表；一是原来由美方任命的科隆市市长，由于他同国社党有瓜葛受到了抨击，在 10 月间被英国人撤职，理由是他在处理住房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名字是康拉德·阿登纳。这个事实正清楚地说明订下这么一个严格的标准，缺点是不不少的。美军当局有好几个月拒绝把在美占区内负责运输业务的纳粹党员撤职，理由是这会引来运输瘫痪，可是当克莱将军在 1945 年 12 月间坚持把运输业务移交给一个在他的工作人员监督下的德国管理局来管理时，撤职的决定就执行了，并没有造成什么灾难。①在英占区，粮食和农业管理处比较成功他说服其上级相信在面临当前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冒着供应脱节的风险而撤销纳粹粮食采购机构（中央农业管理局），尽管从农民征购来的粮食不足，有时据说是由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德国人不可靠。盟国专家们拒绝十分严格地实行非纳粹化，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意味着用业务比较生疏的新手去代替受过训练的熟手，纳粹官员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缺点的：不善于找出马脚的盟国军官们碰到显然和他们同样类型和同样背景的人，就感到为难了。

为了解决鉴定纳粹党员的问题，盟国设计出一种个人问题登记表（Fagebogen）。如果这件事做得有些近乎是酒楼茶肆中的开玩笑，那么缺点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其目的不过是搜集判断个人情况的证据），而在于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个制度来处理这些材料。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理由，②一位军政府官员在某地呆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是例外，而新来的人每每感到难以发现他们的前任做了些什么，更不要讲为什么要做的理由了。所以德国人只得填写一连串的个人问题登记表，向每一个新来的当局递送一份，指望能有一个领导人给他们定一个确定的和公认类别。他们的希望每落空一次，他们对盟军这种 176 办法的信念就减少了一些。然而在集中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四方谈判——制订一种程序并把适当的指示传达给地方官员们以前，地方官员们对于个人问题调查表，只是向身边的公安和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征求一下意见，以便决定暂时让这个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或任命他担任另外的职务有无危险。而负责回答这类问题的官员们在作出回答时所掌握的证据又极不充分。个人问题调查表本身漏洞很多，很容易让填写人弄虚作假；为了堵塞漏洞，把表中提出的问题逐步增加到多至一百三十三项，盟国官员中会讲德语并熟悉德国情况的又为数很少。大多数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又不得不担负特殊的任务，于是非纳粹化的问题就照例交给那些在美国或英联邦各国公安警察部门任过职的人。如果说指导谁该撤职的原则并不总是很明确的话，那么指定由谁来补缺的原则更是几乎不存在了。最省事的办法是征求德国人的意见——但是妨碍盟国官员作出判断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妨碍他决定应听取哪些最好的意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挑拨是非，飞短流长和耍弄阴谋就极为盛行，或者是让那些嘴巴灵巧又善于看风使舵的人、道貌岸然的反动派或者可以冒充不关心政治的保守分子占了便宜，那就不足为奇了。

在最初几个月，俄占区的情况似乎也没有多大出入，虽然那里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活动又受到了支持和鼓励、因而使得征求德国人意见的问题大大简化。俄占区把非纳粹化的责任交给德国人担负的甚至比美占区还要多。俄国人并未有计划地把共产党员都安插在所有重要岗位上，而且能够毫不踌躇地任命那些估计会被他们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人去任职。俄国人用什么人是根据他们对某个人能不能唯命是听的估计，但是也让别人明白无误地知道如果不中他们的意，处置起来是毫不留情的。正如一个俄国人向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受影响，我们敢于尽量利用纳粹分子的聪明才干。对于你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①因此，他们起用马克格拉夫为柏林市警察局长，让施泰德勒在他们的经济管理机构中任职，让贝希勒当勃兰登堡州的内政部长，此外还使用了代表纳粹政权在巴尔干各国多次进行外贸谈判的兰德韦尔、第三帝国首屈一指的机车工程师奥赫尔和坦克专家奥古斯廷。^②法国人同俄国人基本上差不多，原则上不信任一切德国人，但是却认为，通过接触，就能识别谁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靠得住。所以法国人对于纳粹分子的经历不是那么挑剔的。¹⁷⁷然而原来的意图是在四国共管的基础上统治德国，为此，在非纳粹化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样都必须拟订出共同的方针政策。拟订这种政策的第一步已在波茨坦协定第二部分第三、第五、第六段中有所规定，^③而这些规定又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所体现的政策继续。第二个必要步骤就是根据经验拟订出更详细的有关逮捕和撤职的类别。内务和交通管理局进行了这项工作，因而在1946年1月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发了第二十四号命令，^①这项命令不过是把美占区和英占区业已实施的政策略加修改而已。它对被逮捕和撤职的人最后怎样处理的问题仍无规定。1946年10月颁布的第三十八号命令^②中有四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基本上代表了美英双方准备采取的方针。但是在此项命令颁布以前，无从着手对非纳粹化问题采取最后行动，结果使得成立必要机构的问题在占领的头十八个月里实际上挂了起来，尽管法国人和俄国人在起草有关法律过程中都运用各自的影响力求条文规定从严，然而他们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并不认真对待，这就使得情况更加难以令人满意。英国议会对这一结果的批评是不合情理地过于严厉的，正如当时海因德所解释的那样，为了应付法国人和俄国人，英方曾经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让步：

我们在德国政府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发言权。……在管制委员会中即使我们按照民主的原则办事而不采用否决权的原则，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伙伴在某一政策上意见一致时，要想在我们的伙伴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决策上采取一种含有否决性质的态度，而又毋需面对一切反击，那是非常困难的。^③

实际所采取的办法是采用包括一百三十三项问题的登记表（Meldebogen）的新格式，对几乎所有的成年进行甄别，这在美占区贯彻得非常彻底，就是德国人自己去搞，也难以比它高明。美方当局要求每个十八岁以上的人填表登记。结果造成三百万人受指控，九十三万人被判刑。在英占区，到1949年1月1日非纳粹化工作最后结束时，共计有二百十四万四千零二十二万人受审查。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只有得到德国人的协助才能实施；在美占区，最高峰时共有五百四十五个法庭进行审理，工作人员达到二万二千人。^①这一套法庭组织受美占区三个州总178理签署的“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法律的约束，规定从1946年6月1日起，各州由一位专门的

“政治教育部长”负责一切非纳粹化事宜，但在政府部门及报刊、电台等直接影响舆论的机构中任命职务均属例外，仍由美国人自己作主。

按照这一制度，对每一份强迫登记的表格，都必须予以审查，分别列入下面五类中的一类，首犯，罪犯，次要罪犯，从犯，免于追究者。对每一类都按情节轻重规定大小不等的必要的处罚，例如对主要罪犯判处监禁两年到十年，强迫劳动，没收财产，褫夺公职，褫夺公权等。对从犯则仅要求他们向纳粹受害者救济基金缴纳款项。对各个案例都有定期复审的规定，如悔改表现良好可改变其犯罪类别，降为次一类。最后，每人都发一张格式一样的身分证，上面载明持证者在非纳粹化法律下的身分；作出了安排，使身分证在西德全境有效，以免无休止地重复进行审查（除非发现犯罪的新证据）。1945年夏在慕尼黑造纸厂中即将化为纸浆的废纸堆里意外地发现了纳粹党党员及辅助人员的完整卡片目录（德国人也许认为把卡片烧毁是不应该的浪费），这对核实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可靠帮助很大。

然而美国人决不满足于德国人执行非纳粹化法律的方式，经常要求处理得更严格一些。1946年11月，克莱对各州总理说：“如果德国人不愿意于这件事，军政府有能力、有决心自己来干。”^①他们特别反对把“从犯”官复原职，坚持要由美方向已对这类案件全部进行复查。德国人回答说这样做是对法律规定的程序节外生枝，虽然法律程序中规定了特别审理，但审理的原则尚未商定。如果这种纠纷出自美国人和德国人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同，那么这应当通过讨论予以澄清，而不应当由美方片面处理。德国人还争辩说，一旦“从犯”免除了处分，他们同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不然，这种差别待遇应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因此，在谋求职业方面，他们同其他人处于179同等地位，就资历而言他们倒还胜人一筹。对于那些曾任文职官员的“从犯”，如果象美国人所坚持的那样把他们从政府机关中赶出来，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享受养老金的权利，这是对情节较严重的罪犯的一种处分，因而也是德国人的案情审查委员会不愿给予的一种处分。^②

英占区到1947年10月才把审理案件的职责移交各州政府。^①1946年7月设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陪审团，以备地方公安官员咨询，同时还规定被审查者得向德国人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诉，但这种委员会纯属咨询机构。如同美占区一样，委员会的成员由地方政府提名，规定必须保证有一位工会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第三十八号命令发布后，英占区于1947年2月也按上述命令的规定，参照美占区的做法，实施了一套罪犯分类办法。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主要适用于未扣押的纳粹分子。这些措施在初期对那些应予拘捕的几类罪犯，如德军高级军官、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头子以及纳粹党的教导队成员等问题并无影响。前面已经讲过，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对他们所属组织的地位作出决定以前，并不打算对其中许多人进行处理，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到1946年秋才对此作出决定。所以他们被关押了一年多之久，并未进行审讯。拘留营的状况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粮食定量在某个时期下降到每天只有九百卡路里，而被拘留的人是没有机会靠掠夺来给自己补充口粮的。由于整个德国的粮食和住房都极为匮乏，改善拘留营食宿条件的要求只能放在末位来考虑，尽管这是不幸的，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1946年夏季末，这一情况在英国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批评者抓住这一条不放，说是对“未经审判不得监禁”的原则未予尊重。对彼拘留者进行甄别的职责是由情报人员承担的，而情报人员还有好多别的工作要做，因而多少影响他们的甄

别工作。于是甄别工作又从情报人员手中转给由英国官员组成的一些三人小组去办理，而并不要求他们熟悉德国事务（因为倘若提出这种要求，势必又会由于合格人选缺乏而造成耽搁）。这样一来，在押的德国人由 1946 年 7 月的四万二千人减至 1947 年 5 月的一万五千人。^①但是，毫无疑问，甄别工作进展太快，无法保证可靠，或处理的分寸一致。后果之一是等到纽伦堡军事法庭作出裁决时，一些被判有罪的组织的下级成员中，有许多已经释放，把他们再找回来交给盟国特别法庭去审判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还有两万到三万在押人员有待上述盟国法庭去审理。然而他们仍须经过通常的非纳粹化程序的处理。

随后几年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把盟国关于战争罪行和非纳粹化的政策轻率地断言为考虑不周并且根本行不通。在本节开头部分，作者已经试图证明这样的批评，至少其中那些比较极端的论调，完全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人们见到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设法惩处德国的领导人并从德国根除纳粹主义。许多德国人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曾经无可否认地犯过骇人听闻和惨无人道伪罪行，主张放过这种罪行不予惩处就等于主张不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道德准则，这种主张当然要遭到许多人（包括作者在内）的强烈反对。把惩处局限在那些直接犯有罪行者的范围内也是不公平的。尤其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以防止德国的侵略不断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光靠物质上解除武装显然是有种种缺陷的。在最猛烈地批评盟国完全未能履行其战时声明的人中，会有那么一些德国人，他们的意见对于盟国倒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种经不起检验的对非纳粹化进行批评的论调，这就是认定它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不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司法过程来对待。如果坚持按这种表面上很动听的主张去办事，那么除了人人有权自行其是地惩处纳粹分子而无需考虑去建立准则之外，很难设想它还会有什么意义。果真这样做，有可能会大批人不经审讯就被杀掉，虽然其中有些人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同时势必有人借此机会泄私愤，图报复。这样就会作出一些专横的决定，而在处理各个不同案件的罪行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时，也必然有很大出入。既然英美人士声称他们作战是为了使法治得到尊重，既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主要谴责之一就是蔑视法治，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支持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的真正吸引力在于速度，而采用其他办法也肯定是能够达到这种速度的。

再说，以非纳粹化会招致苦难为理由或者以拘留营的状况太象集中营为理由来谴责非纳粹化、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拘留营的精神和宗旨毕竟与集中营全然不同，即使条件恶劣，但对这种状况的不能改善要最终负责的，如前所述。乃是那些住在同一拘留所的人。时常还能听到人们这样说，先处理小人物的这种合平常理的原则，意味着在人们还普遍地保持着战时对纳粹主义的态度时就定了他们的案。结果，他们遭到较重的惩处，而主犯们反而得到从轻发落，因为后者是在人们对纳粹的强烈憎恨开始减退之后才被审理的。这种看法忽视了这一事实：小人物已被释放而得到自由，而主犯们还要在拘留营中忍受好多个月的困苦生活。而且，民主制度的最大坏事之中就是小人物自以为无足轻重，如上所述，^①这种想法在德国颇为流行。对纳粹小人物的痛苦遭遇过分关心是方向不对的感情用事。^②

最后，更不能仅仅由于非纳粹化引起德国人的广泛不满并且妨碍了盟国取得德国人的合作，而对之加以谴责。鉴于德国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曾

经反对过纳粹主义，③盟国不论采取什么治病救人的措施都很可能遭到阻挠。的确，德国人阻挠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证明需要采取那些措施。严重的是社会各阶层都联合起来阻挠，而盟国对之最为倚重的那部分社会舆论（特别是教会）是批评得最厉害的。这就表明：不管在原则上非纳粹化是如何有道理，但在执行中方法上肯定有不对头的地方。

第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时间拖得太长了。造成拖延的原因上面已作了说明，但却不容易知道怎样才能消除这些原因。任何一场战争结束以后，“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①而且只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被征服的人民是顺从听话的，征服者的态度是坚决的。非纳粹化的规划本应对这一因素给予更多的注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拟订的程序过于繁复了。本来有可能使机构和手续简化一些，而仍然能够做得公正并符合法治 182 原则。本来也有可能更早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尤其是在英占区，虽然人们必须记住，造成拖延的主要原因是过分拘泥于四国共同商定的处理原则。

其次，计划太庞大了。这样说是意味着一些较小的人物应该不列入非纳粹化之列，或者给他们一个机会以最简便的手续恢复公职。要说界限应当划在哪里，那是不容易的。但实际上对于“从犯”给予惩处究竟有什么用处，是很值得怀疑的；在盟国的控制一旦放松以后，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恢复了公职，往往这种处分的唯一结果是使他们怀恨在心。如采用一种更快、更直截了当的刑罚制度，效果也不见得差；如果计划不那么庞大，贯彻实施计划所需的时间就会少得多。

第三，整个方针政策的拟订过分偏重刑罚，而对非纳粹化所涉及的人的思想改造问题考虑得太少。理想的办法本应是改造与惩处并重。毫无疑问，有许多罪行最为严重的纳粹分子是不可救药的，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拘禁足够长的时间，以使那些比较具有民主倾向的德国人有机会立足并发挥作用。防止极权主义的复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纳粹政权的人当中易于感化的有多少，而在非纳粹化过程中他们受到的待遇恰恰适足以造成相反的后果。

①还有人说，②很多德国人内心知道他们过去错了，但是出于心理上的理由，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惩处只会促使他们抑制犯罪感，而理想的处理办法则应当有利于解脱这种犯罪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完全避免施加惩处，但是倘若惩处采取的是以下一些形式，即近乎自动地以金钱、实物或劳动等形式作出贡献来弥补他们（在德国内外）造成的损失，来帮助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很难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更富于积极意义。人们常常批评俄国人轻易地把一个人的纳粹经历置之脑后，只要他乐于加入共产党（或德国统一社会党）；③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争取人心的做法确有值得称道之处。183 最后一点，过分注重非纳粹化是不幸的，因为这样做就迫使美国 and 英国当局把当时可资利用的有限的时间和知识过多地用于消极方面，而不是集中力量尽可能地发现最良好的人才，让他们担当重要职务，并努力扩大第二流人物的眼界，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找到第二流人物。根据正确的认识，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工作才是盟国在德国的真正目标，因为这种工作有取得持久效果的希望，而禁止纳粹分子担任公职的命令是在占领一结束就会作废的。毫无疑问，在纳粹分子的心目中，那些担任了公职的人将会沾上与占领军合作的污点，因此一旦他们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然而当时这是军事占领摆脱不了的根本困难，而军事占领是不能指望永久存在下去的；如果说在占领初期，蒙哥马利元帅和麦克纳尼将军

都讲过要占领十年，那么罗斯福则曾经想过只占领两年。有限的占领时期必须设法用来使反纳粹主义扎下根来，并使其代表人物处在能够维持下去的地位（从外界给以尽可能长期的支持）。显然，把思想和人与外国军队的刺刀紧紧结在一起所带来的不料因素必须牢记在心，但是制订政策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不是害怕激起反应。

发现适当的人才乃是关键。在形成英美政策的背后，在战时发表的演说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假定：以为一旦把纳粹分子解职并让他们去从事最卑贱的工作，这时就可以找到足够的未玷污的德国人来治理国家了。这就严重低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弱点，严重低估了他们所受反民思想影响的程度。①俄国人实现彻底改革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要求彻底改造社会，因而能够识别他们的朋友。在东德要想把时钟倒拨很多，永远也不可能了，但是为达到这一点所付的代价只是用一种极权主义代替另一种极权主义罢了。只有重建社会的基础才能粉碎国社党集团的势力，才能堵死回到过去的道路。这种社会改造必然要遭到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势的人们的猛烈攻击。因此就需要用武力来维持，而要让武力获得成效，也许不得不把权力交给那些和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和胸襟褊狭的人去掌握。西方盟国宁愿恢复纳体上台以前的旧制度，希望通过对那种制度进行一番改革，便鬼以防止历史的重演，这种故革因为人们对纳粹主义所导致的结果记忆犹新，决不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则颇成问题，应该集中精力于积极的行动，以便使这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 行政和政

—

第一节 行政

德国行政体制的重建向盟国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这个体制曾被纳粹党加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区②的重要性加强了，命令和政策不是选举出来的机构开始执行，而是采取了自上而上传达的方式。显而易见，要肃清纳粹的影响，必须包括取消同他们的政治观点有直接联系的那些改革。但并非他们所有的改革都是坏的；例如，1935 年的德国地方政府法令（镇法令）③在许多方面是要不得的，但也包括一些符合现代行政思想的改革。凡属纳粹的东西是应当一扫而光呢，还是应当把好的留下来呢？应当建立什么去取代已废除的东西呢？恢复 1919 年到 1933 年存在过的政府体制就算对头了呢，还是应当根据需要进行一些变革呢？应当由占领国决定哪里需要变革呢，还是可以让德国人自己去自由选择呢？使纳粹党有可能取得政权这一事实，说明了 1919 年的体制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很少德国人会赞成原封不动地恢复这个体制。的确，可以这样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第三帝国的兴起是德国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比较深刻的缺陷的征候，而传统的政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缺陷是负有责任的。果真如此，整个模式或许就需要加以改造。

对于英方内务和交通管理处的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分部来说，麻烦似乎在于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考虑到效率，这种考虑导致他们为集中而集中，象绵羊般地服从于使少数追求权力的人得以飞黄腾达的独裁政体的效率”。①与此适成对照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精髓却 185 在于地方自治的传统以及地方居民生气勃勃地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②假如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传统的德国体制若不触动，那就会助长正需要予以消除的弱点，并与树立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一观念的其他措施背道而驰。那些对这方面要求改革的人并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同时也的确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可能受到它的各项建制的影响，而德国政府体制需要彻底革新这件事，正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德国政治活动的性质也许在长时期产生有利的影响。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指山了拿破仑引进德国的一些改革。

当然，有人在回答中可能争辩说，一个国家的建制之所以采取现存形式，是自为它些建制适应于在这个自家的人民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征；阶以，那些引进外国建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样的建制只能发展来适应别的条件和具有别的特征的人民。“不要因为日本人这样做，就去把蕨的嫩芽烧来吃。适合于东方边陲地区一些吃苦耐劳的种族的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你。”①引进德国的许多改革正是受到了过样的批评，并在德国人重新管理自己的事务以后，大多被弃置一旁。然而，这种批评忽视了问题之所在而竟收到效果，未免太不花力气了。如果有人认为，建制当然能够影响政治生活，但又补充说，建制必须适应民族特征（大抵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那末，他就几乎等于说：用有意识地操纵环境的办法去改变民族特征，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就很难看出，民族特征到底怎样才能加以改变。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谁也不会否认：民族特征——环境——建制——民族特征这样的关系是复杂的。①然而、任何人只要不是采取完全宿命论的立场，准有可能对这个环节中的某一点施加有效的影响。德国的经验也没有驳倒这一点，因为 186 实行更多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可能正是由于所作的努力维持得不够长久。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出发点包含在波茨坦协定第二节第九段中，②要求把行政引向“分散政治结构及发展地方职责”；两个占领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向更高一级前进的速度以及留给德国人责任的大小。如前所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创立一个生气勃勃的由地方参与的自治政府的传统，这个自治政府既要训练在更高一级活动的政治家，还要提供一个核心，抵制任何有独裁意向的中央政府。问题是怎样在可资利用的短时间内去创立这种传统。为此，英国人希望使地方议会在进入更高一级以前应尽可能长时间地独立活动；美国人却认为要容许自治政府很快地走完各个阶段，以便德国人在外国监护人的督察下能有最大限度的实践。英国人希望把他们本身发展的初期阶段曾经历过几个世纪的进程压缩成几个月；美国人则指望通过几年的反复试验就足以把民主政府的本能培养起来。英国的计划制订者有意避免把任何完全类似英国体制的东西强加于人。“我们坚持保留德国体制中一切我们认为能够按照民主原则发挥作用的东西……但我们要反复灌输英国地方政府的精神。”①美国人倾向于把更多的责任留给德国人去制订计划，只是在那些计划未能体现他们（象英国人那样）认为是要点的时候才感到失望。法国人尽管在国内政治方面受地方问题的影响，但为安全着想，与其说要建立强有力的地方传统，倒不如说要避免产生任何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要在州政府和地方议会之间建立任何特殊的均衡关系，不如说是要阻止把大量权力授给州一级以上的政府。在俄国人中间，为了安全考虑，需要分散权力，却因为实行计划经济需要进行中央控制，这一愿望被抵消了。各个占领国都不免倾向于认为，解决德国困难的办法，在于引进对其本身的体系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

美国人早在 1945 年 7 月就开始在镇（最小的行政区）、市和乡村区（大体上相当于英国的郡一级的市和乡村区）建立他们所精选的议会，英国人在 9 月也照此办理。美国人的仓促行事不是完全出于原则上的考虑：187 如果德国人要学可民主方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迅速从地方一级开始。而且，这将有助于我们大量减少军政府所需人员的数目。由于那么多的军官在最近几个月要返回美国去，我们即使有一个有力的补充人员计划，也肯定不能为许多地方支队提供合格人员。况且，在我们任命的官员由德国人选举的人员替换之前，我们简直不能撤走地方支队。①但是，并不是出于提供人员的考虑才使克莱写信给他手下的另一个军官说：“及早进行选举是美国的信条”（他特别在“信条”下面划了很粗的底线）。②他把部下的疑虑撇开不管，那么固执地坚持要贯彻这个政策：美占区镇一级的选举在 1946 年 1 月 20 日至 27 日举行，乡村区选举在 4 月 28 日举行，市选举在 5 月 26 日举行。于是，除了州以下的公安支队以外，所有军事管制政府的官员都陆续撤走了。英国人对选举的问题并未给予同样的重视。在为指定的议会（到 1946 年 4 月他们已建立了八千一百个这样的议会）挑选成员时，他们试图把发言权给予为纳粹主义所不容的屈民中的所有重要阶层，并把在德国正常条件下不打算从事这种活动的男人和更多的妇女安排到地方政府中去。据认为，如果给予这些机构稍长一些时间去取得处理自己事务的经验，那是不会有害的。因此，到 1946 年 9—10 月间，英占区才举行了第一次选举。这次选举为下述两方面铺平了道路，一是从较低级的人员中迅速裁减英国人员，二是代之以单一的县级驻扎官，他们在占领后期是要成为领导人物的。③

举行选举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是颁布修改过的地方自治条例（镇法

令），规定地方自治单位如何组织，投票如何进行。为此，美国人在 1945 年 9 月和 11 月先后向德国的州政府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准备必要的立法，规定应该遵循的一般方针；这些一经拟就，须经美国人批准。这个方法收到了缩小州和州之间差异的效果。英国人成立了一个精心挑选的十七人咨询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协助下，他们制订了如 1946 年 4 月的第二十一号法令之类的法规，向全占领区颁布。没有打算把这些法规在各占领区之间进行协调，或者把它们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他们有意识地欢迎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这样有助于分散权力。¹⁸⁸ 英国法令的第一个特征是有关市长的地位。按照传统，德国的市长既是地方议会的首脑，又是它的主要行政官员；通常由人民投票直接或间接选出，任期十二年。在此期间，他可以受到指责，但本能撤换。他经常直接接受中央政府（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官员）的命令，而不需要向他的议会打招呼。英国人所坚持的主要改革是把他的立法职能同行政职能分开，而把后者委托给一个称为“市政秘书（市长官）”的新官员去执行；这样，就在实际上回到了拿破仑和冯·斯泰因改革以前德国通行的体制。这个改革把德国市长降低到英国市长的地位，这样的市长与其说是一个专职的行政长官，不如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一改革背后的意图是要表明：制订政策的责任在于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同时强调：行政长官只是议会的仆人，依靠议会信誉进行工作。法令还规定：议会每年应有三分之一的成员辞职，并应举行新的选举。乡村区也坚持实行了同样的分权，在那里，议会主席的行政职能交给一位首席县长官去执行。

这些改革在德国人中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对这个新体制感到生疏。批评的理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要物色足够的能胜任愉快的非纳粹分子来管理国家，而需要填补的职位倍增，更额外地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德国人还拒不相信，一个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在面对是和非的抉择时，能够假装成不偏不倚和缺乏主见：他们甚至认为不赞同一个政党的政策，而又愿意效忠，是软弱和不真诚的表现，而且，他们相信，政策必须出自专家，因为只有专家才具备必要的知识；他们认为，相应地调整专家的权力和地位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①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人获得修改体制的自由后，就立即把体制修改了；1950 年，他们重新采用了“委员会宪法”（参议会宪法），其中规定：议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专职的和非专职的委员组成；并由一位专职市长担任主席。然而，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952 年的镇法令实质上还保留了英国体制的主要特征。

在美占区，做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市长有时需要由议会任命，有时则由人民投票选出。没有打算分割他 189 的职能。但是美国当局坚持：如果他是 by 议会间接任命的，他的任期只应为二年；而且，现在又有一种随之而来的趋势：即使是由人民投票选出的，任期也要缩短。^①

第二个重要的改革是关于投票的方法，人们普遍感到；在魏玛宪法下，各级政府的比例代表制被强调得过分了；据认为，这样做鼓励了分裂的小党派，使联合成为不可避免，使投票与其说为了一个名额，不如说为了一张名单，从而取消了投票人和代表之间的个人关系，因此，各级政府也就遭到了削弱。英国人迫切希望引进他们的以简单多数票选举的一人选区制度，但是，咨询委员会的德国人担心：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使得反对党总是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以获得一个席位。因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决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席位按这种方式去填补。如果获胜者以绝对多数压倒所有其他的

候选人，构成这一多数的选票就集中记在他的党的帐上。如果没有赢得绝对多数，落选者的票数总和与获胜者的票数之间的差额按所得票数比例在竞选失败的政党中进行分配。这样一来，从各个选区得到的选票就好加在一起集中分配给各个党，而统筹分配的相对数字就决定了每个党可摊到的其余百分之四十席位的份额。这就保证了少数党也可有一些代表，并给了所有党派一个机会，甚至在没有被直接选上的地方也可向议会提供具备特殊资格的人员。也许有人怀疑：这样做也给一定数量的政治交易开了方便之门。这个制度有它的优点，因而在 1952 年的选举中，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仍保留使用。然而，下萨克森州则放弃了这个制度，采用一种直截了当的多数票选举制度。^①

在美占区，美国官员决定对选举方法不表示意见，而让德国人自行选择；1946 年的地方选举中使用了比例代表制，但德国人已在口头上表示反对，因而后来采用时有所修改。例如，在黑森，一个党至少要得到总票数的百分之五，否则就无法取得任何席位；而在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至少要在一个地区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在法占区，地方政府的形式已由占领当局在 1946 年 6 月至 9 月间颁布的条例规定下来。在镇和市，他们试图引进他们的有关选举市长和助理的制度，即由地方议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然而，乡村区的区长仍然是任命的国家官员。法占区的各个州一有机会就回复到采用传统的制度。1946 年夏天首次举行了地方选举。^②

德国人口调查，1946 年 10 月^①

	面 积 (平方公里)	人 口		总 计	每平方 公 里
		男	女		
英占区	97,697.86	10,189,998	12,114,511	22,304,509	228.3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34,075.9	5,369,263	6,427,829	11,797,092	346.2
下萨克森	47,217.77	2,951,110	3,481,683	6,432,793	136.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5,657.57	1,209,662	1,440,826	2,650,488	169.3
汉堡	746.62	659,963	764,173	1,424,136	1,907.4
美占区	107,458.48	7,826,137	9,428,808	17,254,945	160.6
巴伐利亚	70,237.9	4,095,083	4,934,007	9,029,090	128.6
符腾堡-巴登	15,700.12	1,654,512	2,020,725	3,675,237	234.1
大黑森	21,116.69	1,850,164	2,213,915	4,064,079	192.5
不来梅	403.77	226,378	260,161	486,839	1,205
法占区	40,215.88	2,244,432	2,833,374	5,077,806	126.3
莱茵兰-法尔茨	19,856.22	1,227,360	1,533,778	2,761,138	139.1
符腾堡-霍恩佐伦	10,407.39	491,377	627,435	1,118,812	107.5

	面积（平方公里）	人 口		总 计	每平方公里
		男	女		
巴登	9,952.27	525,695	672,161	1,197,856	120.4
苏占区	107,173.25	7,379,546	9,934,188	17,313,734	161.5
萨克森-安哈尔特	24,668.8	1,801,800	2,358,739	4,160,539	168.7
勃兰登堡	26,976.42	1,066,405	1,461,087	2,527,492	93.7
梅克伦堡-伏尔堡门	22,937.78	912,386	1,227,255	2,139,640	93.3
萨克森	16,991.92	2,336,630	3,221,936	5,558,566	327.1
图林根	15,598.33	1,262,326	1,665,171	2,927,497	187.7
柏林	889.91	1,299,701	1,900,237	3,199,938	3,595.8
德国, 1946 年 10 月	353,435.38	28,939,814	36,211,118	65,150,932	184.3
德国, 1939 年 5 月	472,605	28,776,914	30,069,086	58,846,000	166.5

俄国人除了废除纳粹的法律之外，出人意料地很少干预德国人关于地方政府的安排。如果说，这并不是他们想要表示宽宏大量的结果，那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重要的是保证把可靠的人安插到关键位置上，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一个主张独裁的党组织或借助于宪法改革都是可行的。1945年夏天建立了指定的议会；1946年1月举行了县镇级的市长选举。俄国人撤销了普鲁士行政上介于县和省之间的中间一级管辖区；而在西部，这种管辖区却被保留了。^①

西方盟国所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分散德国警察部队。这多少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据认为，若干分散的由地方控制的警察部队被用作影子军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对于一个妄图做独裁者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抓住一个神经中枢，而要去控制若干支部队，那他所遇到的障碍将会更大。但是，若与把警察作为敌对权力的大陆传统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以警察作为公民的朋友而享有盛名的，这又主要归因于地方的自治和控制。同样的考虑使得一些人坚持剥夺警察的武器（即使只是用来射击在某些乡村地区糟塌庄稼的野猪）。尽管为了推行这两项改革煞费苦心，却没有一项能坚持下来。在战后德国的混乱情况下，人们很快发觉有必要允许警察使用卡宾枪，即使不是正规地携带；而且，近年来还可看到一种稳步发展的趋势，要把地方部队在州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盟国对此几乎一点也不表示抗议。在俄占区，从来不想做这种事，相反，在1947年初设立了一个特殊的中央行政机构来控制警察。^①

作为战争的结果，把也许是最永久性的改革引进德国行政机构的是在州一级发生的，就是说使国家成为一个由大小约略相等的各州所组成的联邦。虽然各州人口多至一千二百万，少至五十万，却没有一个州具有普鲁士迄今保持的那种优势地位。这个州之被废除主要为了缩小军事影响，却为德国史无前例地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划分开辟了道路。再说盟国管制委员会，它并不进行指导，而仅仅在各占领区独立采取的行动上盖章而已。到1947年2月25日通过正式撤销普鲁士的第四十六号法令的时候，^②所有新建的州在几个

月之前就已诞生了。

给予这些州的自治权的大小，在各个占领区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理论上的设想在实践中已作了相当大的修正，这是因为占领国鉴于经济情况而不得不实行集中控制。如果法国人和美国人在分散权力方面走得最远的话，那么，所有四个占领国的目的都是要用人为的办法去剥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因为，其所以强调要有一个联邦宪法，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象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府，就会变得不适当地强大，从而走向侵略，但是，一个联邦通常是由一些独立的州组成的，这些州感到有共同行动的必要但又不放心无保留地放弃各自的特性。然而在德国，一个联邦国家却是通过分割一个一直在稳步走向统一的国家而建立起来的。分散权力是根据政治理论——而且是外国的政治理论，而不是根据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德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要求各州政治上独立的情绪，尤其是在南方；即使没有盟国的占领，这种情绪在战后也有可能对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提出要求。但是，谁也不能忽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德国人对他们应属于一个单一的国家越来越觉得重要；由于占领而使他们的国家分裂，已把这种感觉转化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激情和一个世界问题，要求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思想意识是那么强烈，以致很难希望创建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国家。单就这个国家的幅员来说，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乃是效率高的政府所 93 必不可少的；一般说来，1945 年以来建立的样板是够方便的了，虽然不久之后，有人开始批评州政府的一整套部长和部的设置是铺张浪费。但是，期望德国宪法会象美国宪法那样维护州的权利是不现实的；这里的环境差异是那么大，不可能机械地把制度移植过来。这里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要维持州自治的企图就没有指望，倒是有可能造成自治的自行废除。

英占区是在 1946 年 7 月才开始定型的，当时旧普鲁士的两个省，即北莱茵和威斯特伐利亚（到那时为止两个省一直把鲁尔分成两半）合并成为一个州；①其目的是要把主要工业区和某些农村供应区连在一起，以便成为一个平衡的单位，①第二年 11 月，汉诺威、奥尔登堡、不伦瑞克和绍恩堡—利珀诸州合并组成下萨克森州。②然而，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合并的计划却放弃了，仍各自保持为单独的州，即使它们合并在一起，人口仍然比占领区内其他两个州都要少。③所以，到 1946 年底，英占区的未来划分就已经确立了，虽然州一级的选举到 1947 年 4 月才举行，但州政府以及作为其咨询机构的指定的议会却早已存在了。但是，德国正受盟国管制委员会下面的占领当局统治，这些州政府打算干什么呢？如果州政府打算要干的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贯彻别人决定的政策，那么，它们就没有必要设置部长和议会议员。但是贝文说过，为了遵照波茨坦决定行事，英国人打算把德国的行政尽可能分散，并制定宪法，使德国避免走向松散的自治州邦联和中央集权国家这两个极端。④现在正是通过为州政府确定某些职能而开始实现联邦主义的时候了。

结果发布了从 1946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的第五十七号法令。⑤它在四个项目表中列出了一些禁止或限制州 194 一级立法的事项，其原因或者是要把这些权力保留给最后的联邦政府或占领当局，或者是限于种种条件，移交这些权力暂时还不可能。这一措施的宽宏大量的意图只是虚有其表，因为这些项阁表中就包含了四十四个项目。移交给州一级的主要职能包括教育、公安、公共卫生、行政和选举程序（这几方面提出的一切方案在实施以前还必须经

过英国驻在各州的高级专员批准)。但是,考查一下保留的权力就可表明:其所以那么不放手;并不是由于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那个范围所保留的权力只能说是适合属于中央的一些权力。占领当局保留的权力大大地缩减了州政府当局的职权;然而在当时的德国经济情况下,把这些权力留在英国人手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个阶段实行分散权力难免会引起摩擦和混乱。按照当时的情况,甚至交出那些要移交出去的权力,也在掌握这些权力的盟国专家中间引起深深的疑虑。然而,回顾起来,采取这一步骤,无可怀疑是明智的。德国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会自治,只有接收一些权力去行使,才能实践。所有他们现在要接收的权力必须及时移交给他们;假若移交得迟,那么剩下来给予盟国官员仍以顾问资格进行监督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了。当盟国不再是下命令而只是提出建议的时候,一些最密切和最富有成果的接触终于建立起来了;德国当局逐渐珍视他们的帮助,甚至采纳他们的意见。一种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关系比起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来更有可能持久。同时,州的永久性宪法就可更加从容不迫地予以解决。①

美占区照例走在英占区前面,州一级的指定议会早 195 在 1945 年 8、9 月间就已建立起来。巴伐利亚具备成为一个单独州的条件是无可争论的:另一个州则是把原属符腾堡和巴登而没有划入法古区的那些部分合并而成的。②本来打算使黑森和黑森,纳索成为独立州;但在 1945 年 9 月,根据德国人的建议,却把这两个地区合并成为大黑森州。不来梅飞地③直到 1946 年 10 月还由美国官员按照英国人的指示治理,但是,由于“不来梅一直不满意这种安排”,④这块飞地就完全移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就在 1947 年 7 月把它建成为一个在自己占领区内仅有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四人的独立州。在其余三个州内,咨询议会于 1946 年 1 月以指定产生;制宪议会也于第二年 6 月选出,立即着手起草宪法。还指派了专门的美国官员来联系这项工作。经坚持而作出的几项主要改动是:删去大黑森宪章中有关国有化的条款;①删去巴伐利亚宪法中某些可能不适当地限制未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词句;增加规定实行彻底的非纳粹化的条款。但是,在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之前,麦克纳尼将军坚持:每部宪法都必须包含充分承认言论、宗教信仰和结社自由的个人基本权利的条款。②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议会来决定所有制订的法律的合法性。有些特别规定还禁止任何会影响政府民主性质的改革。③美国人还坚持,宪法和随后所有的修正案都必须通过人民投票来批准。这一工作在 1946 年底以前就及时地着手进行了。当工作正在举行时,1946 年 9 月 30 日向美国军官和文职人员发出了一个指令,虽然没有立即公布。④指令规定了对州政府的一些特别要求,例如遵守国际法规、四国决议、占领当局的命令和民主的基本原则。指令还列出了 1947 年 1 月 1 日以后留给美国军政府当局(州级和州级以下)的一些职能。①美国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慷慨大方,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动辄提出意见所冲淡;必须记住,列举出来的那些指示把仍然由中央担负的诸如粮食:农业、占领区间的贸易、物价、出版和广播等职能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人在把责任交还给德国人方面,其行动要比英国人迅速。美占区的特点也许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政策。无论如何,这个政策证明是成功的。

在苏占区,由于波兰占领了奥行-尼斯线以东的领土,使得重新划定边界成为绝对必要。这样,就把波美拉尼亚分成了两半,它的尾部同梅克伦堡街

接起来了。原为普鲁士一个省的勃兰登堡仍然维持原状；但是，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和安哈尔特州却组成了一个新的州，即萨克森-安哈尔特。同图林根一样，萨克森州没有动。根据 1949 年 7 月 9 日发表的一个公告，在所有这些州中建立了德国政府，表面上，有相当多的职权移交给了这些政府、然而，俄国人的方法却是通过可靠的工具来进行工作，把自己的愿望蒙上德国人自愿行动的外衣。懂得了俄国人会冷酷无情地对待越轨行为，也就懂得了几乎没有哪个德国官员或政治家在未搞清占领国是否会承认他们的行动之前，敢于采取什么行动。因此，真正的权力还是保留在俄国人手里。州一级的选举于 1946 年 10 月举行，随后由挑选出来的议会受命着手起草宪法；所有的宪法都仿照千篇一律的样板，包含了一大堆装饰门窗的词句，并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中央行政机构。①即使这样；下文将谈到，冲突并未能避免。197 法占区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的：巴登的南半部，符腾堡的南半部，以及由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地区于 1946 年 8 月组成的莱茵-法尔茨州。1946 年 11 月，各个州从区议会成员中提名，组成了协商议会，并起草了宪法，于 1947 年 5 月通过州一级的选举予以批准。随之产生的权力分配由 6 月 9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下来。②列举出来的关于州政府无权处理的问题一览表，比别的占领区要短得多，从而反映出法国人反对任何类型的中央集权。

有人讲反话说：最大的权力正在交给最小的和经济上最落后的、几乎不能自立的州。③

法占区也包括萨尔。在占领初期，这个地方是作为第四个州而被管理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资源对于法国钢铁工业极为重要，只有借助于这些资源，法国钢铁工业才有希望与复苏了的德国工业相抗衡。萨尔的三个钢铁厂已掌握在非德国人的手里、另外两个在早些时候也被法国人没收了。①但是法国政府需要作更加持久的安排，要在德国人能够处于任何反对地之前就把这种安排固定下来。因此，1946 年秋，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就深表同情地接受了；贝文也表明：英国政府原则上不表示反对。②就凭这一点，克尔兹将军于 1946 年 12 月 20 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告建立萨尔和法国之间的关税同盟（这暗示萨尔和德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委员会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提出了抗议，不过克莱的抗议出于不意地比他的政府所要提出的更强硬了一些；③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没有制造任何严重的困难。并入法国的另一个德国地区是施特拉斯堡沿面的港口和桥头堡克尔。1944—1945 年冬，当这个城市还处在前线的时候，这里一方三千个德国居民中大多数人都疏散走了；但在被占领后，有几百人实际上是被法国人赶走的。九千个法国人被安置下来，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边缘建立 198 了边防哨所。④其目的据说是为了抵消在战争期间希特勒牺牲施特拉斯堡而给予克尔的刺激。①

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关心的问题，特别在州一级，是德国文职机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由于德国的传统，许多严格地说来是属于政治性的职位（如市长）都由文官充任，因而那种在英国，其次也在美国通行的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区分，在德国从未发展起来。文官要不偏不倚，或者说要抑制个人的想法，这一观念对德国人似乎是陌生的。因此，他们认为职业文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以党员身分坐在州议会席上，而仍然担任行政职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简直没有必要去描述这种情况给阴谋活动提供的机会，或者去描述这种情况可能给一个在气质上与其大多数官

员不一致的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不能马上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倒是这种情况所给予那些不仅比别人更懂得怎样操纵官方机构，而耳善于运用个人干预绕过政治障碍的人的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属于一个狭隘的阶层。这种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因而使得长期的法定训练成为必不可少；他们享有一种实际上是绝对的任职的保证；他们习惯于对上级百依百顺地服从，就象他们希望下级所做的那样。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别处的文职官员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即管理国家的事最好让专家们去干，公众干预国家事务的机会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人不仅给中央政府，而且也给许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工作人员、因而人们能够普遍感到他们影响的存在。特别在美占区作了许多尝试，去扩大招聘人员的基础；打破机关内部严格的级别界限；不那么强调法定的训练：使服务条件和指派人员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的控制；尤其是坚持这个原则，即一个官员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前必须辞职（而不仅仅是调动工作）。但是，德国的文职人员，一直持有某种正当理由，自认为是一种胶合剂，能团结整个国家渡过风暴，证明他们既难以说服，也难以强制。在占领期间的各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占领区，都不曾证明有可能会激起足够的公众感情和兴趣来对难于处理的官场强行改革，因而这方面发生的变化就相对地要小些。至于州一级以上，占领国的官方意见认为，只应该建立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中央行政部门；占领区边界只不过作为军事边界这一概念，排除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德国行政机构的任何必要。俄国人却首先违反了这点，于 1945 年 7 月至 10 月间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十二个中央行政部门。①如果这些部门的真正目的是要充当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全德机构的缩影，那么，法国人的坚决反对，却使这些部门只具有管理苏占区的表面任务。共产党人似乎没有实行绝对的控制；许多工作人员具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或者是社会党人。主席和副主席都由苏联军政府任命，只有三个部门的主席是共产党人，虽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个部门之外，所有其他部门至少有一个副主席是共产党人。①

起初，这些部门只起顾问作用，它们不直接对州政府发指示，而是通过苏联军政府与之联系。然而，随着它们影响的加强，就渐渐感到这个办法太转弯抹角了。它们不仅开始发布命令，而且在 1947 年，有一次当州一级的立法被认为导致了中央计划不能完成时，它们就把立法取消了。只是由于建立了一个中央经济委员会，才使一场正面冲突得以避免，这个委员会由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经济部长担任正、副主席，并有中央各部门和合适的党派组织负责人参加；②据认为这个机构发布的命令，考虑了州的意见，从而不至于伤害州的感情。③在本书涉及的时间内，象苏占区那样的全区代表大会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除了党派的代表大会之外）。甚至在由于法国人在管制委员会上的阻挠而无限期推迟了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可能性之前，美国人早在 1945 年 10 月；也已开始对建立一个占领区的权力机构采取行动了。美占区三个州的总理受到鼓励，通过每月在斯图加特与克莱将军会晤一次，行使一种协调机构的职能。这种州标委员会开始时只起最低限度的秘书处的作用，后来逐步扩大了它的职能范围。1946 年 1 月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州际委员会的运输部，管理整个占领区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同时，还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邮政部。1946 年 3 月设置了一个掌管全占领区粮食和农业的专员，接着在 5 月间又设置了一个掌管和控制物价的专员。①6 月，每个州总理又委派了一名代表于休会期间在一个常设的部里工作，其下已设

有六十八个附属委员会，配备了下级官员。^②1947年3月州选举之后，由于从三个州议会中抽出七十二人组成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加强了州总理的权力。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一直保持到1948年6月为一个双占区的机构所代替为止。英占区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慢。1945—1946年冬，为了解决个别问题（明显地是粮食问题），建立了德国的各种行政机构作为英国管制当局的必要助手。这些机构如要向州政府下达贯彻实施的命令，必须同时通过英国的渠道从占领区一级向州一级下达同样的命令。1946年3月，这些机构在明登合并成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到7月份（当它开始接管某些行政职能时）拥有将近四百个工作人员^③。然而，在这个阶段，这个机构的发展却被双占区的联合所阻止；之后，它就被吸收进上述的双占区机构中去了。^①这些双占区机构由于没有具备可以恰当地称为立法的职能，因而不大象州际委员会，例有些象苏占区的中央行政机关。在英占区，制定法律的职能在占领区咨询委员会中得到了发展；1946年3月6日，该委员会在汉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五个（后来是四个）州的行政首脑，四个在要政党的首席代表，两个工会会员，两个合作社会员，十一个属于占领区中各种职能机构的德国负责人（当然，其中有些也是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设有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秘书处和一个由英国人组成的联络部。委员会在成立初期只能讨论由英国当局交付讨论的一些事情（诸如土地改革和划定州界等）；而且，只能在其议事日程上列入经英国同意的一些项目。如果委员会的重要性一开始是受到限制的话，那么，罗伯逊将军却煞费苦心地加强了它的重要性；他亲自参加它的大多数会议，并且作了指示，占领区内通常发布的所有法令和指令必须征求它的意见（虽然不一定被采纳）。为了处理由此产生的事务，委员会建立了若干小组委员会。1947年6月州选举以后，委员会改由各个州议会选出的议员组成；一年以后，它就被并入一个双占区机构中去了。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咨询机构而存在。但它的影响和威信却不断地得到加强。^①

在法占区，一个协调的民事行政机关于1946年1月在科布伦茨开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法国当局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依然如故，这个机关从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协调工作都由法国人自己去完成。

1946年10月4日和5日，英占区和美占区十一个德国州政府的首脑根据他们自己的倡议，在不来梅举行会议。在苏占区和法占区的对等人物也受到邀请，但在最后一刻，前者送来了托辞，后者派来了观察员。会上一致同意，要求盟国管制委员会为全德国建立一个州际委员会和一个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为进行各种贸易交流开放占领区边界，以此作为恢复工商业的第一步。这两项决议对于贯彻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时将会遇到的实际困难均未多加考虑，因此除在公众中产生一些影响外，结果是一无所获。为了消除在非纳粹化标准和程序问题上的分歧，还建立了一个由每个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②盟国当局没有鼓励——但也没有否决——重复这种试验；1947年6月6日在慕尼黑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法占区代表没有获准去出席这次会议；而苏占区代表则在其他代表拒绝讨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时，退出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几项报当含糊的决议，要求盟国澄清德国的政治前途，增加粮食供应，在经济事务上给德国人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决议的实际效果等于零。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或许除了在苏占区之外，其他占领区当局对于提供任何中央政府性质的东西这一问题都采取了实验性的和谨慎的姿态。这样做不仅符合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政策；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长期 202 不愿做出任何事情来减少在占领后期从政治上重新统一德国的机会。可是，另一方面，给予每一占领区某种协调的权力是必要的；甚至法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不可能指望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指示；法国人以及后期的俄国人准会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进行抵制。结果，英占区和美占区各自所采取的步骤不相一致，与俄国人的布置也不统一。对德国人来说，这些步骤显得不必要地缓慢而不完整。如果德国人或占领国本身的短期利益是有决定意义的话，早期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区实行集权，本来会有很多好处。但是对于要求把分散作为对付一个强大和独裁政府的解毒剂来说，集权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对一个如此羡慕军装的民族，在其生活中灌注一些异样的内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个行政问题是一个从盟国管制委员会方面显然得不到丝毫启发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表现在合宜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民主”一词的解释上，这就不足为奇了。唯一稍有意义的决定要算是 1945 年 12 月规定六条选举原则的协议。^①虽然这六条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是受人称颂的，俄国人却证明这六条原则解释起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差异。除了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内容以外，对于哪些权力应属于中央政府和哪些权力应留给州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达成协议。当问题提出时，总被一些人零零碎碎地应付过去。这些人与其说是立宪理论和文宪程序的专家。不如说是一批行政官员。他们从德国外部得到的指导，只是分散权力的要求，此外几等于无。除了进行州的划分以外，制订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草案要留待德国人以后去解决。在地方政府部门，引进了许多改革，但站得住脚的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付出的辛劳也许好象是不得其所。但是，地方事务的自决是不让中央政府过分强大的最好办法，而抑制中央的权力乃是“占领的基本目标 203 标”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困难之一是国际力量和经济力量把可以用来说服德国人相信这些变革的价值的时间缩短了。力量在思想还没有足够时间扎根之前，就得撤退。如果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胜国联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它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什么？

第二节 政治

在德国重建民主，显然取决于恢复党派制度，而恢复党派制度则是盟国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英美人会促其发展，自不待言；而俄国人也参与并确实领导了这一运动，乍看起来比较使人感到惊奇。的确，早在 1945 年 7 月 25 日，他们就在全占领区登记共产党员，允许他们重整旗鼓，给予他们可靠的有利条件。但是象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一样，他们不想给予共产党员独占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不久以后就获准开始活动了。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希望按照与其盟国相同的方针来行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急欲在当时建立一套政治机构以便在日后好让他们控制整个德国，那就很难说了。如果两种动机都能使同一行动成为可取的话，他们就可希望干了坏事而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在别处推行的政策也表明了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实践，懂得在共产党人牢固可靠地实行专政之前能够取得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种种好处。甚至在一开始，他们就设法让共产党人占据要害职位。

在美占区，各党派于 1945 年 8 月 27 日获准在县一级建立组织，于 1945 年 11 月 23 日获准在州一级建立组织，于 1946 年 2 月获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组织；根据要求，各党派需将各自的纲领呈交占领当局，并且定期汇报活动情况。活动经费的详细来源必须随时提供，领导人的履历要经过周密审查，不管怎样，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未经美国人同意不得召开公众大会。各种政治文献的抄本必须呈送情报管制当局。制服、徽章、袖章等，根据管制委员会命令，均需禁止。总而言之，他们希望各党派宛如缸中金鱼，一举一动不得越雷池一步，尽管当主要政治人物被认为确有真心诚意之时，规章条例可不十分严格执行。1945 年 9 月 14 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在德国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作好准备”。①控制各党派活动的 20 章程与美占区的章程大同小异。在法占区，发展比较缓慢，活动带有条件，要接受德国只应是一个松弛的联邦的原则。

在早期，占领区边界仍被视为次要的问题，除某些地方性的特殊情况外，各党派在三个主要占领区内都是在相似的基础上组成的。②这时出现的党派很自然地与纳粹过去所镇压的党派完全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自由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分裂，后来又成为一个受到欢迎的重新组合的政党。③最令人注目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崛起，它是战后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的反映，即：形成民主党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并且包括一个明显的激进派。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以达到共同的基督教目标，这种思想是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中兴起，并在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成熟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德国的某些地方却引起了物议：在威斯特伐利亚，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之间的仇恨，滋长了一种复活旧的中央党的企图。该党由施皮克尔领导，他曾是布吕宁的同事，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年代。在巴伐利亚，新党称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其他主要属于地方性的政党有巴代利亚党、下萨克森国家党和在阿尔弗雷德·洛里茨领导下的经济重建党。洛里茨是个生活丰富多彩的巴伐利亚人，他“时而享受豪华生活，时而饱尝铁窗风味”。④这个党在组织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不象有些政党公开自称为保守派。但是，这决不是说所有够格参加政治活动的德国人都是进步的，也不是说法国的激进社会党是个具有先进政治观点的党。后来，

某些保守党的确出现了，但是它们公开承认它们所自夸的民族主义观点却不为人们所重视，倒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吸取了保守党思想的主要部分，从而对两党的性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自由民主党内有一个支派，真诚地信奉传统的自由党原则，包括经济生活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大部分是由实业家和职业阶层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教权，并敌视权力主义思想。但是一部分实业家之所以对自由民主党感兴趣，不是由于信奉自由这个原则，而是希望因此能够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愿地经营业务，避免政府用规章约束他们。赫尔穆特·赫尔茨是他们在俄占区的首领，威廉·海勒（1933年以前的自由党员）是他们在西部占领区的首领（后由弗朗茨·布吕歇尔继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继承了鲁尔和莱茵兰一带中央党的普及工人运动的观点，这与温和的社会主义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在柏林的领导人是雅各布·凯泽。他认为与反动政策性质相同的任何东西在俄占区都是没有希望的。该派在西部的领导人是卡尔·阿诺德，他是杜塞尔多夫的市长。^①他们的影响在1947年2月阿赫伦起草的第一个党纲上有显著的地位。党纲上说，每一项经济的目的应当适应国民的需要。他们抨击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宣扬消灭卡特尔垄断经济，主张工人广泛参与工业管理，提倡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由阿登纳博士领导的该党的另一翼则希望用生产和竞争代替福利事业来作为主要经济目的，但在早期，这一派的名声不很大。直到1949年，这一派才成功地说服了该党接受杜塞尔多夫纲领（主要由巴伐利亚工商业部长、新接纳的党员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起草）。该纲领把避免通货膨胀置于维持全部就业之上，号召“受物价控制机构支配的各行各业互相合作”。^②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优势，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势力很强。德国新教徒的主要势力在易北河以东。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业区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因此，显而易见，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将是最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强弱似乎取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在魏玛路线基础上与其进步一翼联合的可能性。¹⁰⁵除法国外，每一个占领国都与某个政党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英国左翼团体一直把德国资本家不受约束的力量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认为，如不经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改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样的社会改组，虽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说的基础，但英国工党政府同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处。不少美国人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仅次于共产主义的祸水，同情自由民主党的经济观点，但是发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般社会态度与他们最为气味相投，如果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那么尤其如此。该党与俄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不把外国主子的垂青当作一种纯粹的幸福。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非常清楚，过去他的党曾被贴上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其含义是对德国利益漠不关心，因此吃过苦头。他决心不让这类事重演。尽管英国一些大臣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频繁，但后者还是不停地要求参与德国政府的工作，虽然在德国崩溃以后，他们一直是灰心丧气的。^③他们的纲领除了提出推广国有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来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外，还对祖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要求保证供给足够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占领区或双占区的行政事务，要求

停止解除武装，还要求德国人参与管理钢铁和煤炭工业。②他们尤其要求废除古领区边界和重新统一德国。对这类达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种种现由来反对，但谁也不能把这看成是不合作。共产党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原因是俄国人无意容忍他们提出这种公开批评。同时德国的反俄情绪发展得那么快，以致任何同俄国人公开接触的党派，其行动都极为不便。在西部占领区，他们在马克斯·赖曼领导下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惨淡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而在东部，工人们却如此地偏爱社会党人，以致俄国人（传说是受谢尔盖·图尔帕诺夫的鼓励）急切地想加以利用。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运动据说在 1945 年秋就已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开始了。③在俄国人的鼓励下，他们在柏林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2 月 23 日号召合并并建议其他占领区中的这两个党接受联合纲领，207 分管党内主要机构，以便共同协力。①谈判秘密地进行了两个月，除了奥托·格罗提渥以外，社会党领导人对这种主张都抱冷漠态度。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工人阶级的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人（带有某种正义感）认为，在 1930—1933 年，由于缺乏工人阶级的团结，致使纳粹攫取了政权。据报道，图林根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过：“纳粹分子给我带上手铐，押到柏林……的一位共产党员同志面前，我自言自语说，”为什么需要纳粹分子把我们带到一起呢？’”②此外，格罗提渥是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领导人，而不是全德的领导人，他可能会想到，一旦德国统一了，他的党内的主要职位将会落到别人手里。他可能指望，新党将更多地具有社会党的性质而不是共产党的性质。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执行人在他的劝导下，于 1946 年 2 月 27 日追随共产党投票赞成两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由格罗提渥和共产党人威廉·皮克共同领导。新党的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来自西德的代表。③但是西德当局对他们实行联合的措施有所怀疑，当柏林的社会党人于 3 月 1 日召集群众大会声明反对联合时，当局的怀疑更深了。因此他们不承认西德的新党，或者拒绝发给他们的占领区内出席执行会议的代表所需要的通行证。一批颇有勇气（鉴于俄国人的态度）的柏林社会党人决定在 3 月 31 日组织一次党员表决，得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俄国人却拒绝配合，也不允许社会党在俄管区内活动。西方三个管制区，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票数反对联合，而在莱比锡举行了同样的表决投禁，据说一千六百名代表中只有一张反对票。

这一插曲的结果是实质上并没有提高共产党的威望而把东部占领区的社会党摧毁了，同时在东德与西德之间进一步划出了鸿沟。德国统一社会党精心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组织，有中央书记处和八个部。共产党人掌管了大部分重要职位，常常是党政结合，他们与前社会党之间的均势保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联合前两党间所开展的斗争后来仍在内部继续下去。1947 年期间，共产 208 党开始占了上风。①同时，俄国人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公开表示偏爱。该党成员不仅可以例外地接触官方情报（包括确切的统计，在计划经济中，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们还配给到较高定量的口粮及额外的燃料和衣着，享受特殊的旅行设备，发给汽油和假日工资。有一度新闻纸非常缺乏，而他们的报纸却受到厚待，可以比竞争者刊印更多的版数。不仅象自由德国工会和德国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被用来为党的利益开展运动，而且其他一些政治性质不甚明显的社会组织也同样被利用。和纳粹分子一样，共产党人认为，没有哪一行应置于他们的影响之外。从战后的早期开始，旨在帮助

反对纳粹的各种团体（法西斯主义牺牲者联盟、国家社会主义追随者协会）在东德的生活中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仅使遭受迫害者得到安慰，而且受到感化。妇女被组织进民主妇联，青年被组织进自由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则被组织进了文比协会。相形之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则感到前途困难重重。1945年12月，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巴德戈德斯贝格会议之后，它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赫尔梅斯和瓦尔特·施赖贝尔以及自由民主党的科希因为不愿执行俄国人的命令而被迫辞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凯泽因拒绝合作，又拒绝辞职而受到俄国人施加的很大压力。他自己住在西柏林，俄国人对他无可如何，但俄占区支持他的人却被逮捕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报纸被迫刊登攻击他的文章，直到最后在俄占区内不可能为他再搞什么政治活动时才罢休。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编辑鲁道夫·佩歇尔也被迫辞职，取代他的是一位更顺从的人。但是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却不准解散。俄国人似乎十分想操纵反对党，以示他们对德国人的宽容，同时，他们也可能认为不迫使所有的敌手都转入地下乃是明智的做法。

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46年9月举行地方选举时，德国统一社会党赢得的票数在梅克伦堡占百分之六十九，在勃兰登堡占百分之六十，在萨克森占百分之四十八，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所得票数在梅克伦堡分别占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十，在勃兰登堡分别占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六，在萨克森各占百分之二十（余票根据柏林社会党的命令予以销毁）。10月份在州的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得票四百六十万张，其他两党总共得票四百八十万张。但是票数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在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他们的票数占绝大多数；在图林根勉强占百分之五十，在其他地方则低于百分之五十。在此基础上，他们接着在萨克森的九名阁员中占了五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图林根的九名阁员中占了六名，在勃兰登堡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梅克伦堡的八名阁员中占了四名。五个州中，他们在四个州取得了内政部的要职。^①

这些结果好象还是稳健的，但俄国人的偏爱与强制手段对这些结果伪影响程度，可以从同时在柏林进行的选举中得到说明，柏林全城的选举是在军事管制总部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由四方组成的小组视察投票情况，以便把投票人所遭受的压力减到最小程度。社会党得票九十九万张，在全城二十个行政区内领先。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四十五万四千张，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获得四十万五千张。这次选举的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无疑地使俄国人为之震动。这是他们首次在德国同比较老于世故的公众的自由意见打了一次交道（前一年11月在奥地利，他们也受到了多少相似的震动）。^②这充分说明，一经批评和比较，就暴露出他们是多么不得人心，他们的宣传是多么无能。对苏联军政府的影响越来越深的日丹诺夫派，被巧妙地将了一军，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失败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仔细研究了盟国的方法，对美国人采用的对意见进行典型调查的技巧，尤感兴趣，好象他们设想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施加影响，是因为他仍能更灵活地适应公众的情绪。^③很早以来，柏林市市长一直是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博士担任的。他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他的同僚却认为他对俄国人的愿望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他们在选举获胜后，就逼他辞职，另选恩斯特·罗伊特接替他的职位。罗伊特过去是共产党员，知其底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人认为他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罗伊特一直住在土耳其，所以没有通敌之嫌，但是，他的

当选送到军事管制总部去作必要的批准手续时，俄国人不予批准，此事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后也毫无结果。西方盟国认为第一次选举完全合法，不同意再搞一次选举。为了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困难局面，由罗伊特的副手路易丝·施罗德女士接任市长。

与此同时，1946年夏季美占区的州一级选举②中社会党人在黑森领先（虽然不是占绝对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施托克组织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合内阁。在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赢得了绝对多数，结果其领导人汉斯·埃哈德博士就任总理，他的前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赫格纳博士仍留在内阁任副总理。在符腾堡-巴登，选举结果不是决定性的，民主人民党的赖因霍尔德·迈尔博士继续领导着包括四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四名社会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的政府。美国人倾向于鼓励联合，作为一种促成各党共同工作的办法，以减少削弱各个州政府力量的相互猜忌。

在英占区于1946年9月举行地方自治选举时，基督教民主联盟比社会民主党获得较多的选票和席位。但选举的一个特色是无党派的候选人赢得了一批席位，虽然他们所得的总票数不尽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官员认为这批人的当选是没有政治背景的新来者在提名委员会里所做工作深得人心的结果，但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更多地倾向于挑剔选举制度上的毛病。10月份县一级选举却呈现出不同的情景；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一千一百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前者赢得三千五百十八个席位，后者赢得二千五百十九个席位。共产党人赢得一百三十九个席位，中央党赢得一百九十个席位。1947年州一级选举的结果如下：①选举之后，阿诺德就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欣里希·科普夫仍然在下萨克森州领导一个联合内阁：

在石勒苏益格，赫尔曼·吕德曼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取代了施特策。1946年9月法占区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一百三十万张选票，社会党人获得五十六万张选票；1947年5月的州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各地都占优势。211当然，选举情况并不是在各个州都是可以相比的，但最后结果说明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党。有一定数量的小党派和中立派游离在两个阵容之间，可能为随便哪一个营垒吸引过去。许多没资格参加选举的纳粹分子不会老是受到排斥，以后他们可能加强右翼的力量。此外，上述选举是在战败后反应初现之际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政党的这些支持者由于一时尚未受到这种反应的影响，也许认为隐瞒他们的真实观点是得计的。在西部，的确毫无迹象表明人们强烈希望开展什么社会革命。问题的发展有几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时势变得并不十分有利的话，那里的大多数人会坚决要求民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确实认为党的名称加上民主二字远不止是随波逐流，但党的追随者也的确包括某些不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问题的最后解决也许要由这样一批德国人来决定，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有很多人明白表示他们厌倦政治，不肯从事政治活动或参加任何一个政党。

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

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得忽视人们读的和听的东西。但是，在有关德国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处提到宣传工具问题，即在 1945 年 6 月 5 日的柏林宣言①中有一条，规定除由盟国代表指导背外，所有广播电台和电信设施均应停止活动。在波茨坦协定中唯一涉及该问题的是一条规定：“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②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个并非专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项查禁纳粹书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审议过这个问题，而这项禁令的提出则是无视英美当局将近一年中所实际奉行的政策的。③到 1946 年 4 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宣传报道问题，④但那时各盟国的政策已经确文，因而该委员会除了争论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英美两国政策的如此相似，是由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在德国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排，而并非迫于形势。然而这对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俄国人则更是毫无影响。

第一节 报 刊

212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个阶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①即封闭原来的报刊、由军政府出面办报和批准德国人办报。继《法兰克福评论报》（1945年7月31日创刊）之后，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区批准出版了二十三种报纸，总发行量达到三百七十万份。此后两年间又增加了二十一种报纸。这就使美占区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柏林美管区有《每日镜报》，于9月批准出版，由埃里克·雷格任编辑。对比之下，英国批准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让德国报界人士在英国人的直接监督下工作得稍微长久一些，预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时对于批准办报的依据还存在着争论。美国的观点是，在新闻纸张和优秀的办报人员都缺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中获准创办的报纸数目应该少一点。而且，他们只批准那些代表几种观点的集团办报，希望借此来阻止德国政治家的分裂倾向，使任何报纸都无法只拥护某一政党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让读者听取几种观点，就会促进讨论。美国人赞成各报之间的竞争，于是其他报纸随后便应运而生，以1946年4月创刊的法兰克福《最新新闻》为开端，这些报纸在许多城镇创办起来。但在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除非给予德国人实践的机会，否则即不可能指望他们恢复民主政治的习惯。在占领当局掌握着那么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在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讨论；而如果各政党没有自己的喉舌，讨论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任何地区都按平均五人一份来规定报纸的总发行量。对任何申请办报的政党，都根据对其实力的估计给予一部分发行量（在1946年选举提供出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后，作了必要的更动）。对于这种办法来说，唯一的例外是，有些农村地区，看来办一份以上报纸很难不亏损，因而在这些地区准许发集团办报执照。现在看来，美国的政策比英国的政策高明一些。其高明之处在于，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没有太多的狭隘观点，总的说来报纸的质量比较高。

第一份获得英方许可证的报纸是1946年1月8日开始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伦瑞克报》。^①不久其他报纸也相继得到批准，到这一年的仲夏已办了三十五种报纸。^②4月份，英管区“官办”报纸《柏林人报》为《电讯213报》所取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快达到将近五十万份，成为该市一家最大的报纸。其编辑阿尔诺·朔尔茨恰巧是该报所取代的“官办”报纸的主要撰稿人；该报曾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那时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艰苦斗争之中）。

苏管区的主要报纸仍然是《每日评论报》，但每天至少出版七份各自独立的报纸。在苏占区，各政党获准办报，但只有统一社会党获得畅通无阻的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结果是水平不断下降。直到1947年，俄国审查人员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对每一份行将出版的报纸进行审查：甚至在取消这种审查的时候，还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出关于处理新闻报道的严格指示。1945年末，经法方批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报《信使报》，由《法兰克福报》原驻巴黎的一位记者担任编辑。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革德国报刊并提高其水平，不仅编排方式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是完全过时的，特写几乎没有，而且编辑部评论与新闻之间的界线也非常模糊。据信，这种情况曾帮助纳粹分子控制德国

人的思想，因为普通的德国读者不是受到鼓励专从直言不讳的新闻报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习惯于接受夹叙夹议的新闻，因而把偏见和事实混淆起来。必须把 C·P·斯科特的名言“评论自由，事实神圣”由新奇之谈变成家喻户晓。根据许可证上的条款，要求编辑把新闻单独刊登，并且规定他们不要在第一版登载任何其他东西。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因为素不熟悉而不受欢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现了某种倒退现象，农村地区的报纸尤其是如此。但总的说来，这次改革已扎下根来，尽管有些报纸（主要是有插图的周报）也学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反复灌输办好报刊的原则，曾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和讨论。

当获得许可证的报纸开办的时候，原来的意图是要对报纸进行仔细的监督，如果发现任何被认为有害的言论时就予以申斥。许可证的条款允许实事求是的评论，甚至允许对盟国政策进行合理的批评，同时又要求领有许可证者不得发表任何中伤污蔑盟国或妨碍盟国政策实施的文章。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实行严密的控制。虽然尽量任用会讲德语的官员来负责报界工作，但这样的人太少，并且还有许多别的任务，不允许他们对各种报纸每期刚 214 出版就及时阅读。即使他们确实发现了某些问题，在未同所在部队首长商量之前，甚至也许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总要到出版好几天以后才能对那些冒犯当局的文章进行评判，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评判的结果也差不多总是只对被告告诫一下就轻轻放过。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度量也许比不上英国人，但无论在美占区或是英占区，很少吊销许可证，就是吊销也只限于几个星期；大部分受到这样惩罚的是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对当局的冒犯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是蓄意的。

这种不加严密控制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取之处的，其理论如下，德国人只有通过无拘无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运用自由（评论家们认为许可证的条款本身约束得太死，那他们一定是听信了德国人的抱怨而没有阅读德国人的报纸）。但是德国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国的观点来撰写的新闻稿件，这一事实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国人尊重客观报道的标准，使盟国认识到拥有它们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当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政策到 1946 年年中左右得到彻底贯彻时，在大多数宣传工具中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齐头并进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给予德国人适当的、越来越多的自由去办他们自己的报纸、电台等等，甚至把负责批准的任务也交给了德国机构。^①另一方面，使德国人办的报刊、电台与盟国直接控制的报刊、电台竞争。后者有意避免使人觉得太象进行宣传：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说话比较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消息来源、人员配备和新闻纸张供应等方面也享有优先权。这类报纸中首先出现的是《新报》，由美国主办，从 1945 年 10 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周出三期，而由于新闻纸张缺乏，德国人得到批准的报纸仍被限定每周出两期。该报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而是放在新闻特写和关于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背景知识方面。因为出版这些官方报纸的另一个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国人对外国的无知和误解——纳粹留给德国的遗产之一。丰富的内容是这些报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尽管德国人无疑是有保留地阅读这些报纸，但这些报纸还是逐渐受到欢迎。

英国办的同类报纸是《世界报》，1946 年 3 月在汉堡 215 开始出版，当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报》成为一份比《新报》更侧重新闻报道的报纸，因而它除了采用路透社所发消息

外，还从伦敦得到特殊的新闻供应。它很成功地达到了一百万份发行量，按德国标准衡量这是异乎寻常的，尽管这个数字后来下降了。该报的主要困难是物色一个第一流的英国新闻工作者，这个人既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愿意按照管制委员会内部等级制度的规定领取薪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英国的政策是在柏林和伦敦决定的，报纸却得在汉堡出版，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无法解决了。不仅英方主持办报的人员缺乏编辑才能，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英国的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是，虽然《世界报》被认为是阐述英国观点的，但它常常阐述的只是德国编辑人员所想象的英国观念，这就必然造成麻烦。该报有一个方针是毋须始终支持占领国的行动，但德国编辑人员当然感到难于掌握分寸。如果经济形势的压力并未使高级英国官员无暇把对于该报的一般口头支持转变为落实到物色人员和调整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难令人置信这个问题竟会无法解决。问题还在于人们未能理解编辑部把政策化为社评不能仅仅根据临时的指示行事，而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尽管如此，该报还不失为英占区最好的一份报纸，对德国报刊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另一种英国的官方刊物是画刊《世界一瞥》，在英国出版（因为德国缺乏纸张），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种是模仿《读者文摘》的《新作品选》，也在英国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导。美国人在德国出版了《现代》画报月刊和文学双月刊《美国评论》。所有这些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向德国人提供客观的报道和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了使刊登的宣传材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只给它裹上一层恰到好处的“糖衣”。与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种类和价值更为悬殊的德国刊物（至1946年底，美占区有二百五十五种）。由于对读物的需求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都有销路，但因纸张缺乏，随之需要对发行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报刊的价值从未受到真正的考验。这样一来，在申请发给一种新刊物的许可证时，就有一个216微妙的问题向盟国提出。不批准就有审查专横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种新刊物又意味着原有刊物的发行量要减少，而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这个问题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凡申请出版的报刊看来已经够多或者申请者的背景并不很硬的，则一概不予批准。

占领区边界的划分情况使得苏占区拥有德国的纸张和造纸材料的生产能力过大，而法占区也拥有与其人口不相称的资源。美占区情况较差，英占区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学药品或亚硫酸纸浆的产量方面，纸浆产量只相当于全德供应量的百分之四）。而且，造纸厂也象其他工厂一样，由于缺乏必要的原料，特别是缺乏煤，都开工不足。1946年5月，英占区一百七十家造纸厂中实际开工生产的只有四十家。克莱将军提出的经济政策①排除了向国外大量采购纸张的可能，而国外也是供不应求。②当然，报纸无论如何不是纸张供应的唯一竞争者，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定量供应卡、竞选传单、小册子、商业单据和无数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给，甚至包括肠衣和烟卷也要用纸。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意识到现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纸张。人们可以轻易地说，由于限制报纸每周出两期，③每期出四版，限制书籍每版印五千册，宣传工作所应得的纸张配给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的纸张配给也是很少的。无可否认，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纸张的人，使无法扩大发行量；然而这种“黑市”纸张绝大部分是数量少而规格不一。因此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不考虑各种纸张类型，不考虑配料及其供应，不考

虑各种造纸厂适合于制造何种纸张以及种种类似的因素，而空谈“纸张”本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谈。

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占区于 1945 年 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④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217 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 1946 年 10 月和 1947 年 1 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 1949 年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

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①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敏感。^②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象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说；无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

1946 年 8 月 20 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 218 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将军回答说，他愿意并且赞成停止“这些诽谤”。^①在表示了这种少有的和解态度之后没几天，库罗奇金将军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协调委员会还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直到 10 月 12 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第四十号指令中对德国报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②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章：（1）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2）散布谣言，旨在分裂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3）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4）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

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①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会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 219 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 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①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 1948 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①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 年 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1946 年 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 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①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②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

送。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 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 1946 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 1933 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①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 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①有趣的是，当美国人也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移交时，他们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看来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已在德国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很早开 222 始就允许它有评论自由，这种自由常常使美国人震惊，并引起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后来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正如它当初被说成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一样，这一事实表明它相当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在预示政治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姑且不论）。在移交给德国人管理的后期，英国管制官员担任德国理事会下的第一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为任何别的占领区所未有。

本来的意图是，为了适应西北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这一情况的变化，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来向德国人宣传英国的观点。由于对德广播节目无法使全英占区都听得到，1946 年便作出安排，让它使用东弗里

斯兰的诺尔登发射机，这个发射机原来是为纳粹对外广播而建造的，后来为英军广播网所使用。①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经验表明，各地听众都愿意收听最近最强的电台，除非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电台的可靠性。总的说来，四德各广播电台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听众的信任。②

第三节 书 籍

德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籍之国。但当占领开始时，德国却是书籍奇缺。许多书籍已被纳粹销毁，其他许多书又不准进口。书店、图书馆以及私人的大量藏书均被炸毁殆尽。一个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补。但也存在着是否应该更加扩大这个空白的问题。对纳粹书刊怎么办？

英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作出了一个决定，²²³ 反对拟订禁书目录性质的东西或纵容任何形式的公众销毁。这种行动只会引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鼓励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使禁书全部销毁。另一方面，人们自然不肯让所有纳粹书刊都保存下来，等着去培育反动派。即使思想不能扑灭，但总可以使之易于或不易于传播。主张对反自由主义的书刊不作任何取缔，肯定是自由主义过了些头。因此早期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纳粹书刊（至于哪些是纳粹书刊，未作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规定，而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去做选择和销毁的工作。

这项政策在 1946 年 5 月受到了冲击，当时内政管理局凭着它对非纳粹化的职责，注意到缺少法律规定，于是根据俄国人的倡议拟定了一项法令来加以补救，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令。^①该法令责成市长、地方当局、书商、图书管理员、中小学校长，甚至私人收藏者在两个月内向占领当局交出“一切含有纳粹宣传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杂志、报纸合订本、纪念册、手稿、文件、地图、计划、歌曲集、电影片、幻灯片（包括旨在给各种年龄的儿童阅读的任何东西）”，^①以便销毁。但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执行这项法令（这种结论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看来证实了他们的最坏的猜疑）。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强化原先的政策，派新闻管制官员去视察一下据悉存有图书的主要场所罢了。这些官员一方面保证这项法令多少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不必要地销毁书籍。这整个行动遭到了批评，理由是这样做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只会有害；但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小害不得不同英国人断然拒绝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权衡。关于法占区和俄占区如何执行这一法令的情况，没有材料可资介绍；但是，如果俄国人设法去销毁更多的材料，那才是怪事。

在美占区和英占区，要求书籍出版商也象报纸业主一样申请营业许可证（到 1946 年 6 月，英占区有一百八 224 十五家）。他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能使用的印书纸张数量，由管制当局根据他们所订计划的规模和重要性按大致的比例进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每版限制在五千册以内。书籍出版商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出版书籍，但在营业许可证中告诫他们不得出版鼓吹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不得出版煽动反抗盟国或挑拨盟国之间不和的书籍，等等。出版带有上述倾向的书籍要受到吊销营业许可证的惩罚；如果他们对有些问题拿不准，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国当局审查，大多数书籍出版商似乎都极力希望把稳一些。结果，没有一份许可证被吊销，因而让书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们喜爱的书籍，似乎也不见得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各占领当局都不会率先冒险这样做，而且，纸张既然如此缺乏，对书籍出版商的数目加以某种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著作活动，出版的书籍也不很值得注意。

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明显办法是翻译英美的书籍。但是，只要德国马克

不能兑换外币，向作者支付版税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马克不能兑换成英镑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不得在德国积聚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理由是这种积聚在马克可以自由兑换时将造成额外的紧张）。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英美两国政府用美元或英镑有选择地向一些挑选出来的作者购买一定年限内在德国出版他们书籍的权利；然后又把这些版权以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卖给德国出版商，而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国书籍的选择工作是在伦敦的一个小型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进行的；鼓励德国出版商提出他们愿意出版的书目。选定的书籍决不是局限于政治题目。大约有二百种英国书籍就是这样出版的，美国书籍的数量更大。很遗憾，一些本来最有用的书籍的德文版权被卖给了瑞士出版商，无论出多高的价格用英镑向他们购买，他们都不肯放弃版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从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①不然的话，这项计划是会执行得使人人都感满意的。当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者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书籍被认为不适宜于包括在该计划之内。

看来俄国人无须为批准出版营业许可证操心。他们把纸张分配给他们所宠爱的出版商，同时讲清楚，出版异端书籍将意味着给出版者带来麻烦。他们采用这种办法，无疑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英美的政策是从长期占领这种设想出发的，在此期间应让负责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机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随后可能出现的反动潮流。

第四节 其他宣传工具

管制的范围还扩大到剧院和音乐会，只有那些忘记了第三帝国的音乐和安排演出的窍门所起作用的人才对此感到惊奇。英美的原则是，给剧院经理或剧场所有人发营业许可证，以迫使他们演出的性质承担个人责任。实际上现在很难想起有过查禁某个节目的例子，虽然酒吧间的歌舞表演常常接近这个限度。然而要在这个领域内非纳粹化是特别困难的，而且产生了以富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艺术与政治无关，但同时又很难容许那些曾受纳粹宠爱的人若无其事地继续登台表演。这方面，时间最能医治创伤。但是这一部门的管制官员的工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帮助歌剧院和戏院从当局得到建筑材料、燃料、额外的口粮、通行证以及无数其他补助，要是没有这些，剧院是无法演出的。根据一项与选择书籍相类似的计划，引进了许多外国剧本。由于演出者缺乏材料，而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这就导致人们强调象格鲁克、汉德尔、莫扎特等这类作曲家的那种比较古老、比较朴素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虽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却似乎乐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在文化活动方面，法占区由于法兰西话剧团、香榭丽舍芭蕾舞剧团和巴黎交响乐团的巡回演出而显得具有特色。

在电影方面，由于取缔大部分引起非议的纳粹影片①而造成的空白，通过上演带德语字幕或德语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补起来了。德国人对这些影片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够的既适合德国观众口味又可望增强盟国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万国影片公司（UFA）在巴贝尔斯贝格的主要制片厂都在俄国人手里，而西部地区仅有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制片厂都在慕尼黑市外。这种情况再加上缺乏资金、原料和各种设备，意味着德国影片摄制工作进展缓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区拍摄外景制成的，1947年1月开始发行。英美当局联合拍摄每周一辑的新闻纪录片《银幕上的世界》，强制上映。

在1945—1946年之间的冬天，一些地方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在英占区，开始把过期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放在任何一间近便的房间内，让群众进去阅读。这种安排深受欢迎，因为德国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闻，报纸（特别是外国报纸）又很难弄到，而且很多德国人也乐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间暖和的房间里。1946年3月在柏林临时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英国”的展览会，目的在于影响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社会党的论战；①前往参观的人数表明这种展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上面两件事为起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要在全英占区一连串建立六十个新闻中心，附设阅览室、图书馆以及用于演讲、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会的各种大厅。这种设想做起来就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寻找房舍，进行整理，在德国建立一个供应中心，以及安排报刊、书籍和展览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费时间。但是到1947年5月，已办起了六十个这样的中心，都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桥梁”。这个数字后来必然要减少，但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联络的基础。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做法，到1947年7月建立了二十三个新闻中心。俄国人也不甘落后，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开办了一个堂皇的“俄罗斯文化之家”。

第五节 效 果

上述种种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德国人成为一个见识广博、头脑冷静的民族，把这点记载下来是会令人愉快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些年中继续相信最荒诞无稽的谣言，继续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抱着极其错误的想法。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们认为占领国故意要压迫德国，而是许多人以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德国”竟如此令人憎恶。很自然，他们会批评盟国无力供应更多的配给物品，但是他们拒不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这种匮乏却是纳粹的野心所造成的。象施兰格一舍宁根博士那样的资历较深的负责的德国领导人也许会证明，要不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运来了食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就会死于饥馑。但在英国人发现一般德国人非但看不到他们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却只是谈论饥荒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供应曾要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①1946—1947年的冬天，象“世界粮仓是充裕的”这样一类大字标 227 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刊上，时至今天，盟国为拯救灾难所作出的那份贡献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②这就引起了种种怨言，说盟国新闻处无能。

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的十二组图片中就有三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①这里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

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说教，其唯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1946—1947年冬天刊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团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第十五章 教 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①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②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 1945 年 10 月 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在汉堡，1943 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①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②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③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学校膳食制度，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

使每餐只有一盆汤或一块巧克力，那种终究能得到点东西的心理作用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教师，因为过去纳粹强调对青年进行思想灌输，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区几乎有一半的教师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职了；在英占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师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审查期间，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人失业。①据说法国人一开始走得还要远，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师，虽然其中若干人后来又获准返回学校，担任较低的职务。②总的后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师从年龄和教学 231 方法上来说，或者是旧时代的遗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受教育的、未经多少专门训练的年青教辅人员。在美占区，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以上年过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员未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教学工作。③尽管如此，每班学生的平均数却是六十人，在英占区则是七十人。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学校里，一名男教师要对付一百四十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本书，而且是借来的。④最后，当然没有教科书；几乎所有纳粹时期的教科书都不合适，而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科书即使不太陈旧也好不了多少。⑤好象书籍出版工作的困难还不够多似的。⑥为了出版教科书，还要增加一个编写合适的课文的向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占领区内的盟国人员做出了奇迹：东部占领区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国人自己干的。英占区教育部门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员的配备都是为了进行监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实证明许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员必须负起广泛的责任，有时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长的人选问题。在英美两个占领区，教育部门是管制工作委员会所辖各部门中地位较低、名声较小的一个部门；除非是既有胜任的资格又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愿到教育部门工作，正因为这样，教育部门的人员在胜任称职、品德高尚和富于理想等方面，反而超过一般水准。①到 1945 年底，英占区已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学校开学，学生人数达二百五十万；到 1946 年 9 月，在学人数达三百一十万。有一部分学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为有许多学校必须实行二部制：②有时候儿童们甚至还要等着轮流使用一枝铅笔。其他占领区的进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学校于 1946 年春开始复课。至于大学，英、美当局原来的意图是等到非纳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绪后再开学，但是 1945 年夏俄国人着手使柏林大学复课，法国也于此时使提宾根大学复课，其余两个占领区也就跟着照办：格廷根大学于 9 月复课，海得尔堡、埃尔兰根、马尔堡三所大学于 11 月复课。①教师和教材可就不 232 是那么好办了。俄国人在六所大学开办“师范部”以培训师资（备有供初等学校毕业生就学的专门设施）：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倾向于按照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邦实施的制度开办专门的师范学院。②为了迅速提供教师，在筹设短训班方面显得大胆创新；英方规划要在三年内培训一万五千名师资。在英占区设立了负责编印教材的德国中央咨询委员会，于 1945 年 12 月着手工作，到 1947 年底共计编辑出版了一千零五十万份教材。③俄占区由于拥有丰富得多的纸张资源，1946 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教材。④法占区采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纽约德侨委员会编印的教材，到 1947 年年中。已经足以保证每个儿童有一套书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区的工作进展最慢，那里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负责的；到 1947 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万份教材，其中讲现代史或政治的书一本也没有；⑤直到 1948 年底，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⑥在德国，教师一向比教材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在没

教材的情况下。师资的性质意味着灌输的观点是老一套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的），要不就完全回避主题不讲，即使这样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事件无法讲授。在英占区，1945年11月创办了一个学校广播网，颇有成效，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英美工作人员都是同他们的德国同事们（每每是招聘来的）并肩工作，不是以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双方无分男女，都为了一个共同任务而工作。给予德国人的实际帮助开始减轻他们的怀疑，从而使个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这一点在随后把教育责任移交给州政府的时期证明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占区，这种移交是在1946年12月1日开始的，美占区也差不多同时移交。^①此后盟国的教育官员只担任顾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完全无私的性质得到了公认，使得德国人很愿意听取英美顾问的意见。此333时使用“砖头和灰浆”的阶段也将告结束；中心问题已不是补充足够的师资和设备，而是考虑怎样组织教育和应当给儿童教些什么。正是部分地由于承认了这一点，英占区当局对教育部门的体制重新予以考虑，于1947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顾问，他可以同军政府副总督直接联系工作，尽管在名义上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其他占领区似乎都没有类似的任命。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同时通过党的渠道继续予以控制，这样德国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他们怎样抉择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法国人对教育严密控制的时间持续得较长，从而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应归因于法国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

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发生的主要争论并非由盟国引起，而是在德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33年以前，德国的教育实践总的说来颇力落后，但同时也有一些个别的最先进的改革试验。盟国的贡献在于把其他国家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经验提供给德国。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教育事业的各个主要部门相互协调，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便使儿童们在受过共同的初等义务教育以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才能选择合适的中学——实际上这同英国1944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私立学校同这个学制的关系，甚至私立学校本身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与这个总的争端相联系的还有下列次要问题：（一）统一的学制应当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还是属于各个教派的；（二）允许专业化到什么程度；

（三）古典语文在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教育是否应当免费。在德国享有最高威信是完全中学，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一向强调古典语文的学习，但是英国从阿诺尔德时代以来，文科中学的目标是培养见识广博的和诚实的公民，而德国的中学教育则侧重于谨严的治学素养和对于某一学科的详尽知识。^①增设讲授科目并未能影响这一普遍的治学方法，外界的观察家从中看到了德国人之所以缺乏切合实际的判断能力，缺乏内省以及过于注重理论的基本根源之一。

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制度在俄占区得到最充分的234承认。1946年夏，俄占区每个州都颁布了内容相同的“德国学校民主化”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十二年的综合中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八年，接下来四年是在三种类型的中学（大体上分别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全日制职业学校、部分时间的职业学校）选读一种。一切教育均属免费。废除所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但是允许教会保有必要设施以便在课后进行宗教教育，费用由教会自理。虽然课程侧重于“现代的课目”（从十年级起俄语列

为必修课），选读文法学校的儿童仍有可能修习拉丁文。计划是有雄心壮志的，因为其目标在于提高所有儿童的初等教育水准；在这个阶段如果学得不好，接下来四年的提高阶段将不足以使天赋较高的儿童达到大学所需要的水平，整个教育水准将因而下降。在战后的困难条件下实施这一计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那些对此不抱同情的批评家们则可能报之以各式各样的非难。但是这一措施的确一举结束了一向统治德国教育的阶级差别。

法国人实施了类似的改革，其中初等教育占六年。法国人忠于其反教会的原则，废除了所有教会学校，因而与天主教会发生了冲突。他们建立了师范学校类型的中等学校以培养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法国人的政策是把组成西南部德国的各个面积不大、基本上彼此独立的州置于法国影响之下，按照这项政策，占领当局确定法语为必修的第一外国语，并十分强调灌输法国文化。

俄占区和法占区的学制对盟国管制委员会 1945 年 11 月 23 日颁布的有关教会学校的指令几乎不予考虑，这一指令“要实施到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并且决定性地表达其愿望时为止”。它以谨慎含糊的辞句规定：对于涉及依靠公共基金的教会学校的问题，以及涉及那些由各种宗教团体维持和领导的德国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问题，有关的盟国当局应当在各自占领区颁布适合当地传统的暂行规定。它应当考虑到德国人明确的愿望，并符合有关教育管制的一般指令的要求。……凡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学校都不应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可能性，也不得强迫儿童上宗教课。^①英美当局按照这一指令都组织了公民投票来了解家长们的愿望。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普遍要求设立教会学校，只有某些大城市例外，特别是汉堡。罗马天主教会极力支持办教会学校，路德派新教人士亦然；科隆市的红衣主教弗林斯甚至于主张教会有权过问师资培养和起草教学大纲。家长们可能由于对纳粹把学校改成不信教的做法记忆犹新，也倾向于教会办学。另一方面，一般教师，忏悔教会和某些天主教神甫赞成不要由某一教派办学，而是把宗教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理由是教育制度应以团结全体人民为目标，而不应使教派的分歧加剧和永久化。

英占区和美占区把管理教育的职责移交德国当局，这意味着应当由德国当局而非盟国去决定各该地区未来的教育制度。每一州都有权自行安排，各州之间问取得一致的进程证明是缓慢的。大多数州都朝着统一学校的方向有所前进，虽然没有哪个州实行象在东部那样的教育制度。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唯一补充指示是 1947 年 7 月（这时管制委员会几乎已经不起作用）达成协议的十条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则有：对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实施全日制义务教育，部分时间的义务教育实施到十八岁，其中小学为六年；要求组织中小学课程衔接起来的综合教育体系；规定不收学费，教科书免费，对继续升学而经济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规定师资宜在专门的师范学院进行培养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培养。象在许多其他领域里那样，管制委员会并不要求它所作的基本决定在进行其他可行的工作之前就予以贯彻实施，而只是想在各个占领区已经明显出现的趋势之中找最大的共同因素。

德国教育界面临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大学教育。德国的大学曾经是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但是它们也曾经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心，这一点却没有象前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德国的大学曾经是实施学阀统治的场所，在

大学里只有教授才有权授予其他人以讲学权，只有教授才拥有对出缺的教授席位进行任命的权利，尽管这方面要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控制。大学的学习方法鼓励人们专攻狭窄的领域，以培养学者而非培养有广泛文化素养的人材为宗旨。象马克斯·韦贝尔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为实施这种极端专业化的制度进行辩护，虽然认为这必须作为“精神贵族们的事务”而继续留存。^①最后，过去德国的大学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奖学金制度，因此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能上得起学的中产阶级学生所享有的特权；本世纪中，其他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那些具有接受大学教育才能的人受到大学教育，而在德国几乎看不到相应的措施。进入大学的关键仍然是完全中学所发的毕业证书；这样就为那些只上过其他类型中学的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纳粹主义浸透到大学的各个方面，盟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这一影响。俄国人扫除纳粹影响的办法是把所有大学教师解聘，只让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恢复任教。法国人行动迟缓，接纳了因与纳粹有牵连而在其他占领区被解聘的一批教师；在美因茨（法国人在此重新开办了一所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关闭的大学）有百分之十的教授是从其他职业界招聘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把名声最坏的教授解职，而把其余的人交给德国法庭去处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于那些被纳粹指控为民主分子而遭解聘的教授拖延了他们复职的时间。这种方法当然不会导致把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撤职，更不会导致把基本上持有反对民主的政治态度的人全部撤职。治学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那些曾经同纳粹分子进行过斗争的教授们也看不到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就行了。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人们争论说，如果试图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就会遭到德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招致对思想自由进行干预的种种责难，而且随后更可能产生反作用。最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只把那些罪恶昭彰之辈撤职，而对其余的人力求逐步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物色堪宜于担任大学校长这样关键职务的人选。然而这种权宜之计有其必要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问题的根深蒂固已到什么程度。

接着对大学的教学和招生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英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要让德国人了解，但不强加于他们。虽然改革的主意使某些教授讨厌（这在其他国家学术界也并非全然没有先例），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的脑筋至少开了窍。这个建议的方针终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这是说在1948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英占区大学教育提出改革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为德国合作社运动的领袖，其他成员有四名教授，一位新教徒，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一位工会工作者，一位妇女，还有瑞士和英国的教育家各一人（后者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包括下列各项：发展通才教育以补（而非代替）传统的专业教育之不足；改革大学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组织，使之与周围社会有所接触；促进学生的集体生活以弥补由于旧的学生会暂时消失所造成的缺陷（原来的学生会以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而臭名远扬，在盟国管制期间受到禁止），还提出建议，扩大招生来源（虽然没有达到俄国人所达到的那样程度，俄国人的目标是要使三分之一的大学失来自工人阶级）。规定大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服务。这样彻底的改革计划使德国人感到困惑。虽然对所建议的某些次要改革项目采取了一些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启发思考——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结果可能要到将来才见分晓。

英美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组织交流和互访。早在1946年，仅在教育部门就组织了一百五十名德国人去英国参观学习和参加各种学程的讲习班，而去德国访问的英国人也有一百人；以后几年中这种活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1946年12月，英占区的德国居民首次参加在威尔顿花园^①——这是扩大战俘背景情况介绍的中心——举办的讲习班，以后被送去参加这种讲习班的人日益增加。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来英国进行几天或几个月访问的政界人士、警察、医生、律师、牧师、新闻记者、青年领袖、妇女、政府文职官员、市政官员、无线电技术员，学生等团体以及其他人士等。这些数字也不包括美国人所作的相应努力。当然，不能指望把所有的来访者都争取过来支持东道主的观点——当你想到德国人也被送到莫斯科访问时，这也就够令人快慰的了。但是在西方组织参观访问的基本原则大多是使来访者增长知识和经验，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在英占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即使在占领初期有过更宏伟的想法，要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但很快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们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在教育当局的推动下，通过说理和示范来进行实际的说服教育。我们在回顾过去所作的种种努力时，不管其最后成效如何，很难不对那些有关人士的目标和动机表示敬意。238 至于谈到成效，凡熟悉德国情况的人，都会看到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和工业界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对民主思想仍然格格不入。在教育界本身，仍然有非常多的狭隘的反动传统继续在起作用，甚至盛行起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产阶级的事，这个阶级现在感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教学把知识与智慧混淆起来，而不善于培养判断能力和激发首创精神。但是印象已经形成。问题依然是那些已经意识到改弦更张的可能性的人们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和巩固，或者终于不免为一股反动浪潮所淹没。毫无疑问，如果更多地依靠直接行动，似乎收效更快。但是法国人却因此招致强烈的抵制，而美军企图对其占领区内的青年灌输民主方法的大胆计划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俄国人所完成的改革虽然不大可能会被完全推翻，然而他们为取得这种成就所采用的方法却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在考虑俄国人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后者不可能不对教育制度有所影响。这里，象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了西方盟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教育改革要以社会改革为前提，而社会改革又要以加强民主精神最强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为主旨，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有重大的切身利益关系。……

德国的教育问题，犹如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把德国的再教育当作整个社会改造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魏玛共和国徒劳无益地试图把民主的理论移植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有势力的分子对民主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个教训应当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英占区进行再教育的成效……最终要这样来衡量：看看通过再教育给德国人灌输的思想使社会制度的性质能起多大程度的变化，看看德国人对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先进思想的相互关系的概念接受到什么程度。^①

在西方国家占领区中，有些人声称上述观点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决不能说教育最终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应当认为正是教育才有力量成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当然，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是过于简单化了，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关于这

些问题的最新思想并不赞成把教育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在儿童中培养同他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特征、态度和习惯不是改造世界的办法。每一种新的宗教，每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必须首先争取到一批成年的追随者，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文化核心，使他们的后代在这种文化的框框内茁壮成长。……如果有些人要想改变我们的传统，而且怀抱着能够自觉改变传统的希望，他们这种希望虽属乌托邦式的但或许还有可能实现，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聚集足够多的成年人，跟随他们一起对我们深受文化浸染的传统态度稍作改革。对于那些想把其他社会某些进步传统移植进来的人来说，上述论点也同样适用。……成年人要这样转变态度，进展是缓慢的，而实现这种转变更多地依靠有特殊才能或贤明的个人，而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教育计划。^①

第十六章 两种积极的影响

工人与教会是历来反对纳粹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态度对新的形势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两方面的情况。^①

第一节 工 会

俄国人和西方盟国都注意到促进工会活动是可取的。1945年6月10日，俄国人宣布任命一个八人临时委员会来照顾柏林工人的利益。^①就在第二天，该委员会自行宣布组成自由德国工会，这个团体终于证明既不自由，也非一般所谓的工会。7月10日，俄占区的工人受命在“自由工会”中团结起来。波茨坦协定中有关政治与经济原则的第十段写道：“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②盟国管制委员会首次通过的几项法律中有一项是解散纳粹的劳工阵线，给予工人组织起来的自由。

有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立即出现，那就是组织一个单一的工会并按地区建立分会呢，还是按不同的工业系统组织许多工会。俄国人本能地采取第一种解决办法。果然，在俄占区建立起十八个附属工业工会，并允许这些工会推荐出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中的半数委员。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地方工会。它由各个工厂的小组组成，通过地区及州委员会而至自由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工业工会推荐给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的人选，同时由大会本身任命其余的委员。但是，正如在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情况那样，从最低层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民主体系，其面貌是非常使人迷惑的。自由德国工会原有的职员一开始都是指定的，甚至连民主选举的幌子都不要，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随后要经过一道表面手续，即由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来确认他们的职位，但这是一种预定的结果。各工会不允许掌握自己的基金。实际上自由德国工会是一个与政治统治者密切关联并由中央指挥的组织。其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占领区内的工人，同时却蒙骗工人，使他们认为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有发言权。因此，它比德国劳工阵线几乎没有什么进步。^①在柏林，自由德国工会想建立一个统辖四个管制区的单一组织，但意见分歧很大，军事管制总部未能批准它的章程。

西部占领区的发展受到反对东部占领区做法的反应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们也受到1933年以前的工联主义印象的影响，当时的工联主义运动分裂成三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自由”或社会主义工会，一个是基督教全国工会，还有一个是民主的或“自由主义的”工会。这种妨碍共同241行动的互相竞争对纳粹分子有利。因此，那个时期的幸存者很想从这个教训中吸取经验。他们有些时候曾经设法保持一个地方组织的骨干，使他活动下去，并在德国崩溃后带头重新开展工会运动。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工会运动必须团结一致，而其必然结果是工会必须超然独立于各政党之外。^②某些政治右倾的人不喜欢这种政策，他们一方面怕自己的党会失去以前来自各个工会的支持，另方面怕单一的工会运动可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利用。但不管怎样在最初几年里，这些疑虑就消释了。

英美当局从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出发，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由各地的工人自发地组织工会，美国人实际上想从一个个工厂做起，而英国人则允许“任何一群在就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工人”^①来组织工会。按照这种想法，英占区组织工会的进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称是代表一批工人说话的某个人或若干人向军事管制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把这批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会，明确规定希望从哪些阶级吸收工会会员，宣布该工会的宗旨和已经拟定的章程，还要确定组织工会的区域范围。第二步是：批准后，工会组织人按计划吸收会员，筹集捐款，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临时章程。

第三步是：要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按新章程的规定重新选举。^②

这些规定旨在防止少数精明强干而能说会道的人获得支配工会运动的权力，从中渔利、达到个人自的。要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德国工人对民主程序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从一个厂的情况就可以了解。盟国官员在这个厂里发现选举的结果与众所周知的许多工人的愿望不符。他们调查了有关投票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只看在进一步追究之后，才发现选举的组织者事先在选票的空白处填上了候选人，而并未向投票人解释可以另选别 242 人。没有哪个德国人看出这有什么毛病。但是，每个工会要在分别进行的两个阶段（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先把计划送呈盟国批准，那就会使进展缓慢，而政界对于这种程序啧有烦言；然而这种做法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所赞成的。

缓慢而稳健的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于想避免从上面强加严谨的框框从而采用允许运动自下而上发展的方法而产生的。由于各州工会组织机构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形式，因此不易于互相联合组成较大的工会。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德国人原来建议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单一的总工会——自由德国工会。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人力管理处（多半由劳动部的人员所组成）并不赞成，这种反对意见受到了 1945 年秋季访问德国的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持。莱茵兰当局转而采用这样的办法，即把各个工业系统的全体工人组织成各种工业工会。在汉诺威地区，以地方为基础组成总工会的做法得到了赞助，而在汉堡则认为应把职员和其他一些领薪水而不是拿工资的雇员分开来各自组成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意见逐步协调，于是 1946 年 8 月在比勒费尔德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按区域划分并按职业类别和部门细分的工业自治联合会乃是……具有最高效能的一种组织形式。”在 10 月份又一次召开大会时，英国当局对德国人说，他们欢迎建立占领区一级的工会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并在正式的组织基础上向一切工会开放。^①这就预示英占区内每个工业系统的各个工会此后将逐步合并为十二个组织系统。除公共事业和运输系统外（铁路工人迫切要成立自己的工会），这一合并过程到 1947 年 4 月业已完成，于是第一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会议那时就在比勒费尔德召开，赞成建立占领区工会联合会，选举了联合会的职员，由老资格的科隆人汉斯·伯克勒任主席。这个机构由代表大会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组成。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在理事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理事会由一名主席及每个有选举权的工会的一名代表组成，联合会的经费来源是由能充分支配本身基金的工会提供捐款。

在美国占领区，重点放在成立“办事处”而不是组织工业工会，这样出现的组织多至一千四百个。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成立工业工会的主张，而产业工会联合会则倾向于集中化。一直到关于自由德国工会的争论已见分晓时为止。1947 年自由德国工会在柏林的选举清楚地说明一个集中的组织机构很可能落到共产党人手中。从此以后，美国当局从不鼓励成立集中的组织转而公开予以否定。^①此外，他们在这方面还采取了反对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工会组织的政策，虽然他们同意在 1946 年 8 月成立由一州一个代表组成的非正式的三人委员会来协调全占领区的工会活动。1949 年三个占领区合并后的统一工会组织最后成立时，据说在执行委员会中英占区的代表人数超过了美、法占领区。但是，大规模的组织缺乏经验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还难以肯定，这种

大规模组织已使南部占领区处于不利地位，莱茵兰和鲁尔的工业集中也可能与此有些关系，甚至有关人员各人的品质才能也都有影响。“法占区的占领当局不情愿给予工会任何真正的自由，但被说服在 1946 年 9 月颁布一项命令，允许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织工会，但只能到州一级为止，而“一般工人的”工会则特别予以禁止。各工会组织之间的接触受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鼓励，但世界工联日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它希望夺取工会运动，使之成为谋求统治的一种斗争工具。这就置西方国家占领区当局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不能十分有效地禁止占领区之间的接触，各工会声称希望有这种接触；而占领当局则十分明白它所包藏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西德领导人无愧于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在几次占领区间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做到不为自由德国立会所诱惑，没有中计使谈判破裂。

各占领区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但到 1947 年，会员总数仍然是八百万名左右，而工人人口却已接近二千七百万。^①这种增长对工会运动的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引起了争论。盟国管制委员会在 1945 年 10 月 12 日的第十四号指令中继续推行纳粹的工资冻结措施，虽然承认有 244 必要作某些调整。工会一心想避免再次发生 1922—1923 年那制通货膨胀，对此措施表示热烈欢迎。盟国管制委员会还在 1946 年 1 月 26 日颁布第二十六号指令，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为八小时，每周为四十八小时。不过，大多数工厂总是因为缺乏燃料而缩短开工时间，相对来说工作时间就成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了；同时，即使企业单位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事实上是付不出的），但由于很多交易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工资水平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凡此种种，使得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确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很难发挥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人看来，或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人看来，乃是工会的主要职能。此外，在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协商来确定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是陌生的，因为在 1933 年之前，工资标准就早已通过法令规定下来了。工会一向习惯于依靠强制仲裁的办法求得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劳资双方已事先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种要求，要把工会与正在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就象苏占区内的自由德国工会那样。^①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内，已经为工会会员参加各种咨询委员会（例如非纳粹化咨询委员会）和参加控制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各种临时组织作好了准备。但因害怕它们同国家机器联系得过于密切，害怕重新卷入好容易才摆脱掉的党派政治，从而损害工会的独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在进一步行动上以及在给予工会以一种法定地位上，都有点迟疑不决。这种迟疑不决的原因常常不能为德国人所理解，结果他们对英美管制当局产生了某种不服从管制的情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这同德国在 1919 年到 1933 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厂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问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象魏玛共和国时那样确定该组织

的法律地位，于是盟自管制委员会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的第二十二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①工广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模范协议”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②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③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④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情势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种心情在汉斯·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因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象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根据“模范协定”，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帐目。①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联合决定”在战后已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②

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 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唯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追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

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 教会

因参与 1944 年 7 月 20 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在 1941 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唯一方法。^①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伪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象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1945 年 8 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 1941 年创建的“教会阵线”、“忏悔教会”以及巴代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完整的”教会。后者曾经避免在 1933—1934 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选出一个十二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教会政府”，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局势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作为组织成员的教会都保留其自主权，然而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为代表大家去行动而建立的，其结果是稍胜于一个联合会而略逊 248 于一个教会。

①

特赖萨会议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忏悔教会认为，路德派与国家的联盟对德国新教教义来说是不幸的，应切断这种联系。比较保守的教徒则认为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会的支持。再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教会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费短缺将会妨碍急如星火的许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进行。但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教会经费所依靠的税款，也是由国家征收的。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证明，考虑教会与国家分离还不是时候。因此反而采取了与盟国当局接近的措施，其结果是盟因管制委员会在翌年 1 月的一项决定中继续维持原定的税收安排。

三个西方盟国在各自的机构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务部门来处理同教会的关系问题；在英、美方面，这些部门起初都是教育部门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这些部门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义，所以配备的尽是非宗教人员。美国宗教事务部门的负责人把这一部门的任务规定为：

(1) 不参加教会改组，它只能在内部完成；(2) 保证信仰自由，只要不被滥用；(3) 向教会提供一向由政府给予的方便，(4) 肃清一切纳粹分子，严防在宗教掩护下复活纳粹主义。^①总之，这一部门的作用是实行监督，

而不是给予积极的帮助，这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〇六七号指令的总政策是一致的。俄国人虽然似乎没有建立宗教事务部门，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不迫害教会，也没有给教会特殊的照顾（除了在某些地区，把牧师和医生一道列入粮食配给中的第二类）。准许继续做礼拜，但如前所述，忏悔学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动都被禁止。②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得不到传教的机会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国共产党人施加的比俄国人还要严格的那些限制，缓慢地但是必然地驱使教会与政府当局对抗，于是进一步的压制就接着发生了。然而，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受到镇压，尽管在奥得河以东，德国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会友被波兰驱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兰语做礼拜。249 在英占区，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还以随军牧师同德冈教职人员的接触作为补充。1945 年 10 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其后又在柏林参加一次宗教仪式，当时他说：“我十分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道。我作为世界教会的一个仆人来到这里，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下一个月，英国教会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德国。代表团的到达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作一次广播之时，他向德国教会伸出友谊之手，同时呼吁在基督教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在法占区，新教的首席随军牧师也负责宗教事务。”但是，在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所有占领当局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误解所造成的。有些军政府官员对于教会的故时经历一无所知，而教会方面则认为这是理当知道之事；另一方面，盟国对实施其政策的目的几乎未作明确的解释。但是即使这些表面上的障碍已经消除，产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这些原因乃是盟国对德政策的症结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却因为新教教会（虽然不是天主教会）是德国唯一公开表示悔罪的团体这一事实而加深了。在特赖萨选出的宗教理事会 10 月份于斯图加特会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时候，他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同我们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恼，并负有共同的罪责。我们非常痛苦地说，无穷无尽的灾难是通过我们带给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不错。我们曾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可怕地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暴力政权中的那种精神作过多年的斗争，但是我们要谴责自己没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证，没有更加虔诚地进行祷告，没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没有以更大的热忱去相爱。……我们寄希望于上帝，通过各个教会的共同服务，当前日趋强烈的暴力与复仇精神会在全世界得到控制，而唯一能治愈备受折磨的人类的和平与博爱的精神会占优势。①这份声明不是没有遇到挑战。许多比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们当年一向是反对纳粹的。也认为向盟国单方面承认德国的罪责是错误的行动。他们之中有人曾这样说：“历史上犯罪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来共同负责的。”天主教会从大主教到乡村牧师据 25 说都一致拒绝接受德国集体犯罪这一观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说，他虽然尊重斯图加特声明的精神，但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应在青年人能听到的范围内公开发表。“为了影响一个人，你必须承认他的正确与直率之处。”②其他的人则认为，盟国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的武器所能办得到的事。在这些人士中，对于他们认为盟国想把集体罪责加在德国人民身上那种伪善的做法，怀有很大的憎恨。虽然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①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绪并未有所改变。甚至斯图加特声明的执笔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声明会象凡尔赛条约中的

战争罪责条款那样被人加以利用。发起斯图加特声明的忏悔教会领导人回答这些批评说：担心自己的行动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不能作为一种借口不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改悔若以别人的改悔为条件，则将失去其价值。在新教教会领导人看来，他们过去挺身反对纳粹以及现在始终反对上述批评的事实，应该受到盟国的尊敬。同样那些责怪自己没有充分发言反对纳粹的人也决心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大家认为，教会已经从战争中作为这样的一个团体而出现，它能够在没有德国政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战士来为战败的国家而工作。而且他们发现盟国政策中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认为背离战争时期所许下的诺言的。②德国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东部，粮食与燃料的匮乏，设备的拆除，煤炭的输出，战俘未能遣返，甚至当局不愿给教会办的报纸配给纸张，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错误的。非纳粹化的范围和做法，以及纳粹分子未经审讯就被关押，都是造成不满的特殊原因。教会力求由自己来决定在其内部合乎需要的非纳粹化范围，而要促使它们合作来实施盟国的法律是颇费周折的；在英占区，不得不用命令来迫使天主教教会实施盟国法律。但是教会曾经抵抗过纳粹，在盟国面前无意于卑躬屈膝；诚然，它们相信，它们今后要在这个国家树立权威就得取决于现在的不屈不挠。武尔姆主教在答复大主教的广播①讲话时写道：我们以严肃的责任感和关心来提请你注意，盟国的胜利 251 并不单纯是善对恶的胜利。随着对我国的军事征服和占领而来的是对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动，此种行动在盟国国内也激起了同样的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在某些占领区采取非纳粹化措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给人以更高度的正义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后一批原料和机器从德国那些与军备生产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拿定的时候，向德国人民发出的许多呼吁，要他们设法自救，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听起来只是一种嘲弄。谁也讲不出目前在德国东部上演的悲剧严重到何等程度。但看来我们必须作这样的设想：它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牺牲品。②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和巴代利亚新教主教迈泽尔于 1945 年 12 月联名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处理政治逮捕案件，给予囚犯家属通信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关于限制发给老年有病者养老金的规定。1946 年春，由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和莱茵兰的主教们就有关在俄国及其他地方德国战俘的命运共同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并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结果成为一种正义的呼吁。①后来，在 1946—1947 年冬，红衣主教弗林斯因说了下面的话而使占领当局颇为愤慨，他说：“我们也许阻止不了个别人拿走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请求来获得那些东西的活。”②

德国教会在它们与盟国的关系方面所特别坚持的是需要获得那种它们视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冯·加伦在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扬言要对盟国的轰炸进行报复曾经予以驳斥。他在 1945 年宣称，这件事使他有权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谴责许多出于仇恨和渴望对我们先前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言行”。③而武尔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质问道：英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在为我们的罪孽而殉难的上帝面前并以他的名义来订立一个盟约，宣布宽恕而不是复仇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终止，将会把世界引向灾难。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这样一种态度在盟国当局看来是多么讨厌。有些人认为，教会为了争取以“宽厚的”252 和平取代“严峻的”和平，出来阻挠占领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较单纯地认为，没有哪个德国人有资格对于处

理其国家的方法怨天尤人。显然牢骚埋怨不仅倾向于强调占领的缺点，无视占领的成就，而且毫无历史常识。他们不去注意盟国对德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样巨大的困难情况中贯彻执行的。他们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战争的进程使德国为四个独立的大国所占领，而各大国对其余三国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批评好象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项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的原因。但这种意见龃龉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谁要把绝对价值用之于人事，就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而教会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最有资格要求以运用绝对价值为其任务，而且拒不承担考虑到种种困难的任何义务。这是至善论者与事务家之间年深日久的冲突。此外，德国的教会因为太不关注政治领域，不坚持把宗教原则运用于公共生活而长期受到谴责。这是教会领袖们在战后想予以克服的一个缺点。尼默勒牧师在特赖萨会议上说：“在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①1946年1月在德特莫尔德召开了英占区的教会领袖和国家官员的会议。决定教会承认在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态方面有合作的任务。②基督教民主联盟③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基督教具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当时的巴伐利亚州总理赫格纳博士在1945年11月说道：“每个好基督教徒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①具有同样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忏悔教会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神学研究院，该院学生并不专门研究神学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基础。②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发展。如果教会要在世俗事务方面产生影响的话，它们就会试图对构成德国真正政府的盟国施加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教会所持立场的种种原因到时候终于在英美工作人员中得到更好253的理解和尊重。谁也不会愿意去设想，盟国政策遭到批评的方面正是人们要想突出赞扬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出盟国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一批人或许希望找出最能与跟国求同之处，但他们不愿意按盟国的条件来合作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国负责的领袖人物自由地解决自救问题。他们虽然愿意考虑外来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盘采纳。比较保守的教徒并不特别相信民主的种种优点；他们中有一位说道：“借助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设法医治德国人民的唯我独尊的毛病，就好象把马缰绳套在马尾上一样。只有在人们已达到成熟阶段，能享人间的自由，克尽人间的义务的时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③首先要求盟国帮助的是创造经济 and 外事方面的条件，使新社会有机会生存下去。与其说教会共产主义敌意很深，倒不如说这种敌意助长了对于盟国的政策心怀疑虑，这种政策好象永远要把德国一分为二，要让德国东部的同胞几乎没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恰好为盟国所喜欢的任何调子跳舞的木偶——因为他们之所以象木偶，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牵制。

第十七章 结束语

本书已就盟国占领德国头几个关键性月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种占领不仅应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虽然所有这种过程都是独特的——而且是一次行之非易的修好实习。盟国要寻求答案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德国发动扰乱世界的周期性侵略呢？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使战败国服从战胜国的意志，并确保在以后的岁月里战败国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遵循为战胜国所满意的方针呢？

在理论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剥夺战败国的侵略手段，二是消除其侵略欲望，三是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要剥夺侵略手段而不在同时剥夺生活资料是难以成功的，在军队依靠工业的今天尤其如此。因此，254这就往往引起侵略欲望，结果与第二种方法背道而驰。但是，推行第二种方法必须包括形成一种思想观念，这是命令或武力威胁所无能为力的。况且，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突出地看到思想观念在一定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程度，而此种思想观念乃是一定文化的历史、社会、经济 and 地理环境的产物，不易于用产生某种效果的方法去加以塑造。

既然没有激情就无从进行战争，在愤怒和复仇情绪的鼓动下，往往促使采用第一种解决办法。但在同时，经验与人情两者都否定惩罚性的解决办法，而主张宽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持这两种见解的人都是非常坚决的，无法完全对之施加影响，但他们又是过分优柔寡断，不能毫无保留地自行其是。结果所采用的折衷办法往往被认为憾事，其原因是：惩罚太甚，不能消除侵略欲望；宽大过度，则不能消灭侵略手段。有人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任何一种只要系统地贯彻到底，就可望取得成功，而中间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①

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也许值得怀疑。不管怎样，这种结论背后的思想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产生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动机都是出自人的本性，在媾和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而且，教养儿童和改造罪犯的经验似乎都表明需要宽严结合，或者如大卫王所说的怜悯与诚实相结合。只讲严格的人，遭人憎恨；一味让步的人，不受尊敬。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于是就包含在重修旧好的第三种办法之中了。因为，要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如果只说侵略将遭到压倒一切的力量回击，这是很不够的，还得展示出和平政策必将开花结果的某种前景。处理个人之间的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尚且不易，涉及到国家之间的问题，那就更难为力了。一方面，要表明使用武力将在实际上遭到反对，而且是决定性的反对，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之间建立那种在处理个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互尊敬和体贴的关系，也更为困难。两者之间所需要的那种均衡，是无法开出一个精确的处方的，正确的比例如何，将因时因事而异。然而，尽管难以找到正确的比例，但是只要能够这样去做，它仍然是成功地争取和平与成功地制订对外政策的关键。

对于一个已经一败涂地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向它表明，对征服者进行侵略必将吃亏，而且要使它自动接受将 255 来的和平解决办法。但是，战胜国如果是几个国家的联盟，那么只有在这个联盟团结一致时，那样做才会取得成效，而在历史上，胜利的联盟陷于分裂是屡见不鲜的。如果盟国能就一项共同的政策达成协议，那就会大大推动它们在德国缔造和平的工作：有关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为保持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牺牲。的确，任何

人只要想到四大国的分歧对未来世界产生影响的全部含意，就不会想把他们的努力斥为短视、无知或徒劳无益了。①万一历史证明是使人误入歧途的，那么世界前景倒确实是光辉灿烂的了。同时，毫无疑问，因为四个战胜国在如何对待战败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所以要作出一番努力来达到四国的协调一致，这样一来，要找出一种正确对付德国人的方法，其任务就大为复杂了。

英美所抱目的的基本点是把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进德国，而这种制度比第三帝国曾经推行过的更接近于“民主生活方式”。俄国人也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用词的一致一时掩盖了思想上的根本分歧。①俄国人处理赔偿问题的最初做法，除了适应于外国人的刺刀所支持的专制政府外，是否还适应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这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困难处境，看来他们自己在一定时候也承认了。然而，这种做法与促进以人民抉择为基础的自治，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这种自治却是西方政策所公开宣布的目标。英美因为希望同俄国人保持团结，在波茨坦条款中接受了许多惩罚性的东西，这些与他们平时解决政治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与他们为德国设想的政治前途也不一样。嘴别是工业水平计划，装模作样地要求德国人合作，可是又竭力策动德国人反对任何这样的合作。在一时感情激动之下，美国领导人可能接受摩根索计划，然而几乎令人不可想象的是，经过若干年，讲英语的各族人民居然会准备支持该计划所包含的那种苛刻程度。在制订一项能为四大国所一致支持的对德政策方面，过决非是唯一的困难。

俄国人不仅在惩罚德国方面显得更加无情、而且在 256 改造德国方面也显得更加严厉。他们对于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以及要促其实现的方法都是坚定无疑的。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使他们懂得，任何人如果要在社会上树立某种思想观念，必须从变革社会制度开始，特别是从变革经济权力的分配制度开始。当然，西方盟国认识到，要建立一种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有必要进行一些变革，但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引进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知道，德国的某些制度曾经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因此准备强制推行一些其他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对德国是陌生的，不受德国人欢迎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改革范围已扩大到诸如教育方法以及新闻宣传等方面，同时英国人还主张实行基本工业社会化。不可否认，俄国人并未立即实现土地、手工业或整个工业的社会化。但总的说来，美国人和法国人不会干涉财产分配问题，而英国人虽然在社会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进行得并不彻底；俄国人却这样做了。西方盟国即使没有明确阐述过他们的原则，他们还是按照原则行事的，这就是说，他们想要建立的政治社会和德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之间并无不相适应之处。民主政治，只要在开头若干年内能牢固地建立而又加以保护，以后就能扎下根来。任何这样的想法。都抹煞了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根本差别。

在英美，在较为集中的工业化产生出城市工人阶级之前，种种条件使得经济发展有可能早日开始，并给予中产阶级以足够的力量好从成功的革命中赢得政权。在德国，这种情况之所以不会出现，主要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未能把这个国家巩固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由于一些小的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倾轧和衰微，还由于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处。在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之时，工人革命的危险已经露头了。马克思明确教导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踏脚石。英美中产阶级对于通过他们的

革命所固定下来的自由传统充满了信心，而且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医治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方法就是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然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激进倾向采取了较强的防御态度。当他们在 1848 年和 1918 年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用以打垮敌军、地主贵族和军事特权阶层的 257 时候，他们却屈服于害怕对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妥协，以保证免遭危险。最成功、最富有的产业家们同地主贵族同心协力，接受了他们很多的社会观点，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之一。无甚成就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本应产生出一些自由社会的领袖，却由于 1923 年的通货膨胀和 1932 年的经济萧条而进一步遭到削弱。

这一历史背景（这里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许多次要原因）给我们提供一种依据，大大有助于说明德国社会中显而易见的软弱性，如果我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地加以观察的话。但是如果不清这一点，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诸如对文化的兴趣，对知识的尊重，对卫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等，往往都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一旦德国中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当然会出现英美那样的政治社会，这种预料也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德国中产阶级却给民族主义和纳粹党提供了一些最热忱的拥护者。因此，把他们看做自由的保卫者，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被出卖过一次的通行证，还有再次被出卖的可能。

有人自然会问，既然德国中产阶级不可信赖，权力就决不应落在他们手里，而应掌握在别的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人手里，特别是要掌握在工人手里。在这里，权力必须是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战争期间，英美公众普遍认为，鲁尔和莱茵兰的企业家们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一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关系密切，必须同样地严厉对待。但是，既然俄国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从根本上打击了容克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一个阶级，可以随时抵制任何开倒车的企图，那么还要妄称纽伦堡的起诉、非卡特尔化以及其他用来对付企业家的措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无稽之谈。^①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土地改革应有彻底的工业社会化与之相配合，工人也应和农民一样成为（不管怎样在名义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据说，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不再发生受工业巨头资助的（如果说不是受其策动的）独裁政治的反扑。258 这种分析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的论述极其相似。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提出，难道不正是根据德国和西方民主政治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类推吗？它假设：在权力移交之时，德国人不论多么勉强也得接受其后果，正如皮尔和迪斯雷利领导下的托利党人接受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党人接受坎贝尔—班纳曼内和阿斯奎斯内阁的措施一样。但是，一度实行过的大体上以英美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权力实际分配情况作过一番现实主义的估价。这样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国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而在德国，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问的。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样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因为，只要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集团，自认为有权用武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认为已强大到足以伺机而动，那么无保留地让这个集团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就会招致灾难。无论如何，我们还无法断言，德国工人被授予权力之后会愿意按照自由主义路线来治理国家。然而，即使他们愿

意这样做，反动力量也可能十分强大而残忍，除非无产阶级政权是同样的残忍和独裁，就不可能被制服。从政治上来脱，西德人民阵线若不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内，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权，而共产党人是包藏着破坏联合以达到自己目的的祸心的。英国驻德国的高级官员也许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财产问题是多么重要，而美国人则公开反对对自由企业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会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个左翼独裁政权去维持这件事的严重危险性，那末，把未能实现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错误，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情况既然如此，剩下的问题是：能否在现存的体制内再花些工夫来更换上层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负责岗位上，并以强迫转让个人财产的办法把这种变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来，从而使倒退现象难以发生。可是实际上，深谋远虑和不愿干预的情绪妨碍了采取迅速行动。一旦战败的时刻已经流逝，那么对这种强行干预的阻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当然，这种行动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问题的。的确，愤愤不平的业主们一定会象抗拒社会化一样，激烈地抗拒这种转让。实践证明，剥夺公认的纳粹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种种尝试多 259 数成了昙花一现。说不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他们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转给了别人（而不为国家所有），那么，一旦德国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在新秩序内拥有一定物质利益的集团的产生以及能够调度出来予以支持的力量，并不足以阻止非正义的倒退进程。甚至还不能断言，新业主就一定会比老业主开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看出盟国在德国可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有待于政治改革和非纳粹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在实际上继续保持，除了说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国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须填平鸿沟之外，还出现了东西德之间的另一基本差别。的确，逐步形成这样一项政策的前景一开始就是很渺茫的，虽然从彼此的利害关系来看，作此尝试是正确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等人已经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记录，说明在战争期间团结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么困难。不单单是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必要考虑使得当时的情况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险消失之时，战胜国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观念在环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种环境所必然具有的差异之大，造成各国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让、互相谅解来弥合这种差距，不仅需要对此情况有所认识（从承认差距的存在开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愿望。然而，在俄国人方面，正是这种寻求谅解的愿望，似乎被共产主义教义的原则所排斥掉了。这种教义不仅宣传它的信条是绝对真理，而且教导其信徒们只能按照集体的自身利益、物质力量和争取统治的斗争去考虑问题，只要有一点肤浅的马列主义知识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由四国组成的政府就是一种将其效率寄托于这种合作的实验。只要有一点肤浅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样，就英国人来看，俄国通常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同盟合作，不如说是威胁恫吓。事实上实行四国共同政策的企图，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德国行政机构建立之前就早已破灭了。德国问题的整个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当各占领国开始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时，占领区边界就有了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政治意义。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实际代表两个互相 260 竞争的社会制度并受两大敌对集团战略利益支配的东西

方之间的分歧，则是最难处理的。何况，这个根本性的划分把一个国家分成两部分，而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别的国家更为民族团结的观念所迷住。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泰然处之的，德国人更是万万不能。它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永远起着鼓励作用：它直接助长战争而不利于和平。它还雪上加霜，丧失领土给俄国和波兰，对此，德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凭摆布的。产生巨大灾难的内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以期避免旧事重演。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话，那么西方盟国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订一项和他们平时的政治态度更为一致的对德政策。再也没有必要去采取一种强硬的方针，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在西德，人口日增，资源渐少，要开辟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加强工业化而不是拆毁工业。

然而，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个现代工业国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为政府后盾的居民自动进行合作。德国人在受到战败的震动之初，曾经准备给予占领当局至少是服从命令的那种程度的合作。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军政府为德国人办事比他们自己的任何领导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 1946 年残冬，盟国确保自愿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补贴，又想避免加强公开施用独裁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权力移交给当时已经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并且依靠他们的良知，依靠为将来追求占领的基本目标而可能向他们施加的影响。把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是东西方之间以竞争取代合作之后的必然后果。原来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时间在德国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种优势力量，已为露骨的拉锯战所取代了。而且，在请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给予支持的时候，又坚持要人家改变特性，这是不易办得到的。1919 年后，德国人不得不在战胜国中间“赢得同情”，而 1945 年的战胜国却由于他们本身的纠纷被迫在德国人之中竞相争取同情了。

如果说盟国在开始占领时失之于过严，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稍许花了点时间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那么，后来的倾向却是流于宽大无边。起初，看来他们对于取悦德国人的想法几乎是采取蔑视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却显得迅即不记旧仇，宽恕为怀了。无可否认，一旦德国成为世界均势中一个有争议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征服德国人的躯体就会同征服德国的灵魂成为一个齐头并进的目标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占领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德国仅仅站在西方一边，这是不够的。它可能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它相信西方军队能够用来支持他们重新统一和收复失地的企图。将对西方事业增援而不是威胁的德国只能是这样的

德国：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从而放弃以武力解决为唯一有效解决办法的观念。硬说这种态度在德国已成习惯，或者说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那是悍然不顾事实的。只要德国人认为西方要对他们的支持付出某种代价时，这种态度就不见得会加快树立起来。当然，德国的身心都属于四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德国就有照此办理的可能。战争期间的考虑欠周也许使得某些人指望转化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后来的痛苦经历表明了非纳粹化之难。即使真正的障碍的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改变这一结构的直接尝试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根据 1945 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把盟国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设性纲领的整个想法责难为自以为是、空谈理论而且不切实际。从这个观点来看，背景情况使得变革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德国的未来完全可以交给德国人去处理，他们一旦在第三帝国明显地遭到失败时，是非常愿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这样讲就忽视了下述的困难：一旦第三帝国不愿承认失败，因而迫使盟国军队打进德国中部，盟国就难以袖手旁观了。他们一到那里，权力会自动会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对政治后果施加影响。立即撤退意味着把德国抛进那个在中欧十分容易蔓延开来的饥荒、疾病和内战的险境中去。情况很可能如此，如果内战爆发，三个主要盟国就会发现自己被拖进敌对方方面，因为他们生怕看到真空地带被一个敌视他们的政府所占据。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风险让一个共产党政府进入鲁尔，那么，俄国人也不甘冒风险让一个“反动”政府到达奥得河。何况俄国人还要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赔款，他们如不填满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

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理由尽管是可笑的，^①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 1945 年 7 月拆散。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

人头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 1945 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②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 1918 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会是一个错误。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1945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①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 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谁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是有保留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这种观点行事）。这种观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盟国因为相信个人有超脱所处环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始终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的基础上，就是说甚至德国人也有可能及时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宽容的体会。他们不肯承认，改变德国面貌的那种精心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今天也无须说它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今大的两个德国中存在着许多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担忧。但是，对这些倾向感到吃惊的任何人只会期望发生奇迹，或者对俯拾即是的证据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德国内部的一批人，他们似乎也分担着忧患。当然，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处的环境，因此指望在德国寻找完全象我们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种发展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对这一点有不断深入的领会，盟国的政策本来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德国社会必须按照德国的条件来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的或侵略

性的。有头脑的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清醒的，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观念的普遍欢迎，对重新武装的深感犹豫。而且，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容易使人忘怀的，在东西方冲突中，谁会最先受到打击也是不容易使人认清的。有些德国人看到某些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遭到了失败，明白了邪恶之所以占上风的终极原因。热心于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是众多的，他们已经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在继续贯彻占领的积极目的的过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务是加强对这类人士的影响，而不损害他们的爱国声誉。为此，现在仍然和往常一样，有必要在宽与严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不可否认，俄国人的态度曾一度失之过严，现在又鼓励宽大无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和合作，我们就必须经得起暂时的惊慌和烦恼的影响。调整这种平衡以适应一时情况所需要的良好判断力以及防止左右摇摆所需要的坚定性，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二编 四国对奥地利的管制 1945—1946 年约翰·梅尔

作者序

大战期间，就存在着一个“德国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那就无所谓“奥地利问题”。关于战后处理奥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既未在私下进行过剧烈的争论，也未在报刊上长期刊载过通讯报道。1943年11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声称奥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一真相对任何一个客观看待事实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长们表示希望看到奥地利重建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相信会得到英美公众舆论的充分支持。

换句话说，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任务，从未象它们对德国的任务那样，首先考虑的是对一国人民进行再教育，而是考虑重建一个国家。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享受独立的最后四年是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盟国的决策人看来从不怀疑，奥地利在摆脱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压力而重新建立国家之后，必将成为一个遵循西方路线的正统的民主国家。它们所怀疑的只是，奥地利如果在1938年的疆界范围内恢复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两岸的人认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如果说不是在政治上）和东南欧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但并未妨碍一致同意这样的基本政策，即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清除纳粹影响，不作过分拖延便将其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政策为四大国所接受，并被看作是盟国占领的目的。而占领则被视为实质上是一种过渡阶段，是做好准备以便把行政职责移交给一个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奥地利政府。

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年11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年6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①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

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 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 1944 年和 1945 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 1955 年 10 月

奥地利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 1943 年 10 月 30 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 1938 年 3 月 15 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①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 1939 年 11 月 12 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②1940 年 11 月 9 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③1942 年 9 月 9 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分，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 1938 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④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 1942 年 2 月 13 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①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 1943 年 2 月 2 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而且必须取决……于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②

毋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 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分访问伦敦时，忽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①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

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 1938 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八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 275 尔顿）坦率地说：1938 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 年的 2 月和 3 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除非这个国家说一句决定性的话，奥地利就会灭亡——而奥地利是灭亡了。因此我感到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②

形成英国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流亡者和前奥地利大使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国致力于宣传奥地利的事业。诚然，这些流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难者，而是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的活动同其他国家具有流亡政府声望的逃亡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40—1942 年间，在伦敦有两个主要团体。奥地利办事处是由社会党前议员海因里希·阿利纳主持的，成立于 1939 年，从 1940 年到 1942 年出版了《自由奥地利》月刊。1941 年又组成了自由奥地利运动，把各种政治流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的许多小团体团结在一起，奥地利办事处也从属于这个组织。自由奥地利运动出版了德语周刊《时代之镜》，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除这两个主要组织外，还有第三个组织，即奥地利社会党人伦敦局，大部分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包括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和奥斯卡·波拉克那样的杰出人物在内。奥斯卡·波拉克后来成为维也纳的社会党日报《工人报》的战后第一个主编。这第三个组织拒绝加入自由奥地利运动，其部分原因是该局的许多成员虽然反对纳粹，但在一个时期内还抱着与一个民主的德国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三个组织如能团结一致，显然是有利于奥地利的。但在 1942—1943 年间虽然作了多次努力，并由英国政府多方予以鼓励，^①结果还是没有联合起来。奥地利办事处脱离了自由奥地利运动。1943 年 11 月，在秘密的奥地利工会代表弗朗茨·诺维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自称为奥地利社团代表，是由自由工会、伦敦局、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等聚集起来组成 276 的。^①奥斯卡·波拉克在 1945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奥地利社团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奥地利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并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团体，仅仅吸收了具有非共产主义见解的个人。^②

在大战期间，流亡的奥地利人和英国的许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军中组成一支奥地利部队。丘吉尔本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从未实现，^③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据报道大约有三千名奥地利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④

在莫斯科会议前，关于奥地利的未来地位，美国似乎不曾有过比较正式的声明。美国忙于对日作战，又受孤立主义影响，国务院所关心的是战后大国合作的总的原则问题，而不太注意对待个别国家的具体政策，特别如本书前半部所论述的，战后如何处理德国尚无定见，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在 1941—1943 年间，从大西洋彼岸来看，奥地利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1941 年 12 月，丘吉尔首次会见罗斯福时，如果谈到了分割德国——看来有可能——他会顺带提到奥地利问题，这样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罗斯福总统在 1942 年 1 月建立了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研究分割德国的计划期间，毫无疑问考虑过奥地利问题。^①然而，有鉴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长期阻碍美国制订一致的对德政策，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并非毫无意义的：1943 年 10 月 28 日，当时的陆军部长、前任国务卿史汀生在他的日

记里写下了他对那时正在莫斯科讨论的恢复奥地利独立问题的怀疑：他们显然一点也不领会，需要从根本上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来使和年持久巩固。……如果恢复二十五年前凡尔赛和会对奥地利所安排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使奥地利 271 重新处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看来他们对此全然没有考虑到。战后的中欧要有饭吃。要吃饭就得免除关税。^②

美国在莫斯科会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最后一个奥地利国王查理士的长子奥托大公所采取的态度，他是前奥地利流亡在美国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难者^①。1940 年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公民一起注册去服选征兵役，但根据法律他是一个匈牙利人，因此不能为美国军队接受。^②显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脑，在美国到处演说，声称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统治。1942 年，他取得很大进展，足以打动美国陆军部接受一项计划，由他的军事委员会招募一支奥美特种军团。但是侨居美国的几个经过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前政府成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③国务院不得不出面干涉，并于 1942 年 4 月正式否认它有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图。^④陆军部接受暗示，在 8 月份宣布奥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⑤然而直到 1944 年 4 月 11 日，^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国防务哈佛小组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关于美国偏爱奥托大公的主张，声明美国政府将授胁任何一个与共同敌人战斗的组织，不过这种援助“所采取的形式，不应损害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一国人民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权利”。^①

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 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 278 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②许多人在让他何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在法国本上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述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③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 1945 年 4 月 25 日的事了。^①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 1941 年 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②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 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③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 1929 年修改过的 1920 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④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 1943 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 279 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并非如此。在 1955 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莫斯利的记载。^①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文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士(联合王国)、詹姆斯·C·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丙是一个国家,因而对 1939 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话。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错,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 1955 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①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②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③280 如前所述,1941 年 1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 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 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 1943 年,苏联着着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 月 2 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

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这一良好准则的例外”。《泰晤士报》认为，毫无疑问，奥地利人急切地等待着联合国把他们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也毫无疑问，全体奥地利人将有决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于欧洲，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与 1919 年所建立的组织根本不同。《泰晤士报》说，这种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诚然得到了承认。但是，对整个欧洲的未来组织应该首先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对具体国家的前途作出明细的决定，而且决定的内容是受组织的性质制约的。这项原则运用于“奥地利问题具有特殊的说服力”。²⁸¹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设计多瑙河国家联邦时就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史汀生在考虑奥地利的经济生存能力时也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① 这一观点，在英国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② 但实际上，这种对于整个欧洲组织的关切，由于战后“铁幕”把东欧和欧洲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而落得一场空。何况，麻烦的程度更甚于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引进了战后处理奥地利的计划，使奥地利永远不能摆脱。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按理应当受到与其他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如法兰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同样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的，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据此推理，它应受到与德国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惩罚。英美两国代表当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虑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们对于维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却并不十分成功。^③

的确，宣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奥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认奥地利是一个特殊情况。无可否认，许多奥地利人曾经在开始时欢迎过纳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确热情地执行过纳粹的某些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但这绝不等于奥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赞成纳粹的整个政策或行动。^④ 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通敌者，或者比后者更应受到指摘，这也是不确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几个星期之内，行政机关的所有主要职位，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控制权，都由德国人接管了，就连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于使用同一语言，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的“划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区既迅速而又彻底。到 1939 年，奥地利已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权利来表达其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了。^⑤ 在这种情况下，说奥地利因为参加了希特勒的战争而要承担责任，这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

然而，一部分与纳粹德国雷同的事物一经传入，不是 282 马上就可消除的。战后对奥计划与战后对德计划有必然的联系，从而遇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混乱和拖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同对德计划相比，对奥计划被认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欧洲咨询委员会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之时，曾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并向英、美、苏三国政府提供建议。但在论述三国政府审议奥地利问题之前，这里顺便扼要地谈一谈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计划的发展情况。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特别考虑过这一计划，但到1945年2月为止，实行这项计划的可能性并未最终丧失。

战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在莫斯科已经作过一些讨论。11月份在德黑兰，当罗斯福提出把德国一分为五时，丘吉尔建议将德国南部某几个州并入多瑙河联邦。^①这一建议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斯大林表示反对，其态度之坚决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反对时一样。^②这事搁置了一年。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丘吉尔转告罗斯福说，斯大林与他先前的观点相反，将会“乐于看到维也纳成为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德国南部诸州联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尔进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进去的建议。^③

上述安排当然要取决于三国的正式认可，但并未立即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表示愿意在即将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国会议上予以讨论。^④但那时丘吉尔虽提出这一问题，斯大林又建议在当时当地作出如何分割德国的决议，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予以讨论。丘吉尔本人说，三国虽都同意分割德国，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五六天内是难以解决的。分割德国问题经提交外长们去研究，责成他们拟订一份计划以供讨论。^⑤建立多瑙河联邦的建议看来不曾进一步研究。5月9日，理查德·劳对下院一位提出质询的议员说，在雅尔塔没有讨论过占领奥地利问题。^⑥

欧洲咨询委员会讨论奥地利问题，是以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的，虽然这项宣言含有若干言外之意。必须规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政府，恢复1938年前的奥地利疆界，并使奥地利的所有国家机构摆脱纳粹的控制和渗透。但要保证达到这些目标，在奥地利也和在别处一样，显然有必要一开始就予以占领。因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战胜国之间公平分担占领的职责。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已于1943年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接受莫斯科宣言中的原则，^⑦可是这时它还没有代表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因此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起初只是按三大国占领的角度来考虑的。^⑧根据设想，美国将参加占领，因为它和其他两国联合发表莫斯科宣言。1944年1月14日，欧洲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英国和苏联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草案。但是，这种设想不久就显然成为泡影了。英国在1月15日首次散发的划分德国占领区的建议，^⑨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包括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其人口大约相当于建议中的英国占领区（德国西北部）和苏联占领区（德国东北部）的人口总和。这和英国从意大利或法兰西进攻中欧的设想是一致的，这次进攻的部队主要将由当时控制意大利的美军来提供。苏联在2月18日首次提出的建议中^⑩接受了英国拟议的东部占领区，但主张把奥地利从占领德国的计划中划分出来，不划归占领德国南部的国家，而由三国共同占领。苏联代表指出，他对英美两国之间如何划分占领区问题不予过问。这两个建议，美国均未接受。3月份，总统送交美国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怀南特一项建议，主张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而把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划归英国占领。

罗斯福总统不愿化美国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占领，似乎是出于两种主要的考虑。②第一，他顾虑孤立主义者批评他把美国精力集中于德国而不集中于日本的决定；他还觉得德国战败后，如果将美国军队重新部署到远东去，那么从易于到达德国北部诸港和海峡诸港的方位出发比从南部内陆地区出发要方便得多。第二，他似乎认为占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地区，有使美国卷入英苏两国在巴尔干半岛抗衡中去的危险。我不希望美国背上战后重新组织……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包袱〔他对赫尔说〕。我们远处三千五百多英里之外，这不是我们本身的任务。确切他说，这是英国的任务。……必要的是，美国占领军对南欧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哪一天确能撤退，就将尽早地撤退。①当时对他有影响的第三点考虑是，法国在战后可能混乱动荡，他认为这说不定会危及驻在南欧的美国军队的交通。②总统所持的这种态度，虽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却得到了陆军部的赞助。但在那时，政治上的考虑应从属于打赢战争的纯军事目的，这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英国的意见，如俞所述，一开始是从在意 285 大力的兵力部署出发的。即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升迁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美国军队不复控制意大利的时候，英国主张由美国军队承担占领奥地利的原意，在制定“霸王”计划③的过程中仍然未变，因为英国设想由驻扎在英格兰东部的英军攻入北欧，由驻扎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美军攻入南欧——因此也攻入奥地利。如果采纳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建议，那么业已拟就的“霸王”行动的整个军事计划就要受到影响。进一步的考虑是，如果以后要分一个占领区给法国，那么从法国毗邻的南部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嗓是方便的，而且在美国军队按总统已表明的重新部署兵力的意图撤退时，法国占领区便可加以扩大。

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英国与苏联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看法不一致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英国代表身处本国首都，具有一切有利条件，便于获得最高决策人的指示。而美国代表却不得不在驻伦敦的安全工作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受权代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来协调指示的，但实际上却因各自需要取得华盛顿的上级批准而束缚住了手脚。①即使在华盛顿，陆军部的民事局有一个时期也拒绝合作，其理由是德国投降与占领德国纯属军事问题，因此安全工作委员会无存在的必要，就此而言，欧洲咨询委员会本身也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咨询委员会中关于奥地利问题的的工作遭到严重的拖延，这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与此同时，“霸王”计划的进攻日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至少让参加进攻的部队得到指示。驻在英国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地中海地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非正式地同意作出一项安排，于 1944 年 4 月 10 日正式开始详细制定奥地利军政府计划。②1944 年 4 月 28 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战败或投降前的德国军政府的联合指令”，规定这项政策由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在某所部于敌人战败或投降前攻占德国或奥地利的领土 286 时予以实施。①指令指出，该指令在“敌人投降前，为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联合建议相一致”，其内容可以更改。指令还包括一项“奥地利政治指南”，强调占领奥地利与占领德国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指南提到，占领区居民可能抱着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这就没有必要完全禁止与之亲善；②除了消灭纳粹和维持秩序的指示外，指南还重申莫斯科宣言既定的政策，其昏的是把奥地利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为建立自由和独立

的奥地利铺平道路。因此应该鼓励那些“没有因追随纳粹而被玷污的”奥地利人去取代占据许多地方政府职位的德国人。在禁止纳粹教条和纳粹宣传之外，还要禁止“泛日耳曼主义与重新和德国联合”的宣传。同时，指甫还规定，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应准备给予奥地利比德国更多的政治活动自由。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指示，美国参加占领奥地利问题在政治上还未肯定，这说明伦敦的民事工作计划起初几乎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见制定的，虽然美国代表当然也随时了解情况。有一个小组着手开展工作，后来成为对德和对奥管制局的一个组成部分。1944年的春夏两季，这个小组在以陆军部的F·傅文申爵士为主席的委员会指导之下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经济作战部和新闻部在搜集奥地利当前状况必要的情报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没有这些情报，民事工作就无从进行，可是在其后好几个月，关于占领区的划分及关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都几乎没有一点明确的消息。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颁发的指令，一开始就以服从随后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政治建议为条件，其日期正好和罗斯福第一次有保留地同意美国占领奥地利不谋而合。怀南特因为要获知明确的政策决定还存在着困难，于是在5月份飞返华盛顿，带回了总统的意见，同意美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例如，通过派遣美国代表常驻维也纳联合司令部，同那里可能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接触，但并不真正占领任何领土——^①287然而对于派遣占领军的实际规模并未作出承诺。^①这种让步由怀南特于5月31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宣布了。这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交换意见的情况再度趋于复杂，因为怀南特的行动看来事先没有通知国务院，特别是没有通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4月28日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颁发过一道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于6月9日又向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颁发了另一道指令，坚持美国军队不得使用于南欧，包括奥地利在内。随后出现的混乱以及设法使文件协调的工作，一直到10月才最终解决。那时盟军司令部的工作方始取得真正的进展，准备组织占领初期的奥地利军政府。

与此同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7月1日建议三国共同占领在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范围内的整个奥地利。四周之后，即7月31日，怀南特进一步确认美国接受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但只在维也纳派驻一支象征性的部队。

这至少说明有了一些进步。因此英国代表于8月21日提出建议，设想采用三国管制中央的制度而由英苏两国联合予以占领。

但是，德国西部的两个占领区如何分划这个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对这个问题的迟迟不作决定，反过来使管制奥地利的进一步规划也延宕了下来。直到英美两国政府首脑于1944年9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边形”）时，罗斯福才最后接受英国原先提出的建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地区。此时双方又同意对奥地利应分别进外理。^①欧洲咨询委员会再次考虑了这种主张，于是11月13日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个划分三个占领区的新草案，规定苏联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东半部，英国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西半部，外加卡林西亚，美国占领上奥地利、萨尔茨堡、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包括东蒂罗尔。苏联的计划同时规定了三国对维也纳本身的占领：苏联占领东北区，包括内城；英国占领西北区；美国占领南区。^②288对这些新建议的讨论，这时受到了新出现的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在丘吉尔和艾登10

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应邀请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三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的日期定于11月11日。①法国接受邀请乃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而且意味着在那天以后不久，法国对于解决问题将有发言权。既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必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到目前为止解决的任何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讨论。②第二，1944年10月28日，保加利亚政府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③美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解放了的中欧国家里，占领国所施加的影响之大小很可能直接与驻扎该地的军队的多少成正比例。在保加利亚，尽管管制工作委员会是国际性的，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真正有力量的是苏联，因为它的军队实际上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④第一点考虑刺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力图使德国占领区的协议得到签署，从而刚好在法国被委员会正式接受之前，即11月14日，签署管制机构议定书和占领区议定书。第二点考虑对说服罗斯福相信下述观点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美占区毕竟是可取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接受了毗连奥地利的南部德国占领区，军队的补给问题这时已不大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虽然有相当一庚时间的延宕，1945年1月5日怀南特接到了指示，要他接受1943年11月13日的苏联建议，但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按军事理由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的。法国虽于1944年11月11日应邀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但到11月11日才实际参加。①那时法国代表立即要求在德国划出一个法国占领区，但表示不可能有足够的法国军队去占领奥地利地区，只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但是，当美国表示它决定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占领区时，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1945年1月29日英国代表提出一个新的草案，规定法国完全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这一草案就变成了最后的占领区协议的基础。289 英国草案对苏联在11月份提出的建议作了件多重要更动。它不仅设想出一个由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不包括东蒂罗尔）组成的法国占领区，并且设想法国享有和其他三国同等的地位来参加管制，即在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中包括法国成员，并在维也纳城的东南部建立法国管制区。此外，原来苏联政府建议的英国占领区，其界线是不顾德国的邦界和奥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专区界限，把施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一分为二；英国人建议不采取这样的划法，而是以1937年12月31日奥地利的国界为基础，按德国在奥地利境内的分区界线来划定不同的占领区。他们认为，这种划法有可能利用现存的州级行政机构，便于管制。根据这点，英国建议把整个下奥地利分给苏联，包括布尔根兰的北半部；把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分给美国；英国则分到卡林西亚、施蒂里厄布尔根兰的下半部和东蒂罗尔。至于维也纳的划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建议占领国应沿袭纳粹所划的维也纳区，而不是仅限于苏联建议的维也纳城区。英国人把这个大维也纳的西南部划给自己，西北部划给美国；东北部划给苏联。内城则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个指挥官组成的盟国间管理权力机构来作出安排。这四个指挥官还负责“大维也纳”区的联合行政管理。一俟军事情况允许，不迟于德自签署军事投降条约或停止首组织的反抗之日，全部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就建议中的各国占领区来说，苏联代表在接受时提出两个重要保留条件。他希望在苏联占领区内，第一要包括上奥地利中位于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尔根兰州的施蒂里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1938年10月1日纳粹法令颁布后才划出去的。他还维持原来的“小”维也纳的建议，就是说要恢复1937年12

月 31 日的维也纳边界线。苏联代表提出的两点界线更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苏联控制住奥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个边界，还控制住奥地利境内整个多瑙河北岸。然而这两点要求都被承认了。据埃里克森说，对于第一点要求是美国让步的，尽管怀南特加以反对，止步的原因是这一要求“没有重大的军事考虑”。对于第二点要求是英国让步的，旨在希望苏联代表不会继续反对英国关于划定维也纳界线的建议。^①

实际上，苏联提出的修正只是对英国草案建议的划分各国占领区有所修改，此外并无实质性的变动。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关于维也纳本身的安排。事实上，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把整个文件的签署一直拖到 7 月份。这里也应该提一提，虽然法国占领区的范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政府一级一时还没有批准。2 月份，丘吉尔在雅尔塔力争让法国完全参加对德和对奥的管制，斯大林勉强予以同意。^②但是直到 5 月份英美两国之间解决了德国的法占区的细节之后，^③美国方始同意英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提出的有关奥地利法占区的建议。与此同时，民事工作计划也以加速的步伐进展。魁北克会议决定对奥地利的处理要与德国区别开来以后，英国的奥地利计划组——当时在副专员（民事）W·H·B·麦克（后来是亨利·麦克爵士）指导下——便从德国计划组中分了出来，同时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人员也经充实，与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经盟军司令部见历山大无帅同意，T·J·W·温特顿（后来是爵士）准将被任命为副专员（军事），负责协调把管制委员会的英方人员于 1945 年春季送到意大利与美方的人员会合。美方人员当时已经集结，并于不久前已经进入意大利。法方当时还只在组织过程中。

第三节 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①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 291 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象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②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战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和奥波德·费格尔本人，从 1938 年到 1945 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③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 1938 年 4 月 2 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领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④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⑤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 292 变成“东部边区”，后来仅称之为“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⑥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 1931 年 5 月 31 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同德国结成联盟。⑦第二，奥地利人在 1934 年至 1938 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 1931 年 5 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 1938 年“优柔寡断”，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⑧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世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 1955 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

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涉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①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 1938 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 293 在 1938 年 5 月 13 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②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德国人的血不可流”，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③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天主教徒，从 1934 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 1938 年 10 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 10 月 10 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①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 1934 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消极怠工”，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 1942 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②1943 年 3 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冯·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全民的反德态度”，他还谈到“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③

1943 年下半年，盟军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获胜的消息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最后当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奥地利部分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时候，它无疑地激起了奥地利人对他们国家战后将会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有关奥地利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抗纳粹的消息开始纷至沓来。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组成的一支奥地利游击队，在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 294 在内的反抗组织的松散联盟即奥地利自由阵线领导之下，以福拉尔贝格的几个地区为中心开展活动。这些游击队的某些部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赶出基地之后，经由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到达斯洛文尼亚，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于 1944 年 11 月在斯洛文尼亚组成一个奥地利营，由南斯拉夫指挥，士兵和军官都是奥地利人。其他反抗组织在布尔根兰、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不同地区也开展战斗，^①其人员的来源相同而政治目标则各异。作为 1944 年 7 月 20 日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反抗运动和奥地利的掩护行动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两个军区的东部，逮捕二十名纳粹党要人的计划执行得很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德国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奥地利的计划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②实际上盖世太保随即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万多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纳粹法庭每月判处死刑的人数多至四百名，然而这种镇压的凶焰并没有遏止住奥地利的反抗活动。1944 年 12 月，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即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它

负责指导许多地区特别是维也纳区的反抗运动。各种地方组织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特别在蒂罗尔，由后来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领导的地方委员会，在美军到达以前夺取了因斯布鲁克的政权，其后成为当地的州政府。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的军用徽章 05（以 5 代 e，因为 e 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成为整个奥地利皮抗的象征。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七人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两名，天主教徒荫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一名。^①以后伦纳政府的核心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中的某些人组成的。

1945 年初期，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首次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瑞士的奥地利组织“瑞士联络处”建立的。2 月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设法与盟军取得了联系，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告诉盟军，并要求支持。3 月份，一个年轻的反抗工作者弗里茨·莫尔登访问驻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要求盟军不要轰炸奥地利的非军事目标。莫尔登获得了一个特殊身分，担任了驻意大利美军的联络官。^②

与此同时，奥地利自由阵线于 3 月 11 日发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它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建议允许奥地利招募一个兵团，参加联合国一边作战。这个建议显然因提得太迟而未能实现。总之，备忘录是在 4 月底才送到伦敦的。

^①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在那些国家，有了盟国人力物力的渗透，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作战实力的部队，相形之下，奥地利不免处于劣势。1944 年 9 月，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告奥地利说，奥地利要作出可为盟国考虑的贡献，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②一个月以后，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从伦敦作了广播，呼吁国内同胞“打开锁链”。^③甚至在 1945 年 3 月，艾登还对下院议员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不可想象”它能够和被解放的国家或盟国的领土相提并论；问题已经再三表明，在最后处理时，必须考虑奥地利本身对推翻纳粹主义所作的贡献。他想提醒奥地利人民，时间有限了。然而，他趁机重申英国政府的希望，即应该重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④因此到 1945 年 3 月，即解放前夕，盟国的对奥政策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占领区的划分已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确定了大体轮廓，关于管制机构的协议也确定了主要条款。但是，如前所述，在 7 月份之前，两个协议都没有签署。不管怎样，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矛盾并未消除，即使矛盾所产生的整个影响暂时还不明显。

第二章 解 放

第一节 从东部解放

1944年6月和7月丘吉尔提议盟军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罗斯福没有表示同意，①而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却一反他往常对西方国家在296巴尔干半岛地面作战信心不足的态度，强烈主张西方盟国应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向维也纳挺进。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这时苏联军队距离柏林的路程比盟国军队要远得多，而且在波兰遭到了严重的堵击。此外苏联统帅部似乎相信，德国人因为仇恨俄国人，他们会在东线集中一切防御力量，情愿让西方侵入德国。看来切斯特·威尔莫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一建议把足够的德国兵力引出中欧和巴尔干前线，以便红军向柏林和维也纳挺进。可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德国人在阿尔登山脉发动了进攻，有效地把西方国家的进军推迟到2月份，致使整个前景改观。②那时东线苏军进展得非常快速，离维也纳只有八十英里，离布拉格只有一百二十英里，离柏林只有四十五英里了。2月15日，苏军挫败了德国在布达佩斯的最后抵抗。③此外，美国反对动用驻扎在西欧以外的美国后备军，再加上铁托拒绝接纳英军，这就使得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大规模登陆的问题成为泡影。总之，此时的形势发展已使原来要协助苏军挺进的想法变得没有必要了。3月份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的东方和东北方展开猛烈反攻，欲解布达佩斯之围。可是到3月16日，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损耗了德军的兵力。俄国人迅速予以反击。在月底之前，他们已经越过奥地利边界。4月4日传出消息，说苏军的装甲前卫距维也纳已不到十二英里。④四天后（4月8日），奥地利首都被围。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关于奥地利的宣言”。这一宣言根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宣言说），奥地利人民与德国境内的德国人不同，他们是“反抗德国人把他们疏散”和“欢迎红军解放奥地利的”。宣言又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占领奥地利的任何领土，或改变奥地利的社会秩序。苏联政府恪守保证奥地利独立的莫斯科宣言，⑤将把宣言变为现实，支持在奥地利根除纳粹统治与重建民主条件和民主制度。这一宣言发表后，托尔布欣元帅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尽可能在各方面协助红军，同时保证不触动“个人权利、奥地利公民的所有权、私人社团以及属于私人的财产”。呼吁书继续说，在奥地利人民自己“通过民主方式”重新建立奥地利当局之前，将由红军任命的临时市长行使民政职权。行政人员将从当地居民中挑选。呼吁书以这样的词句来结束：“用你们自己的功绩为奥地利的解放作出贡献吧。你们这样做就会加速全面解放，重建奥地利的自由和独立。”①

在4月13日维也纳陷落前的五天苦战和在其后苏军占领的最初几周中，奥地利人对于苏联这些诺言的实际意义便有所了解了。在上一年秋季，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分散的抵抗组织因德国军队和民团中的奥籍兵士纷纷逃亡而归而得到了加强。纳粹为了保卫奥地利，最后企图招募本地人入伍，称为民团，这是一次夭折的“总体”动员。4月2—3日夜，反抗组织领导人与苏军司令托尔布欣元帅取得联系，②并提出了一个计划。托尔布欣元帅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便利苏军进入维也纳的计划。4月5—6日，德国克雷默尔将军声称，城内枪声可闻，但并非来自俄国人的射击，估计有一万五千名武装的奥地利人在反对德国人。③4月7日，奥地利各游击小组迎接红军。4月13日维也

纳陷落时莫斯科电台宣布，维也纳居民和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居民不仅在战斗时“协助红军，制止德国人的抵抗”，而且通过这样帮助解放维也纳而“保全了奥地利民族的荣誉”。①4月12日，《消息报》指出，“奥地利自由阵线在组织游击小组和成立南斯拉夫军中的奥地利部队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②

然而，尽管苏联官方这样承认奥地利人的协助，并且向全体奥地利居民作出过种种保证，但是维也纳的群众在这时候却亲身经历了所有大规模掳掠和疯狂破坏的恐怖。对俄国军队来说，夺取维也纳被公认为一次长期而 298 艰巨战役的顶点。他们曾经看到自己的国家惨遭蹂躏，自己的村庄化为灰烬，自己的妇女为残酷的侵略者所污辱，由于侵略者自诩属于一个优秀种族，使所犯暴行更为人所不齿。此外，俄军中大多数是简单幼稚的士兵，他们在胜利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粗野放荡，他们也不去细辨操德语的人中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差别。就这种士兵来说，他们要求痛痛快快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然而，毋庸置疑，大多数维也纳人现在只希望结束战争，不管抱着什么保留态度，他们都在准备把俄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假如苏联军队的行为有所节制，与他们司令官的声明相称，他们赢得的友好与尊敬，很可能不下于他们实际上引起的恐怖与仇恨。他们初期在奥地利的所作所为，正如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使得人们坚定不移地要反对他们。

同时，我们在回顾过去时也要说一句公平话，维也纳陷落时和后来一个阶段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暴行，绝非都是苏联士兵干出来的。伦纳写下了他的看法，说战胜者所造成的破坏，在许多情况下比纳粹分子撤退时所犯下的罪行要轻得多。纳粹分子撤退前的破坏堪称典型，他们把不能带走的一切补给品和设备都搞成废物。就是这些纳粹分子，命令救火队撤出城市，好把许多东西都付之一炬，使人无法抢救。尤其是这个都城的象征、右代圣殿圣斯蒂芬大教堂，也是纳粹分子下令开炮予以摧毁的。①

此外，在各大城市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一批不法之徒，其人数随难民逃兵和地痞流氓的流入而激增。流入的这些人是在苏军挺进之前从十几个国家逃亡出来的。果子酒和杜松子酒到处都是，无人收进空室的酒窖。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一切正常销售制度已遭破坏。整个社会生活组织暂时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幻灭和绝望的时刻，就连那些平素矜庄自持、奉公守法的人，为了苟延残喘，有时候也不得不象小偷土匪那样行动了。

在乡村里，情况自然要安逸得多。可是，即使在乡村，苏军到达时也免不了犯下种种暴行，这样就使原来欢迎解放者的许多奥地利人猛然醒悟了。事情也怪，正是 299 这类暴行所造成的一个事件却决定了奥地利第一个战后政府的成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值得详细一谈。

卡尔·伦纳博士是老一代的社会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当过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自 1934 年以后被迫退隐。他曾经叙述过苏军进入时怎样发现他住在塞马林山隘下的小镇格洛格尼茨。①4月1日和2日，即复活节后的星期天和星期一，他和镇里其他居民碰到苏军巡逻队挨户搜查暗藏的枪支和德国士兵。尽管实际上所有的重要纳粹分子及其亲信都已逃跑，但由于语言障碍，苏军对居民的真实感情却茫无所知。而搜查过程中所产生的情况，据伦纳说“是不会令人轻易忘怀的”。因此在星期二，据他说，为了想“保护人民”，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出门去找地方指挥所。街上阒然无人。到处布岗。他向岗哨打听，谁也听不懂他的话。最后在一个小指挥部

里他获得申诉的机会，辗转由几个士兵把他护送到邻近的克特拉赫村。那里碰巧有几个苏联军官熟悉他的姓名和履历。^①

这一次偶然的会见立即产生了结果。伦纳连外衣都没穿就被送上卡车，开到山区的一个村庄。他在村里和“高级军官们”谈了一晚。他说，那些军官对他极其尊敬，静听他陈述奥地利人民大众的思想状况，招待他晚餐，还负责把他的行踪通知他的家属。两天后，他被送到霍赫沃尔克斯多夫的一个农家，受到热尔托夫将军和一批苏联高级军官的欢迎。热尔托夫向他保证，红军对奥地利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坚决维护苏联政府声明，允许奥地利独立。他问伦纳是否愿意协助红军缩短战争进程，以减轻奥地利人民的痛苦。伦纳回答说，他愿意协助，但同时讲清楚不愿充当苏联的代理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引导过奥地利人民克服困难，从战争走向和平，现在他愿意以前总理的身分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俄国人 300 对此表示同意。在格洛格尼茨和后来靠近维也纳新城的艾比希尔城堡作了短期筹备之后，伦纳及其家属在 4 月 21 日被接到维也纳，在希青区文茨街上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

伦纳很快就觉得他所考虑的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这件事，现已不很需要了。长期不活动的老政党纷纷重新出现。许多区已建立起临时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不是与红军有联系就是得到红军的全力支持。^①伦纳明白，他的任务不是要奥地利人民回顾民主的过去，而是要去引导和组织已经在行动的民主力量。在以后几天内，他接见了一批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其中有基督教社会党（后改为奥地利人民党）的领袖利奥波德·孔沙克，有克尔纳将军和社会党的阿道夫·谢尔夫，还有共产党人恩斯特·菲舍尔和约翰·科普莱尼希。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迅即开始讨论。经过两天的辩论，4 月 27 日就政府组成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②其人员组成包括老社会党的代表、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得到陶尔斐斯的支持而未玷污，现在组成了奥地利人民党，向一切政治思想保守的奥地利人敞开大门，只要他们忠于民主原则。共产党不仅能够宣称他们在奥地利自由阵线中作为反抗运动的组织者而起过突出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获得俄国人支持的有利条件。临时政府在成立之日发布了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公告。4 月 29 日苏联政府正式予以承认。^③

第二节 从西部解放

斯大林很可能长期以来就想在大战结束前把整个东南欧和中欧掌握在手中，因此他尽一切可能在西方盟军开到前就确保掌握住维也纳。丘吉尔毫不隐讳地表示他相信这是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敦促杜鲁门总统有必要在整个战线上尽可能深入东方与俄国人会师。^①但丘吉尔的意见却彼置之不顾。艾森豪威尔为追求纯军事目标而作出的决定，即尽可能迅速摧毁德国兵力，反而得到了 301 支持。他曾叙述，到 4 月 1 日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之后，他的三个主要目标是：首先长驱直入，越过中欧，与俄国人会师；下一步是同时向两侧推进，在北翼切断丹麦德军的退路，在南翼深入并占领奥地利西部山区（即所谓的“棱堡”）。根据情报，纳粹在山区正在准备作拼死的防御战。^②第三个目标是次要的，而且是要继其他两个目标之后达到的，结果苏联军队已在 4 月中旬占领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而美国的第三军和第七军直到 4 月底才从西北方面进入奥地利，法国人从西面进入奥地利。萨尔茨堡于 5 月 4 日被占领，次日林茨的德国驻军宣布投降。法军进一步向南挺进，于 5 月 3 日夺取了因斯布鲁克。5 月 5 日，德国 G 集团军在巴代利亚的哈尔接受了盟军提出的投降条件。^①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北部武装党卫队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的倡议下，结束意大利前线敌对行动的谈判从 2 月份起一直在进行着。第八集团军在波河山谷进攻获胜之后，4 月 29 日德军在卡塞塔签署了投降条件。据此，意大利的一切敌对行动于 5 月 2 日便停止了。^②英国的第五军和第十三军随后向意大利东北部推进，从而进入了奥地利。5 月 8 日，英国军队开进克拉根福，在尤登堡与占领施蒂里亚的苏联军队会师。

第三节 南斯拉夫的侵入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复杂问题，就是南斯拉夫对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南部提出领土要求，因为那儿住着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欧洲咨询委员会并未提出过南斯拉夫参加占领奥地利的计划。但在 1944 年 12 月，维莱比特将军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代表铁托元帅坚持对克拉根福提出领土要求。^③1945 年 4 月 2 日，南斯拉夫把一份照会送交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国家，正式要求它们同意南斯拉夫占领包括克拉根福和菲拉赫在内的一个地区，并通知说，在和会上南斯拉夫将要求把这一地区并入 302 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这份照会并未得到答复。但是一批南斯拉夫部队尾随英军开进了奥地利。5 月 8 日，英军抵达克拉根福时，发现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占领该地，^①有些是越过卡拉万肯山脉进入的。有一个时期，以南斯拉夫司令名义和以英国司令名义发布的公告，互相颉颃地张贴在这个地区，双方都告诫居民要服从其命令。南斯拉夫部队在的里雅斯特已同西方盟国发生纠纷，有一个时刻看来西方盟国很可能要使用武力把铁托的部队赶出奥地利。^②英国向铁托递送一份照会，警告铁托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领土要求。与此同时，伦敦吁请苏联当局协助。据铁托说，其后不久，苏军司令部唐突地命令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撤至战前南斯拉夫的国境线内。^③接到这项命令的日期不清楚。虽然铁托说遵照命令执行，但不可能立即照办。5 月 17 日，铁托要求把他的驻奥部队置于英军统帅之下。5 月 20 日，美国政府致电斯大林，要求他协助同铁托进行谈判，同时通知丘吉尔，如有必要，准备以武力对付铁托的领土要求。^④局势一连紧张了好几天，后来铁托同意把部队撤离奥地利，但这并不影响他将来对斯洛文尼亚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第四节 政治上的拖延

但是，上述事件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四国占领奥地利可以按计划实施。首先，西方军队原先打算取道意大利进入奥地利。因此，英美两国参加奥地利军政府的人员一直在意大利待命，由盟军司令部指挥。①结果美国军队从北部和西部进入奥地利，这就是说在美国占领区，进驻的那些军政府人员原来是为占领德国训练的，而不是为占领奥地利训练的。②此外，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划分奥地利占领区的协议，特别是关于维也纳的各国分区管 303 制协议尚未签署或批准。在这一过渡期间，四国军队继续占领着原来控制的地区，其界线是由地区司令官当场决定的。因此苏联军队仍然控制着划归英美的两个占领区的东部。美国占领着划归法国占领的地区的大部分。由于在奥地利不仅存在着大批已投降的德国军队，而且存在着正如一个英国司令官所说的“形形色色流离失所的难民”，因此整个局势动荡不定，而且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在卡林西亚，有以前由德国人在意大利北部使用过的两个俄国移民兵团，“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外加他们的家属”。他们的运输工具是“敞篷四轮马车……上面满载着行李、饲料、妇女、儿童和为数众多的教士，拉车的牲口集形形色色马匹的大成，少数是善跑的骆驼”。③

在以后几周内，奥地利仍然处于僵局。其背景是三个主要占领国的关系日趋恶化。④苏联觉察到单独对德停战的危险，曾经强烈抗议英美在意大利同沃尔夫将军谈判时把它排除在外。4月12日罗斯福逝世，中断了他和丘吉尔、斯大林之间的战时伙伴关系。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西方盟国和俄国人存在着争执。艾森豪威尔决定挥戈南下，直捣德国的“棱堡”，前不向柏林挺进，对此，丘吉尔曾同他激烈地交换过意见。尤其是4月29日莫斯科电台宣布奥地利临时政府组成，使西方国家大为震惊。那年早些时候已有谣传，说莫斯科已经挑选出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委员会，充当奥地利临时政府，⑤但消息一直没有证实。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中从未商定成立临时政府。根据理查德·劳5月2日在下院的讲话得知，英国驻莫斯科代办在4月26日获悉伦纳向驻奥地利苏军司令官建议组织临时政府的消息时，曾受命明确通知苏联政府，英国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是预定共同占领奥地利的四个国家都同样关心的事。⑥美国也有类似的反应。而且伦敦和华盛顿都以某种忧虑的心情注意到下列事实，即两个重要的部——内务部和304 教育部——分别由共产党人霍纳和菲舍尔担任部长，这两人在莫斯科度过部分或全部战争时间：副总理由前共产党书记科普莱尼希担任，这是第三个由莫斯科提名的人选。此外，关于西方代表团进入维也纳问题，月初业已商定，但苏联政府却提出先决条件，要欧洲咨询委员会就占领区和管制组织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在西方看来，俄国人大有可能象他们在罗马尼亚已经做过的那样，企图确保他们在奥地利的地位。⑦英国⑧和美国拒绝承认伦纳政府，并对俄国人不让两国代表进入维也纳提出联合抗议，但无结果。⑨关于承认问题的不幸的意外之事，一直持续到7月份的波茨坦会议，到9月份苏联同意一项折衷方案时才最后解决。⑩写此书时奥地利面临俄国占领的局势。苏联方面没有军政府的组织，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愿意把它行使的职权——如果它存在的话——交给奥地利人。但是，这并不能力他们未经盟国同意就单方面组织临时政府一事推卸责任。

在奥地利本土采取的这些限制性措施是和伦敦欧洲咨询委员会内妨碍议

事的策略同时并用的——顺便提一下，哈里·霍普金斯从1945年5月26日到6月6日以杜鲁门特使身分出使莫斯科，结果改善了总的气氛，苏联直到那时才放弃那种策略。^①

谈判过程是颇费周折而且旷日持久的。美国对1945年1月英国建议^②的正式意见终于在4月初下达给怀南特。美国人同意四国占领区的建议，但对划分维也纳管制区问题提出一系列反建议。他们要求为四国提供足够的行政管理设施，在美国管制区内为美军提供适当的空运设备，为四国都提供在它们几个管制区的过境通行权，还有四国在维也纳内城适当分配设备问题。特别关于机场问题，他们建议英国草案中划出的维也纳美国管制区应与法国管制区对调，以使施韦夏特机场处于美国管制区的范围之内。

对于这些反建议和其他国家随后提出的修正案所进行的谈判，因苏联代表提出一个要求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代表要求不应订一个协议而应订三个协议——一个是关于各国占领区的，一个是关于维也纳管制区的，一个是上述两协议的附录。西方国家预见到这一程序的后果将会使维也纳问题难于达成协议，因此坚持只订一个协议，根据原来纳粹所划定的区界在“大”维也纳范围内各国拥有相等的管制区，而在各自管制区内都有一个机场，至于内城则由四方共管。它们还要求有一份“附加说明记录”，其中四国政府要指令各自的司令官提供共同的必要运输、训练、娱乐及其他设备。苏联最后放弃了订三个单独协议的建议，但仍坚持维也纳协议应以旧城边界范围内的“小”维也纳为基础，坚持苏联占领内城，还坚持维也纳只设一个机场，置于苏联管制区内，由四国共同使用。苏联还建议四国放弃制订一份附加说明记录，而把细节安排留给总司令们在现场解决。欧洲咨询委员会在4月份收到美国的意见之后，几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达成协议。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同意“小”维也纳的建议来换取苏联接受四国共管内城和制订一份四方同意的附加说明记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获得供美国使用的图尔恩机场和供英、法使用的施韦夏特机场，并获得从这些307机场到维也纳市的交通运输权，从而部分地控制了它们自己的空中交通。此后，关于维也纳划分管制区的问题便很快达成了协议，英国得到西南部和东南部的五个区，美国得到西北部的六个区，法国得到西部的四个区，苏联得到东北部和南部的六个区。内城由盟国间的权力机构共同管辖。

在欧洲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的同时，四国政府之间也一直在互相磋商。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在整个5月份内几次三番想进入维也纳，都遭到了阻挠。经过多次拖延，而且直到最后时刻才作出最后安排，但是，英、美、法的代表团各自在温特顿将军、弗洛里将军、谢里埃将军率领之下终于在6月3日抵达维也纳来实地研究问题。^①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初步讨论，可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那么多的限制，以致6月9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杜鲁门，说“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已奉托尔布欣元帅之命于6月10日或11日离开。他们获准看到的東西是严格地限制在市区之内的。答应供盟国使用的只有一个机场。”^②三大以后，他把致斯大林的电报草稿送给总统，内中强调要把奥地利问题当作紧急事务来解决，“好使德、奥问题的整个安排同时实施”。在同一份电报里，他极力主张俄国人撤出目前占领的奥地利英占区的那一部分，同时英美军队撤出德国的俄占区。^③

杜鲁门完全同意这份草稿，于6月14日据此致电斯大林。^④丘吉尔接着发出他自己的那份电报，表明赞同杜鲁门的意见。6月17日，斯大林回电重

申他的意见，认为欧洲咨询委员会应完成其工作；他还说，由于苏联司令官因参加莫斯科的庆祝胜利活动，暂离维也纳，要到7月1日才能开始德、奥两地的撤军工作。最后他承认在德国和奥地利“现在为法国军队确定占领区是合乎需要的”。⑤这些安排得到了履行。

与此同时，西方代表团已回伦敦汇报。亚历山大元帅6月21日在米兰发表讲话，说他们在维也纳受到俄国308人很好的接待，俄国人“表示非常愿意毫不拖延地让盟国在维也纳和他们在一起”。①事实上，正如已经指出的，此后不久在欧洲咨询委员会里达成了最后协议。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对于机场问题和附加说明记录问题的意见分歧一直阻挠着协议的达成。英国代表胡德勋爵士威胁说，如果这些争端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就中止谈判，后来苏联代表接到必要的指示，才表同意。

划分占领区的协议最后是在7月9日签署的，②而必不可少的四国政府批准通知书都是在7月24日收到的。7月16日，四国总司令的代表在维也纳会晤，作出临时安排，又在7月24日至26日之间签署了执行附加说明记录和分区协议总则的议定书。③议定书被称为“参谋长议定书”——至少在英方看来是如此——调整了占领维也纳的军事条件，因此在总的方面使占领顺利进行，它是具有最大的价值的。在柏林则没有类以的协定。

建立管理机构的协议是7月4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签署的，比分区协议的签署提早了五天。这一机构与对德管制机构大致相同。最高权力授予由四个总司令组成的盟国委员会。但总司令各在其本占领区内具有最高权力。四个司令都各有一个政治顾问协助工作。盟国委员会的一切决议都要取得一致同意。盟国委员会下辖一个执行委员会，通过各国所属工作人员来贯彻盟国委员会有关整个奥地利事务的决议。工作人员由各国当局任命，包括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组成陆军、海军，空军、经济、金融、赔偿、内务、劳工、法律、战俘和流亡难民、运输和政治等十二个管理处。盟国对奥委员会——注意在这个名309称中略去“管制”二字，说明奥地利的地位与德国的地位有所区别——的主要任务规定如下：

（一）保证在奥地利实施6月5日在柏林签署的关于战败德国的宣言中的条款；①

（二）实现奥地利与德国脱离关系；

（三）尽快建立奥地利中央行政机构；

（四）为建立自由选举的奥地利政府做好准备；

（五）同时为令人满意地进行奥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好准备。①

第五节 波茨坦会议②

影响战后奥地利前途的最后的的主要国际决定是1945年7月在波茨坦作出的。

5月底，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去伦敦拜会丘吉尔时，丘吉尔告诉戴维斯，他对苏联单方面在奥地利施展策略表示担心，③并于7月20日波茨坦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单刀直入地指控俄国人阻挠英美两国人员进入维也纳和迟迟不让西方去占领已经达成协议的地区。④事实上，如前所述，四国总司令的代表已经于7月16日在维也纳会晤，作出临时安排。因此斯大林能够给予这样的回答：协议现在已经达成，必要的部队调动一两天内即可开始。两天后斯大林在主持会议时宣布，苏联军队现正撤到规定的占领区，英美两国部队正进入各自在施蒂里亚和上奥地利的占领区。⑤实际情况是英国军队于7月24日进入格拉茨。⑥7月24日至26日，四方代表在维也纳再一次会晤，签署“参谋长议定书”时，已安排美国军队从多瑙河以北的地区撤让，那个地区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协议是划归苏联占领的。这样，四国占领区已最后调整到与已经作出的决议完全相符了。①会议后期，丘吉尔为奥地利委员会中英方成员的紧急建议所迫，提出要苏联协助解决不属俄国管制区的维也纳市民的粮食问题，斯大林同意了，因为该市的粮食供应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来自奥地利东部，即俄占区。②

这些问题如此解决之后，下一步是解决赔偿问题。俄国人在雅尔塔已明确表示他们很重视战争赔偿。③莫洛托夫现在提出，奥地利的赔款应定为两亿五千万美元，以物资抵付，六年为期。这一建议立即遭到英美两国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不符合莫斯科宣言中盟国要把奥地利当作一个被解放国家对待的诺言。其后，贝尔纳斯指出，不管怎样，奥地利将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一个国家既要接受盟国的援助又要向盟国偿付赔款，这是荒谬的。因此一致同意不向奥地利要求赔偿。8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艾德礼的问题时，确认了这一决定。当时艾德礼是通过战后英国大选继丘吉尔担任首相的。贝尔纳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这一协议应写进议定书中。”④事实上，这一协议并未写进议定书。⑤然而，贝尔纳斯说，美国代表至少认为，他们离开波茨坦时已经在豁免奥地利偿付赔款方面取得了成功。①8月23日，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官赫克托·麦克尼尔在下议院证实，英国已采取不要求赔偿的政策，正如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②

但是，赔偿问题虽然表面上解决了，事实上却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临时提出，苏联分得的德国国外资产虽然已经包括德国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资产，但也应把德国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加上去。据说，杜鲁门只提了几个问题，没有和他的技术顾问磋商就表示同意了，艾德礼和贝文虽然比较犹豫，但也跟着表示同意。③这个让步在当时显然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让步。代表们都很清楚，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已经夺取了“战利品”，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罢了。当然，“赔偿”二字并未提及。但实际上这个让步正使斯大林如愿以偿。8月2日公布的波茨坦协议关于赔偿部分包括下列两条：④

(八) 苏联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的德国企业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规定以外的德国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 英国及美国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以及德

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涉及奥地利的规定留下了可以随意解释的余地。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联毫不迟疑地利用这一条来为它在奥地利东部进行掠夺作辩解。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假使了解其真实意图，是决不会这样考虑的。这一问题后来成为讨论对奥条约时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一开始没有把它解决好，在以后十年内对奥地利的经济犹如脖子上挂上了一个磨石，甚至在 1955 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奥地利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是为苏联的利益而抵押掉的。

在波茨坦考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奥地利的重要问题是苏联提议把伦纳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会议同意这一问题暂缓解决，等英美部队开进维也纳之后再说，这些部队看来马上就要开进去了。

第六节 盟国委员会首次会议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多几天，第一批西方占领军队就开进维也纳，8月23日，英、美、法三国的司令部正式迁至该处。^①战争已经结束了四个月，盟国对奥委员会可以开始工作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但是一开头就有一个困难要克服。6月3日西方代表团第一次进入维也纳时，^①四国进行了初次接触，关于维也纳的粮食供应问题与苏方当局曾经作过多次讨论。³¹²俄国人起初不愿意帮助解决西方管制区居民的粮食问题，尽管居民的粮食一向是由东部奥地利供应的。西方盟国自然不能单从军事物资内承担这一任务。斯大林在波茨坦答应过协助西方管制区，^②这虽已定为政策，但还需要通过就地正式协商来加以贯彻。由于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巴西执行亲善使命，^③与苏联副司令热尔托夫将军进行的讨论还未能完成最高一级商谈。克拉克将军回来后，8月底四国总司令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举行了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商定于9月11日在维也纳正式会谈，但关于维也纳粮食供应的安排仍未最后取得一致。

会议是在苏军司令部帝国旅社举行的，由苏方代表伊凡·科尼耶夫元帅担任主席。其他代表是联合王国中将理查德·麦克里里爵士，美国的马克·W·克拉克将军和法国的M·E·贝图亚尔上将。他们随带各自的政治顾问W·H·B·麦克（联合王国），J·G·埃哈特（美国），叶·德·基谢列夫（苏联）和L·德·莫尼科中尉（法国），还有四个副高级专员：T·J·W·温特顿少将（联合王国），格伦瑟少将（美国），A·S·热尔托夫将军（苏联）和P·R·P·谢里埃准将（法国），由他们四人组成执行委员会。^①

会后，向奥地利人民发布了一份重要声明，^②宣称盟国委员会从那一天起对奥地利全国性的事务行使最高权力，虽然各总司令据此得在其辖区内行使全权。声明重申以1943年莫斯科宣言作为盟国政策的基础，并宣布下一项任务是相应地产生一个牢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以便重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为此目的，民主党派可以允许通过报纸、电台和公共集会发表政见，作为通向自由选举的一个主要步骤。这一声明表达了委员会旨在及早统一奥地利和彻底肃清德国影响的意图。

会议作出了其他几项重要决议。粮食争论解决了，答³¹³应从9月23日起，维也纳居民的每天口粮定量从八百卡路里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尽快地恢复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以及电报、电话的畅通；三个正式的民主政党，即人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准继续自由开展政治活动；还成立了几个四方委员会来研究并汇报有关复兴的许多紧急问题。^③

会议的气氛是诚挚愉快的，看不出什么不吉的朕兆。从帝国旅社的窗子里看出去，不可能象从施瓦岑贝格的广场上以后专为盟国对奥委员会开会用的大厦里看出去那样，一眼就见到俄国人所竖立的巨大的红军纪念碑。它以施瓦岑贝格宫为背景，造型是一个苏联士兵，一手擎旗，一手持盾，象征着解放。而维也纳人对苏联士兵却已给予“不出名的强盗”这一称号了。

第三章 占 领

第一节 任务的性质

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组织初看起来在许多方面与对德管制委员会有相似之处。驻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于正常情况下每隔十四天开会一次，而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则每隔十天开会一次。①执行委员会对盟国委员会的关系与协调委员会对管制委员会的关系也有某些地方相同，②虽然执行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盟国委员会，而协调委员会则不能代表管制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下面设有许多四人委员会，如同在德国一样，是由若干全国性管理处的主管人组成，在两个委员会中大致上彼此相对应，但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在德国，粮食管理处是同经济管理处分开的，而在奥地利，只有一个经济管理处，它的职责之中就包括了粮食和农业。关于占领区，起初总的组织原则也是相同的，即在每个占领区单独设一个军政府司令部，其下属部门均附设于各个全国性机构。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及其下属四人委员会的主席，和在德国一样，都是按月轮流担任。在取得记录译本的一致和克服 314 语言障碍方面，都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如同在德国一样，只有在政治管理处内，仅用俄语转译或译成俄语，而法语是不用翻译的。

维也纳的组织机构本身也不同于柏林的组织机构。

有一个盟国军事管制总部——这个名称，在两个城市里都是相同的——由维也纳市的四国驻军司令和军政府高级官员组成。但柏林没有共管区，而维也纳的内城则由四国共同管理，从占领一开始，其实际活动突出地表现在由一支国际军事警察来巡逻。巡逻队是乘一辆吉普车的四个军事警察，分别来自四个占领国，各自穿着本国制服。①

就人员招募问题来说，盟国对奥委员会也遇到管制委员会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有些是相似的。开头招募人员比较容易，因为所需人数较少，而申请去做那些在各方面似乎尚合自己志趣的工作者还不乏其人。但由于迫切要求复员和战斗结束时实行各种长期休假制度，这就产生了应募人员能否接得下去的问题。这一点，两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趋向于想在国内寻找一个和平时期的牢靠工作，这时在物色合适的人员方面，两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最后，至少在关于西方政策的调节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延宕和困难，其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问题。拿英国来说，它把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并在一起处理，建立一个特别的管制局，由当时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J·B·海因德来负责。①华盛顿和巴黎的安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这样的趋向，即奥地利问题与大得多的德国问题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可能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容易使一般人把这两个组织机构等量齐观，或者更精确地说，使人们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出发来考虑盟国对奥委员会，正如过去在计划阶段就有过一种趋向，即按德国情况来考虑奥地利本身的问题。其实，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对奥委员会的工作环境是全然不同的，甚至在委员会存在的初期，来自德国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来。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奥委员会与 315 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规模上不同；第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就数字比例来说，在奥地利要管理的人口总数和德国的人口总数比较，几乎少得可笑——是七百万与七千多万之比。奥地利的总面积是三万二千方英里，而德国的总面积是十三万八千方英里。对奥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

员，即使在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超过对德管制委员会总人员的零数。

规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于维也纳，这就使得在奥地利建立机构的问题大为简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虽然决非阻止——发展占领区组织机构而损害集中管制的趋势。盟国对奥委员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维也纳，各种全国性组织的管理处，都相应地距离不远。以英方为例，十二个处绝大多数就都设在申布龙宫内，或设在宫址一端的前党卫队兵营里；其余都设在希青第十三区的征用房屋里。各处之间的距离，乘车只需五分钟，步行也不超过二十分钟。机构这样地集中于维也纳，又说明了四国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在维也纳度过较多的时间，而远不是象初期的驻德司令那样通常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各自的占领区内。^①

维也纳的辖区小于柏林，再加上存在着一个共管区，因而更产生了一种情况，即市内四国管制区的界线并不象在柏林那样划得很严格。四国占领军和奥地利人本身从一个管制区进入另一个管制区从未遭到控制，尽管实际上其他三个占领国的成员为谨慎起见，特别在夜间，并不无限制地进入苏联管制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本来住在苏管区的维也纳人，一有可能，就及早采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区内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区划给不同的国家来管制，特别在占领初期，有碍于经济情况恢复正常，这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件事记录在卷，1945年底法国军政府坚持需要一张许可证，使马里亚希尔费尔街一边法管316区的货物能够送到那一边的美管区。^②然而，在这些保留意见得到适当考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占领一开始，维也纳的统一实质上就保持下来了。

占领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占领初期的几个月内，安全检查也许是造成占领区之间壁垒森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占领区成为重要的纳粹分子或战争罪犯的避难所。而且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匮乏也使占领国和奥地利的地区当局不愿意让货物离开其控制范围。^①如果他们确信这样外流的货物会用于奥地利本国的话，他们也许不至于会过分犹豫。但不合理的情况是，早期对奥地利的边界，特别是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国内占领区界线那样严格。例如，在奥地利南部和东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布肉食的定量，因为牛羊群都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内。^②其结果是各占领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在发展其单独的经济实体。这种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幅员更广阔的德国，如果说这在德国造成了用难和反常状态的话，那末对一个疆域还抵不上德国一个占领区的国家来说，这简直要导致一种悲惨的荒谬现象了。

规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奥委员会象人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管制委员会那样，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差别，是由于前面已提过的第二个因素，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德国是被战败的。而奥地利，至少从官方来说，是被解放的。即使奥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说：“我们战败了，还可以活下去；可是让老天爷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次解放吧”，但差别就在于奥地利人从一开始并不被视为要加以管制的过去的敌人，而是被看做要给以帮助的朋友。确实，在占领之初，如果希望无保留地采取这种友好态度，乃是不能兑现的理想。首先，态度之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四大国间情况之各异。俄国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什么官方意见，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现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友谊，而他们带来的那种赠品却被认为莫名其妙，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个人方

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³¹⁷ 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①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②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法方在四国谈判时则以东西方的调解人自居，以弥补它本身比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点，但它这样做却能为达成妥协性解决办法作出可贵的贡献。要它不再充当这种角色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其他两个西方盟国那边，这只能是逐步的。

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最愿意看到奥地利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如果他们对许多奥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到底，而且有些人还正式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么他们简直是有乖人性。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内，美占区和英占区都禁止和奥地利人友好。^③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区约为7月底，^④在英占区则稍微早一点，原因是6月29日丘吉尔给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备忘录。^⑤³¹⁸ 此外，当三个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关于苏军暴行的传闻充斥于耳。过一些时候，他们才明白那些传闻有许多是确有其事的，并非象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以为有人希望破坏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忠实地照搬戈培尔之流的宣传。

然而，这些保留态度都是暂时的。盟国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毕竟要区别对待，这是根本的。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意味着猜疑较少，神经紧张较轻，任意使用强权的诱惑力较弱，对人类苦难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抑制力较小。它也意味着总的看来，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奥地利人一开始就受到了鼓励。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国到达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的核心。尽管俄同士兵有过种种不正当的举止，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有组织地进行过掠夺，但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且允许这个政府在苏联控制区范围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在其他占领区内，三个西方盟国都通过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别人更早一点允许在州一级基础上成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采取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原则。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占领国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同时期的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还有一点是战争破坏的相对程度。奥地利的伤亡人数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踪者估计为三十五万人，伤十七万人；^⑥1945年底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是战俘，大多数在苏联。这对总数只有七百万的人口来说，遭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空袭与战争的破坏，奥地利也未能幸免。德国人在林茨

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联合企业；在兰斯霍芬有一个制铝厂；德国梅塞施密特垄断组织在维也纳新城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工厂。这些目标和其他工业目标都遭到猛烈的轰炸——在维也纳新城，经过联合轰炸和最后几次战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无损，城内人口从 1944 年的四万五千人减至 1945 年 4 月的八百六十人。②在维也纳市内，许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砾成堆；街灯荡然无存；运输缓慢得犹如涓滴细流。然而，按比例来算，这种破坏程度还不如德国之巨大，因为德国的工业城市是既大又多。在相当多的奥地利农村地区，村庄和小 319 市镇实际上还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奥地利西部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从未发生过战争。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委员会开展初步工作，比在德国面临的相应任务要轻松得多了。

最后，如果加以比较，谁都知道，奥地利人民和德国人民在性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我们假定奥地利不是被解放而是战败的，这种性格也一定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把性格一般化了，那是很危险的。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居民之间，他们的性格区别也许不太明显。但从总的看来，区别是仍然存在的。奥地利人具有这么一种特性，他们的敌人称之为懒懒散散，不负责任，他们的朋友则称之为快快活活，宽恕容忍，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悲惨。这种特性是“摇摇欲坠的帝国”互让互谅的产物，是奥地利人处于欧洲的一个十字路口的产物，是他们相对地接近地中海的古老文明的产物。这种特性具体表现在他们偏爱莫扎特的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而不喜欢瓦格纳的宏伟的英雄乐章。盟国对奥委员会的成员完全不受此种性格的潜移默化和息怒消疑的影响者，确实是寥寥无几。

第二节 政治发展

（一）1945 年的选举

在 9 月 11 日盟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盟国对德政策和对奥政策的总区别，已如前述，①由委员会的声明加以阐明了，声明说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创造条件。9 月 20 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对此继续加以研究，一致同意伦纳提出的邀请西部诸州代表来维也纳开会的建议。①西方各国的成员，特别是英方成员，迄今为止以临时政府无充分代表性为理由一直未予承认，而伦纳也同他们一样，急于要消除这种反对的理由。

伦纳建议的会议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在黑伦街下奥地利州议会召开。②其结果是实际上扩大了临时政府，因 320 为增添了来自各州的人民党新部长。这些新部长中有外交部长格鲁贝尔，他是蒂罗尔州临时政府的州长；有一个负责财产管理的国务部长，还有几个副部长。会议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西方盟国对于共产党人弗朗茨·霍纳担任内务部长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伦纳也意识到西部诸州都有类似的不安。为了照顾西部诸州和西方盟国的情绪，会议建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监督普选的安排和控制警察。③这个委员会由人民党成员两名、社会党人两名和共产党人一名组成。其次，会议建议 11 月份举行大选。这些措施大有助于消除西方盟国的忧虑。10 月 1 日，盟国委员会同意向四国政府建议把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并给予有条件的承认。但在 10 月 20 日的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此通过正式决议，重申盟国委员会是奥地利的最高权力机构，临时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但必须置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之下。会议还规定大选应不迟于 1945 年 12 月 31 日举行，并授权临时政府通过适用于全奥地利的法律，其条件是这些法律要经过盟国委员会批准，并不得与军政府的法律相抵触。①

联合声明的和谐调子为第二天苏联政府的行动所破坏了：苏联政府单方面通知奥地利临时政府，说它决定完全承认该政府并互派大使。②但从其后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西方的忧虑好象又一次证明是被夸大了。7 月份又召开了两次州会议，起草了举行选举的建议，包括剥夺纳粹分子选举权的规定。这些建议得到了临时政府的同意和盟国委员会的批准。③11 月 25 日，奥地利全国开展中央议会和州议会的选举。

投票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它是在山区冬季雪封之前举行的。尽可能在大黑前收齐票箱，计算选票。④如前所述，监督工作由各党派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然而，选 321 举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也没有任何关于徇私舞弊的指控，这一事实是令人可惊可佩的。不应忘记，自 1930 年以后，奥地利人民没有参加过普选，而当时的国内局势也决不是稳定的；褫夺纳粹分子的公权自然要产生一种不满的因素；对选举的实际监督是由缺乏经验、尚未完全组织好的警察执行的。可是，在西方人看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苏占区内没有任何干涉，那里的公民到投票场去投票，享有与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同样的自由。

投票率是很高的——为应参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右翼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一百六十五席中的八十五席。社会党人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七十六席。共产党人获得百分之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四席。①选举结果有趣地证明，尽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两次大战间的党派先后在陶尔斐斯、许士尼格以及纳粹

的独裁统治之下遭受压制而销声匿迹，但奥地利人的政治忠诚还是坚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国的初期一样，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投人民党的票，而城镇则投社会党人的票。但与 1934 年前那段时期比较，社会党人已经改善了他们的地位。在维也纳本市，选民的大部分选票是集中的，社会党人赢得的选票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七，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证明除因斯布鲁克外，各州首府对他们的支持都有所增长。

在选举期间，三个政党都约定继续结成联盟，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新政府，以人民党领袖利奥波德·费格尔为新总理。12 月 8 日，盟国委员会接到了推荐的新部长名单。部长职位按比例分配给两个主要政党：人民党八名，社会党六名。余下两个职位给无党派人士，一个职位给共产党。按照严格的公平合理做法，共产党所获选票甚少，分配名额是没有份的——当然也不能保留原来共产党人的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职务。然而，人民党领导人认为完全排除共产党人是不策略的，因此新建一个动力和电气化部，由共产党人任部长，目的在于继续取得该党的合作。这一着是厉害的，使共产党没有理由诉说自己受到歧视。322 盟国委员会没有立即批准这份名单。特别是苏、法两方对于曾与纳粹有过瓜葛的几个人表示不同意。①经过四次调整，包括否定尤利乌斯·拉布（后来他在 1953 年当上了总理），盟国委员会才在 12 月 18 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批准了调整后的名单。②12 月 19 日新国民议会召开会议。12 月 20 日又召开了国民议会和上院联席会议。上院是同时由各州议会选举的。卡尔·伦纳博士当选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总统，所得票数为二百零五票中的二百零四票，一票弃权。③伦纳任命人民党领袖利奥波德·费格尔为联邦总理，社会党领袖阿道夫·谢尔夫为联邦副总理。

菲格尔抓住时机宣布他的政策。他在 12 月 21 日的议会开幕词中强调，为了重建和恢复奥地利的自由，需要各党合作，需要重建一支独立可靠的警察力量和司法体系。他呼吁占领国放宽占领区之间的往来限制，并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奥地利进行经济援助。同时他极力主张奥地利有必要与四国合作，他说奥地利虽然是“倾向四方的”，但一向是“传统的通向东方的门户”。因此，它自然要寻求与多瑙河流域重建贸易关系。①

这项政策是无懈可击的。1946 年 1 月 1 日，盟国委员会正式承认了奥地利共和国，其后与新政府互换了政治代表。②盟国驻维也纳的代表就是前已提到的那四个政治顾问。③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次大选和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经四国正式认可的奥地利政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向外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奥地利的民主精神虽经多年的独裁统治和战争，却远远未被压服，不仅能够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成熟了。两个主要政党各自抛弃了战前基督抄社会党人某些比较极端的教权思想和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伦纳政府当政期间，他们已经显示出能够在一起共事，其合作程度是第一共和国时期所难以想望的。现在他们表明毫不迟疑地同意 323 把这种合作继续下去，而且在职务分担方面几乎没有耽搁什么时间就取得一致意见。其所以更为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即使在各自的观点方面较少地趋向极端，但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纲领，而这个国家的几个地区仍然非常明显地信守其旧时的政治忠诚。

如果说往日左翼与右翼间的泾渭分明在今天再一次得到肯定乃是确切无疑的话，那末问题也极为明显，奥地利人民是不想和共产主义打交道的。西

方国家从这一点上得到了双重保证。这不仅仅是一个吉兆，预示奥地利将保留在西欧民主国家的结构之内发展其政治前途，而且在下列事实上也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迹象，那就是俄国人在其占领区内允许选举自由进行，而且丝毫不想加以干涉。有人议论说，如果俄国人已经容许在奥地利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其他东欧国家说不定也有希望能和平地朝着民主方向发展，虽然从一切表面现象来看情况是适得其反的。

然而，事实真相似乎是这样，苏联当局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人竞选的实力，到选举揭晓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似曾估计共产党人可获选票高达百分之三十。如果选举结果真是如此，他们大概希望共产党人仍可掌握内务部和教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在适当时机好从中渔利。选举的实际结果显然促使他们要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政策。事实上克拉克上将已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次选举标志着苏联除搞假合作外，确已无计可施了；并继续说，不久以后他们就着手既要限制苏占区内奥地利当局自由，又要不顾选举结果给予共产党人以较大的特权。^①但在当时，苏联观点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了。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说明共产党获得选票之低，总不能说西方盟国在苏占区内施加了影响。苏联方面不可避免地丢了面子。在任何人的心目中，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苏军在占领初期的所作所为确实使奥地利人丧失了对共产主义可能产生的任何同情。

更为有趣的是，尽管苏联在政治标准上推行真正温和的政策，但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苏联当局单方面批准成立奥地利临时政府，是不符合一致同意的盟国计划的，这自然或多或少引起埋怨和猜疑。与此同时，伦纳本人决不能称之为亲苏派，他的确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清楚地写过，他在和苏联军事当局谈话时明确表示过这一点。^②再进一步说，每一个部除部长外，再任命两个不同党派的副部长，保证了临时政府成为真正的联合政府。当时所有的报道一致说，伦纳政府在当时苏占区范围内享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③但严峻的事实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资以使战后的混乱变得井井有条的时候，在一切动产都被当作战利品运向东方的时候，理论上的自由是无济于事的。

如前所述，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所采取的政治态度与俄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采取的态度比较，事实上要谨慎得多。一位记者有点夸大其词地总结了这种情况，他说：在苏联占领区是有自由而无物资，在西方占领区则是物资多而无自由。就政治自由而言，到选举开始就一反原来的趋势了，虽然情况还不是立刻和全面的改变。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了各州政府，国家日常管理工作的责任大部分交给奥地利人自己去担负，占领国的任务自然减轻了。在以后许多个月里，主要问题是带根本性的生活问题，即提供粮食和公用事业，以及恢复国家经济。在这些方面，奥地利的确是一定要依靠盟国的。但这次选举还是标志着奥地利向恢复自由迈出了明确的一步。

（二）新管制协定

尽管经过了选举,盟国仍得按照 1945 年 7 月 4 日欧洲咨询委员会有关管制机构协议的条款①对奥地利政府进行管制。的确,选举后不久,盟国委员会正式通知奥地利政府,把奥地利的法制推行到整个奥地利,不得解释为否定盟国管制和监督“奥地利政府和向该政府负责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行动”②的权利。事实上,奥地利政府所通过的每项法律仍然要盟国委员会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虽然法律管理处除了批准外要提出什么建议,那与其说是常规,不如说是例外,①但是否决权仍然存在,而且在 11 月份委员会要求废除临时政府关于军事方面的一切法律时,就曾行使过否决权。②

在已经举行过选举并按选举结果成立了自由选择的政府之后,这种情况还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且的确是同莫斯科宣言的规定完全抵触的。这种情况预示奥地利人更加坚信他们要不失时机地对之发表意见了,而时机很快也就到来,那是因为关于宪法问题的情况令人不满而造成的。

1945 年 5 月 1 日,在临时政府赞助下连续印行了政府公报,其中有五种法律的文本。这些法律谋求调整奥地利的地位,把原来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同时恢复 1929 年宪法的条款。③新选举的菲格尔政府于 1945 年 12 月 19 日通过一项法律,再次肯定这些较早的立法。④虽然盟国委员会里的三个西方国家成员准备表示同意,但苏联代表却加以拒绝。由于盟国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得到一致同意,只能对这项法律拒不认可。

①此外,由于苏联的坚持,1946 年 3 月 30 日盟国要求奥地利政府不迟于 7 月 1 日提出“一份依据民主原则的永久性宪法”。②因苏方反对而否决了临时宪法的消息由美方透露给新闻界后,③立刻引起了反应。奥地利新闻界抗议苏方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他们在 1945 年 5 月单独控制维也纳时同意通过法律,毫无意见,而现在却提出反对。接着费 326 格尔于 4 月 12 日在国民议会发表一篇演说。几天以后,伦纳总统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机会用独特的生动语言描述了他的政府的困难处境。据报道,他说:“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四大国希望我们用什么模子来塑造一部宪法呢?要我们仿效苏联的宪法,或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吗?要我们模仿美国的总统制,或者法国的宪法吗?法国宪法本身尚不存在。④各式各样的抗议以国民议会向盟国委员会提交一份正式决议而达到顶点。到 7 月 1 日,新宪法尚未提出。但盟国委员会并不采取行动。事情就到此为止,因为情况是这样,实际上经新政府再次肯定的伦纳政府的立法仍然生效,而奥地利宪法乃是 1929 年修改过的 1920 年的宪法,再加上解放后通过的一切补充性的法律。

在 1946 年的春季和夏初,又向盟国提出了几次申诉,要求放松其严格监督并履行它们的正式保证,给予奥地利以自由。①强有力地指出,一个经过自由选举并得到承认的政府,居然把立法交给外国,这种怪事真是空前未有的。此后不久,社会党人副总理谢尔夫博士在他和一位社会党议员皮特曼先生非正式访问伦敦时,得有机会就这方面的问题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意见。②但就英国而言,事实上修改 1945 年 7 月的管制协定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早在 11 月选举之前,委员会中的英方成员就已经对此着手工作了。1946 年初,在政治管理局内,四方开始讨论英国的草案,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③保留权力问题,在占领初期已经造成了种种困难,看来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对这件事的达成协议,也要起阻碍作用了。但是,经过几个

星期的谈判，在 6 月份英方担任主席时，以英国草案为基础的新协定最后提交盟国委员会，并于 6 月 28 日签署了。^④新协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进步。无怪乎 9 月 29 日伦敦 327 纳在人民剧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①有鉴于迄今为止奥地利政府的一切法律都必须获得四国的批准，因此新协定的第六条把这种规定只限制在立宪性的法律方面。至于其他一切立法措施和国际协定，如果在盟国对奥委员会收到后三十一天内，奥地利政府没有接到该委员会持有反对意见的通知，则可视为盟国委员会业已批准。既然在这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盟国委员会作出决议时仍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新协定中规定的任何不属于立宪性的措施，即使得到占领国中一方的批准，也不能再对它正式宣布反对。当然这是协定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但除此而外，更进一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放宽了管制。第四条规定，除少数情况外，盟国委员会应消除一切“对奥地利内部人员往来、货物运输及其他交通方面尚存的限制”，这样一来，占领区的界线就可以视为“各国高级专员职权范围的界线和占领军驻地的界线”了。此外，还允许奥地利政府组织一个管理关税和疆界的机构，盟国本身要尽快地把一切关卡和管制旅行的职能移交上述机构，但不得妨碍占领军的军事需要。协定宣布奥地利政府可以自由地与联合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但与其他政府建立关系，则必须事先得到盟国委员会的认可。

占领国只有在这样一些领域内特别保留其权力，可以采取直接行动，这些领域就是有关非军事化，保护联合国家或其侨民的财产，管制流亡难民，在奥地利本身建立管制措施前对进出奥地利的旅行予以管制，以及追查和逮捕四国中任何一国所需要的人员或国际法庭所需要的战犯等等。除了这些领域，以及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和保证贯彻盟国委员会的指示的比较全面的目的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委员会只是通过奥地利政府或其他适当的奥地利当局来行动。新协定还在第一条中规定奥地利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但奥地利政府及其一切下属机构都应执行盟国对奥委员会下达的指示。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重要的限制，因为委员会不经过一致同意是不能发出任何指示的，而自此以后，能够取得一致同意 328 的问题，则为数更少。一方面三个西方国家都把新管制协定解释为是要尽可能给予奥地利政府以广泛而充分的权力，因此都不愿意采取任何二种好象没有必要去侵犯那种权力的措施。另一方面，苏方则持有相反的看法，而且实际上是在试图限制新管制协定所给予奥地利的自由。苏联当局的态度当时引起了某种惊讶，的确有人在猜测苏联人签署新管制协定时也许是没有充分了解其含义。但根据英方领导成员的消息，苏联副高级专员热尔托夫将军在新协定签署前本来是反对第六条第一款的，其确切理由是不难想象的，即所谓“我们还在睡觉，法律就已生效”。在莫斯科，协定的全部含义说不定是慢慢才被理解的，尽管看来未必如此。但不管怎样解释，苏联的签字显然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苏方在 8 月份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盟国委员会提出两份特别针对第六条条款的文件。第一份文件谈的是立宪性法律的定义问题，这是执行委员会致总理函件的草稿里提到过的。苏方认为，5 月 31 日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那个有问题的定义，事先没有送交盟国委员会审批，因此在法律上无效。实际上委员会中所有三个西方国家的成员都记得盟国委员会早就讨论过定义问题，并特别同意由执行委员会把它拟定出来。西方代表指出，这一定义在 5 月 31 日被采纳后当即成为新管制协定的基础，而现阶段苏方却加以反对，这说明他们是想取消协定中的一部分内容。

苏联的第二份文件是关于新管制协定如何实施问题。这一文件的内容是要获准使一项决议得以通过，使盟国委员会得以“保留其原先控制奥地利各部的职权”。并“按新管制协定的条款来实行管制”。当然，这等于是违背新协定的整个精神。盟国委员会中的其他三国成员都直率地指出了这一点。由于他们联合反对，第二份文件未予讨论。^①329 苏联在盟国对奥委员会中的实际做法是对一致同意的决议在字面上做文章，而不坚持那种显然经不起一驳的错误解释。什么构成立宪性法律，什么不构成立宪性法律，这是苏联代表所孜孜以求的问题。虽然他们想使执行委员会 5 月 31 日决议无效的企图未获成功，但在 9 月 27 日盟国委员会讨论奥地利政府的“货物运输法”时，他们又进一步施展手法了。9 月 20 日，这个法案提交执行委员会，西方三国成员已经同意，苏方成员却提议加进一条，使法律不能适用于“属于占领国的财产和货物”。西方三国成员指出，占领国的财产和货物问题在新协定中已经得到了保障，而且这项法律不是立宪性的，所以应按“三十一天规定”于 9 月 23 日生效。当时苏联代表宣布他们保留在自己占领区内不实行这一法律的权利。9 月 27 日，这项法律提交盟国委员会时，苏联高级专员再次表示同样的态度，所持的理由是它有害于苏联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他是不能让步的。

关于奥地利按照新协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其他许多方面，其情节大都如此。盟国委员会已经授权奥地利政府与所有承认它的国家——德国和日本除外^①——互换外交代表，而现在是迅速采取行动，按第七条规定授权奥地利与联合国家政府保持外交和领事关系，这样到 1946 年底已经有了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的核心驻在维也纳，以保证外国政府能不断获得有关奥地利国内情况的可靠消息。一旦奥地利要参加国际组织为成员国，不管这些组织是不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早在 1946 年 3 月，奥地利曾派过一个代表去参加日内瓦教育会议国际局。^②但是，它所处的反常地位使它在正式会议期间只获准以奥地利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下一个月国际联盟本身就在会议期间解散了。尽管有了新管制 330 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盟国委员会在年底之前对奥地利总理关于奥地利要求申请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通知一直未予审议。1946 年 5 月，奥地利总理要求恢复奥地利在国际工人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盟国委员会在 8 月和 9 月两次予以审议，都因苏联的反对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苏联反对的理由是国际工人组织是国际联盟的产物，而国联现已不复存在了，奥地利应成为联合国相应组织的成员。^①11 月间。总理又提出这个问题，通知盟国对奥委员会说，他认为根据新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奥地利有申请成为国际组织成员的自由，这时苏联代表坚持说，在他看来，四国对此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必要的。其余三国代表不同意，于是这个问题又退回政治管理局。这些事件中的第三个例子是 1946 年 10 月奥地利请求允许它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一回委员会中的苏方成员只是说，他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年内，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讨论。^②

然而，苏联的反对实际上不能阻止奥地利政府单独向这三个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因为奥地利政府明白，其他三个占领国是会支持它的。到一定的时候，这些组织部接纳了奥地利，从而加强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费格尔政府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行动和其他悍然不顾苏联反对而采取的行动一样，是极有胆略的，因为虽然奥地利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承认，而且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

很大的可能性，即此类行动不会导致个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实际上的威胁，但危险总还是有的。1946 年间，公共安全在维也纳绝无保障，绑架官员的事件也不是无人知道的。^①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可以按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审议 331 的问题几乎都一律遭到同样的对待。在政治管理局，三个西方国家的成员总是同意奥地利的提议，而苏方总是反对。这样就要执行委员会和盟国委员会来作决定，而在这两个委员会内，的的确确也只是老调重弹。问题就这样过去了，只在会议记录上记下了意见不一致。结果是把问题再交回奥地利政府。奥地利政府则等待规定的三十一天到期，把法律或其他立法措施予以颁布或在奥地利政府公报上发表。

（三）非纳粹化

占领国宣布的两个首要目标是清除奥地利的纳粹影响和使奥地利脱离德国。这两个过程实际上被认为是建立任何永久性奥地利政府的根本性预备措施。战争结束后，四国从到达这个国家的最初时期开始，就在各自占领区内着手工作以期达到上述目标。他们所遵循的政策也许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在苏占区内，奥地利当局在很早阶段，即伦纳临时政府成立一周之后，就采取主动，通过了第一个非纳粹化法（第十三号禁令）。接着是6月6日的禁止法，6月26日的战争罪犯法和9月份工业部门清洗法。①这些法律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样一种政策，其主要内容是：1938年3月日日参加纳粹党者被宣布为犯有重大叛国罪，②在纳粹占领下加入纳粹党的奥地利人被认为可以从宽处理，但地方长官以上的纳粹党高级官员则应视为当然的战争罪犯，情节最严重要处以死刑。这种政策于解放之后就立即开始在俄国人占领的地区内贯彻执行，当时的伦纳政府就在这个地区范围内行使其权力。在此时期，俄国人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都是通过奥地利的有关部门执行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以共产党人弗朗茨·霍纳为首的内政部执行。

在维也纳成立盟国对奥委员会之前，其他三个占领332区内，由西方盟国各自执行其政策。无可否认，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政策都是旨在集中处理主要的纳粹官员和战争罪犯，对小人物则从轻发落。但实际做起来是五花八门的。

在西部占领区内，美国军政府有好几个星期并未着手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因为奥地利是以一种不曾料到的方式解放的——这就是说，军政府的官员原来是要去德国的，①过一段时期他们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给专门来奥地利服务的同事。此外，当法国人进驻从美占区划归他们占领的那部分地区时，这部分地区的工作又作了第二次移交。在英占区内，初期的活动不得不只限于卡林西亚，在那里一开始就能够贯彻原定的总政策，因为配备执行奥地利军政府任务的官员是随着第八集团军从意大利进入占领区的。在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对于奥地利当局本身应准予协助进行非纳粹化工作到什么程度，都存在着混乱，那种混乱持续地存在着。

10月份盟国承认了临时政府，接着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展到整个奥地利。这本应意味着原来非纳粹化法律的效力也同样会扩展到全奥地利的。其实不然，因为临时政府的一切法律须经盟国委员会正式批准才能在全奥推行，而非纳粹化法律直到12月才被批准。因此，西方国家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工作暂时仍然由各占领国紧紧掌握，其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1945年10月31日，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由四国组成的非纳粹化工作局，旨在使这项工作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②可是还没来得及考虑问题，费格尔政府成立，情况又起了根本性变化。这就使通过奥地利当局来进行工作，更有其必要了。1946年1月10日，盟·国委员会对这一客观现实给予某种程度的承认，要求奥地利政府在内务管理局的总的监督与管理下，于两个月内彻底清洗民事部门上层三个等级中的纳粹分子，而且允许该政府自由制定和贯彻自己的反纳粹法律。然而，盟国对奥委员会保留权利，撤换国家管理机构或私人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或高级职员，只要他们是进行过直接反对盟国或奥地利民主力量的纳粹活动，即使这些活动333根据非

纳粹化法律还未一一列入专门项目之内。①这一要求所产生的总的效果是把非纳粹化工作的执行权从占领军手里移交给奥地利人，但盟国行使自由决定权而采取直接行动的清洗除外。虽然在这一年内盟国委员会有理由抱怨非纳粹化行动过于拖拉，但从总理给盟国委员会的定期报告来看，进展还是相当大的。7月26日费格尔报告说，奥地利政府从公用事业和工业岗位上撤换了二十七万名纳粹分子。②6月份建立的内阁会议到年底已经“甄别”了大约一万五千名主要文职官员。在同一时期内，应盟国的要求，有四百零八名重要文职官员和实业家已被撤职，而由奥地利主动处理的约五千余名。9月15日，总理报告说，共有三万九千名奥地利文职官员已被解职或发给年金令其退职，还有二万六千名尚未处理。年底也有一份类似的报告，谈到在私人企业中采取行动的情况，说有二万五千名高级职员和二万八千名雇员已被解职。①

与此同时，政府着手制定一项新的非纳粹化法律，可使整个工作进程按一个恰当的统一标准开展。这项法律最后在7月24日由奥地利议会通过，送交盟国委员会。委员会中的苏方成员反对这个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法方成员也多少表示反对，到12月才取得一致同意，其代价是作了近五十处修改，大大加强了这整个法律的严厉性。②奥地利政府不喜欢那许多修改之处，因为接受那些修改，简直要使已经严重缺乏有能力的文职官员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接受修改和通过这项法律是同奥地利订立和约的先决条件，而订立和约的谈判已定于新年开始，因此修改的内容逐步被吸收到这项法律的新文本中，终于在1947年2月6日被通过了。

这项法律要求对以前的所有纳粹分子进行登记，并根据他们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和履历来一般地划分为“有牵连”和“较少牵连”两大类。它还规定按罪行轻重进行惩处的等级。惩治办法从禁止在某种职业范围受雇到支付“赎罪税”，各不相同，而且可以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再罚或不再罚。这项法律的实施交由奥地利非纳粹化官员去执行，这些人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一切有关系334的奥地利人和盟国当局保持联系，并对行政机构的非纳粹化工作个人负责。

1947年这项法律的实施，其时间已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盟国委员会对法律进行修改使它更为严格之前，这项法律与临时政府通过的早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合在一起来看，其总的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奥地利政府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已决心肃清希特勒主义的流毒了。也应该说，1946年9月1日由奥地利当局登记的前纳粹党员或候补党员不下五十三万六千人，其中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人是党卫队员，六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人是挺进队员。①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在一起，在全体选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实际情况是，登记的纳粹分子数字超过了奥地利最大政党的党员数字，②因此他们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对之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忽视。

（四）君主主义者的活动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奥地利政府经盟国委员会同意对于 1946 年初哈布斯堡王族成员在奥地利重新露面所采取的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和罗伯特大公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法国的一些支持，而在奥地利本国，他们的事业在早期受到过奥地利人联邦同盟的支持。1946 年初，他们在维也纳法国管制区内露了面。社会党报纸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奥地利政府赶紧重申，前共和国所通过的并在宪法里体现的有关驱逐不肯宣布效忠于共和国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法律仍然有效。继而又通过内务部发布一项正式命令，驱逐那两个大公并解散奥地利人联邦同盟。^①1 月 22 日，法国高级专员贝图亚尔上将在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声明那两个大公进入法管区并未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会议通过决定，保证委员会将帮助奥地利政府执行把哈布斯堡王族逐出奥地利的法律。^②2 月 25 日，委员会采取最后的逻辑上必然的步骤，正式禁止组织任何君主主义的政党。^③

（五）奥地利的报刊

正如奥地利的政治活动几乎在尚未完全解放时就重新恢复一样，奥地利的报纸在苏军到达维也纳刚刚两周之后就复刊了。^④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是《奥地利报》，“为维也纳居民办的红军报”，1945年4月21日首次发行。可是，仅仅三天之后就出版了奥地利人办的第一张报纸《新奥地利报》，它是在三党联盟主持下出版的，后来这三党联合组成临时政府。过了一段时期，直到8月5日，1895年创刊的社会党《工人报》和1929年创刊的右翼《人民小报》都在街头再次出现了。在同一天，新的共产党日报《奥地利人民之声》也创刊了。在此阶段，按照苏联的政策，俄国人是反对奥地利报刊这样复刊的。他们也许可以指望编辑们在这个阶段谈到占领国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但是，就苏联严格控制国内报纸而言，他们竟肯让具有这种传统的奥地利报纸复刊，在西方观察家看来，真是十分奇怪的事；1945年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时，也都仿照苏联的先例，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报。8月26日，美国的《维也纳信使报》创刊；9月18日英国的《世界新闻》初版问世。这时，逢星期一没有日报，法方对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特别机敏，11月12日出版了《维也纳星期一报》以填补这个空隙。然而，这份报纸到1946年2月25日就停刊了，法方从2月18日起即以《星期一世界报》来取代，而在1946年10月1日又出版《世界晚报》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奥地利官方报纸《维也纳报》于1945年11月12日复刊，开始其第二百三十八年的发行。11月21日，第一份非德语报纸《英国晨报》第一次在维也纳问世，它原来是由英方于这一年的夏季在其占领区内出版的。

这样，到1946年底，维也纳的情况如下：^①

晨报《奥地利报》（苏方）

《新奥地利报》（无党派）

《工人报》（社会党）

《小人民报》（人民党）

《奥地利人民之声》（奥地利共产党）

《维也纳报》（官方）

《英国晨报》（英方）

午报或晚报《维也纳信使报》（美方）

《世界新闻》（英方）

《世界晚报》（法方）

星期一版报纸《体育日报》（地球出版社——共产党控制的报纸）

《星期一世界报》（法方）

西方国家对奥地利报纸最初的态度表明是有保留的，这和它们对待奥地利政党的态度相似。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周内，在西部占领区内都没有奥地利人办的报纸，这和苏联占领下的维也纳的情况是一个奇怪的对比。到盟国对奥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政策才互相协调，其代价是在维也纳实行某些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即使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在维也纳人看来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因此，10月1日盟国委员会在正式确定奥地利的出版自由时，同时规定不许任何报纸批评盟国委员会或盟国军政府，不许发表任何针对盟国政策的批评意见或有损盟国团结的文字。^①自此以后，情况开始逐渐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盟国允许在其占领区内出版属于主要政党的地方报纸，并倾向

于允许这些报纸的编辑逐步取得较大的自由。另一方面，苏方则逐渐开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解释 1945 年 10 月 1 日的决定，而且不时勒令违反该决定的报纸停刊或受惩罚。1945 年 12 月 28 日，盟国委员会向所有编辑发出通知，提醒他们有义务遵守 10 月 1 日的决定；②1946 年 5 月 10 日也作出决议警告右翼的周报《车辙》。③象这种能为四方成员一致支持的行动是罕见的。3379 月 13 日，苏联企图撤换社会党《工人报》的编辑，就未能获得成功。④

但是，如果说这种程度的监督已被奥地利人所憎恨，认为是盟国不能遵守莫斯科宣言的诺言的另一例证，那么它和盟国控制新闻纸而强行限制出版相比，引起的怨言毕竟要少得多。西方盟国决定出版自己的日报以与苏联的《奥地利报》相抗衡，这就使奥地利人的新闻纸供应受到很大影响。1946 年，这个国家的新闻纸总耗用量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吨，盟国报纸就用去不下一万零九百七十一吨，即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⑤占领的原来目的由于冷战危机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恐难找出更明显的例子了。

第三节 经济发展

(一) 引言

在 1945—1946 年间,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经济工作方面需要考虑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问题,需要维持粮食供应,避免产生大规模的饥馑。第二个是逐步由奥地利人自己承担政治责任。第三个是东、西方盟国间在早期出现的政治分歧。第一个问题意味着经济管理处除了搜集情报为将来的行动打下基础外,对整个经济的恢复几乎做不了什么工作。重点全放在救济工作上,实际任务主要是对从盟国库存中所能调拨的物资输送给奥地利加以监督而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奥地利政府的担子越来越重,而盟国对奥委员会经济管理处的责任则越来越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到 1946 年经济管理局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东、西方盟国之间的争论上。一般说来,西方力图促成奥地利的经济独立,而苏方则力图予以削弱。从 1946 年春季以后,又有第四个因素以当时在奥地利开始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团的形式出现。^①这个代表团是在盟国委员会总的领导下工作的,当然与经济管理处有紧密的联系,但对于日常工作,代表团则和有关的奥地利当局 338 直接联系。因此,后者几乎一直不能处于较好的境地。一方面没有外援,他们无力恢复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听来自不下五个不同方面的意见,而意见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如果他们不想甘冒失去所需援助的危险,他们就不得不表面上把意见全部接受下来。好在他们尚称有幽默感和外交手腕。

但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经济恢复不同于政治恢复,不仅是广义地恢复第一共和国时的状况。自 1938 年以来,在经济平衡方面有过许多次实质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远有甚于纳粹思想,对未来的长远计划必然要起决定性作用。

到 1938 年,第一共和国依靠旅游业、大力发展的农业和稳定的出口贸易,建立起一个虽不稳固但却合理的独立经济基础。当时以国际联盟借款的形式来不断输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看来如果能够适当地审慎从事而和平又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经济前景决不是暗淡的。可是就在那一年,奥地利在政治上已被消灭,随后的七年扼杀了它在经济上刚出现的独立格局,使之成为德国战争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工业产品扩大了,原料生产增加了。为了把传统的经济重心从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移向较近德国的一些地区,在林茨建立了重工业综合企业,使炼焦炉、炼钢厂和制氮厂联合起来,还有多瑙河上的一个大港口为其服务。这个港口后来与德国的几条河流连接起来。在兰斯霍芬建立了一个制铝厂,在伦青建立了一个木质纤维毛纺厂。^①结果造成农业劳动力因流入城市而日益枯竭,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的有意识的削减,以抵消东欧和乌克兰的被征服地区对德国供应量的增加。最后,纳粹在吞并奥地利前,通过直接所有权,掌握股票和卡特尔协定所取得的对奥地利经济的间接控制,已经变为紧密的直接控制了,这是因为纳粹占领奥地利后立即把大宗股票和其他产权转入德国人手中,并用大批德国人取代奥地利人充当经理。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德国资 339 本对奥地利的渗透是如此残酷,以致大多数奥地利工业已经成为“纯粹的德国财产”了。^①

导致这些变化的资本扩张,有许多显然会有利于和平时期的奥地利经济。但也有其不利之处。因为它是为德国的利益而不是为奥地利的利益设计的,而且是适应于战时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需要的。如果从奥地利本身的观点

来考虑，不少工厂的建厂地点并不合乎经济原则，而且在原料供应方面以及对奥地利工农业之间劳动力分配所产生的总的影晌方面都留下了种种困难。但是，这些对第二共和国未来的有利之点和不利之点，在 1945 年 4、5 月间都是无关宏旨的。因为整个经济体制已经瘫痪了。在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作战时期，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工厂装备都被撤退的德军运走或破坏。而战争本身又对春耕春种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使一年的收成落了空。剩下来的许多东西，不是为当地居民所抢走，就是为苏联军队所征用。在西部占领区内，大批投降德军和难民的存在，纳粹经理们的逃亡，盟国自己的军队的到达，南斯拉夫的侵入和依靠德国战争机器推动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综合体的崩溃，已使工业实质上处于停顿状态。

（二）粮食供应

盟国和应变的奥地利当局的燃眉之急都是粮食供应问题。维也纳的整个粮食供应和分配机构已经瘫痪了。甚至在3月和4月两个月内，正式的口粮定量已经减至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约等于正常定量的一半。而一旦所有储备粮食都用尽之后——实际上很快就用尽——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粮食了。不但下奥地利的正常供应来源已被切断，而且不再存在任何一个可向别处采购粮食的组织。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纳粹分子，大部分已经逃跑。不管是公路运输还是铁路运输，都已停顿，因为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有三百八十五座铁路桥梁已被摧毁，维也纳的所有铁路车站，只有一个未遭严重破坏。维也纳的卡车数字从1944年底的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二辆下降到1945年底的三千五百五十三辆，摩托车从一万七千八百十五辆下降到一千七百八十六辆。^①5月份维也纳的每日口粮定量降至极为可悲的水平——三百五十卡路里。伦纳向托尔布欣元帅求援。俄国人答应援助，给维也纳居民分配了油、肉、糖和干菜，暂时使这个城市免于饥馑，^②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在下奥地利苏占区内的其他工业中心，情况是十分危急的。象圣琅尔滕和维也纳新城这些城市，有三、四个月每天平均口粮只有五百至六百卡路里。事实上，这时维也纳和这些城市的粮食情况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地区还要糟。

西部占领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糟。奥地利多山的特点，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颇不宜于农业的，而现在人口已激增，因为来了许多流亡难民，这些人的早期情况是到处流浪，恣意劫掠。

1945年7月底，维也纳的情况略有改善，因为临时的盟国救济计划把口粮定量标准定为八百卡路里，而如前所述，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答应了丘吉尔所提出的要求，帮助解决维也纳非苏管区的粮食供应。^③那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一向是来自现由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的。盟国对奥委员会一经在维也纳成立，情况便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从9月23日起，盟国委员会把维也纳的每天口粮定量从八百卡路里增加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但是，在其后的许多个月内，维也纳和各州的情况依然不佳。城镇居民大多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唯一吃得相当好的人是盟国人员和那些处于偏远地区而又能自给自足的农民。一定数量的供应品就从这两个方面流进了黑市。例如1946年2月28日官方报纸《维也纳报》报道说，前一周内有五百八十三起检举黑市罪犯的案件，而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代表团于1946年6月在维也纳调查粮食供应情况时，却连一个黑市饭店也没有发现，^④那个报道或许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测定。这个代表团报告说，结核病死亡率从1938年每十万居民中有一百人，增至1944年的二百二十三人，1945年的二百三十五人，1946年3月的二百四十二人。从1944年到1946年，婴儿死亡率从每一千个一周岁的孩童中有八十八人增至一百九十一人。^⑤341在1945—1946年的冬季，就连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定量都维持不住了。到1946年3月，尽管美英两方紧急运入粮食，但普通用粮户的定量已经减至一千三百二十卡路里。由于面临一次肚界性的缺粮（英国第一次被迫实行面包配给制），盟国委员会不得不于3月18日把正常定量减至一千二百卡路里。^⑥

与此同时，已经采取步骤去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可能给予的援助，虽然进展慢得令人遗憾。尽管奥地利过去是一个敌对国家，没有资格成为会员国并受到援助，但在1945年8月联总行政委员会在第三届会议上通过了特

别决议，“由于对该国实施行政管制的有关当局请求并赞同其意见”，①批准在奥地利进行善后救济工作。1945年12月18日，②盟国委员会邀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一个工作组来调查并提出建议。早在新年里，经济管理局内部已开始对方式进行讨论，并同奥地利政府磋商。1946年4月5日，奥地利政府和总署行政委员会最后签订了一项协定，③5月1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式承担起购买粮食供应奥地利的经济责任。即使如此，但由于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船舶和粮食的当年调拨任务已经十分繁重，盟国委员会不得不提供临时援助，把已经同意的供应普通用粮户每人一千二百卡路里的定量标准维持到6月1日。希望到那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尽快送来粮食。实际上连这个希望也要落空。春旱之后，雨水特多，收成的前景，低于原来估计的水平。粮食部长弗伦策尔不得不告诉盟国委员会说，本国的粮食只能供应全国需要的百分之二十二。下奥地利的副州长说，有些地区，人民正在每天靠六百至八百卡路里来活命。为了弥补不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又得向盟国筹借二万五千吨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来应用。①342即使如此，情况仍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一千二百卡路里的水平抵不上战前正常标准的一半。曾经希望在秋季有可能至少增加到一千五百卡路里，但是等到掌握了收成的详细情况，就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了。10月1日，费格尔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监紧急呼吁求援，说定量继续为一千二百卡路里将意味着人民“体质的毁坏”，他还指出，奥地利与接受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的卡路里定量比例较低。他以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来增加呼吁的力量，说在德国，普通用粮户现在的定量水平是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他要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10月14日起保证奥地利的基本定量为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②费了很大的劲，从11月11日起才达到这个定量。但即使如此，普通用粮户的定量有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增加到这个水平以上③，甚至维持这一标准也由于秋季苏联方面对公平分配的方式设置障碍而遇到了困难。①7月23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批准，到1946年底最后分配给奥地利的基金达一亿一千七百三十万美元。②总数中的大部分是用于救济——大约粮食八千一百万美元，衣服、纺织品、鞋袜二百万美元，还有医药用品二百万美元。这样只剩下三千二百多万美元用于复兴，其中较大的部分，将近二千一百万美元，要用于农业上的需要——种籽九百万美元，农业机械六百四十万美元，其余用于包袋、绳索、肥料等等。这样就为补救奥地利经济的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打下了基础。

为便利起见，上面一直提到“普通用粮户”的定量标准，因为当时大多数正式参考文献中都是用这个标准的。但必须指出，这多少被误认为是这一时期奥地利每人平均343均消耗的实际卡路里量的一个标准。在约计七百万的总人口中，大约二百万人多一点是粮食自给的，他们的口粮定额比其他人要高得多。剩下的五百万人中，诸如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其他工人、儿童、孕妇或哺乳的母亲等，获准增加补充定量，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补充定量是与家庭中名义上只享受“普通用粮户”定量的其他成员分享的。现在评论中的这一时期分配给所有定量口粮消费者的卡路里平均数，经计算如下：①

1945年6月至1945年8月1,082 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1,679 1946年3月至1946年5月1,361 1946年5月至1946年11月1,529 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1,824 同时还必须提一提规模很广、组织很好的外来救济工作，它大部分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1947年初，英国若干团体同英国红

十字会和爱尔兰红十字会一起，送来了五千吨食品、四百吨医药用品和四十吨衣服。到 1947 年初，美国各慈善团体送来了九千五百多吨食品和三百二十吨衣服。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于儿童。许多儿童给轮流地送到奥地利境外的许多疗养中心。英联邦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也都是乐于提供援助的。②最后必须提醒一下，那些在乡村里有亲友的奥地利人，偶尔到较少需要粮食供应的地区走一趟，也可以补充他们的定量。但是，即使把这些粮食补充来源都计算进去，事实仍然是这样：在战争结束后的头两年内，整个奥地利人民都营养不良，其严重程度对经济恢复的总进程产生了连续而有破坏性的影响。

（三）燃料和动力

在 1945 年和 1946 年间,供应每人仅够维持生存的口粮必然是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向用户提供煤和电。为恢复国家工业提供燃料和动力,也成为仅次于前者的紧要任务。

燃料情况本来是不会很糟的。1937 年奥地利固体燃料的总消耗量以无烟煤计算是五百十五万公吨。国内出产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余百分之六十五全靠进口——其中来自德国的占半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各为四分之一,还有一些零数是从匈牙利进口的。此外,虽然 1937 年无烟煤的总消耗量是二百八十八万六千六百公吨,但国内产量只有二十四万五千吨。因此,全国无烟煤的需要量中,靠进口的不少于百分之七十八。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一些炼焦炉时^①没有扩大采煤设备,因此这种基本情况到战争结束时并未改变。但是进口来源现在已经断绝了。奥地利唯一的无烟煤矿位于苏占区,褐煤矿分布在英占区和美占区内。组织解体,劳动力减少,再加上粮食匮乏,在短期内使本国生产犹如涓涓细流。^②

不久生产就重新开始了,尽管存在着巨大困难,1946 年的年产量,折合无烟煤计算,总数达一百二十六万公吨。但这个数字还只是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数达二百万公吨左右的进口也不足以使总数相当于 1937 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此外,进口大部分来自德国,一旦要求鲁尔供煤的竞争开始紧张起来时,它是否能维持,那是绝无把握的。

关于石油问题,尽管有不同的原因,其情况还是相当困难的。奥地利国内有相当多的资源。自 1934 年下奥地利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开采以来,国内原油产量到 1937 年增至三万吨。纳粹的开采办法虽不经济,但 1944 年终于把石油产量提高到一百十二万吨。1937 年奥地利国内消耗量只有三十八万吨。据战后估计,正常情况下的产量每年可达六十六万吨,^①因而即使在这个水平上,除某些特种类型的石油外,也能满足奥地利国内的全部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剩余可供出口。不幸的是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位于苏占区内,这就使这些估计多半成为纸上谈兵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奥地利政府签订的协议有这样一种谅解,就是说四国都要提出足够的石油 345 来维持奥地利的经济生活。1946 年 3 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建议会员国政府“凡在其他接受联总救济的国家驻有军队者,应指令其部队不要消耗当地生产的……燃料或其他正式列入联总计划之内的供应品”,当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中并不包括液体燃料或滑润油。而实际上,提供民用的交货是零星分散的,有时候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工业生产,即使按 1947 年 1 月共产党的《人民之声》的说法,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了大约每年五十万吨的水平。^②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也许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经济财产,但是甚至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奥地利政府签订协议时,它的控制权仍不在奥地利人手中,事实上自 1938 年德国并吞奥地利以来,它从未为奥地利人所掌握。1945 年 4 月苏联部队到达以后,新占领油田的这些外国人开始把大量的设备和供应物资当作战利品运走;后来他们突然改变政策,重新开工生产,随后又根据波茨坦协定的条款把油田划为“德国财产”而坚持油田的所有权。苏联军队守护着油田设备,产量大部分输往苏联。盟国委员会和奥地利政府几次三番提出抗议,都无效果。

另一方面,电力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奥地利的巨大水力发电潜力,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步得到开发，纳粹又进一步予以扩大，即使其发展目的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但资源依然存在，实质上并无损坏，而且迅速投入生产，其水平大大超过战前。固体燃料奇缺，要求以电力代替，即使目前产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满足战后的需要。尽管如此，但工厂至少是完整的，预期大有可能逐步满足全国需要，而且比较经济。

燃料与电力的缺乏再次增加了个人用户的困难。在 1945—1946 年的冬季，按维也纳的标准来说，还不算严寒，但是一连几周气温在零度以下，家里难以取暖，这对老年人和首都大批住在窗无玻璃的公寓或宿舍里的人来说，是特别困苦的。一到周末，凡是强壮的人都去维也纳森林或附近乡村搜寻能够找得到的燃料。老年妇人跟在盟国煤车后面希望从雪地上捡到几块煤的景象，到处可见。

(四) 工业总情况

如前所述,提供粮食、燃料和其他形式救济的压倒一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推迟了整个经济的恢复。然而,即使上述需要并不那么迫切,严重的障碍也早已存在了。姑不谈由于纳粹强迫奥地利经济与德国体制合而为一,许多经济部门都以非经济的形式出现,据战争结束时估计,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大约百分之四十已被破坏。苏联以波茨坦决议为借口进行了掠夺^①,其结果使上述比例在战争刚结束的阶段急速提高。此外,奥地利的整个对外贸易结构已经支离破碎。占领区的强制划分,意味着那些甚至能从国内得到原料的工业,也往往不能保证得到原料。基础工业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占领区,而精加工的工业则大部分在东部。^②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攫取的战利品,既是囊括一切,又是不加选择,从工厂整个工段的设备到牛羊、家具、私人所有的杂物用品,都兼收并取。^③伦敦政府对此毫无权力禁止。因此,工业恢复的活动首先必然只限于在西部占领区内进行,而由于缺乏任何全面掌握的权力来领导,就是在西部占领区内,也只能在州的基础上尽其所能而已。而况,各州之间的分离主义倾向导致了商业上的竞争。^④施蒂里亚缔结了一项以菱镁矿向法国交换磷酸盐的协定,并从鲁尔得到了煤。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协定,以按来换取玻璃的进口。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一种贸易趋势,即与占领国结成纽带——并不是通过有关军事当局的专门倡议(不管怎样,他们手里已充满了一般问题要处理,例如德国战俘、流亡难民、法律与秩序、非纳粹化等等),而仅仅是因为商人最容易能和他所在的占领区内的有关国家接触联系。至少有那么一个观察家认为,给奥地利安排占领区是“近乎精神错乱”,^⑤这种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一切困难,贸易和工业还是开始 347 迅速地恢复活动了,即使规模狭小而又受到严格限制。奥地利如与德国或英国比,它的工业化水平较低,这意味着手工业工人和小规模企业在国家经济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纳粹统治结束后,民族主义勃然兴起,这就激励了要求恢复的意志。初步的恢复主要是从小工场、小商行中开始的,因为比起大企业来,它们的性质更适宜于采用临时应急的措施。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意志也反映在产业工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他们虽然不能经营轻重工业工厂,但一俟原材料和燃料能够正常供应时,他们将会以同样的魄力和个人的首创精神,争分夺秒地从事恢复和再建工作。许多工厂在有限的规模年重新开始生产,到 1946 年 1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生产实际上已提高到相当于 1937 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①

应该再强调一下,工业恢复的这些开端,主要是奥地利人本身努力的结果,因为盟国的援助多半限于进口食品和燃料。1945 年 9 月,盟国对奥委员会成立,对占领区之间的货物流通放松了控制,对交通也随之作了某些改善。但是即使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 1946 年 5 月着手工作的时候,力量还是集中于救济方面,这是说到年底为止所分配的一亿一千七百三十万美元^②中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可以留作援助工业之用。然而矿山和基础工业保持着不断向上的趋势,1946 年 10 月的产量达到 1937 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另一方面,消费品工业的产量则落在后面,甚至到了 1948 年 3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的时候,消费品工业的产量还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③此外,尽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对农业进行了援助，1946 年底的农业产量仍然只相当于 1937 年产量的一半左右。

1945 年和 1946 年间，奥地利在恢复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主动精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对外贸易数字几等于零。但自 1945 年 8 月与匈牙利签订了第一个货物交换协定后，其他许多协定便相继签署，到年底总数达三十一项。然而这些协定并不 348 是都能完全执行的，到订约时商业方面的进口与出口量还只分别达到 1937 年进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一和百分之三点二。就是在 1946 年经济恢复继续增进之时，这年年底的进口与出口也只达到 1937 年相应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和十三。②

在外贸领域内恢复得这样缓慢，主要原因是苏联在 1946 年连续六个月坚持贸易协定不属于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中政治协定的范畴，而须得到四方的绝对同意。到这一年的 12 月，苏方成员让步，执行委员会才能授权奥地利政府不经盟国委员会事先同意可径自与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定贸易协定。③

（五）货币改革

1945 年和 1946 年间，奥地利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一点也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战争结束时，奥地利自然没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实际上都是空的，因为现金大多给俄国人拿去了，剩下的尽是不值一文的德国债券。唯一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知其总数多少，在德国垮台后仍然不断流入奥地利，特别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流入。盟国都暂时发行各自的货币。因此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收回德国马克，用国家货币来取代，并使流通量能有可以控制的平衡。

临时政府对这种局面自然非常了解——倒一点也不因为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其他奥地利官员由于维也纳银行缺乏存款而只限于每月领取薪金一百五十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苏占区内权力有限，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最迫切需要的立法一连多少星期还是草稿，搁在伦纳博士的办公室内；①等待国际地位的明确和管理全国的一元化权力的建立。苏联当局从它们所攫取的财产中提出六亿马克一笔“存款”作为兑换的基础，但是直到 1945 年 7 月 3 日按中央银行过渡法重建奥地利国家银行和颁布银行支付法时才开始实行。这就使解放后一直关闭的奥地利银行得以复业。银行支付法规定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六十全部限制使用，百分之四十部分限制使用，但对受严格限制的临时需要则准予支付。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个人把手头的一些款项存入银行，保证对这些存款不再限制使用。但是，这个立法仍只能部分生效，因为它只适用于苏占区，政府的权力仍局限于这个区域内。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内，纸币流通仍是自由的。①

1945 年 11 月 30 日所采取的第一个主要步骤是通过奥地利先令法，要求一切公开发行的银行纸币，包括德国马克和军用先令，在 12 月 1 日至 23 日期间向银行兑换新的奥地利先令，兑换率为一比一。现行的一切银行纸币，除十个德国马克以下的小额纸币外，全部停止流通，这些小额纸币留待以后处理。奥地利银行纸币的发行限于每人一百五十先令，其余部分以百分之六十列入限制使用帐户，百分之四十列入部分限制使用帐户。一种与此同时进行的业务活动，是对所有银行帐户以同样的比率将德国马克转为奥地利先令。最后一步是兑换小额纸币和硬辅币，于 1946 年 2 月 20 日实行。

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总的货币流通量。下面的事实说明了工作的一般规模，1938 年 3 月 7 日，奥地利国家银行的最后一周结帐单表明，总的货币流通量是八亿九千九百万先令；1946 年 2 月从银行和公众中收回的纸币总数是八十六亿五千九百八十万；同一日期按先令法在民间流通的货币略微超过十亿，加上向占领军发行的十五亿，总共约为二十五亿。兑换的结果自然是黑市价格和外国货币价格的暴跌。①由于第一次在全国实施统一的货币制度，贸易大为促进。然而，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平均每月的纸币流通量从 1937 年的八亿四千九百万先令增至 1946 年 12 月的五十五亿六千一百万先令。②350 就货币兑换对奥地利居民的影响而言，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限于批准奥地利政府呈送的法律，并对各占领区的实际兑换工作给予一些帮助而已。委员会倒较为直接关心奥地利当局提供给它们作为占领费使用的款项。这笔费用的总数多少，四国之间怎样分配，这是盟国委员会早期在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从 1946 年 2 月 12 日起，总的费用相继减至占每年联邦预算大约二十五亿先令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二十

五。这年年底，据一致同意，1947 年这个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五。③在占领之初，分配给苏联方面的费用高于分配给其他三国费用的总和，但这种不平衡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逐渐减小了。1947 年的协议规定，那一年的总费用为一亿三千万先令，其中四千万分配给苏联，其余三国各为三千万。①

（六）苏联的经济政策

奥地利政府促进工业和经济恢复的一切尝试，西方三国帮助奥地利政府的一切努力，总是因为盟国对奥委员会未能全面控制苏占区而遇到严重阻挠，前面已经提过，苏联当局掠夺了大量的原料、工业设备和私人财物。^②这种掠夺在 1945 年整整一年中继续未断。其中有很多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而且对苏联经济是否有利，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机器拆卸下来，往往一搁就是几个星期，任其生锈，然后才装走，有些简直永不装走。波茨坦协定签订后，俄国人的手法略有改变。苏方代表建议与奥地利政府签订一系列单方面协议，仿照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建立公司的先例，建立苏奥混合公司，以开发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和管理多瑙河航运公司。^③这样就会导致苏联控制奥地利经济的重要部门。临时政府以值得赞扬的坚定态度拒不同意。^④后来俄国人再度把力量集中在大规模拆 351 运的政策上。可是在 1946 年春季，他们最后也抛弃了这一政策，以利于把定为德国财产的设备原封不动地留在奥地利，使之为苏联的经济利益开工生产。于是建立了一个机构，名为“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这个名称来自俄文第一个字母 USIA），^①以监督各有关事业。1946 年 6 月 27 日，苏军司令正式下令将东部占领区年一切德国财产转归苏联所有，^②并于 7 月 16 日把情况正式通知奥地利政府，^③自此以后，大约有四百处财产就这样划归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掌握了。这些财产包括生产石油、硫酸、金属板、人造纤维、电力设备。建筑器材和玻璃在内的各种企业。

苏联政府可以援引美国处理赔偿专员在波茨坦会议后于莫斯科召开的战争赔偿会议上所作的让步，为它对波茨坦协定^④中赔偿条款的解释作辩护。当时出席赔偿会议的美国专员承认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即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在波茨坦所指定的那些国家的全部德国资产。^⑤此外，在波茨坦会议后，美国政府于 9 月 7 日曾致苏联政府一份照会，提出：虽然〔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有权监督和处理德国国外资产的分配，但苏联政府可以处理德国在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无需通知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可以处理其他一切德国国外资产，无需通知苏联政府。^①

西方国家要反对苏联的这种立场，可以援引 1943 年 1 月 5 日联合国在伦敦发表的宣言中关于强制转移敌管区财产问题的规定。这一文件苏联是参加制定的，它为签署国保留对被占领区财产的任何转移宣布无效的权利，不论转移所采取的形式是“公开的掠夺还是在形式上似乎是合法的处理，即使据称是自动实现的”，^②都无例外。但苏联政府坚持该宣言不适用于奥地利。这个论点似乎是有一些法律根据的。^③

尽管苏联当局可能提供法律论据来支持其行动，但其行动本身显然是直接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四国新近达成的承认奥地利政府并允许其对全国行使管辖权的协议的精神的。

英国高级专员斯蒂尔上将代表英国政府立即向苏军司令提出抗议。贝文在 1946 年 7 月 12 日的外长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四国委员会来报告主要困难，即对构成德国在奥地利的财产下一定义。^①8 月 2 日，诺埃尔-贝克在下院宣称，英国政府认为“任何使奥地利划分为占领区的影响加剧的行动都是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如果任何这类行动似有可能“破坏四国都曾同意

保持的奥地利国内外的领土完整”，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②但贝文的建议遭到拒绝。英国提出的抗议和奥地利政府采取的大胆行动都无效果。奥地利政府打算通过一项国有化法律来对抗苏联的行动，该项法律适用于苏联当局要求占为己有的许多奥地利财产。这项法律如果实施，就可以使那些财产免受苏联的控制，至少也可以大大限制苏联的控制。可是在这项法律送交盟国委员会的时候，尽管西方三国的成员毫无异议，但苏联高级专员却立即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这项法律干涉了管制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可以根据以往的盟国协议直接采取行动处理德国财产的权利。③库拉索夫上将不祥地补充说，苏方保留在苏占区内为保护其本身利益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

苏联的反对并不足以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因为根据新管制协定的条款，反对意见必须四方一致才能生效。但很明显，不管这项法律正式颁布与否，苏方是不会允许它在奥地利东部施行的，①因而奥地利政府本身宁愿暂353 时停止执行占领期间有争议的措施，而不想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有限制地予以实施。

但事情到此尚未结束，在秋季和冬初，盟国委员会内部因苏联的态度而进一步引起了争论。9月14日，苏方企图诱使其他三方接受一项限制以后十年内奥地利工业能力的计划，②未获成功。10月11日，盟国委员会指示执行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关于控制边界的法律草案，因为苏方不仅想把占领国的军用品而且想把占领国的一切用品都不规定在法律条款之内，这一步骤将使苏方想要定为已有的任何东西，特别是苏方控制的各种企业生产或需要的物资自由进出苏占区合法化。③一星期后传来消息，说俄国人已不准奥地利人视察苏占区的工厂，并已下令凡食品和工业品未经签署许可证者不得在苏占区内作任何距离的移动，或移出境外。④

这种政策如果允许继续推行，将会迅速造成苏占区与奥地利的其他地区隔绝，而新管制协定也要变得毫无意义了。西方三国立刻采取抵制行动。在10月25日的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英国高级专员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一项长篇声明，评论苏方对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解释。他说，国有化法律对苏联的赔偿要求毫无影响，苏方无权否认已经生效的盟国委员会的决议。①这项声明在奥地利国内外广泛宣传。虽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势，但对苏联的政策的确起了节制作用。②显然俄国人曾经决定，一味采取执拗态度是对己不利的，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同意作出决定，承认奥地利政府有权控制本国的全部资源，并将所有这些资源充分用于奥地利经济。③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盟国的意见分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出现的情况各自发表公报。塔斯社介绍这次会议的公报是别具一格的，它几乎不提会上的让步，而集中谈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奥地利政府不曾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利用本国资源或通过稳定价格来消除奥地利工业方面令人不满的现象。事实上奥地利政府已经得到指示，要在三十天内提交出一份复兴工业的计划，包括进出口计划在内。④

局势的关键问题在于奥地利政府不能实行全面控制，不论本国的粮食，还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粮食，其分配必然不均；而就东西两部分粮食资源数量不相等的情况来考虑，可能蒙受最大损失的是苏占区。争吵一直持续到年底。但在11月15日，美方重申了它要把奥地利作为一个单了的整体并统筹粮食供应的意图，①于是12月3日苏方同意在1946年12月8日到1947年1月3日这段时期内允许苏占区的粮食供应品自由流通。②

但是，奥地利政府虽然在这些方面的权力已经再次得到了肯定，苏联却通过其财产管理局的活动仍然严重地限制了奥地利政府的权力。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一开始就象一个在奥地利国土上独立行动的代理机构。对奥地利的法律和商业惯例毫不考虑。它的买、卖、进口和输出等活动毫不注意奥地利的正式规章。后来它毫不犹豫地^①在维也纳苏管区和整个苏占区开设了一系列零售商店。在这些商店里，凡是从东方进口的无税商品，或由管理局所属苏占区企业的产品，卖出的价格比任何地方都便宜，这显然是想证明共产党企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维也纳人并不受骗。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存在便足以充分说明苏联对待奥地利的真实态度。但是这一整套制度是奥地利经济体上的一个流脓的疮伤，是恢复经济的主要障碍。

在试图评价盟国对奥委员会这一阶段在经济领域里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曾特别提到过奥地利人本身在创业活动中所担负的日益增加的责任，也提到过盟国对奥委员会活动范围的相应缩小。与此同时，不应认为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是可以忽视的。在早期的时候，经济 356 管理局年做到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交换了统计数字，共同估计了这个国家的总的需要，并对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作了有效的估计。就物资援助而言，苏方在早期清楚地表明，它无法继续或实质上对粮食供应出力，而法国政府则在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无法养活其本国人民。然而，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计划于 1946 年夏季生效之前，四国是补充供应的主要来源。的确，如果没有它们的援助，没有许多外国救济组织的自动援助，奥地利就要沦于饥谨了。此外，这种援助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停止工作之后还是以很大的规模在继续进行下去。到 1946 年秋季，进一步援助的前景已趋暗淡，11 月间，费格尔给盟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要求用外国贷款来弥补预计 1947 年因购买粮食而造成的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的赤字。年底之前，英国同意提供八百五十万英镑作为救济和重建款项，还有一百五十万英镑作为购买原羊毛的商业贷款。接着美国也提供援助，1947 年初它是唯一能够按所需的规模提供援助的国家。^①

主要来自英美的这种或别种形式的援助，使奥地利政府能够在 1946 年间开始进行长期建设工作，到这年年底，可以断言，尽管困难重重，但终于打下了战后经济恢复的牢固基础。

第四节 几个特殊问题

（一）难民与流亡难民

虽然单从人数方面来说，流亡难民问题在奥地利并不象在德国那样严重，但就其复杂性而言，它肯定与德国不相上下。毕竟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当务之急是把大批接受投降的敌方部队集合起来，解除其武装。在冯·谢尔上将指挥下的德国西南军区的百万大军中已经包括驻扎在萨尔茨堡、福尔拉贝尔、蒂罗尔和卡林西亚部分地区的部队，而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战线的某些部队也撤退到奥地利来了。①此外，还有一些从西部和北部撤退到奥地利的部队，其中包括这样的仆从军：一个匈牙利兵团 356 和一个哥萨克兵团。②后者是弗拉索夫将军所部的一部分。但是，对这些敌军的处理，只是总的困难中的一个最紧迫的方面而已。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根据第三帝国与意大利、苏联和罗马尼亚所订的协议，成批的日耳曼裔移民已经迁到了奥地利。1939 年和 1940 年间有四万至五万南蒂罗尔人定居在奥地利，不久接踵而来的有布科维纳的一万一千名德国人和比萨拉比亚的一万名德国人。1941 年南斯拉夫被肢解之后，斯洛文尼亚的戈特舍飞地大约有，一万名操德语的人移至第三帝国，①其中有一批定居在新并进来的南施蒂里亚和南卡林西亚。在以后几年里，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原因是德国工厂为避免盟国轰炸纷纷迁进了奥地利。随着工厂而来的有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包括战俘和其他从德国占领的欧洲许多国家中押送出来强迫劳动的人。最后，德军撤退时，后面总是跟着一大批难民——有两万名德国人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三万六千名来自罗马尼亚巴纳特，还有不知其数的人来自南斯拉夫巴纳特、西尔米亚、斯拉沃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②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政治难民——纳粹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纳粹箭十字组织的成员。1945 年 4 月，许多奥地利人为躲避俄国兵从东部逃到西部，使局面又增加了混乱。

那时上述各种人总共有多少，无法提供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单是德国战俘就有二十五万名。③据同一资料估计，在美占区内的流亡难民就有七十万人，还不包括从东部逃来的大约二十万奥地利人。韦南根据广泛调查，推算出在整个奥地利境内非日耳曼裔的外国人有九十万名。①除去德国部队，这时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这一数字也许可靠。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可以想象，尽管预先已经订出计划，但除了粗糙而即可实施的控制措施外，几乎难以采取其他办法。一开始的局面就好像是在战场上打仗。一支支德国部队被集中起来解除武装。大约有八万五千名苏联公民组成的哥萨克兵团，被强行从英国人手里移交给 357 苏联管制。②搭起一座座临时帐篷，供给成群结队的非军事难民居住。注册登记和大致分类的工作开始进行。过了好几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训练的专门人员才能着手进行具体的工作、这些专门人员就成为军政府成员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初划分的两大类，一是属于联合国家的国民，一是前敌国的国民。首先着手有组织地遣返所有愿意回国的第一类人员。这些人大多来自西欧——盟国战俘、被迫应征服劳役者、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其他来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虽然后来情况变了，当时却也有许多人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去。③至于前敌国国民，从奥地利遣返的德国战俘，数字也很大，到 1945 年底实际上已全部遣返。④对参加前德国军队的奥地利国民，则就地予以释放。

但是，尽管在初期取得了这些成绩，由于难民从毗邻国家陆续不断地流入奥地利，由于许多难民越来越不愿意回国，又由于东西方盟国之间初期出现的意见分歧，正如影响其他一切问题的处理一样，也影响了流亡难民问题的处理，因此情况不久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战争刚结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开始把所有具有德国国民身分的人——德国本土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驱逐出境，其后不久，匈牙利也如法炮制。这些人大量涌入奥地利，与之俱来的还有从奥地利东部苏占区逃来的其他许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想到西方国家占领区内避难。^①而且，尽管在制订计划阶段认为所有流亡难民都会愿意重返家园，但很快就清楚，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苏联或苏占区和来自现由铁托元帅政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人，都极不愿意回国。这些政治难民在联合国家和前敌国的国民中都不乏其人。的确，到 1945 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凡是愿意离开奥地利回国的人大多数已动身了。^②因此，原来划分的两大类，实际上已变为愿遣返者与不愿遣返者这样两大类了。358 这种划分是盟国对奥委员会有效工作的直接成果，因为在 1945 年 8 月四国流亡难民管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这种分类很快导致东西方之间根本性的意见分歧。^③苏联坚持强制造返，西方盟国则坚定不移地拒绝往后对难民采取强制措施，那些被证明是战争罪犯的人则当别论。苏联坚持己见，使寻求共同行动基础的尝试失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种统一政策，因此各国在其占领区内继续自行其是。

然而，即使在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情况下，进展还是有一些的。波茨坦会议为了试图改变这种混乱情况，曾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遣返工作虽然要做，但应该要求三个有关当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府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暂时停止把德国人驱逐出境，好让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便在各占领区公平分配被驱逐出来的德国人。^④波茨坦协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部分没有提到奥地利，所以一开始时对奥地利未起作用。但在 1945 年 11 月 20 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⑤把奥地利列入要驱逐德国本土公民和其他国家中德国公民的国家之一。对这些人的接运工作很快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这一机构名为“德国人代表团”，是在 1945 年 11 月 20 日成立的。它着眼于挑选熟练工人和其他在经济上对德国有用的人。由于奥地利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因此 1946 年 1 月 5 日在奥地利内务部成立了一个国民定居局，为了与“德国人代表团”抗衡，又成立了一个“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代表团”。但是，1946 年 2 月 19 日奥地利联邦政府与西方盟国签订的有关协定，苏方不予承认，下令波茨坦协定中提到的德国国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应一律从苏占区立即撤离。^⑥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战争结束时在奥地利居留的外国人，其总数到 1945 年底毕竟大大减少了。许多联合国家的国民已被迫返。其中五万九千名波兰人和七万八千名苏联公民。实际上所有的德国战俘已经撤走了，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德国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也已着手遣返。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估计，其他难民为数尚多，大约有四十万人。^⑦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为前敌国民，百分之二十五为联合国家的国民，包括不论国籍，只要是在战时会遭德国迫害或受骗的人。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的人数只有五万，因为在可以救济的一类人中，排除了敌国民。

下一年内，因为那些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被送回了德国，形势大有进展；其余的联合国家国民被遣返回国，又使形势进一步好转。整个遣返数字不下二十万人。①留下来的人大部分是不愿风国的“铁杆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反华沙政府的波兰人、反苏的乌克兰人和以前敌对的匈牙利人，还有尚待遇返的大批被驱逐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甚至还有德国本土公民。经过各国遣返代表帮助说服，这些人中有的改变了主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刚被送走，新的难民又接踵而至。1945年底以后，所增加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都是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驱逐出来的。由于波茨坦协定并未提到上述三个国家，英美两方军政府拒绝这些人进入德国，他们不得已而留在奥地利了。此外，1946年9月，德国的美方当局因为它的占领区内有人满之患，不得不暂时停止批准入境。不久，德国的英方当局也作出类似的决定。②

而且，与此同时，又有大批犹太人离开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其中大部分要去巴勒斯坦，却把奥地利当作中间停留站。撇开持续不断的膳宿供应问题不谈，他们的到来特别给英方制造了政治上的复杂情况，因为英国是受托管理巴勒斯坦的国家。③

除了许多新难民进入奥地利外，还有不少已经在奥地利的难民，一开始就逃避了注册登记，其原因不是当局出于疏忽，碰巧把他们漏掉了，就是他们有意规避，生怕360登记后可能引起什么后果。等到西方国家反对强制遣返的政策逐步为众所周知时，他们中有许多人就不再隐蔽，出来向当局要求救济。

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是，到1946年底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总数只是比1945年底的总数略多一些罢了。根据1946年10月1日英国的一个估计。其数字为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其中有二十六万人是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①1947年4月美国的一个估计，认为总数是四十六万七千五百七十七人。

②

人们一直注意到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处理流亡难民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想法，这种分歧是苏联坚持强制遣返所造成的。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采取统一的政策，并严重妨碍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联总与奥地利政府的协定③中规定，既然处理流亡难民是盟国委员会保留管制的一件事，联总的参预必须根据它与委员会订立的协议。但事实上苏联的反对使这项协议未能达成，其结果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得不根据它和三个西方国家的高级专员所订的各项临时协议来进行工作。④实际上这并不十分妨碍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来执行救济和遣返任务，因为理由很明显，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内的。尽管管理方法各不相同，三国工作的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难民集中在西部占领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苏联利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虽然许多流亡难民如果给予机会都是很想干活谋生的，而且的确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并于最后获得了为奥地利所接纳的权利，①但是也有另外许多人，特别是在初期，不愿接受管制，自由自在地到处流浪，随遇而安，谋求一饱。他们这样做，不但失去当地人对整个流亡难民所处困境的同情，而且威胁着公共安全。苏方就能够利用这一点，还利用西方的反对强制遣返来一再攻击西方国家在其占领区内藏垢纳污，“窝藏法西斯分子”。的确，在1946年6月巴黎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就以此为理由来推迟考虑签订奥地利条约。②

有趣的是，尽管这样，苏方倒被劝使提供其占领区年 361 流亡难民统计数字，但他们的统计显然是随意武断，这就降低了统计数字的价值。举例来说，1947 年 4、5、6 三个月的难民总数一直是六万八千人，而从 7 月到 12 月却是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二人。^①

奥地利政府在照管难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象它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 1946 年 3 月接管之前，奥地利政府不得不以先令来偿付难民营的费用，而救济难民的进口物资的总费用则是由奥地利政府作为总的救济债务的一部分来支付的。在初期，军事当局还供给诸如建造临时营房的设备和管理难民营必需的交通工具，但到 1946 年 5 月 31 日以后，这类供应便告中断，供养难民的全部费用就都由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担了。^②

到 1946 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流亡难民问题乃是国际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其工作时，不能予以忽视，于是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建立了后来成为国际难民组织的机构。^③但就奥地利而言，虽然不可否认，流亡难民很快就以他们的劳动力奥地利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甚至到 1955 年，难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 警 察

苏联训练的共产党人和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茨·霍纳被安插为伦纳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而重建一支非政治性的警察力量乃是它们本身所确定的初步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简直不存在什么警察力量。纳粹所建立的整个组织机构都已瘫痪，那些负责人都已逃跑。其后在 1945 年 6 月，俄国人首先建立若干辅助警察小组，归鲁道夫·豪特曼领导，此人过去是电车售票 362 员，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而弗朗茨·霍纳领导的来自南斯拉夫的奥地利游击营则驻在霍夫堡，充当共产党的护卫队之一。^①但与此同时，奥地利旧警察中的一些人员，在弗朗茨·纳吉指挥之下，从奥埃尔斯堡宫的抵抗运动司令部派出来工作。^②其后不久，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副部长社会党人奥斯卡·黑尔默根据 7 月 20 日的权力过渡法着手采取积极步骤，在更加有组织的基础上扩大警察活动范围，摆脱共产党的控制。俄国人同意他的建议，召回前维也纳警察长、七十九岁的伊格纳茨·帕梅尔博士，因此到 8 月下半月其他盟国抵达维也纳随时，一个非共产党的警察力量的核心已经存在了。

10 月 7 日，在英国人的鼓动下，四方公共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建立一支由中央征募和组织的并经过适当训练的警察部队为主要目的，商讨了八点政策。法方和苏方唯恐新的警察可能变成奥地利军队的核心，这一疑虑必须打消。但到 11 月份，四方已一致同意制定一项政策。1946 年 1 月，在以前的罗绍尔—卡泽恩兵营建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学校，因此在年底之前应征的新警察源源而来。在成立一支重新组织的警察和宪兵部队方面，三个西方占领区都有进展，在苏占区内也有较少的进展。^①第一次各州代表会议^②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对警察的控制，建立了一个各党委员会，霍纳要有所行动就不能不通过这个委员会。1945 年底第一个自由政府成立后，内务部长的职务文由奥斯卡·黑尔默担任了。从奥地利国内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然是左右大多数选民的人民党对社会党人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从而成为加强联盟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也标志着结束了共产党人对警察的一切实际控制。黑尔默在西方国家的坚定支持下，着手清洗共产党分子，只有在苏占区内被迫勉强同意保留共产党分子的部分职位。毫无疑问，他最大的成功乃是把俄国人建立的由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迪尔迈埃尔博士领导的政治警察组 363 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在 1946 年之前，迪尔迈埃尔专横独断，有权把犯人扣留在劳动营内。有一个劳动营就座落在英国管制的维也纳第十一区内。英国保安官员在访问这个劳动营后，揭露了它内部骇人听闻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有两人不曾送至医院而在营内死去）。这个劳动营从此就不再归迪尔迈埃尔控制了。虽然他一时还继续活动，但其行动已受到严格限制。后来黑尔默终于能够把他调到奥地利西部去。

对警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说明奥地利政府的选举和得到承认已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从此以后，苏联政策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例如拒不同意奥地利政府一再提出而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建议，给警察发放武器^①和现代无线电通讯设备。诚然，奥地利人并没有完全控制苏占区的警察，苏联当局有时毫不犹豫地要让共产党警官继续掌权，或者力图威胁奥地利警官，不许他们执行本国政府的命令。甚至在 1946 年 8 月，当恢复治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时候，黑尔默的报告中还说，在下奥地利，谋杀案件有二十六起，

谋杀未遂案件有二十四起，暴行案件有九十八起。②总的来说，苏占区的治安情况虽然确实本比西部占领区好，但也不象外国报纸有时描绘的那样坏。

③

（三）检查制度

解放初期，西方三国司令官对奥地利国内一切通讯联络建立了军事检查制度，作为一种安全预防措施。但在苏占区和维也纳则无检查。①这时苏方已经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把非纳粹化的责任移交给奥地利当局。当四国开始讨论检查这一问题时，苏方竭力主张西方三国所建议的对维也纳国际通讯联络的民事检查也应交由奥地利 364 负责。②最后一致同意，维也纳检查局在盟国管制下检查一切民间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而维也纳邮政检查局则负责检查进出维也纳的国际邮件。1946 年间，奥地利政府多次要求停止一切检查，因为这与根据自由选举建立起来的全国性行政管理是不相容的。法国在其占领区内带头取消内部来往信件的检查之后，经过英方的推动，盟国委员会指令自 10 月 4 日起停止一切国内来往信件的检查。③但在 1946 年底之前，并没有进一步放宽检查。苏联方面一变早期的方针，在那时以前对放松管制一直采取敌视态度，阻挠了进一步发展。④

应该补充提一下，检查制度的继续执行，对于 1946 年间奥地利与外部世界的电报、电话和航空通讯的逐步恢复起了许多抵消作用。

（四）建议的对奥条约

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条约是在本书所述阶段之后才实际进行讨论的。然而，在 1946 年底前已经采取了某些准备步骤，在这里必须谈一谈。

从理论上说，盟国与奥地利之间无需订立什么条约。奥地利被第三帝国并吞后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因而从未与盟国交战。所以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签订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的。况且莫斯科宣言已规定把奥地利重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已经执政，如果四国对宣言有一致的解释，那么为了结束占领，就必须分别与奥地利政府订立协定，处理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东西方上开始就对宣言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尤其是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声明放弃向奥地利提出赔偿要求，随后又同意将奥地利东部的“德国 365 财产”给予苏联，而苏联对这一点的解释却与西方国家对独立的解释，观点完全不同。此外，南斯拉夫提出的领土要求，克里姆林宫予以支持，而西方则坚决反对。因此很显然，如果要有效地贯彻莫斯科宣言的保证，就必须通过占领国共同谈判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协定。这种协定应采用“国家”条约形式，正式调整政治和领土情况，以便第二共和国重获独立，同时规定占领军撤退的日期。

1945 年间，其他困难太多，不容许根据这些方针来考虑签订条约。但早在 1946 年 1 月，美国驻维也纳公使约翰·G·埃哈特向国务院建议，奥地利条约应与德国问题分开考虑，并应与意大利及东南欧的其他敌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同时开始进行。^①因此华盛顿准备了一份条约草稿，2 月份、美国正式通知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说他们希望下一次外长会议在巴黎开会时讨论对奥条约问题。^②5 月份开会时，英美两国代表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但未成功。^③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与贝尔纳斯的私人谈话中温和地告诉他，奥地利条约是一个“特殊案件”，不管怎样并无具体建议可供讨论，而且由于奥地利政府忽视非纳粹化工作，必须再予以占领一年，总之苏联代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④他们提出一个反建议，说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应先交副手们讨论，研究一下是否应由部长们亲自来考虑。为了对付苏联方面的反对，美国代表得到英法两方的支持，在讨论 6 月 15 日开始的下一半会议的议事日程时，建议列入奥地利条约问题，并建议副手们应同时准备好提供外长们考虑的条约草稿。苏联代表再次反对，这一回的理由是副手们已经在讨论五个条约，没有时间了。贝文提议四国在会议休会期间交换条约草稿，这也仅能 366 迫使莫洛托夫答应采取措施“加紧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罢了。贝文提出皮对意见，说英国代表继续坚持在 6 月份考虑对奥条约，“不管用什么方法对待这个问题”。^①外长会议间歇期间，贝文在 1946 年 6 月 4 日的下院外交辩论时，直率地表示出他的愤愤不平，他说：“苏联硬说他们不准备讨论奥地利问题。这一点我当时不明白，现在还是不明白。那时以后，美国已提交一份条约草稿。我们在外交部有一份详细的草稿。”^②

会议的下半部分继续召开时，代表们都已拿到了在休会期间散发的美国草稿。会议采纳了法国代表皮杜尔提出的决议案，把“审查奥地利问题”列入未项议程。6 月 26 日，英国代表散发了一份题为“对奥条约重要章节方案”的草稿。但只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7 月 12 日，才讨论了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建议委托副手们研究现有的两份草稿，如法国和苏联也提出草稿，可以一并研究。莫洛托夫相反提出了一项四点决议案，要求注意：新管制协定已经

给予奥地利政府更大的自由；奥地利的西部占领区内有四十三万七千名流亡难民，他们在战时反对过盟国，确已构成对奥地利内部安全和“毗邻民主国家”的一种威胁；因此需要以撤走这批流亡难民作为恢复奥地利独立的先决条件；（再提一下）必须先行签订五个其他条约，然后才能授权副手们准备对奥条约。其他代表对此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莫洛托夫又滔滔不绝地争论了一番，其论据是硬说奥地利还继续存在着纳粹主义，还在和德国勾结。显而易见，情况已不可能再有什么进展了。①

但与此同时，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6 月份达成协议：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和约中允许在交通线上留驻苏联军队，直到苏联从奥地利撤军为止。

因此在巴黎会议结束时，苏联代表取得了两个重要收获。第一，他们诱使美国和英国的代表透露出他们考虑签订奥地利条约的条件的性质。第二，他们获得了在奥地利愿留多久就可在东南欧驻军多久的牢固的法律基础。而西方盟国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对苏联不愿撤离奥地利又引起了另一个动机。

1946 年 12 月在纽约召开的下一次外长会议上，争取考虑奥地利条约的尝试又遭失败。然而，因为这时已完成了对意大利和一些卫星国的条约，莫洛托夫最后同意把对奥条约和对德条约一并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下次外长会议订于 1947 年 3 月召开。

其后对条约的谈判情况在《概览》丛书的以后几卷中有所叙述。②对奥条约的讨论是从盟国对奥委员会审议的不同标准上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并不是严格限制在所提参考条件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别是在赔偿管理处内，经常讨论着直接有关订约条件的问题。各国代表时常向有关的处提供谈判的消息。最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存在与否显然取决于条约谈判的成败，因此谈判的进展和前景对委员会工作的速度和总的气氛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这件事虽然与奥地利条约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但对奥地利战后的对外关系却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奥地利和意大利在 1946 年 9 月 5 日达成了关于解决南蒂罗尔操德语的居民问题的双边协议。但这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职责无关。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①

第四章 结束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的看来，西方盟国在 1945 年夏季进入维也纳时，对前途是满怀希望的。战争期间，盟国之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它们决没有严分东西，互相排斥，对希特勒给予毁灭性的失败，也未有所阻挠。而且，胜利者已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 368 组织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于丘吉尔所说的合作繁荣的“广阔高地”之上。盟国委员会中的西方高级官员非常清楚，特别在维也纳，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要与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因为比别人更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对成功的前景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在俄国人占领了格拉茨三个月之后，进入该地的英方人员，对于指望苏联军队做出模范行动，绝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看到的是铺着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烧，卧房四角粪便成堆；他们听到的是当地居民讲不完的遭受奸淫掳掠的事件。然而，当时军官一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国有可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总的说来能与俄国人合作共事，尽管彼此之间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苏联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们对俄国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动表示尊敬，《战争与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赞扬的口气谈到苏联，这些都同样有助于友好亲善。因此委员会中的许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维也纳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有机会积极参加战后受到双倍欢迎的重建工作，而且还为了有缘会见苏联盟友，谈天说地，互致殷勤，了解他们对于人生的见解。不仅如此，维也纳又是欧洲的伟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甚至纳粹主义和六年的战火都难以将其摧毁。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乃是众所周知的乐天友好的人民，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将是一项愉快的任务。最后，维也纳是通向其他国家或都城的大门，其历史影响几乎是同样伟大的或者更加伟大，但六、七年来却为烽烟所阻，不久就有可能从那里旅行到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甚至到更远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华沙。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 369 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末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

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 370 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

在盟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一级，苏联代表在行动上较大的自由。但时间一久，情况就很清楚：他们也受到较严的控制，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结合得越来越严密的一个组织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话。1946 年的春夏两季，一批与西方代表相处得很好的苏联官员为其他一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个苏方人员开始表现出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在苏联同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到 1946 年底，在盟国对奥委员会里，凡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后不归于烟消云散者，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现在已很明显，西方代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的关系，看来已不能象在战争刚结束时那样建立在友好的和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国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苏联世界里，个人关系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服务的，而代表的遴选与训练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在苏方成员这种逐步与私人断绝交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地强硬起来（本卷前面已有所叙述），而且这种断绝交往的确很明显是其精心策划的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部分。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局部问题都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奥地利产生的这种变化和苏联在其他国家采取的总的强硬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政

府逐步抛弃和战时西方盟国的合作，是步调一致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政府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许后者更引人注目——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了。从东欧国家传到维也纳的消息是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国代表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然而，尽管关系恶化，尽管例如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建立使苏联对奥政策显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苏方在公务上的关系，如果说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难得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也从未变得比冷淡还要糟。即使在开会时往往直言不讳，^①但会还是照开。即使对函件的答复可能一拖几周，但通信还在继续。即使正式宴会的请柬很少得到答复，但到时候苏方出席的次数还是多于不出席的次数，而在苏方担任主席期间，他还是分担举行招待会的责任，尽管必要的交谈往往用放映苏联电影来回避。^②

因此，就与俄国人合作而言。即使 1945 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为泡影，但失望只能说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样的保留意见，我们还必须说，盟国对奥委员会是起了作用的。通过其卓有成效的机构盟国秘书处，散发了各种文件，安排和组织了各种会议。每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达到反法西斯的战争目的时，四国达成协议还是比较迅速而有效的，有时即使不是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诸如逮捕战犯、遣散残余的德国部队并解除其武装、摧毁纳粹战争设备等问题上，交换情报和采取一致行动，相对地说都没有什么困难。占领初期四国还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统一，对四国本身所许诺的奥地利独立问题，能够达成书面协议，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时间一久，东西方对这问题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对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对奥地利的工会 372 组织，对奥地利的政党都给予自由了。自由选举举行了。与选举的结果相符，奥地利政府成立了。1946 年 6 月签署了新的管制协定，于是盟国委员会给予奥地利政府以很大程度的自由。此外，由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同意，粮食供应保持在免于饥馑的水平之上，起初是从盟国本身的军事库存中拨出粮食来供应，其后授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到奥地利进行工作。尽管苏方经常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许多问题还是达成了协议，这是事实。在经济恢复方面能够打下基础，得力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者较少，而是有赖于四方三国的几次努力与奥地利本身的不断采取主动，这也是事实。即使对一项奥地利条约的讨论已作出初步安排，但瞻望前途，仍是未定之天。然而，奥地利政府是从自由选举中获得政治权的，得到四个大国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承认，能对国内一切重要领域和大部分地区自由行使权力。单从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来说，就意味着打基础的重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没有战争，苏联的事后反对是不能使之垮台的。

但除了这种积极的成就之外，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年来，奥地利除了为纳粹德国所允许的文化接触之外，和其他一切文化联系都已断绝，现在所有四个占领国的文化宣传在奥地利犹如潮涌，这就使它直接和世界舆论再次进行接触。如前所述，每个占领国都出版了各自的报纸，以不同程度的审慎态度宣传其本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每个占领国还有各自的新闻社和阅览室，陈列了本国的图片和文学作品。此外，英国在格拉茨、格拉茨圣彼得和克拉根福有三个电台。^①美国在林茨有一个电台。法国在因斯布鲁克和栋比恩有两个电台。俄国人虽然没有正式控制电台，但通过在维也纳苏管区表面上属于奥地利的电台里设置苏联的常驻检查

机构，实际上也独特地收到了同样的效果。但四国之中、表现得最善于文化宣传的是法国。诚然，贝图亚尔将军对《费加罗报》的一个记者说，文化是“奥地利问题中的最具有法国特色的一个方面”。^②新闻社一直是各占领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开办新闻社同时并举的是开展 373 各种文化活动，“由各国进行文化外交的比较永久性的机构举办——英国委员会通过维也纳的一个办事处，后来又进一步通过格拉茨、克拉根福和因斯布鲁克的办事处；法国外交部文化局通过驻洛布科维茨宫的维也纳司令部和因斯布鲁克的法国学会；俄国人通过当地的“奥苏文化和经济关系促进会”；美方虽然一开始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美国新闻社的建设上，但也通过国务院的文化事务部门的代表开展活动。^①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互相竞争，给维也纳带来它们的某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财产，诸如书籍和图片的展览，演员、舞蹈家、歌唱家和音乐家的联袂光临。与此同时，盟国对奥委员会教育管理处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奥地利的教育当局，为学校供应新的教科书，并通过一系列暑期学校和交换学生的计划为研究人员的再教育提供方便。

不时到维也纳各占领国阅览室去走一走，从读者人数来试图衡量哪个国家在这种文化冲击中取得最大胜利，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陈设得如何别具匠心，琳琅满目，在夏季前来参观阅读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间里面人数最多，这或许不是不耐人寻味的。维也纳人对于如此慷慨提供给他们东西的确并不那么目眩神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至少是并不显得寒伦的。他们本身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而从被占领的最初时期起，他们就决心把这份遗产完整无缺地保存下去。奥地利临时政府在其决心重建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从最低层（从下水道着手）向上发展来重建战争废墟。它在宣布立即着手重建歌剧院（对于这一任务，它感激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在供给电影院和戏院的特殊用电量方面，也显示出既很精明又有创造力。当西方盟国到达时，可以看到音乐和歌剧已经重新演出了。通过歌唱家和音乐家顽强坚毅的努力，出现了奇迹，在 1945 年和 1946 年的整个严冬季节，上演了优美壮丽的歌剧，举行了一次次音乐会，演出了一出出戏剧。你可能在《菲德利奥》听到“囚徒合唱”，演员们穿着令人伤感的褴褛衣衫。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贝尔森和茅特豪森集中营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费加罗》在化妆舞厅的猩红、雪白和金黄的彩饰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见到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四国成 374 员。其中有些人也许在下午的会议桌上争辩过，晚上却和奥地利的各阶层人士一起在音乐厅聆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盟国对奥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维也纳这个头等重要的国际艺术中心的往日声誉，还可以使战后不久那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尚能为人所忍受。

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价值，可向其成员提供机会，从人性的角度亲身领略战后欧洲的现实。就此而言，这个委员会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出国工作的代表团或委员会比较，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大战结束后，几乎在欧洲的任何一国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能够亲自从流亡者、难民、饥饿、疾病和贫困等方面看出战争的含义。在柏林，他们同样能够充分地与法国、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国民结识交往。具有起码的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每天所见到的人有什么总的想法。可是在维也纳，因为这个城市规模较小，而盟国占领的目的又表现得比较温和，所以在个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别处

少见的亲密，而对于民族性格和观点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样更为严峻的气氛中有可能进行得细致些。即使苏联占领军比别国部队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他们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苏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图景带回俄国——诚然，从苏联归国士兵再教育过程的报告中明显地看出，苏联当局对于他们的公民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可能发生爆炸性后果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拿破仑战争期间，特别是拿破仑失败后联合占领巴黎期间，俄国人和西方接触，对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公开爆发是 1825 年由军官们领导的流产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谁知道长期与西方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又一直是苏联占领别国时不可避免的伙伴。在苏联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利用接近苏联在欧洲的占领区和西方之间的边界这一有利条件而投奔西方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们认识到本国政府多年来有计划地欺骗了他们，不让他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关于西方观念对其国民思想所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对此可能引起的长期后果惊慌到什么程度，我们猜测一下倒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考虑所有这些情况时，必须记住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目的毕竟不是盟国的政治教育问题，而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到 1946 年底，尽管无可怀疑地取得了进展，但是已经很明显，东西方对莫斯科宣言含义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就所能预料的情况来说，意见分歧可能要继续保持下去。如果当真苏联除了战争以外，无法取消当时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已经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苏联是能够这样做，而且也很想这样做的。苏联不改变它的整个对奥政策，奥地利是不会取得独立的。而在冷战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刻，那种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充其量是现在这种远非理想的形势可能令人不安地继续下去。总而言之，占领的确使奥地利获得好处。但它也遭受其害。由于战争而受到的破坏，继之以苏联在东部占领区的劫掠。占领区间壁垒的存茬阻碍了经济的恢复。盟国的征用造成房荒更加严重。占领费用给这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只有通过麻烦的手续，取得四个外国统治者的同意，才能进行治理。四个大国占领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人人都知道这是荒唐可笑的。

附 录

盟国对奥委员会

四国代表成员，1945—1946 年

美国：

高级专员 马克·W·克拉克将军（1945 年 9 月 1 日—1946 年 12 月 23 日）

副高级专员 A·M·格伦瑟少将（1945 年 9 月 1 日—10 月 29 日）D·W·布兰少将（1945 年 11 月 1 日—12 月 22 日）R·H·塔特准将（1946 年 1 月 5 日—1947 年 2 月 25 日）

政治顾问 J·G·埃哈特

英国：

高级专员 中将理查德·麦克里里爵士（1945 年 9 月 1 日—1946 年 4 月 25 日）

将军詹姆斯·斯蒂尔爵士（1946 年 5 月 24 日—1947 年 9 月 30 日）

副高级专员 少将 T·J·W·温特顿（后为爵士）（1945 年 9 月 1 日—1950 年 1 月 1 日）政治顾问 W·H·B·麦克（后为亨利爵士）

法国：

高级专员 M·E·贝图亚尔陆军上将（1945 年 9 月 1 日—1950 年 9 月 29 日）

副高级专员 P·R·P·，谢里埃准将（1945 年 9 月 1 日—1950 年 9 月 29 日）

政治顾问 L 德·莫尼科

苏联：

高级专员 伊凡·科尼耶夫元帅（1945 年 9 月 1 日—1946 年 4 月 25 日）L·v·库拉索夫将军（1946 年 5 月 10 日—1949 年 4 月 2 日）

副高级专员 A·S·热尔托夫上将（1945 年 9 月 1 日—1950 年 7 月 1 日）

政治顾问 叶·德·基谢列夫

